

第一輯

孙中山宋庆龄
Sun Yat-sen & Soong Ching Ling
Archives & Research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 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Co., Ltd.

1

Sun Yat-sen & Soong Ching Ling:
Archives & Research 2009/12

孙中山宋庆龄 文献与研究

- 论孙中山的强国思想
- 中国国民党一大前后孙特关系研究
- 孙中山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 孙中山与上海金融界关系述论
- 最后的奋斗：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主张
- 孙中山与上海情舍的关系和影响
- 政治法统：挪用与纪念日的演变
- 宋庆龄在德国
- 大革命失败后的邓演达与宋庆龄
- 宋庆龄研究回顾与展望
- 我家与宋庆龄的关系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Co., Ltd.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
文物管理委员会 编

Sun Yat-sen & Soong Ching Ling:
Archives & Research

第一辑

孙中山宋庆龄 文献与研究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 编

《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编辑委员会

顾 问： 金冲及 许德馨 张 磊 姜义华 林家有 沈渭滨
 熊月之 吴景平 盛永华 郭岱君 林孝庭 宋曹琍璇

编委会主任： 秦 量

副 主 任： 马玉成

编 委： 黄亚平 邹 镭 陈亚玲 陆柳莺 刘金驰 朱玖琳
 宋时娟 廖大伟(特邀) 邵 雍(特邀) 刘国友(特邀)

主 编： 黄亚平

副 主 编： 朱玖琳 宋时娟

编者的话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孙中山扮演了民族英雄、革命先驱的重要角色;而宋庆龄不仅是孙中山的战友、学生与伴侣,而且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不懈奋斗,新中国成立后还作为国家领导人进行政务、国务活动,并且在妇女儿童工作和社会福利事业上有着重大的贡献。无论是分别研究孙中山、宋庆龄的生平实践与思想主张,还是进行两位伟人整体的研究,都是非常必要的。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目前是唯一一家业务范围同时包含孙中山和宋庆龄的事业单位,主管上海孙中山故居、宋庆龄故居及宋庆龄陵园的文物保护和宣传教育工作,同时承担孙中山、宋庆龄学术研究的职责。自1985年正式成立以来,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即以“保护文物,加强研究,扩大宣传,教育后代”为宗旨,在研究工作方面获得了一定成绩。1991年,与中国福利会联合发起成立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在宋庆龄研究上取得了较多成果。历年来相继编辑出版的书籍和刊物有:《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目录》、《孙中山——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大型画册、《宋庆龄在上海》大型画册、《纪念宋庆龄文集》、《宋庆龄与中国抗日战争》、《国之瑰宝——宋庆龄的思想与实践》、《宋庆龄与中国名人》、《宋庆龄与二十世纪》,以及《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文物图录》等等,并定期编辑出版《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内刊)。2006年创建开通了以孙中山、宋庆龄资讯和图文数据为主的专业网站。

如同对其他近代人物的研究一样,关于孙中山、宋庆龄的各种史料文献的搜集、整理,弄清孙中山、宋庆龄的生平实践与思想主张的基本史实,是产生高水准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的基础。同时,我

们认为孙中山、宋庆龄研究,亟待提升整体学术水平,从而在整个中国近现代人物研究的主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一直有一个愿望,那就是编辑和公开出版一份孙中山、宋庆龄学术研究的丛刊,其主要篇幅,一是刊发关于孙中山、宋庆龄新的文献资料,供研究者使用;二是发表国内外专家学者新的研究成果。通过这一公开出版品,为提高我们自己队伍的学识和学术水平,推进海内外孙中山、宋庆龄研究机构、专家学者联系、沟通和交流,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囿于各方面条件的不足,这个愿望只能在我们的心头一直搁着。今天,在各有关方面的关心、支持下,通过我们的不断努力,《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问世,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是一本以年度为周期的学术性丛刊,一年一辑。每一辑的内容均由学术研究和文献资料两大板块构成,相互比重则根据每一辑编辑的实际情况决定。栏目设置上有专题研究、探讨争鸣、学术述评、读史札记、相关人物研究、档案文献、口述回忆、海外译文、史料辑存等。文稿选用方面,我们建立了一个以专业人员为主的评审委员会,并由部分顾问参与指导,一方面给投稿者以公平的待遇,另一方面力求选用的文稿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准。

虽然我们花费了不少心血,尽了自己的努力,但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丛刊,无论栏目设置,还是编辑水平,都还显得稚嫩。我们相信,丛刊的创办,就像初生的婴儿、破土的树苗,需要在未来的成长中逐渐成熟、不断完善。因此,我们衷心希望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有关领导和读者朋友们,能够不断给予我们建设性的意见,支持和帮助这一新生刊物,共同推动孙中山和宋庆龄文献资料的收集刊布和学术研究工作。

最后,借用宋庆龄的一句话,愿小树苗健康成长!

目录

编者的话

专题研究

001 论孙中山的强国思想 / 林家有

015 中国国民党一大前后孙蒋关系研究 / 李吉奎

035 孙中山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 沈渭滨

053 孙中山与上海金融界关系述论 / 吴景平

078 最后的奋斗：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主张 / 戴鞍钢

094 孙中山与上海帮会的关系及影响 / 郭绪印

108 政治法统、挪用与纪念日的演变

——以孙中山“五五”就职纪念日为中心 / 陈蕴茜 杨 涛

125 宋庆龄在德国 / 邵 雍

136 大革命失败后的宋庆龄与邓演达 / 朱玖琳

学术述评

151 宋庆龄研究回顾与展望 / 盛永华

回忆口述

165 我家与宋庆龄的关系 / [法]高醇芳

档案选编

193 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藏宋庆龄致黎照寰夫妇函

海外译文

277 鞋盒里的中国来信(1913—1967) / [美]马尔科姆·罗肖

特著 王志鲜译

史料辑存

331 《申报》孙中山奉安史料汇编(上) / 任冉冉

后记

Contents

Forward

Monograph

- 001 Lin Jiayou, *Study on Sun Yat-sen's Thought of Building up a Powerful Nation*
Li Jikui,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n Yat-sen and Chiang Kai-shek before and after the First Kuomintang Congress*
015 Shen Weibin, *Study on Sun Yat-sen and the Provisional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035 Wu Jingping,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n Yat-sen and the Financial Industry in Shanghai*
053 Dai Angang, *Final Struggle: Sun Yat-sen and his Plans for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078 Guo Xuyin, *Sun Yat-sen's Relations with Shanghai Secret Societies and their Impact*
094 Chen Yunqian & Yang Tao, *Political Legitimacy, Appropriation, and Evolution of Commemoration Days: Centered on the Inauguration Anniversary of the Extraordinary President of Nationalist China*
108 Shao Yong, *Soong Ching Ling in Germany*
125 Zhu Jiulin, *Study on Soong Ching Ling and Deng Yanda after the Great Revolution*
136

Review of Academic Activities

- 151 Sheng Yonghua, *Review and Prospects of Studies on Soong Ching Ling*

Oral History

- 165 Gao Chunfa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ong Ching Ling and My Family*

Selected Archival Materials

- 193 *The Letters from Soong Ching Ling to Mr. and Mrs. Li Zhao Huan in th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rchives*

Overseas Work in Translation

- 277 Malcolm Rosholt, Wang Zhixian (translator) *The Shoe Box Letters from China, 1913-1967*

Historical Data Collection

- 331 Ren Ranran,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the "Shun Pao Daily News" on Sun Yat-sen's Grand Funeral (part I)*.

Postscript

专题研究

Monograph

论孙中山的强国思想

林家有

[内容提要]

实现中国的富强是孙中山的毕生追求,他有一套完整的强国思想和计划。他认为,国不强则不能与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抗衡,争得民族的独立和平等;但国不富则不可能强,也不可能有社会的稳定和民生的安乐、幸福。所以,孙中山强调:“一个国家的伟大,不在于它的人民富有,而在于它人民的幸福。”所谓幸福就是社会和谐、治安良好,没有战争,没有政治的烦恼,国民有自由、民主,能够充分享受到国家发达带来的好处,即“民有、民治、民享”。为实现国家的富强,孙中山认为,从事物质建设是国家富强的根本,而富强的最终目的是解决社会民生和社会进步。中国只有实现富强才有未来,但“治本为先,救穷宜急”,“我中华之弱,由于民贫”,致强之原在于实业发达。所以通过发展经济解决中国的长治久安,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社会是孙中山留给中国人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当今社会建设具有重大的启迪。

[关键词]

孙中山 强国 物质建设 民生 天下为公

—

孙中山的强国思想是对近代中国贤人志士探求救国救民,复兴中华民族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强国是一种理想,也是中国人的追求,如何才能实现中国强国的理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主张,但孙中山作

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中国近代化的先驱，他的思想和主张具有代表性。研究孙中山的强国思想不仅具有学术价值，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仍有重大的启迪意义。

孙中山的强国思想反映了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和国情，但是孙中山以及许许多多国人为了强国，做了许多努力，曲曲折折，反反复复，一会儿“中体西用”，一会儿“西体中用”，一会儿“全盘西化”，一会儿“回归传统”，弄到中国什么也不是，中国人做了一百多年的强国梦，但国还是强不了，梦未能成真，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有一点是不可不提及的，那就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的混乱搞乱了人们的思维，加上帝国主义的侵夺，祖国的分裂分治，未能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和调动全国人民的力量从事建设很有关系。梦想中国富强，这是一个中国发展的永恒主题，梦想是一个期待、展望，也是一种追寻和力量，所以梦想是好事不是坏事，梦想尽管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它必将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继续梦想下去，奋斗下去，直到真正圆梦那一天为止。强国目的不达誓不罢休，这是誓言，也是中国人的意志和奋斗决心。这要感谢孙中山，因为只有从孙中山开始的近代中国才真正开始自觉地对世界和正视中国，也只有从孙中山开始中国人民才沿着独立、民主、富强的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富强自觉地进行斗争和奋斗。

孙中山的伟大是他从小就关心中国的前途，探讨解救中国和实现富强的方法，他不仅进行思想理论的创造，还制订了实现中国富强的计划。孙中山实现中国富强的梦想未能变为现实和理想，但这不能说明他的强国理想有什么问题。

早在孙中山投身革命之前，他就对中国的富强问题进行了探索。现已收入《孙中山全集》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他写于1890年的《致郑藻如书》。在这篇文章中他就指出：

远观历代，横览九洲，人才之盛衰，风俗之淳靡，实关教化。教之有道，则人才济济，风俗丕丕，而国以强；否则反此。呜呼！今天下之失教亦已久矣，古之庠序无闻焉，综人数而核之，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此人才安得不乏，风俗安得不颓，国家安得不弱？

此所谓弃天生之材而自安于弱，虽多置铁甲、广购军装，亦莫能强也！必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则智者不致失学而嬉；而愚者亦赖学以知理，不致流于颓悍；妇孺亦皆晓诗书。如是，则人才安得不盛，风俗安得不良，国家安得而不强哉！^[1]

在这里，孙中山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指出：实业是强国之本，而兴学育才又是强国之本的根本，他主张通过多办学校来改变中国贫和弱的状况。可是一年后，孙中山在《农功》这篇文章中则又从经济上考虑。他首先注重科学发展农业，建议“我国似宜专派户部侍郎一员，综理农事，参仿西方，以复古初”，开辟利源使“本境居民日臻富庶”，以解决民生问题。并提出：“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2]

从教育为先，到以发展农商作为“强兵富国”之本，这说明孙中山对于“强兵富国”问题的认识尚在初级阶段，并没有能将自己的强国理念作系统的清理和陈述，并从理论上给予提升，他今天强调这个，明天又强调另一个，说明他所指出的问题都是当时的实际，但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他都来不及将其讲明。但孙中山的可贵之处是他对问题的执着追求，他不会说过就了事，他总会将事情的解决放在其思考的重要位置，但有时也会修正自己的意见和主张。所以孙中山对于理论问题，敢于创新，也勇于开拓，正是这种精神使他对问题的认识永远不会停留于原地踏步不前，更加不至于妨碍他的视野拓展，以及阻止他认识和思想的进步。

1894年6月，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谈到他留心泰西各国“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时，又指出：

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在这里，孙中山否定了洋务派的“徒惟坚船利炮”的富国强兵思

[1]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2]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6页。

维和做法,从人才、地利、物用和物流四个方面提出自己的富国和强兵主张,并强调商者是“一国富强之所关也”,谋富强者,“当以商务收其效也”。只要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欧洲其能匹哉!”“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1]

在《拟创立农学会书》中,孙中山又从古“世宙,国家得臻隆盛、人民克享雍熙”的角度去论证“一国之兴衰,系夫上下之责任,师儒不以独善自诿,君相不以威福自雄,然后朝野交孚,君民一体,国于是始得长治久安”,但是“我中国衰败至今,亦已甚矣”,“追求积弱之故,不得尽归咎于廊庙之上,即举国之士农工商亦当自任其过焉”。所以,孙中山认为:“故欲我国转弱为强,反衰为盛,必俟学校振兴,家弦户诵,无民非士,无士非民,然后可与泰西诸国并驾齐驱,驰骋于地球之上。”^[2]这是什么意思?看其全文,都是在批评清廷洋务派“以练兵制械为自强”的主张为非是,宣传以士而贯四民,讲求科学,“首重农桑”。然而,正如学人所指出,这是孙中山借以创立农学会聚集俊秀,掩护革命,强国富民倒在其次。

但由此也可见,到这时孙中山已经基本形成自己的强国理念和主张,那就是通过培养人才,发展经济,尤其要改变重农抑商的思维,重视发展商业来积累财富,然后“修我政理”,兴农政发展农业生产,实现养民立国。他说:“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不可以养民,不养民难于立国,民“是在先养而后教”,所以兴农政发展农业生产是“今日之急务也”。^[3]

综上所述,孙中山的强国思想是在于重视农、商、工业的发展,改变洋务派的讲军事用枪炮对付枪炮、用武力对付武力的思维。孙中山通过发展经济,振兴实业来强国的思想具有时代意义,这个思想一经确立便为他治理国家、建设社会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1894年11月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孙中山便指出:“中国积弱,非

[1]《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4—15页。

[2]《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4—25页。

[3]《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7页。

一日矣”，为了“奠我中夏”，孙中山建议“集会众以兴中”；为了“维持国体”、“申民志而扶国宗”，孙中山便以“振兴中华”号召天下，通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来实现中国的强国理想。^[1]

1896年伦敦蒙难后，孙中山在伦敦发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新党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文中批评“欧洲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腐败势力所造成的中国在国际间的耻辱和危险的程度，也没有认识到中国潜在的恢复力量和她的自力更生的各种可能性”。^[2]孙中山说，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不是同义语词，中国的官员腐败，然而中国人则有无穷无尽的创新能力和克服困难的勇气，只要打倒腐败的清政府，“使目前的制度让位于一个不贪污的制度”，“中国的富源的开发，会增加整个世界的财富。中国政府的行政和军事的改革，会使它对于外来的打击（或是从帝俄来）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3]只要中国能够建立一个贤良的由中国人掌握自己命运的政府，中国就一定能够恢复它的活力，使自己强大起来。

1903年12月9日，孙中山在给夏威夷的华裔美国人麦格雷戈夫人（Mrs. Aoc McGregor）函时，他又指出，每一个精明的观察者都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帝国，“它是一个前程远大的国家”，“倘能使中国人民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资源并对其加以适当利用，则中国将来定能成为最大的强国”。^[4]为了让世界各国了解中国的发展对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影响，孙中山强调“支那人为最平和勤勉、最守法律之民族，非强悍好侵略之民族也。其从事于战争，亦止自卫”，它绝不会侵略其他国家。^[5]“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6]

实现国家的富强需要内外的条件相配合。一方面需要国内各阶层

[1]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9—20页。

[2]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87—88页。

[3]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06页。

[4]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5页。

[5]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46页。

[6]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55页。

人士的了解,明白中国的国情;一方面是需要外国的理解,中国的发展是中国本身的需要,中国富强不会对任何人带来威胁。所以,孙中山强调,所谓中国富强会给世界带来“黄祸”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假设,反对中国富强更是一种荒唐的行为。中国的富强不仅是亚洲人的福音,对全人类都是一种贡献。各国的对华政策都必须站在中国人民一边,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为了确保我们的成功、便利我们的运动、避免不必要的牺牲、防止列强各国的误解与干涉”,我们必须普遍地向文明世界的人民,特别是向美国、英国人民呼吁,要求他们“在道义上与物质上”给以我国同情和支援。^[1]而在国内则要求全体国人都要将强国的愿望作为努力方向,明白中华民族不振兴则中国的一切改革和理想都无法实现。

二

中国只有富才能强。怎样才可以使中国富起来?这有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也有实施办法上的问题。1905年8月13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说:日本、美国发生很大变化“皆非中国所能及”,过去“极野蛮者如条顿民族等皆兴”,只有中国人不能由过代之文明变而为近世的文明,所以“人皆说中国最守旧,其积弱的缘由也在于此”。孙中山说,“殊不知不然”。真正的原因是“我们中国现在的人物皆无用,将来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倘若是中国人如此能将一切野蛮的法制改变起来,比美国(按:今美国)还要强几分的”。“日本不过我中国四川一省之大,至今一跃而为头等强国”,只要我们能“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立志恢复”,“执全球的牛耳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中国要由我们四万万国民兴起”,只要全国人民奋起对中国进行改革,“我们放下精神说要中国兴,中国断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若是我们人人担当国家义务,将中国强起来,虽地球上六个强国,我们比他还要大一倍。”^[2]孙中山是说,中国要复兴,要强大,必须找到自己积弱积贫的原因,然后下定决心学习西方文明国家发展的经验对中国进行改革,中

[1]《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55页。

[2]《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78—280页。

国才有强大的可能,只要全国人民都发挥建设强国的积极性,立志“振兴中华”,中华就“没有不兴的道理”。然而,建设中国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但在中国不能完成一个民族革命,再去实现民权革命和民生革命,应当“毕其功于一役”,即民族、民权和民生革命同时进行。“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在中国却还在幼稚时代,但是将来总会发生的。到那时候收拾不来,又要弄成大革命了。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伤国民的元气。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1]孙中山认为,欧美不能够解决社会问题是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地必然会涨价,但通过政策限制地主的收入,土地涨价归国家,仅这一项国家就会增加许多收入。现今苛捐尽数免除,物价也渐便宜了,人民也渐富足了。“欧美日本虽说富强,究竟人民负担租税未免太重。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仅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2]孙中山这些想法固然很好,但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私人不纳税,如何限制富人越来越富就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节制私人资本会不会影响私人工商业的发展,也是一个不知数。但是孙中山确定“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项政策作为民生主义的内容,便为他的求富理想奠定了发展方向。

所谓“节制资本”就是通过国家发展大企业如铁道、矿山及各种机器厂,以及带有垄断性的商业和服务业,掌握国家的主要财富,改造民生,解决社会问题。这在《实业计划》以及晚年民生主义演讲中,孙中山都有论及。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3],在“令中国大富”^[4]。

为中华民族求富,为民生谋幸福,这不仅是孙中山的理想,也是近代中国一切先进的中国人的理想。然而,孙中山的“求富”观跟近代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单纯追求的“国富民穷”,或少数人富多数人穷的目标不同。孙中山的所谓“大富”,就是中国人普遍的“富”,不是少

[1]《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5—326页。

[2]《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9页。

[3]《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9页。

[4]《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60页。

数人“富”、多数人“穷”，也不是“国富民穷”。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患贫”，“贫穷就是我们的痛苦”，因此，他主张“发财主义”，所谓“发财”就是在发展民族经济的基础上，使人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解决社会问题。而不能像欧美国家那样，国家很富强，但有些平民却很贫困，贫与富的差别很大，这不是国家的真正“富”，至少不是我们中国所追求的“富”。所以，他尖锐地指出：“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未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1]孙中山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认识不清，故他以发展民族经济，尤其是要让国家掌握经济命脉，通过发达国家资本主义来解决社会问题，避免人民穷困，作为避免“第二次革命”的手段。一方面，他对西方空前的“物质文明”表示赞赏；另一方面，对这种“物质文明”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他又忧心忡忡；一方面，他目睹“其民实困”之后，对受压迫剥削的平民深表同情，从而联想到中国人民的苦痛；另一方面，对“第二次之革命”又抱反对和否定态度，希望通过某些改革，避免各种社会弊端，“毕其功于一役”。就实际意义上看，孙中山是希望用一种理想化的资本主义来取代当今实际存在着的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2]，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使中国成为社会稳定的资本主义富强国家。

在孙中山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会出现国家强盛，其民实困的现象，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了，从而使这些国家成为经济强国，但由于分配制度不合理、不公平又制造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分配上的不合理、不公平又反映在“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不是以解决社会福利和民生为目的。因此，孙中山主张发

[1]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8—289页。

[2] 张启承、郭志坤：《孙中山社会科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80页。

展经济要“以养民为目的,不以赚钱为目标”。^[1]为了实现这种“以养民为目的”的经济主张,孙中山提倡发展经济要避免社会财富为少数人所得而私,“节制私人资本”就是为了防止少数人掌握国家的多数财富,造成民富国穷,或人民贫富差别的扩大,而发展国家资本就是通过国家的政治手段,切切实实地解决人民关切的“食、衣、住、行”四件大事,通过为人民办实事,把全体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加快各种建设,切实解决“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2]等各种问题,做到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为此,孙中山指出,中国的出路在于振兴实业。“实业不振,商业失败”,“外货之入口超于土货之出口”,“此为中国之最大漏卮”。如果无法弥补这漏卮,“遂至民穷财尽,举国枯竭”^[3]。到了这个地步,中华民族的前途则不堪设想。所以,振兴实业便成为孙中山强国富民的首要任务。他认为:“中国宝藏至富,甲于世界,开发振兴,中国必强。”并为此制订一整套振兴中国实业的计划,提出了明确的建设中国的大方针、大计划和实施办法。

孙中山为了实现强国富民的理想,他奋斗了将近40年。他在生前虽未能圆梦,但他的精神和理想则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因为孙中山等许多爱国者的强国梦,以及他们的奋斗都说明每一个追求中华民族复兴的人都在希望与失望、悲观与乐观中思索如何走向中国自己的未来。龙应台先生在《百年思索》一书的序言中说:“这一百年间中国人抛掉了多少东西?这个过程,称之为集体失忆、自我消灭,也不算太过吧?”^[4]我们用不着太过悲观,一百多年来我们的确失掉了许多东西,但我们也得到了许多东西,我们没有失忆,也没有健忘,只不过是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发展道路的强国路线晚了一点而已。万幸的是咱们中国人经过各种反复和曲折,终于找到自己民族复兴的办法和途径:改革开放,复兴中华。也即是说,中国的强国梦,中国人做了一百多年,虽然曲曲折折、反反复复,直至今日,国还不是很强,人民想富

[1]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10页。

[2]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55页。

[3] 《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132页。

[4] 朱维铮、龙应台编著:《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三联书店2001年10月版,第19页。

也还富不起来,虽有少数国人富起来了,但大多国民则连小康水平还达不到,有少数人现在连温饱都没有解决。富强梦未能成真,我们不能因此就连梦也不做了,那也不对,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理想,没有理想就没有未来。所以,梦还得做下去,就是梦想也不能停止,因为梦想就是对未来的展望,对未来的期待,梦想尽管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有梦总比没有梦好,梦想中国富强,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没有过去包括孙中山等许多仁人志士的追求和梦想,也就没有今天的经验教训。为此,强国梦必将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继续做下去,直到真正圆梦那一天为止。蒋梦麟先生说过:“我们要明白过去,才能认识现在。我们要知道今日局势为何演变至此?就必须知道近至几十年远至百年千年中国历史的演变,以及近百年西洋史的发展,所谓:‘精古通今’,就是这个意思。”^[1]蒋先生讲得很对,对于过去了的事一无所知,对于未来也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只有接受历史的教训,才能有所警惕,有所作为。孙中山给我们的最大启迪是中国必须富强,也一定会富强。所以,我们必须坚定信心,努力奋斗,直到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那一天也不要松懈斗志,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完成强国富民的伟大理想而努力奋斗,是全体中国人的伟大使命。

三

孙中山为了实现中国的强国理想奋斗了一辈子,他的强国理想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重大问题。

在《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的自序中,孙中山说:他革命三十余年,虽受到很多挫折,但“吾志所向,一往无前”,这就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推翻专制,创建共和”,从此继进,“实行革命党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夫《革命方略》所规定之种种建设宏模,则必能乘时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也”。^[2]记得,罗家伦先生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

[1] 台湾《自由中国》,第六卷第三期,刊于1952年2月,参见明立志等编:《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页。

[2]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116页。

的世界，“一面有伟大的进步，一面是无情的摧毁；一面求精微的知识，一面作残暴的行动；一面听道德的名词，一面看欺诈的事实；一面是光明的大道，一面是黑暗的深渊”。尽管如此，但罗先生强调我们用不着悲观：“我们不能老是彷徨，长此犹豫……我们要相信人类是要向上的，是可以进步的，我们的理想是可以达到的，我们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纯洁的信仰、高尚的理想、充分的热忱，是我们改造世界建设笃实光辉的生命的无穷力量。”^[1]罗先生说的事情，在特殊的奇怪年代的确是层出不穷，但不能因为这样就扰乱了我们的思维，动摇了我们的理想和信仰。孙中山的强国理想，它本来就是为了改造现实，但因为政治的混乱未能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去实现强国的理想，理想变成梦想，现实变成展望和企盼，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丧失我们的热忱，对连孙中山做过的强国伟业之梦也失去了记忆，并无知地抹杀他的作用，因之也抛弃我们的理想和追求。

孙中山的强国步骤和目标是很明确的，大致说来分三个层面（或者说三个意思）：

第一，人民起来革命，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建立共和国，这是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想强国也实现不了。孙中山认为，清政府实行什么自改革，不可能达到中国富强的目的，因为清政府是个封建专制政体，它不可能解决中央与地方、朝与野、上与下的各种矛盾，加上官吏腐败，它不可能通过自身体制内的政治变革，更加不可能动员人民奋发向上来实现强国。所以，孙中山强调，政治环境不好，没有良好的制度，任何强国的理想都不可能实现。

第二，建立共和政制，必须是按照他为革命党制定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及“革命方略”所规定的种种规划进行建设，即他强调的心性建设（精神文明）、物质建设（物质文明）和社会建设（政治文明）同时进行，才能使中国登上“富强之域”。

第三，国家的富强与人民的幸福安乐，是实现强国的目标。

国家强大了，而人民贫困，或者说人民富裕了，但不幸福，这都不

[1] 罗家伦：《信仰理想的热忱》，《三民主义周刊》第三卷第十期，又见《历史的先见：罗家伦文化随笔》，学林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37—44页。

是他强国的初衷,也不是他强国的理想。孙中山说,要实现国家富强,发展经济是首要的任务。

他说:“一国之中,土地不论大小,人口不论多寡,其生产力强者国常富。”“欲上纾国计,必先下裕民生。”“欲上充国库,必先下裕民生。”“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不养民胡以立国?是在先养而后教,此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可见,以人为本,人又以民生为本,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问题,实现丰衣足食,这是孙中山的基本国策。

孙中山又强调:“我认为一个国家的伟大,不在于它的人民富有,而在于它人民幸福。”^[1]这是什么意思?它是说,一个国家不是在于他的人民富有就达到目的,关键在于人民幸福。所谓幸福就是社会和谐,治安良好,没有战争,没有政治的烦扰,人民有自由,有民主,能享受到国家发达带来的好处,即“民有、民治、民享”。所以,孙中山强调:“治本为先,救穷宜急”,“衣食足而知礼节、仓廩实而知荣辱”,“实业发达,民生畅遂。”^[2]国家富裕了社会就会文明,就会和谐,人民就会生活幸福。又说:“然欲图长治久安之道,必舍武力而趋实业。”^[3]“长治久安之道,当以发展实业为先。”^[4]所以,发展实业,从事物质建设是国家富强的根本。国不富就不强,但对于富,我们长期以来都有一种仇富的心理,为富不仁,富都是剥削得来,其实这在发达国家里只讲法治,不管贫富,富者有好人和坏人,贫者也有好人和坏人,所以树立正确的富裕观,先富带后富,实现“均富”是孙中山的基本观点。

但进行实业建设,一要有安定的环境,二要有资金,三要有技术。这三样东西缺少一样都不行。孙中山认为,维护安定,一要解决人们重整旗鼓的生计问题,即衣食住行的问题。需要革命时,要革命,但革命是为了建设,不建设就不要革命。可见他革命的目标是为了创造建设的环境,为强国做基础性工作。其次,搞建设需要钱,中国一时拿不出钱怎么办?孙中山说:只好以向外国借款、吸引外资华洋合股、外人包办等各种方式在

[1]《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528页。

[2]《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28页。

[3]《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580页。

[4]《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588页。

中国办企业。在维护主权独立的前提下,实行对外开放。技术问题,即人才的问题。人才一是靠自己培养,二是靠引进。

总之,孙中山的强国包含民族独立、经济发达、教育先进、科学发达各个内涵。国家要富强是一种合力的结果。这有政策问题,也有国民的认识和支持的问题;有政治问题,也有国际间的问题。为此,孙中山认为:(一)改革清政府的政治体制,实行共和民主政治体制,是为强国建立制度、政策的保证;(二)只有政治好,才能经济好,但强国的关键在于经济,经济不振兴、不发达,一切无从谈起。所以,振兴实业是关键;(三)确立“学问为立国的根本”,强调只有发展教育,“育人才而培国脉”,中国才有复兴、强大的可能。富强的最终目的是解决民生问题,使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实现社会和谐,“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孙中山为了复兴中华,实现他的强国梦,他有思想有理论有计划,但由于民国后政治形势的反复、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势力的混战,破坏了孙中山建设国家的大环境,破坏了孙中山的强国梦。孙中山未能在他的生前实现强国梦,但他留下的思想、精神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我们应该重读孙中山,全面地理解孙中山的强国思想。孙中山的强国思想对当今中国社会建设有重要的启示:一、必须重新理解孙中山的强国理念,弘扬他的强国精神;二、国不富则不强,目前是要实现中国的富裕,让国人过着幸福的生活;三、强国是一个综合的力量,它包含科学技术的先进外,也包含经济、军事,乃至教育和文化的综合实力。军事强不是国家的真正强大,过去清政府包括洋务派在内就是单纯追求军事的强大,结果吃了大亏。

总之,强国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追求,没有追求,没有理想,势必会产生疏离感。但国人千万不要误解孙中山只是一个风尘仆仆的革命家,其实他最中心的思想就是实现国家的富强,而富强的最终目的是解决全国人民的民生问题,使中国人民生活安定和幸福。其次是我们富强了不是去学帝国主义去侵略别的国家,而是要确立睦邻友好的政策,树立“济弱扶倾”的思想去支持和帮助后发展的国家。中国必须富强,只有富强中国才有未来。中国人做了一百多年的强国梦,梦想还没完全实现,但在追求强国过程中,中国人形成了一种不达目的誓

不罢休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才有强国的理想和强国的追求。

当今我们国家比过去是强大了,但还不是很强大,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我们的经济实力、文化教育也还不够先进。所以,我们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通过对孙中山强国思想的追寻,我们觉得:中华民族同胞应该利用当今国内外的和平发展机遇,对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进行整合,在和平发展的主体思想指导下,经济优先,利用各地的不同优势,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发展科技技术,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创造财富,集中精力解决社会民生各种问题,逐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文明和进步。

我们经常讲,治国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民生为本,做人民的“公仆”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认真地执着地一件又一件地解决人民的生存问题、生活问题,以及民主、自由等各种问题。我们国家很大,人口很多,这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我们国家大,但各地的条件不同,发展不平衡,加上人口众多,教育跟不上,人的素质和技能不高,谋生手段有限,这是我们社会的极大负担。加上廉政建设还有问题,对于官员的贪污腐败、治理无能和资源的极度浪费,都还存在不少问题,而重中之重的问题还是社会就业、财产分配不均造成贫富差别过大的社会问题。首先是要告别贫困;其次是要加强法治,实现社会的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惩恶扬善,使民众的公民意识得到加强,树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和谐意识。为了解决我们国家的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国家的强大是全中国人民的使命。所以,我们应该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坚持科学发展观,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发展科学,使国家强大和人民富裕,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祖国的和平统一。这是孙中山的遗愿,也是全中国人民和海外同胞的伟大历史使命。

(作者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中国国民党一大前后孙蒋关系研究

李吉奎

[内容提要]

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关系,是“孙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在孙蒋交往的特殊时段——国民党一大前后约半年时间里,孙中山先是派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报聘、考察,随后又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校长。与这些重大史事相关联的,是迄今尚未受到学术界重视的另外一些问题,即蒋介石访俄返国后,拒绝回广州报告此行,达一月之久;蒋将书面报告寄给孙中山后,孙对之“毫无省察”。当蒋勉强回到广州,以非代表身份列席国民党一大后不过21天,却居然派人向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蒋于2月3日被孙任命为筹委会委员长)宣布发遣散费,径返奉化。约两个月,屡催不返。凡此,均关大局。尽管如此,孙中山仍坚持黄埔军校非蒋莫办。正是通过办校、练军,使蒋介石得以崛起广东,完成孙中山统一中国的愿望。本文分五部分,对诸多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这个关键性时段的历史,有较准确的阐述。

[关键词]

孙中山 蒋介石 “六一六”之变 苏俄 国民党一大 黄埔军校

在孙中山研究中,孙与蒋介石的关系,颇受学者的重视。一般读过中国近代史的人都晓得,在1922年“六一六”陈炯明事变后,蒋氏应孙中山之召,自甬赴粤,随侍兼旬,深获孙之欢心。翌年,便有派蒋氏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考察之举。蒋氏返国后,又当上陆军军官学校(俗称黄埔军校,简称埔校,以下用此简称)校长。蒋氏出长埔校后,即着手编练校军(后发展为党军、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在孙中山去世后,他据以崛起广东,排除异己,号令群雄,统一中国,

成为不二的“总理忠实信徒”。然而，这是高度概括，是表面文章，它远未涉及这一时段孙蒋间的若干关键问题。

资料表明，自1923年12月15日蒋氏从苏俄返沪后，迄1924年5月3日孙中山正式任命他为埔校校长的近半年时间里，孙蒋关系微妙，甚至可谓低迷。蒋氏抵沪当日即返奉化，拒绝回广州报告达一个月之久。赴广州列席国民党一大不久，居然派人宣布遣散埔校筹备委员会（蒋任委员长），遽行返甬。蒋氏恃宠而骄，目无法纪，内中奥秘，或隐或显。凡此，已往学者似未作系统考析。此事实关中国近代历史之重要一页，笔者不揣固陋，拟对此加以梳理。下文分五部分：一、“六一六”事变与孙蒋关系意义重大；二、孙中山对蒋氏之访俄报告未予置评；三、蒋氏对其以非代表身份列席国民党一大深致不满；四、孙中山坚持埔校“非蒋莫办”之苦心不为蒋氏所理解；余论。叙述失误之处，敬祈方家赐正。

—

蒋介石与陈其美有深厚的关系。1908年蒋氏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便是陈介绍的。^[1]蒋氏初次会见孙中山，大概也是由陈引见的，但不应在蒋氏留学日本期间，因为孙中山在1907年3月离开日本后，直至1913年2月访日，仅在1910年6月秘密返日待了15天，其时蒋氏正在日本军营里见习。武昌起义爆发后，蒋氏受陈其美之召脱队返国，参加浙江光复，又任沪军标统。因与陈其美的亲密关系，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欧洲返抵上海之后，蒋氏若经由担任沪军都督的陈氏介绍给孙认识，是完全能够做到的。“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员纷纷流亡日本。在总结“二次革命”失败原因以及在组建中华革命党入党手续问题上，孙中山与黄兴意见严重分歧。孙要黄兴“静养两年”，不过问革命之事。黄见矛盾一时不易化解，便赴美国治病去了。支持黄兴的一批党内重要干部，另组欧事研究会与中华水利社。坚决支持孙中山的陈其美在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中担任总务部长，相当于同盟会执

[1] 莫永明、范然著：《陈英士纪年》，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行部庶务黄兴的职务，孙倚为左右手。这个时期，蒋氏有机会单独接触孙中山。日本警视部门即保存有蒋氏进出孙宅的记录。这种单独接触，既说明孙对蒋氏的信任，也有利于对蒋氏的了解。陈其美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地区反袁军事负责人，自然属于袁政权所必除的政敌。1916年5月16日，陈在上海日人山田纯三郎的居所为袁氏刺客所杀。据载，陈既死，刚回沪不久的孙中山闻讯即往视，抚尸痛哭。蒋氏则于悲痛中将陈的遗体搬到自己家里去，办理丧事。^[1]早在1915年2月间，陈其美回上海时，留蒋氏在东京处理未了之事。蒋氏送陈至横滨上船，表示设陈有不幸，当为陈之“第二化身”。不料一语成讖。陈死后蒋氏为撰祭文，誓“以守我之信，践我之约而已”。^[2]蒋以此誓陈，对孙亦以此自重。

陈其美去世后，蒋介石毫无选择地投身到孙中山营垒里，并尽力地表现自己的军事才能。由于蒋氏具有相当的军事历练，第一次护法战争开始后，1918年春赴粤，投孙旋往援闽粤军陈炯明总司令部（在闽西南、粤东北一带），先后任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第二支队司令、许崇智第二军前敌指挥官等职。因与陈部将领不洽，蒋氏一再离队。尽管如此，孙中山对他仍信任有加，并要求他像对陈其美那样对待陈炯明。援闽粤军反攻顺利，军抵老隆，蒋氏归队，1920年10月11日，陈炯明任命蒋氏为第二军参谋长，代师次河源患病的许军长指挥调度。在1920年9月21日朱执信虎门遇害后，10月29日（是日援闽粤军克复广州），孙中山致函蒋氏，内谓：“执信忽然殁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又过之。”孙在该函中也指出，蒋氏“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齟齬难合”，要他为党而“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3]把蒋介石评为党内水平最高的知兵者，不免使他养成目无余子的自大

[1] 《陈英士先生纪念集》，见莫永明、范然著：《陈英士纪年》，第431页。

[2] 杨树标著：《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28、29页。按：据杨庶堪1924年5月23日辞去广东省长职后致继任者廖仲恺信，蒋介石似曾对孙中山说过不利于陈其美之言论，谓“堪既与介石绝交，不容更致书。唯尚有一言，请兄代询。英士将死之前，渠告我以谁氏谗构于先生，致英士之求死不得者。若闻此而仍漠然无所动于其中，则其人良知已绝，愚更何言也。”（《天隐阁集》，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380页。）

[3] 《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9页。

狂,也使他认定以后孙绝对少不了自己。到了11月上旬,蒋氏借口陈炯明置西江肇庆于不顾,反以粤军主力派遣北江,表示不满,离粤赴沪(按陆系桂军从北江方面撤退,粤军以一部追击;15日粤军主力占肇庆。蒋氏之说不实)。这时许崇智也去了上海。在广州的胡汉民致函孙中山(时在上海),要许、蒋赶快回广州:“汝为来,固须先生邀其速即返粤,介石亦定要与之偕回”,“若只洁身抛弃兵权,则他人正中下怀,此求两人所宜知也。”^[1]胡、许、蒋与陈炯明积不相能,是孙中山身边的反陈联盟,孙陈分裂,由来有自。以后蒋之利用许、胡以图权势,实发端于此援闽粤军占领广州之际。

1920年11月3日,广东省议会选举陈炯明为广东省长,仍兼粤军总司令。6日,陈氏接收了督军、省长印信。^[2]10日,孙中山又重行委任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是日,陈通电就省长职,并宣布废除督军。11月28日,孙中山抵达广州。29日,重组军政府,孙中山为四总裁之一,这是他第二次开府广州。

广州军政府未能得到国际承认。北京政府是直系曹吴控制的政权。在广东省政府之上存在由广东提供经费支持的军政府,且寄养滇、桂、赣等客军,形成变相的“督抚同城”局面,孙陈间出现难于调和的矛盾。大而言之,孙主张武力统一、北伐(攻曹吴),要求选总统,搞三角(孙段张)反直同盟;陈主张保境安民,粤军不出省,联省自治,民选县长,认为选总统尚非其时,私下与洛吴联系。孙陈各有人事系统,政见异趣。陈氏实际也做了一些妥协,如选举孙为总统,出兵平定广西,以原督军署为总统府;在艰难踟蹰中,提供经营桂林北伐的军费;允许邓铿从陈部第一军第一师中抽出兵力编成孙中山的警卫团。

参加桂林北伐的粤军,是许崇智第二军。蒋氏任第二军参谋长,他虽任此职,却恒居沪上,孙不断促其来粤,但往而复返,不止二三次,孙亦莫可奈何。蒋氏赞成北伐,但也认为选总统尚非其时。至1922年4月20日,当孙陈矛盾即将转为冲突的前夕,蒋氏致函孙,称:“陈

[1] 蒋永敬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1页。

[2] 陈定炎编:《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

意图谋叛，逆迹已彰，莫如尽速予以讨平，再谋北伐，是为上策。”^[1]当时陈炯明虽为粤军总司令，大体上实际只能掌握第一军，而在该军第一师师长邓铿被刺后，第二师师长洪兆麟去了上海，第三师师长魏邦平犹豫于孙陈之间（陈离广州后即被孙任为广州卫戍司令），陈部主力在西江，广州几乎是座空城，孙因改道韶关北伐，此时抵达肇庆，若依蒋氏策略解决陈炯明，并非无取胜之可能。但胡汉民等不赞成，认为反陈可能引起战祸。孙中山亦不赞成对陈动武^[2]，但解除了陈炯明的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职务，仅保留其大本营陆军部长之职（此前陈已辞去中国国民党广州支部长一职）。陈以事无可为，乃于21日离开广州返惠州。22日，孙中山抵广州。当斯时也，孙中山诚可谓兵事鞅掌，不遑宁居。无论是韶关北伐，还是应对从广西撤回即将进广州的“陈家军”（孙之用语），都指望倚蒋氏为臂助。然而，蒋抵广州的第二天（24日），却因孙不接纳其“先清内患，再图中原”的建议，拂袖而去。在香港登轮前，他却给“竞公总司令”写了一封情词恳切的长函，函中称：若行内斗，“无论其结果如何，必致两败俱伤，即胜者亦不免同室操戈，授人以残杀同志之口实，吾知其精神之痛苦，较之败者为更烈也。”续谓：“以此而论，则吾公不能不出，且不能不速出也。如吾公深信中正，果能允纳一二，勿听细人之言，勿任宵小之徒，尊重党魁，共同前进，则中虽愚陋，尚思待罪疆场，执鞭以从，聊供指臂之助。”在二三日内，蒋氏为何态度转了一百八十度大弯呢？不宁惟是，经蒋氏亲自删订的《蒋介石年谱初稿》，不但未收4月20日向孙建言讨陈之事，而且对24日致陈炯明函也做了手脚，删去开头自承罪恶的一大段话。^[3]猜测蒋氏写此函与篡改内文的目的是多余的，但表明此时他对孙中山主

[1] [日] 古屋奎二著：《蒋介石秘录》（中译本）第二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4页。

[2] 据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篇第1096页记述：“先生（按：指孙）以陈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并主张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陈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且直奉战争方炽，不可失此良机。若按兵不动，则与拥兵自卫者何异？遂未纳。”

[3] 删去之原文为：“中正昨日回省，极拟劝驾赴三水，以为最后转圜之一着，不料吾公已舍职离省，徒令彷徨失措，不知所归。此次改道攻赣，以致内部纠纷至此，皆由中正一人隐忍贻误之咎，然当时以为反对过甚，竟无从中维持之策，故不能不顺从一时，以为权宜之变，万不料有今日之现象也。中正罪恶，诚万死莫能赎矣。”（陈定炎、高宗鲁著：《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香港：吴兴记书报社1997年版，第300—301页。）收入《蒋介石年谱初稿》之同一函件（见该书第84—85页）已改得面目全非，文长，不复逐录。

张的不满与背驰,即他在删改后的表述,“中正惟有独行其道,不复预闻内部事情”。当孙急需用人之际,蒋氏居然又走了。

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部叶举等人发动兵变,围攻观音山孙中山官邸与总统府。不管这次兵变是否陈炯明指使的,他都应负道义上的责任;当兵变逐走孙中山之后,他不自责或放洋,而是亟亟于回省主政,尤显得这个秀才加法政生缺乏政治头脑。6月18日,孙中山从永丰舰上发电报给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同时,蒋氏接汪精卫、林业明从上海来电,“惊悉粤变,犹幸总理无恙。”事虽紧急,但直至25日,蒋氏才携妻由沪动程;29日抵广州,上了永丰舰。孙中山在8月9日离开广州。蒋氏夫妇与之一同返沪后,又回溪口。9月13日,蒋氏写完《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1]。孙中山无疑对这种宣传品饶有兴趣,同年10月10日,他为该书作序,对蒋氏大大表扬了一番:“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2]在永丰舰上与孙“共生死”者岂止蒋氏一人^[3],而“蒙难记”中俱未及,“序”中又未及(仅提“海军将士”),独树一帜,蒋氏之地位,也就不自高而高了。

实际上,蒋介石可以说是“六一六”之变唯一受益者。首先,经此事变,粤军一、二军由同袍变为敌对,许崇智军成孙系军队之主力,蒋任该军参谋长,实负指挥调度之责,其地位亦随之益显。欲击破陈系粤军,蒋即以此自任。其次,经此创痛,孙欲图新,决策联俄容共,启动之初,孙便想到用蒋助成其事。1922年8月30日,孙由沪致函在甬之蒋氏,谓:“日来变局愈速,非兄早来沪同谋不可”;“某事(按:指孙与越飞代表的会晤)近已由代表专人带函来问远东大局问题及解决办法”,“从此彼此已通问讯,凡事当易商量矣”,并告对方有一军事随员,将讨论军事问题。^[4]一年以后有派蒋访俄之事,实伏笔于此。复次,许

[1] 或称《孙大总统广州蒙难日记》。日记体裁,逐日记事,包括6月29日以前各事,只字未提蒋本人之迟来或随侍及离开,显示蒋之智慧与乖巧。

[2]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71页。

[3] 据黄惠龙《中山先生亲征录》所记,在舰上者,尚有胡毅生、林直勉、林树巍、陈策、熊秉坤、马伯麟、谢心准、杨虎、杨熙绩、周仲良、陈群、陈煊、马湘、黄惠龙。据《陈洁如回忆录》记述,这位蒋夫人也一直在舰上。

[4]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537页。

部粤军未经灌输新思想，北伐、东征、对付祸粤之滇桂军，均难用力，必须从头开始，以作后图，于是有后续埔校之设、校军之练，凡此，为蒋氏之纵横捭阖，提供了广阔天地。蒋氏既受孙之重用，予以权责，终以坐大。故可断言，“六一六”之变不仅对孙蒋关系而言意义极其重大，更是中国近代历史之重要转折点，其历史轨道之发展，影响至今犹在。

二

1922年8月15日陈炯明重返广州后，政权并不巩固。拥孙的杨刘滇桂军及部分粤军组成西路讨贼军，沿江东下，陈军无法抵抗。当时纸币低跌，陈又反对弛赌禁增加收入以维持政权（谓“粤军可倒，赌不可开”），军心更加涣散。1923年1月15日，陈通电下野，即日返海丰。次日，滇桂军入广州。2月15日，孙中山由沪启程回粤，21日抵广州，重建军政府。

孙在沪期间，1923年1月26日与苏俄代表越飞联合发表《孙越宣言》，随后又派廖仲恺赴日，与越飞代表进一步磋商落实问题。返粤之后，联俄容共政策进入实施阶段。在上年10月，孙中山将入闽粤军编为东路讨贼军三个军，许崇智为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蒋介石为参谋长。许蒋不洽，蒋氏在闽沪间来来去去，心思不在军中，热衷于上海交易所事，自谓为所事波靡，其本人及友人多被累。1922年2月15日，孙中山任命蒋氏为大本营参谋长，并电催其赴粤，谓“军事枢机不可一日无人”。汪精卫、张静江等亦迭电催促。15日，胡汉民、汪精卫、邹鲁、林业明、林直勉、胡毅生还赴甬促驾，主客优游林间，至19日结伴赴沪，27日蒋复回甬，延至4月6日始赴沪，15日赴广州，20日抵达，此时距孙之任命其为大本营参谋长已逾月。其时东江、潮梅军事紧急，且屡攻惠州不下。6月17日，孙又任蒋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随孙出征。正当军事繁忙之际，7月初，蒋氏“默念苦持军事，怨忌交集，引退为安”；12日，乃借口“为许崇智所龇，愤而辞职，避往香港”。13日，蒋氏在港返甬前，写了一封信给杨庶堪（大本营秘书长），内称：“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

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1]此函此事在《蒋介石年谱初稿》中未记。蒋介石已获悉孙中山将派代表赴苏俄，他想通过杨向孙进言，以促成自己前往。为何蒋不直接向孙提出此项要求呢？大概他了解自己并非唯一人选，为直接争取不成预留余地。此前，5月12日，孙在致越飞电中讲到，将“派代表赴莫斯科详细磋商”。马林在该电报上附言，“赴莫斯科代表可能是张继和蒋介石。”^[2]蒋氏函件果然收到了效果。8月5日的蒋氏《年谱初稿》记称：“禀承总理意旨（按：应读作‘总理满足我之要求’）约会苏俄代表马林及张继、汪兆铭、林业明等，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政治与党务。”^[3]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除蒋氏外，还有沈定一、王登云和张太雷。代表团于8月16日出发，乘船至大连，转搭满铁及中东路火车北行，9月2日抵莫斯科。代表团除肩负上述任务外，还有讨论孙中山的“西北计划”，争取苏俄帮助编练军队等问题。蒋氏向俄方转交了孙致列宁、托洛茨基及齐契林的信。代表团一行受到高规格接待，先后会见加里宁、齐契林、鲁祖塔克（俄共〔布〕中央书记）、斯克良斯基（军委副主席）、加米涅夫（军队总司令）、卢那察尔斯基（教育人民委员）和托洛茨基。还会见了在华工作过的越飞、马林和维经斯基。他们参观了多所陆海军军校和工厂农村，乘了飞机，参加群众集会并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蒋氏提交了“代表团意见书”（内容包括中俄两党关系、绪论、军事计划书、宣传、结论。此件不存中文原件，具体不详）。在10月21日与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会谈谈及与“西北计划”中有关的蒙古问题（蒋强调中国在外蒙的主权）时，“无结果而散”。使他印象较深的是9月11日与俄教练总监彼得罗夫斯克谈话时，得知俄国军队组织的内容之精要在政治委员制度，“凡遇有困难勤务，必由其党首负责躬先”，这就是埔校始办的党代表制度。本文随后还将讲到，此行使蒋对联俄容共政策萌发厌恶思想，即“事实与主义之别”的主张。1923年12月10日，蒋氏一行返抵大连，13日乘船返沪。在船上“属

[1]《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六卷，第92页。转引自汪荣祖、李敖著：《蒋介石评传》上，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4—85页。

[2]李玉贞等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153页。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页。

游俄报告书稿”。15日上午抵沪，即访张静江，下午“3时，趁‘江天’轮归甬，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林业明、陈果夫均集舱房叙别，劝公（按：指蒋）即回沪，处理一切党务”。^[1]汪、胡、廖正在上海准备召开国民党一大之事，也不无迎蒋返沪、返粤之意，但说到要等他“处理一切党务”，当是虚言，因蒋氏（访俄事了）在党内尚无任何职务。

蒋介石回奉化后，毫无返粤报告之意。“一大”即将召开，如不作充分的访俄报告，势必影响大会相关文件的起草，故孙中山及其亲信心急如焚，函电交驰，12月28日，廖仲恺函称：“诸兄最迟明正四日船，偕精卫、鲍君等同行，万不能再延，否则事近儿戏，党务改组后而可乘此惰气乎？”24日，孙中山亦电催蒋复使俄之命：“兄此行责任甚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台意对于时局、政局所有主张，皆非至粤面谈不可，并希约静江、季陶两兄同来，因有要务欲与商酌也。”（30日收到）^[2]尽管如此规劝，蒋氏仍置若罔闻，他将访俄报告寄给了孙中山后，便“息影慈庵，拂案焚香，绕堇抚树；入夜，则闲蹑山门外，岭上寒风，松间明月，清景耐人寻思”，^[3]过着与世无争的恬静生活。

蒋氏果真心态如此平和写意吗？否。他对孙提出的埔校领导层的人事安排，大体已得到满足；对由杨庶堪（实际是由胡汉民）出任广东省长、许崇智复任粤军总司令的建议，则因未能实现，颇有微词。但这些仅是借口。真正使他对孙不满的，是孙任命鲍罗廷为顾问（10月18日任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12月12日，正式聘任鲍为顾问^[4]）未征求他的意见。据陈洁如回忆，蒋返溪口后对她说：“我们的领袖太不给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43页。

[2] 12月20日，廖电称：“学校急待开办，无论如何，乞即买舟来沪，同伴南行为荷。”22日，廖汪胡函称：“鲍先生及弟等待商之事甚多，万不能以此一事遂耽搁来沪之期也。”（按：此事系指蒋对省长人选的意见）26日，胡廖汪又函：“兄所主张者，今诸问题待兄至而决”，“军官学校由兄负完全责任办理，一切条件不得兄提议，无从进行。诸如此类，非兄来不可，省长问题犹在其次。”27日，张静江转来杨庶堪要蒋速来之电，并自谓“以兄私意，似不宜再缓”。28日，廖函除告诸人南行日期外，并告埔校政治部长定戴季陶，教务长俟蒋到任后再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44—145页。）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45页。

[4] 据《中国国民党八十年大事年表》第162页。转引自罗刚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六），台北，1988年版，第4496页。另一说为1923年10月24日，见李玉贞著：《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1996年版，第281页。

我面子了，他怎可于我仍在俄国的期间，接受俄国新派来做顾问的鲍罗廷？至少也可以打个电报问问我的意见。现在，我要让他等我的报告，等了又等。”^[1]这则记载当是可信的。从1923年蒋氏抵沪至次年1月4日廖、鲍等离沪，鲍罗廷一直在上海，蒋氏不屑与其晤面。后来虽勉强逢迎，但始终心存芥蒂。等候多时才举行的埔校开学典礼，甚至没有鲍的身影。蒋氏之游俄报告不经由廖等带返广州，表明该件寄粤是在廖等返粤之后。这个报告在抵沪之前应是大体写就，返奉化时是润色的功夫了，但陈洁如在回忆中说，蒋返溪口写访俄报告，“他动手草拟访俄报告书，每天只写一点点，因为他心情欠佳，不容易写好。他慢慢写，几天后，终于完成了，竟长达四十页。无法在此引叙。现在我仅摘录其中最重要的几段。”^[2]陈洁如看过这长达40页的访俄报告是可信的。但是，迄今为止，海峡两岸出版的孙、蒋二人的全集、年谱、传记，均未刊有这个报告，甚至无从知道孙是何时收到这个报告的。^[3]汪荣祖等人认为该报告可能比较正面，所以要在1924年3月14日致长函给廖仲恺，作为不赞成联俄容共政策之补充意见。蒋氏晚年写《苏俄在中国》一书时提及该致廖函，谓“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我游俄报告的意见”。然而，查勘《陈洁如自传》中所引录的四段最重要内容（即不赞成联俄容共政策部分），有三段是与3月14日蒋致廖函中的雷同文字，这就难以理解，致廖函的补充报告与寄给孙的报告，究竟有什么区别了。至于“自传”中仅剩一段关于苏俄准备派五十名顾问、办一所军校，以及“苏俄愿与中国（按：指与孙）订立一项中俄相互合作联盟”的内容，是否就是蒋氏报告中所谈到的，实在无法否定或肯定；如果不是陈洁如与捉刀人在写“自传”时持有蒋氏报告书底稿，那么，笔者宁愿相信“自传”中相关引录的“重要几段”，是抄录致廖函三段文字及根据史事杜撰的一段。总之，以目前所看到的资料，这是无法说清的问题。

[1]《陈洁如自传》（中译本）称为《一个改写民国历史的女人——蒋介石第三夫人陈洁如自传》，北京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第174页。

[2]《陈洁如自传》（中译本），第175页。

[3]笔者曾亲询过台湾一位研究孙蒋、国民党党史的行尊，据告，台北相关史料保存单位亦不存此件。

《蒋介石秘录》称，蒋氏的访俄报告是“无讳无饰”地表达了对苏俄的“不安心理”，“然后，于1924年1月16日到达广州，晋谒孙中山，更在口头上作了详细说明”。^[1]蒋氏追述说：“国父认为我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宜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2]孙蒋会见还谈了些什么，史料无征。明显地，一来话不投机，二来一大大会在即，各有心思所在，彼此间未深谈便匆遽结束。蒋氏自订的“年谱初稿”甚至未记会见之事，而是以“公由沪回粤”，一笔轻轻带过，情见乎词。^[3]

三

国民党一大筹备多时，于1924年1月20日至31日举行，因悼念列宁逝世，25至27日休会。大会公开的争议是党员跨党问题，核心层的斗争是孙中山向鲍罗廷提出要以《建国大纲》代替《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有重大争执均以妥协结束。由于孙中山对一大宣言有自己的看法，故一大尚未结束，1月27日，他便在广东高师开始讲《三民主义》（共讲了16次，因北上，未讲完）。召开国民党一大，全党进行改组，是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的阶段性成果。出席大会的各省代表一般是6人，各省党部推选与总理指派各半，两类代表中皆有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浙江的指派代表为杭辛斋、沈定一、戴季陶；推选代表为戴任、胡公冕、宣中华。蒋介石以非代表身份列席大会。

这是一桩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怪事。如果说通过推选，蒋氏无法获得代表资格，那么孙中山为何不提名蒋为指派代表呢？浙江实在无法安排的话，为何不安排在上海特别区或别的省区呢？叶楚傖是江苏人，他就是上海区的指派代表。眼看着自己的访俄代表团部属沈定一和老搭档戴季陶都当了浙江代表，自己却什么也不是，心中当然别有一番滋味。据《陈洁如自传》记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 [日] 古屋奎二著：《蒋介石秘录》（中译本）第二卷，第270页。

[2] 罗刚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六），第4533页。

[3] 1924年1月21日广州《民国日报》刊载：蒋介石由沪抵广州，晋谒孙中山，报告沪上各方对直情形及江浙局势近况。这可能是宣传式的报道。

于1924年1月举行，就在介石和我回到广州之后几天。我们只能旁听，没有发言权。我注意到，这使介石觉得自己渺小，没有分量。事实上，介石在会场座椅中，不时局促扭动。”^[1]这个记述形象地反映了蒋氏当时的内心世界，若从更深一层分析，他刚从苏俄考察回来，清楚联共（布）的运作，不是大会代表，便进不了中央执监委，更没有决策参与权。蒋氏返国后的种种表态，表示他关注的是全局，他要过问的，军事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还有政治、财政和党务，而目前居然连参加出席的资格都没有，这就难免使他想到自己与陈其美的关系，断定孙中山不相信他。他在宣布遣散埔校筹委后于3月2日写给孙中山函中，长篇回忆他与陈的手足情谊，至死不渝，而“今日先生之谓忠者、贤者及其可靠者，皆不过趋炎附势、依阿谄谀之徒耳”，“观于陈逆变乱、石龙失败^[2]之际，纷然各谋生路，始终景从之人数，寥如辰星，可以见矣”，这是提醒孙中山别忘记前年白鹅潭休戚与共之事；复谓“先生不尝以英士之事先先生者期诸中正乎，今敢还望先生先以英士之信中正者而信之也。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之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说来说去，还是“未之深信”，因函中已说过孙去年以来在新旧过渡时期抹杀旧日之系统。^[3]蒋已深陷对孙之猜疑中，个中原因，并非完全由于去年6月以来双方缺乏沟通之故，追其原始，固出于蒋之对联俄容共心持异议，孙又不乐于见到亲信如蒋氏者加入冯自由、邓泽如辈之大合唱，而一时难于说明，只能进行冷处理。与此相关者，便是对蒋氏访俄报告之态度，对它未予置评，亦是蒋氏指为“未之深信”之原因。

孙中山派蒋氏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俄，实在是蒋超乎寻常的信任，期许之重，莫可言喻。然而，当蒋氏将孙中山的“西北计划”向苏俄试探并谈到中国在外蒙的主权问题，受到对方冷遇的时候，蒋氏的满腔热忱，便顷刻跌至冰点。中国人自清初即称北邻为罗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又喻为封豕长蛇。李鸿章与之签订密约，东三省藩篱尽

[1] 《陈洁如自传》（中译本），第177页。

[2] 指1923年11月中旬陈军攻击石龙得手，进逼广州郊区时之事。

[3] 全函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0—164页。

毁，俄日入我堂奥，予取予攫，今又争外蒙主权而不得，如此国家，冀其助我振兴国权，岂非缘木求鱼？此蒋氏因怀疑俄国用心导致疑忌联俄容共之主因也。但是，孙中山在国际上举目无亲，俄人又热情示好，联俄外交已进入快车道，即将召开的一大和开办的埔校，在多个方面（包括经济上）都离不开俄国人，此时去反对联俄，岂不坏了乃公大事！况且，已内定蒋氏出长埔校，将来也仰仗俄顾问的支持，而访俄报告对俄人说三道四，足以影响未来的关系，这是蒋氏自贻其戚，故孙对报告采取防扩散处理，先是“留中”，后是“付丙”，此乃对蒋氏的爱护，但蒋氏不察，对廖（实则对孙）抱怨，谓“党中特派一人赴俄，费时半年（按：应是4月），费金万余，不可为（谓）不郑重其事，而于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此弟当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亦应引咎不遑也。然弟在俄行动，自觉无可为人诽谤之处，亦无失却党体之点”。^[1]这封1924年3月14日致廖仲恺函，句句写来，均是对孙中山的不满。收此信后，廖王顾左右，答谓“至于对外问题，不自弟（按：廖自指）始，亦未尝因弟而加甚”。^[2]盖发纵指示，皆在主公，奔走之人，不必置喙，徒生事端也。有的著作讲到蒋欲结合胡汉民、许崇智以打倒廖仲恺，在一大期间未能实现之事，事属枝蔓，这里就不多谈了。^[3]

有的记载说1923年“12月15日蒋介石回到上海，也参加了宣言的讨论与修改”^[4]，这种说法恐不准确。又有的著作认为，“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决议开办军官学校和创立党军”^[5]，这种说法也是不准确的，国民党一大并未讨论建立军校的问题，更遑论决议创立党军了。实际情况是，1月24日，孙中山委派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8日，勘定以黄埔岛原有广东陆军学堂及海军学堂旧址为陆军军官学校校址。最早出现上述不准确记述的，可能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7—168页。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9页。

[3] 1924年1月29日，孙中山任命杨庶堪为广东省长，大本营秘书长遗缺由卸任省长廖仲恺充任。杨既长粤，蒋介石散布杨“挟滇军自重”，对胡汉民言，杨“一日不去，则粤局一日不安”。杨认为，“彼其旨趣，不过欲夺我居职，以崇奉其长官耳”。（按此“长官”指许崇智，事详《天隐阁集》，第378—379页）5月23日，杨辞省长职，赴沪。6月12日，廖仲恺重任广东省长。

[4] 李玉贞著：《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327页。

[5] 杨树标著：《蒋介石传》，第38页。

是《蒋介石年谱初稿》，它所记国民党一大，有“通过重要各议案，开办军官学校，创立党军等”^[1]一句。综上所述，可知蒋介石在国民党一大并未起何种作用，其地位之不足道也是显而易见的。黄埔军校创办既未经“一大”讨论，那么，它是如何创办起来的，蒋氏又如何当上校长的呢，这是下一节所要讨论的问题。

四

孙中山历来重视开办军校。兴中会和中华革命党时期，曾经开办过几个训练班性质的军校，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根据一些记载，1921年年底以后，孙与苏俄方面交往中，曾经几次谈过帮助孙办军校的事。蒋介石访俄又一次谈到此事，但仍未正式进入运作。1924年2月初，孙中山约见了苏俄军事顾问团，表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按照苏俄式样建立一支军队，准备好北伐的根据地”；又称，希望他们把自己的反帝经验“传授给我们的学生——革命军队的未来军官”。^[2]谈话表明，这些顾问至少有一部分是分配在军校工作的。此次约见可以认为是落实联俄外交的一个要点，但拟议办校则大体上是与蒋氏访俄的同时。

1923年11月12日，陈军陷石龙，孙中山从石滩返广州，形势十分危急，鲍罗廷甚至提出考虑孙弃粤走海参崴的问题。为动员工农群众抵御陈军，于是有组织国民党员自卫队之议。在15日举行的临时中央执委会上，讨论了由廖仲恺起草的义勇军组织法，并着手进行人事安排与物资供给，据载，党员加入者甚踊跃。陈军败退之后，又有将义勇军组织变为国民党军官学校永久组织的决议，定名为国民军军官学校。这是1923年11月26日有孙中山出席的临时中执委会第十次会议上决定的。会议还商定校长为蒋介石，教练长陈翰誉，政治部主任廖仲恺（并任筹备执行委员）。军校已开始办公。据刘峙说，陈翰誉是许崇智的上校参谋，保定军校出身，目空一切，骄纵自私，处事多失公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56页。

[2] [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0、91页。

平，致为各方不满。^[1]为使办校工作从速进行，12月5日，临时中执委第十四次会议决议，由秘书处致电上海，询蒋介石何日可抵粤就军官学校职，而蒋此时尚在俄也。这个军官学校尚未对外亮相，又改名为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1月24日对蒋氏的任命，是该校筹委会的委员长，似校长人选并未确定。

根据各记载，蒋氏任埔校校长，并非一开始就选定了的。曾任埔校政治部主任的包惠僧说：“黄埔军校开办之前，孙中山派蒋介石到苏俄去考察军事，决定派程潜为校长，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蒋介石认为这一次的联合战线黄埔建军是开创性的局面，以他同孙中山的关系与他曾到苏俄考察军事的条件，他说一切即是学习苏俄，程潜那一点日本派的旧的军事知识有什么用处呢？他既不愿在程潜之下，便愤然离开了广州。”^[2]由桂军讲武堂转入埔校的一期生覃异之也说：“关于校长的人选，最初决定为程潜，而以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蒋介石在当时无论在党在军，都是后辈，孙中山先生派他为军校副校长，已经是‘不次之迁’了。但是蒋介石不愿在程潜之下，对这个任命不满意，就离开了广州，跑到上海，表示消极。”^[3]蒋之抵制，导致程潜在校长人选上出局，但时间不详，也不一定曾经有所谓任命之事。

许崇智籍隶广州，留日士官生，与孙中山相知在中华革命党时期，任中华革命党军事部长、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在山东）参谋长（后为蒋介石，总司令居正）、援闽粤军第二军军长。孙陈决裂后，任孙系粤军总司令。许以贵公子出身，耽于逸乐，创始之事，非其所长，上述刘峙所记续称，“起初孙中山先生想要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兼军官学校校长，负责筹备。但许崇智力不从心，一切委之于上校参谋陈翰誉”^[4]。按这则记述，国民军军官学校似曾由许氏筹备，未见他处记载，但许氏未能当上校长，却是事实。

陈公博在《苦笑录》中称蒋氏为人“阴鸷犷悍”，画皮画骨，诚可谓入木三分。以蒋氏劣极之人际关系而欲承担此大任，自然不为党内

[1] 刘峙：《我的回忆》，引自汪荣祖等著：《蒋介石评传》上册，第93页。

[2]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页。

[3] 覃异之：《黄埔建军》，《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页。

[4] 汪荣祖等著：《蒋介石评传》上册，第93页。

军内高层所乐见乐闻。于是，党内提出由孙中山亲任校长的主张。国民党党史会所藏的会议记录显示，1923年12月8日，在孙提名蒋氏担任军官学校校长后，部分同志反而请愿提出要求孙自兼校长，并在当日举行的中执委会议第十五次会议上作成决议。但孙未予采纳。^[1]

尽管如此，由孙兼长军校的传闻并未停息。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月3日刊出：“闻该校已定孙总理担任校长一席，其余各事，经陆续筹备云。”苏俄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记述，“人们原来认为孙中山本人要担任军校校长”，但孙坚持要由蒋氏来担此任。^[2]至于反对蒋氏出长军校的人，据埔校学生李奇中称：“不少人反对蒋介石担任这个重要职位，例如李济深、范石生、杨希闵等等。李济深被派为黄埔军校的教练部主任，实际上拒不到差。反叫邓演达代行职务，就是表示不喜欢这个校长。”^[3]然而，任用蒋介石长校，孙中山已铁了心。宋希濂记述：“自孙中山决定创办陆军军官学校之日起，广东各实力派人物，认为是一块肥肉，纷纷向孙中山推荐校长人选，争夺颇烈，而孙则属意于蒋介石，各头头不同意，争论不休，孙曾忿然曰：‘如果不叫介石当校长，宁可不办。’”^[4]话已到此，夫复何言？蒋氏长校之事，便乾纲独断了。

孙中山为何非要蒋介石来办军校不可呢？有一段被人反复征引作为理由去加以说明的记述。据说，孙表示，“黄埔军官学校刻由蒋介石主持，有为之士官辈出。当攻击滇军时，蒋介石所指挥之学生军，精锐无比，业已发挥其战斗力矣。我辈知蒋介石为英杰，数年前曾与之谈养成新军之事，今蒋介石已成新军之中心人物，正着手编制民国第一之劲旅。彼为浙江出身之武官，十年前曾留学于日本士官学校，受新式军事之教育，且人物雄略沈毅，将蔚为军官中之大器”，“军事则命蒋介石掌握”。^[5]这篇日本记者对孙中山的访问记，所记多乖史实，据称是1924年2月某日进行的事，由梁惠锦辑的《台湾民报中有关国父孙中山先生》记载的，收在台北出版的《研究孙中山先生的史料与

[1] 罗刚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六），第4493页。

[2]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第24页。[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译本），第91页。

[3] 李奇中：《黄埔练兵》，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226页。

[4] 宋希濂：《参加黄埔军校前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242页。

[5]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4页。

史学》一书中。这篇访问谈话,据笔者研判,它是一个不了解中国当代史的人编造的故事。孙中山去世于1925年3月,广东军事当局平定杨刘滇桂军在1926年6月12日,“谈话”中两次讲黄埔学生军讨灭客军,绝非一时口误。至于将林虎、李福林并举,谓彼等知大势所趋“归附吾辈”,更不知其所云。孙中山在世之日,蒋氏何曾“掌握”广东军事?“谈话”对蒋氏之高度评价,适足发其“谈话”不足取信之覆。

有关孙中山信任蒋介石之事,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孙中山与陈其美(连带及蒋)的关系,蒋氏个人的历练,“六一六”陈变后相从的经历,蒋访俄后俄方的认可。这个访谈如果还有什么内容可资参考的话,可能便是其中说到孙“数年前曾与之谈养成新军之事”,演绎起来,孙蒋间或者有过约定,将来一旦有机会,便由蒋去办一间军校,以养成一批新式军事人才,编练新军。做领袖的不能食言,现下有了机会,便要兑现了,这便是非蒋莫办的原因。不过,这篇访谈连可信度都成问题,这个说法自然难于成立了。

滇军将领范石生确曾说过威胁、讽刺蒋介石办军校的话。筹备之初,军校虽然有可能被滇桂军人消灭,但它还不成气候,也与滇桂军没有什么直接冲突,而且这是孙中山要办的事业,客军虽然野蛮,谅必没有哪个人敢直接与孙作对而攻击军校。广东财政极端困难,孙中山虽拉旧交通系入伙(叶恭绰、郑洪年长大元帅府大本营、广东省财政),但夜无隔宿之粮,艰难竭蹶之状,屡见于当事人文牍。黄埔军校从筹备之日始,即由廖仲恺经纪其事,蒋未与闻。1924年4月3日廖致蒋电最能说明问题:“军校款,弟(按:指廖)不问支出,兄亦不问来源,经费不乏,尽可安心办去,惟请即来。”^[1]以上受客军威胁与经费困难两点,是蒋介石解散埔校筹委会的原因,但应不是主要原因。^[2]主要原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75页。

[2] 苏俄顾问切列潘诺夫认为,蒋之离去,“显然是因为他当时还不完全明白这所军校对于大资产阶级和他本人来说是一笔多么可观的财富。而且无疑他是害怕共产党人的革命威望,觉得军校校长这个职位是一个圈套”。([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译本),第91页。)美国韦慕庭认为,蒋离开广州是因为有一种反感情绪,“这种反感情绪,很可能是由于和鲍罗廷意见齟齬触发起来的”。([美]韦慕庭著:《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译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页。)可聊备一说。

因,是他认为孙中山对其“未之深信”,甚至委任的职务是筹委会委员长而非正式任命为校长,具有可变性,故以去留问题作为对孙之要挟。这就是在1924年2月21日,蒋介石写信给孙中山,并呈中央执行委员会,辞去筹办军校职务,径离粤,同时派人向筹备委员宣布发遣散费。此后两个月,蒋孙间互相拉锯角力,致使孙因焦虑染上重病。^[1]

2月23日,孙中山派廖仲恺代理埔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5日,又派邓演达赴甬促返。26日,中执委会奉孙对蒋“不准辞职”指示,要蒋“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王登云等人也去电,告以“现此事非办不可”,“非公莫属”而“进行停滞,度日如年”。29日,孙本人亦去电,谓“且兄在职,辞职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迟”。随后,廖仲恺、胡汉民相继去电催返。蒋氏对邓演达说,自己离开的原因,是孙“现非有改革决心,国党皆陷绝望,若能公开整理财政,革除市侩垄断财政,并促展(胡)汝(许)回,则彼可回其意”,完全不提军校事。如前所述,3月2日,他上书孙中山,14日又致函廖仲恺,洋洋洒洒,发泄其心中的不满。他在廖函中指责孙中山:“孙先生回粤已阅十五月,为时不可谓不长,而对于民政、财政、军政,未闻有一实在方案内定,如期施行。”他又将矛头指向身居省长的廖仲恺:“且政府今日居此地位,凡有责任者如再不反省自悟,则粤局长此扰乱,必无整理收束之一日。”函中进而攻击联俄容共政策,“即对俄党问题”,主张“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2]凡此种种,孙中山当然知道蒋氏用意所在。蒋氏绝无意放弃埔校的职务,因为这职位直接牵涉到自己的前途。经广州方面多方催返(廖仲恺甚至电告蒋,“归否,请即复,俾得自决”。言下之意,再不回来,要换人了!),在孙中山最大限度满足了他的要求后,4月21日蒋才回到广州,26日入校视事。军校以孙中山任总理。5月3日,孙中山特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

[1] 是年5月间孙中山连续生病,休养,外间所传消息殊恶。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4—165、167页。

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9日，孙派廖仲恺为陆军军官学校中国国民党党代表，二人于12日呈报就职视事。6月16日，埔校正式举行开学典礼。扰攘数月的孙蒋间矛盾的调适，至此宣告结束。蒋介石如愿以偿，迈开了通向中国权力巅峰的步伐。

余 论

在笔者上大学的年代，陈伯达的四本小册子^[1]，是被奉为圭臬的，它几乎写定了一部中国近代史。“人民公敌蒋介石”，这是结论。后来，情况有些变化，据说蒋氏抗战还是有功的；窜伏海曲，也把那个小岛建设得不错，民众怀有多金；尤为重要的，他有爱国心，坚决镇压“台独”，反对美帝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乃至“台湾地位未定”论；西沙之战，他激于民族大义，说了一句彪炳千古的话：“西沙战事紧啊！”部属心领神会，立即打开封锁多年的台湾海峡，让大陆增援舰队迅速开赴前敌，歼顽灭寇，光复故土。如此一来，历史改写，“人民公敌”这顶帽子，便不再给他，收回来了。不过，尽管有关蒋氏的论著屡见不鲜，但是总体而言，蒋介石究竟是何如人也，人们实在不甚了解，也似未有大理论家如陈氏者再去重新作历史性定位。准绳既失，杂议丛生，论者便不免各言其是了。

平心而论，无论是研究孙中山还是研究蒋介石，孙蒋关系都是一笔浓墨重彩。孙中山革命凡三十年，始终重视武力；他也相信西人的话，一支笔胜过三千毛瑟枪。革命成功要靠枪杆子与笔杆子这两杆子，这是孙中山的先知先觉处，后之来者，不过发扬光大而已。正是在靠两杆子出政权这个关键问题上，孙中山除了宣讲《三民主义》，便是办军校，练党军，力排众议，将这副重担交给蒋氏。没有人会否认，蒋氏完成了孙中山的重托。问题是，蒋氏在完成办校练军任务，并凭借手中的家伙统一中国的同时，也摧毁了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与中共一战再战，情仇爱恨，未见穷期。历史的硝烟已飘过八十余年，流风余韵，至今不绝，追其原始，盖发于斯。

[1] 即《刽子手曾国藩》、《卖国贼李鸿章》、《窃国大盗袁世凯》及《人民公敌蒋介石》。

或问，是孙中山挑花了眼，选错了人呢，还是蒋氏以欺诈手段获取信任，最终却背叛了孙的事业？笔者认为，孙深悉蒋之优缺点，更了解党内高层干部的状况；蒋氏从未隐瞒自己的观点，更无所谓以假面目骗孙，以求宠信的问题。用与被用之间，势之所至，理有必然，非可以“蒙骗”、“幸至”作解。本篇所述，系截取孙蒋关系中最关键的部分进行剖释。探赜索隐，或许多少能说明一些问题。

在孙中山身边，能文之士甚多，而惯战之将殊少，若黄兴之文武兼资、人缘绝佳者，凤毛麟角。且黄兴既死，孙无复副手之设。助手济跽，类皆奔走、办事之员；以言指挥调动一切，谈何容易。以国民党论，欲图成事，孙之后备位领袖者，必雄鸷习武之人，以适武力统一之用。孙点检左右，拔蒋氏于众人侧目之中，洵不得已之举，亦不得不然。不用蒋，用谁耶？至于蒋氏生前到底实践与背叛了哪些“总理遗训”，非关本篇，容当另文讨论。

（作者为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教授）

孙中山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沈渭滨

[内容提要]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基础上修改制定的。《组织大纲》自公布后,曾经历三次修订。孙中山在大纲修订过程中,对实行总统制抑或实行内阁制已有所考虑。《临时约法》实行内阁制,但其与通常意义上的责任内阁有不少区别。《临时约法》及其内阁制的议订,是“为法制法”的必然结果,不是以限制袁世凯的日后专制为目的。孙中山对《临时约法》的内容是不满意的,但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公开表示。相反,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仍把《临时约法》视为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作为与袁世凯、张勋、段祺瑞等坏国坏法行为斗争的武器和法理依据。护法、护国相统一的不懈斗争,既是孙中山后半生的光辉经历,也是他思想转变的重要阶梯。

[关键词]

孙中山 《组织大纲》 《临时约法》 护法斗争

《临时约法》全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11日,由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公布。它不仅是南京临时政府期间等同于宪法的根本大法,对研究其国体、政体有指标性意义,而且也是孙中山法治思想和捍卫民主共和国斗争最重要的法理依据。学术界对此多有论述,但若干结论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专就《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修订、《临时约法》的解读和孙中山对《临时约法》的认识,略抒管见。

—

《临时约法》是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基础上修改制定的,而《组织大纲》本身已经过多次修改。孙中山对《组织大纲》修改

的态度怎样？以往的研究很少关注。其实，孙中山的立场，与尔后的《临时约法》在政体改制上有直接关系，所以有必要先说一下《组织大纲》的内容及其修改经过。

1911年12月3日，在武昌召开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上，讨论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作为组建中央政府的法律依据。

《组织大纲》共四章，依次为临时大总统、参议院、行政各部、附则，计二十一条^[1]。其第一章“临时大总统”设六条。规定了临时大总统的选举（第一条）；临时大总统有统治全国之权（第二条）；有统率军队之权（第三条）；经参议院同意有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之权（第四条）；经参议院同意有任用各部部长及派遣外交使节之权（第五条）；得参议院同意有设立临时中央审判所之权（第六条）。总统权力重大，连作为司法机关的“临时中央审判所”也可由总统指派。表明司法权尚未独立和分离。

第二章《参议院》设十条（即第七条至第十六条），作为代表民意的立法机构，参议院具有广泛权力。其中第十条“参议院之职权”列八款。除了议决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及设立临时中央审判所，议决临时大总统任命各部部长及派遣外交专使外，另有议决政府预、决算；检查政府出纳；议决税法、币制，发行公债及法律之权；有议决临时大总统交议事件及答复其咨询等。这些职权体现了立法机构的独立与分权，以立法制衡行政，对总统权力作了必要的限制。

第三章《行政各部》计三条（即第十七条至十九条），规定临时政府设外交、内政、财务、军务、交通五部（第十七条）；各部设总长一人，总理本部事务（第十八条）；各部职员编制、权限，由部长规定，经临时大总统批准施行（第十九条）。显然“行政各部”只是政府最高行政首脑——临时大总统属下的具体职能部门，各部总长的任命、职权都由总统规定，只对总统负责。

第四章《附则》计二条。其第二十条：“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六个

[1]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全文，见刘星楠遗稿：《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附录，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44—246页。

月以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民议会，其召集方法，由参议院议决之。”第二十一条：“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施行期限，以中华民国宪法成立之日为止。”

由此可知，《组织大纲》的主要任务，是为组织中央政府确立了体制的构架及行政与立法之间的关系。从构架看，司法权还没有独立与分离，尚未建立真正的“三权分立”体制；从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和各部行政的三者关系看，参议院具有广泛权力，行政各部只是执行临时政府具体行政职能、对大总统负责的政务机关，临时政府采取的是总统制而非责任内阁制。

《组织大纲》产生后，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的权力纷争和南北议和的复杂形势，进行了多次修改。

第一次修改，缘起于留沪以便“联络”的各省代表之动议。早在12月4日，即《组织大纲》制定的第二天，留沪代表为争得主动，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以大元帅筹建中央政府。在武昌的各省代表，对此虽然不满，但为了脱离战火威胁，只得离开武昌东下。及至12月12日齐集南京时，只能在既成事实下做文章了。12月15日，各省代表会议议决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承认上海方面所举正、副元帅，从而对《组织大纲》追加一条：“大总统未举定以前，其职权由大元帅暂任之。”^[1]

上海方面的意见，引起以首义之功自居的黎元洪的不满和醋意。而黄兴也坚辞大元帅一职，力持改推黎元洪。12月16日，各省代表会议顺水推舟，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由于黎元洪在武昌，由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于是，在《组织大纲》追加的条文后增添一项：“大元帅不能在临时政府所在地时，以副元帅代行其职权。”^[2]

所以第一次修正，只是在大总统未举定前，追加了大元帅、副元帅职权的条文。但这一修正，隐含着革命阵营内部虚位以待袁世凯的普遍心态。因为，这时南北议和正在进行，并且传出袁世凯“亦主张共

[1] 刘星楠遗稿：《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250页。

[2] 刘星楠遗稿：《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250页。

和,但须由国民会议议决后,袁内阁据以告清廷,即可实行逊位”^[1]的消息。各省代表会议代表们立即意识到还是承认现实、暂缓选举大总统,以大元帅暂行组织临时政府为好。

第二次要求修正,在孙中山回国之后,缘起于国民党最高干部会议作出的提议。

1911年11月24日,孙中山自海外回国。12月25日,孙中山在广东都督胡汉民等陪同下,乘轮船到达上海。由于当时组建临时政府正处于难产的局面,而孙中山却希望利用列强尚未干涉中国革命,采取“中立”的有利形势,尽快组织中央政府,实现共和目标。所以,在26日即抵沪第二天的当夜,在宝昌路行馆,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选举及组织政府问题。会上一致推举孙中山出任民国政府总统。接着讨论政府体制,孙中山认为应实行总统制,宋教仁则主张实行内阁制,双方意见分歧,但大多数同意孙中山意见。宋教仁不得不服从党议,但仍不放弃自己内阁制主张。27日,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在宝昌路行馆继续举行。这次会议突然提出设内阁总理一职,“议决举中山为总统,克强为内阁总理”。当时,孙中山、胡汉民主张不设总理,宋教仁起而力争,结果,孙中山表示认可,但黄兴不愿担任,经过多方劝说,黄兴只得同意。于是“中山为总统,克强为总理之议始定”^[2]。由于各省代表会议议决在12月29日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会议决定派宋教仁、居正于最高干部会议结束后,立即赴宁,要求修改《组织大纲》不设总理的规定,提出修改案。但各省代表因为不知“在沪所决议者,起而反对,致未通过”^[3]。

《组织大纲》虽未修改,但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的提议却值得注意。这个提议,应该是宋教仁坚持采取内阁制的意见得到与会者同情的结果。孙中山、胡汉民尽管不同意设总理内阁,但考虑到众议由黄兴出任,不便坚持,只能表示认可。这样,事实上为将来的《临时约

[1] 刘星楠遗稿:《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250页。

[2] 居正:《辛亥札记、梅川日记合刊》,转引自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1913)》,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有关两次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可参阅拙著《孙中山与上海三题》,见《上海研究论丛》第1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 徐血儿撰:《宋先生教仁传略》,见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45页。

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埋下了伏笔。从作始意义上可以看到,宋教仁主张内阁制,纯粹是从“内阁制之适于民国”的角度考虑的。他在留日期间对日本的内阁制有过深入的观察。1911年8月,日本桂太郎内阁总辞职,代之而起者为西园寺公望任内阁总理大臣。9月初,宋教仁在《民立报》发表《日本内阁更迭感言》,指出:“立宪政治以代表国民公意为准则,而最适于运用此制者,则莫如政党政治。”^[1]这一看法,可以说是宋教仁主张实行内阁制和政党政治最具代表性的表述。虽然他曾说过“美利坚合众之制度,当为我国他日之模范”^[2],但目的是为了组织全国议会团之议而拟定的会议召开办法,所以全文以《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为题。后来,陈其美的11月14日通电,即是以此为张本,揭开了沪汉争权的序幕。由此看来,宋教仁力主内阁制,根本上是为了政体选择的目的考虑,并非出于抵制未来的袁世凯搞专制独裁而故意设计的。

第二次修订在1911年12月31日,缘起于孙中山派黄兴向各省代表会议提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

12月29日,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会议。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早在12月11日,宋教仁对通过不久的《组织大纲草案》发表过不同意见,认为它“不适合者颇多。如人民权利义务毫不规定,行政官厅之分部则反载入,以限制其随时伸缩之便利。又如法律之提案权不明,大总统对于部长以下文官吏之任免权不具,皆其失处也。闻赴鄂各代表不日当会合留沪代表开议于南京,甚望其反复审定,不使遗笑大方也”。^[3]但是武昌各省代表会议代表在12月12日齐集南京后,并未对《组织大纲》再行审议。孙中山当选后,觉得宋教仁的上述意见可以考虑,便于12月31日派黄兴由沪赴宁,向各省代表会议提出修正《组织大纲》的意见。同时,云南代表吕志伊、湖南代表宋教仁、湖北代表居正也向代表会议提出修改意见。“他

[1] 宋教仁:《日本内阁更迭感言》(1911年9月5日),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6页。

[2] 宋教仁:《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约1911年10月),《宋教仁集》上册,第365页。

[3] 宋教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草案〉按语》(1911年12月11日),《宋教仁集》上册,第371页。

们认为：一、《组织大纲》采用美国的总统制，只规定设正总统，未规定置副总统，这样，黎元洪不好安置；二、行政机关规定设立五个部。有些太具体，欠缺伸缩性。因此，建议修正，遂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其内容是：

- (1) 原文第一章临时大总统下，加“临时副总统”五字。
- (2) 原文第一条删改为“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皆由各省代表选举之，代表投票以一票为限”。
- (3) 原文第五条删改为“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并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各员须得参议院之同意”。
- (4) 原文第十七条全删。
- (5) 原文第三章行政各部，拟改为国务各员。
- (6) 原文第十七条拟改为国务各员执行政务，临时大总统发布法律及有关政务之命令时，须副署之。
- (7) 原文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拟删除。
- (8) 原文第二十条召集国民会议下，拟加入制定民国宪法六字。
- (9) 追加关于大元帅、副元帅之职权条文，拟删除。^[1]

各省代表会议对《组织大纲修正案》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其中第(1)至第(4)项议案，因已过半夜，对第(5)至(9)项未及讨论而散会，于是第二次修正遂告结束。所以，第二次修正只有两点：一是增设了临时副总统；二是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毋须经参议院同意。

对于修正案拟改总统制为内阁制最重要的第(5)、(6)两条，代表会议以夜深而不予讨论，所以第二次修正，《组织大纲》仍然采取总统制。不予讨论的原因有点奇怪，其中必有隐情。据《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透露，原来“此时有宋教仁想做内阁总理的谣传，因误会宋教仁主张修改《组织大纲》，纯是替自己打算，于是一种政客的嫉妒的心理便充分暴露了，攻击宋教仁不遗余力”。^[2]

第三次修正是在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之后的第二天，即1912年1

[1] 张国福著：《民国宪法史》，华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6页。

[2] 李剑农著：《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1页。

月2日，缘起于马君武提出第二次修正案在夜间通过，不应有效的驳论。马君武是老资格的同盟会成员，又是代理参议院的临时副议长。他认为第二次修正案非常重要，不应该在夜间匆匆讨论，而且没有讨论完就作罢，应该重新更议。当天，即由皖、苏、浙、闽、桂五省代表提出了又一个修正案。各省代表会议本日已根据《组织大纲》第十六条规定，在参议院未成立之前，代行其职权，名为“代理参议院”。接到五省修正案后立即开会讨论，并通过修正。决议如下：

原文第一条修正为：“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皆由各省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

原文第五条修正为：“临时大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兼任免文武职员，但制定官制及任命国务各员，须得参议院之同意。”

原文第六条后，增加一条为第七条（原第七条改为第八条，余递推），条文为：“临时副总统于大总统因故去职时，得升任之；如大总统有故障，不能视事时，得受大总统之委任，代行其职权。”^[1]

经过第三次修订后，再也没有人提出修订动议。1月3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当天孙中山提出各部总长名单征求同意。原以宋教仁为内务总长，遭反对，改以程德全掌内务。各部总长如下：

陆军总长	黄 兴	海军总长	黄钟英
外交总长	王宠惠	司法总长	伍廷芳
财政总长	陈锦涛	内务总长	程德全
教育总长	蔡元培	实业总长	张 謇
交通总长	汤寿潜		

至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按《组织大纲》及其修正案规定，终于完成组建。《组织大纲》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综上所述，《组织大纲》自1911年12月3日制定，到1912年1月2日的31天内，中经三次修订及一次修订提案被否决，经历了一个几度

[1] 刘星楠遗稿：《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254页。

更议、不断修改的过程。修改的主要内容是增加了副总统和改各部行政总长为国务员，否决了宋教仁提出的内阁制建议，坚持实行总统制。南京临时政府，正是按《组织大纲》及其修订内容所确立的体制和构架组建的。其间，孙中山从一开始主张采用总统制、不同意设内阁总理，不同意实行责任内阁制，到勉强同意设总理，并派宋教仁、居正赴宁，向各省代表会议提出修改《组织大纲》不设国务总理的建议。虽遭否决，但可知他在当时形势下，对实行总统制抑或内阁制，已经有新的考虑。这种考虑不是基于对袁世凯的担忧，而是基于对自己生死与共的战友、同盟会第二号人物黄兴在临时政府的职务安排。在通常意义上，国务总理是内阁的首揆，同意设立国务总理，势必为实行内阁制开启建制之门。因此，后来制定的《临时约法》，变总统制为内阁制，就孙中山来说，是有其思想基础的。

二

《临时约法》的制定，经历了两个过程。首先，由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更名为“代理参议院”，在《组织大纲》基础上，于1912年1月5日拟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亦名《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接着由1月28日成立的参议院开会讨论，将《草案》拟定的六章四十九条，修改为七章五十五条，后又改定为七章五十六条，经三读通过^[1]，终于1912年3月11日，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公布。

为什么要对《组织大纲》作全面修正，修正后又为什么要改名为《临时约法》？

原来，自从《组织大纲》公布后，招致很多革命党人诟病，要求修改之议再三。于是代理参议院在修订时增加了“人民权利义务”一章。但增加之后，若再称《组织大纲》显然不妥，决定改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正如当时的代理参议院议员谷钟秀所说：“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召集国会，限期六个月，恐不及，势须展缓，而根本法上之

[1] 关于《临时约法》的起草及参议院审读经过，可参阅张福国著：《民国宪法史》，第47—50页。

人权,不得不迅速规定,又不能纳入临时政府组织之范围,于是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之名称,而为临时约法,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之缺漏者增补之,窒碍者修正之。”^[1]由此可见,修订《组织大纲》是势所必然,改名《临时约法》是名实相副,两者是自然合理的逻辑结果。其间并不包含为了限制日后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实行专制独裁而采取的政治谋略。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共六章,依次为总纲、人民权利义务、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及国务员、参议院、司法、附则,计四十九条。经参议院审议后,作了若干调整:

议决第一章《总纲》之原文;第二章《人民权利义务》删“权利义务”四字,定章名为《人民》;改第三章为第四章,并删去“国务员”,定章名为《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第四章《参议院》改为第三章,余仍为原文;增第五章,改称国务员为内阁;第五章《司法》改为第六章,余仍原文^[2]。

从上引2月13日《参议院议事录》的记录内容看,尽管当天孙中山已经辞职并荐袁世凯自代,但参议院审议《临时约法草案》时,只在次序上作了调整和章名的文字上略有修改,对《草案》内容仍照原文通过。这只能证明《临时约法》从草案制定到三读通过,确实是“为法制法”,不是像以往研究者认为是出于限制袁世凯专制而“因人设事”。

《临时约法》最初发表在1912年3月11日出版的《临时政府公报》第三十五号上,以后有多种文本,其中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收录的全文点校最为精准^[3],可作为解读依据。

《临时约法》共七章,依次为总纲、人民、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附则,计五十六条。比《组织大纲》多了总纲、人民、法院三章,把原行政各部一章改为国务员;在条文总数上,由原二十一条增至为五十六条,多出了三十五条。

[1] 谷钟秀著:《中华民国开国史》,第83页。

[2] 南京《参议院议事录》(2月13日记录),转引自《民国宪法史》第51页。

[3]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20—224页。

《临时约法》“总纲”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二条），确立了民主共和的国体；规定：“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第四条），确定了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体。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体制。

第二章“人民”，共十一条（即第五条至第十五条），规定了中华民国人民不分种族、阶级、宗教信仰，一律平等（第五条）；享有人身自由、财产及营业自由、言论、出版、集会及结社自由，有书信自由及居住迁徙自由，有请愿、陈述自由，有控告官吏违法之权，以及有应试任官与被选举之权。同时也规定了人民有纳税及服兵役的义务。

第三章“参议院”，共十三条（即第十六条至第二十八条），作为三权分立政体的立法机构，参议院行使代议制政体中的国会职权。“在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第二十八条）。

参议员职权，集中体现在第十九条下设十二款中。参议院拥有立法权；可议决临时政府预、决算及税法、币制、度量衡制；募集公债及审议国家财政；答复临时政府咨询；受理人民请愿；得以法律及其他事件之意见向政府提建议；质询国务员；要求政府查办官员受贿、违法；有弹劾临时大总统及国务员等权限。

参议院对临时大总统的权力作了必要限制。除上述方面外，其第十九条第五款规定：“承诺第三十四条、三十五条、四十条事件。”《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原文为：“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官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第三十五条原文为：“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第四十条原文为：“临时大总统得宣告大赦、特赦、减刑、复权，但大赦须经参议院之同意。”这三条与《组织大纲》的规定是一致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说明无论《临时约法》还是原《组织大纲》，都授予临时大总统有任命文武官员之权，有代表国家行使对外宣战、媾和、缔约，对内宣布大赦、特赦之权，但在任命国务员及上述有关国家利益的决定时，必须经参议院同意，以确保国家利益不受临时大总统个人意志的

侵害。

与《组织大纲》司法机构没有独立与权力分离不同,《临时约法》新设了第六章“法院”,就法院法官的任命、法院编制、法官资格、法院职责、审判公开及法官审判的独立性等,都作了明文规定。《临时约法》真正宣告了三权分立体制的实现。

《临时约法》与《组织大纲》相比,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它把《组织大纲》的第三章“行政各部”取消,改设为第五章“国务员”。条文也由原三条增订为五条(即第四十三条至第四十五条)。现将两者内容列表于下(凡新增均以*标示):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中华民国临时组织大纲			
第五章 国务员	第四十三条	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	第三章 行政各部	第十七条	行政各部如左: 一、外交部; 二、内务部; 三、财政部; 四、军务部; 五、交通部。
	第四十四条	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		第十八条	各部设部长一人,总理本部事务。
	第四十五条	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		第十九条	各部所属职员之编制及其权限,由部长规定,经临时大总统批准施行。
	第四十六条	国务员及其委员,得于参议院出席及发言。*			
	第四十七条	国务员受参议员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复议一次。*			

细读《临时约法》第五章“国务员”各条原文,我认为这个内阁制与通常意义上的责任内阁制有不少区别。

所谓责任内阁,按通常说法,是指由获得议会多数席位的一个政党或几个政党联合组阁;组成的内阁行使政府行政权,其工作只向国会(议会)负责,总统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国会问责时总统不承担责任,由内阁担责;内阁必须受国会监督,并定期向国会报告工作;国会

一旦通过对内阁不信任案,内阁必须总辞职,或者提请总统或国家元首下令解散国会,进行改选,以待新成立的国会决定内阁的去留。

两相比照,《临时约法》中,国务员的组成没有多数党组阁的规定,只是指“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第四十三条)。联系第四章“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第三十四条“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也仅规定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即国务员,必须得到参议院同意才有效。两条都未涉及内阁如何组成。《临时约法》规定的内阁是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同意下的“派定内阁”,不是政党政治中成立的“政党内阁”。此其一之不同。

《临时约法》中关于国务员的职责,没有国务员对参议院负责的明文。其第四十四条“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似不应像以往研究者那样解读的为“内阁向国会负责”^[1],也不应把“负其责任”四字从全句中单独剥离,认定“国务员负有实际的责任”^[2],隐指作为对参议院负责的依据。如果严格按照第四十四条原文解读,应是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在行使各部政务中,对大总统负责,这和责任内阁向国会负责的通义是有质的区别。此其二之不同。

按照责任内阁制构成的要件,内阁受国会监督,并定期向国会汇报政府工作,接受国会审查。《临时约法》没有相应条款,只在第四十六条有“国务员及其委员,得于参议院出席及发言”的规定。显然,这条内容与责任内阁及国会之间的实质性关系,并不等同。此其三之不同。

《临时约法》也没有关于国会一旦通过对内阁不信任案时,内阁必须总辞职的条文。只在第四十四条有“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复议一次”的模糊规定。所谓“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既可解释为个别国务员,如某一部的总长之“失职或违法”而遭弹劾,也可理解为全体国务员遭弹劾,所以原文的措辞有

[1] 这一说法,见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2页。

[2]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8页。

着可以作不同解释的弹性,但其整条原文,没有内阁总辞职的明确规定。而内阁总辞职和总统有权解散国会进行议会改选,恰恰是责任内阁制的重要构成之一。此其四之不同。

《临时约法》中,唯有第四十五条“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与责任内阁有副署权庶几相近。

可见,《临时约法》虽然采取了内阁制,但其规定的内阁与通常意义上的责任内阁还有不小差距。它只有副署权一项权力,在其与临时大总统、参议院的三者关系上,存在不少疏漏和权限不清之处,容易被野心家、阴谋家利用。后来的事实证明,袁世凯在炮制袁记约法之前,正是据此把内阁视为御用工具。这与袁的独裁专制固然有关,但与《临时约法》在内阁制条文上的不完善、不明确也不无关系。因此,以往把《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的意义评价过高,认为它“包含着抵制袁氏专制以保障民国的目的在内”,实在是一种不符合原文的解读,也是很难经受史实检验的浮辞。正如参与制定《临时约法》全过程的奉天咨议局代表吴景濂事后回忆说:“议约法时,关于取美国制度,抑或取法国制度,当时争论甚多,有速记录可证。并非为袁氏要做大总统,故定此约法,以为牵制。予始终侧身与议,故知之较详。”^[1]当事人已经证明,后来的史家又何必舍此强作似是而非的推论呢?

尽管《临时约法》不完全、有缺点,但它的制定与颁布,毕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带革命性、民主性的第一个根本大法。作为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是足以彪炳史册的。

三

孙中山自始至终没有参与《临时约法》的决议。现有资料表明,他只在1912年1月28日参议院成立时,赴会发表演说,以示祝贺。祝词仅就“破坏难,建设尤难”立论,勉励到会议员尽竭才智,“以固民国

[1] 吴景濂:《组织南京临时政府的亲身经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412页。

之始基，以扬我族之大力”，完全不及于约法议订^[1]。以往有研究者称，《临时约法》是在孙中山主持下修订的。这是于史无征的说法。张国福先生已在《民国宪法史》一书中予以辩证。我同意他的考订，此处不赘。

其实，孙中山对《临时约法》的内容是不满意的，只是因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公开表示而已。直到1921年4月，为了继续进行护法斗争，他在广东的一次讲演时，才第一次系统阐明了对《临时约法》的看法。根据他的演说，他对《临时约法》的不满之处，在于它未能按照孙中山历来主张“五权宪法”的理论作为议订的根据，而是按照“三权分立”的美国成文宪法制定。

在孙中山看来，为各国效尤的美国三权宪法，“不完备的地方很多，而且流弊不少”^[2]。例如选举权，美国宪法虽规定官吏由民选而来，但民选的流弊很多，于是为了防范，美国规定了有财产才有选举权，没有财产就没有选举权的资格限制。孙中山指出：“这种限制选举和现代平等、自由的潮流是相反的。而且这种选举更是容易作弊，对于被选的人民，也没有办法可以知道谁是适当。所以单是限制选举人，也不是一种补救的好办法。”^[3]

孙中山认为最好的补救办法，是限制被选举人，实行普选。但普选得有一个关于被选人的标准，就是不问财产，只求才德和是否能于胜任。“如果没有才，没有德，又有什么能干，单靠有钱来做议员或官吏，那末将来所做的成绩，便不问可知了。”^[4]所以即使单单实行普选，也可以生出流弊。孙中山经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提出三权之外，加上中国古代行之有效的选拔官吏的考试制度，即多加一个“考试权”，才能选出有才德、能干的国家官吏和议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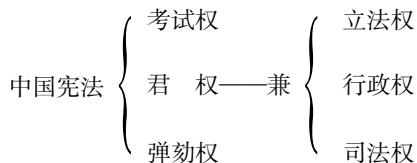
孙中山主张，在考试权之外，还要加上一个“监察权”，以防止官员的违法和腐败。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宪法构成是：

[1] 孙中山：《祝参议院开院文》（1912年1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4—4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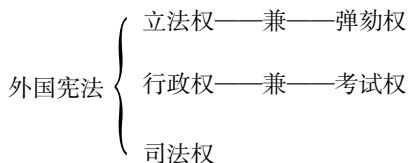
[2] 孙中山：《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1921年4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500页。

[3] 孙中山：《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1921年4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500页。

[4] 孙中山：《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1921年4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501页。



其中专管弹劾的官吏，就是像唐朝的谏议大夫、清朝的御史之类，虽君主有过，亦可冒死直谏，风骨凛然。外国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弹劾权，是自由与政府中间的一种最良善的调和方法。孙中山说：“由此可见，中国从前的考试和弹劾权都是很好的制度，宪法里头是决不可少的。”^[1]在外国宪法里，缺少了这两项应该独立出来的权力，所以：



有鉴于三权宪法的不完备和流弊，孙中山倡导中国新宪法应该按立法、司法、行政、弹劾、考试五个独立的权来制订，称之为“五权宪法”。

对“五权宪法”之说，孙中山是极为自豪的。他多次说过，“五权宪法是兄弟所独创，古今中外各国从来没有讲过的”^[2]，只有实行“五权宪法”，才能使中国富强，人民得到真正民权。南京临时政府虽然根据《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规定的第二期约法之治“解军法，布约法”^[3]，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却不以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作为民国宪法的法统模式，而是根据美国成文法系，采用“三权宪法”，这当然会引起孙中山的不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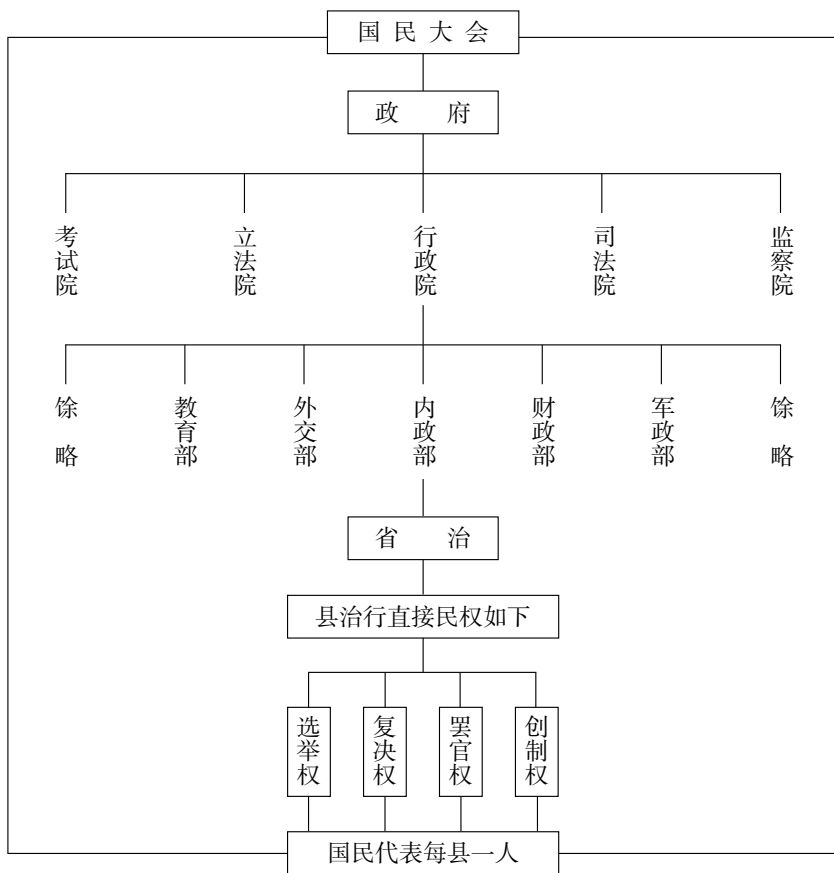
孙中山对《临时约法》的另一个不满，就是《临时约法》中没有县自治以行使直接民权的条款。按照他对“五权宪法”构造的制度，治国机构应如下图所示构成：^[4]

[1] 孙中山：《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1921年4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507页。

[2] 孙中山：《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1921年4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499页。

[3] 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97页。

[4] 孙中山：《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1921年4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498页。



孙中山指出：“除了宪法上规定五权分立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县自治，行使直接民权；能够有直接民权，才算是真正民权。直接民权共有四个：一个是选举权；二个是罢官权；三个是创制权；四个是复决权。五权宪法好像是一架大机器，直接民权又是机器的制扣。”^[1]两者关系如此重要，而《临时约法》既没有按“五权宪法”制定，又没有县自治的条文，虽在第二章制定了“人民的权利与义务”条款，但在孙中山看来，都是政府恩赐的间接民权，不是县级地方自治下人民行使自由意志的体现；因为没有县自治，《临时约法》所定的人民权利义务，能否实现也难以检验。所以孙中山断然表示：“我们民国的‘约法’，没有具体的民权，在南京订

[1] 孙中山：《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1921年4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513页。

出来的‘民国约法’里头，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那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意思，兄弟不负那个责任。”^[1]

不对《临时约法》负责，这就是孙中山对《临时约法》的真实态度。

虽然，孙中山对《临时约法》不满意，但是他仍然把它看作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并以此作为限制袁世凯专权的法治武器。孙中山第一次用《临时约法》对付袁世凯，是1912年2月13日向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咨文。咨文说明辞职原因之后，附了三个“办法条件”：

- 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
- 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
- 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2]

必须说明，孙中山向参议院提交咨文时，《临时约法》尚未公布，还在议决之中，他就已经将之作为民国的根本大法，要袁世凯遵守毋违了。但是，袁世凯接任之后，大搞专制独裁，甚至暗中策划，刺杀力图实现政党内阁的宋教仁，孙中山对袁氏忍无可忍，决心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1914年5月，他发布《讨袁告示》，历数袁世凯独裁的罪行：“解散参众议院，临时约法推翻；消灭司法独立，铲除自治机关；外债滥借滥用，苛税不惜民艰……”^[3]为维护辛亥革命成果，毅然举起武装讨袁的大旗。

“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帝制自为，孙中山在东京与友人的谈话中，明确表示：

约法与国会，共和国之命脉也，命脉不存，体将安托？明达之士，当袁世凯破坏约法、解散国会之时，当早知其必有称帝之一日，而能烛其先机，大声反对者，乃绝无其人……自筹安会发起，国之豪俊，恍然警醒，群起义旗，讨袁世凯破坏约法，解散国会之罪。罪首诛，则约法复；约法复，则民国苏。^[4]

[1] 孙中山：《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1921年4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513页。

[2] 孙中山：《咨参议院辞临时大总统职文》（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84页。

[3] 孙中山：《讨袁告示》（1914年5月），《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89页。

[4] 孙中山：《在东京与某某的谈话》（1916年4月），《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281—282页。

这一谈话，将约法与国会视作民主共和国命脉，可谓孙中山辞职以来，第一次对《临时约法》的高度评价。其后发表的第二次《讨袁宣言》，正是这一认识的集中反映。《宣言》指斥袁氏“解散国会，公然破毁我神圣庄严之约法，诸民权制度随以俱尽”，指出此次斗争，“不徒以去袁为毕事”。义军之举，“为出于保卫民国之诚”。强调“袁氏破坏民国，自破坏约法始；义军维持民国，固当自维持约法始……夫约法者，民国开创时国民真意之所发表，而实赖前此优秀之士，出无量代价以购得之者也。文与袁氏，无私人之怨，违反约法，则愿与国民共弃之”。^[1]所以孙中山领导中华革命党发动的讨袁斗争，就是以《临时约法》作为反袁的法制武器，把维护约法与维护民国统一了起来。由此及彼，蔡锷等人进行的“护国战争”，本质上也就是护国与护法相互结合的正义之举。

迨至张勋复辟，孙中山通电全国，南下护法，讨伐叛逆，更以护法与护国相统一为旗帜。1917年7月，他在《致津沪国会议员电》中称：“自叛督称兵，国会解散，大法荡然。逆贼张勋，乘机复辟。伪主溥仪，因势窃位。而民心归向，终在共和。伪清败征，智愚共见，于是前之倡乱坏法者，又假借反对复辟，拥护共和之名，以图自固。帝制余孽，亦乘此以要功。文以为今日之患，非患复辟者之众，正患伪共和者之多。”^[2]

把张勋、段祺瑞之流复辟阴谋和伪装共和的面目，置于共和、约法的阳光下，使之暴露无遗。可以说，民国成立之前，孙中山为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而不懈奋斗；民国成立之后，他又以维护共和政体与约法的尊严为职志，与各种坏国坏法的民贼作势不两立的斗争。正是在这一耗去他后半生的长期斗争中，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进入到一生最辉煌的阶段。因之，研究孙中山与临时约法，对孙中山的思想转变，对孙中山后半生的革命经历，都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课题。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1] 孙中山：《讨袁宣言》（1916年5月9日），《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283—284页。

[2] 孙中山：《致津沪国会议员电》（1917年7月19日），《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118页。

孙中山与上海金融界关系述论

吴景平

[内容提要]

辛亥革命和民国成立之后，上海工商业和金融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孙中山努力推动中国金融近代化，积极主张在上海发展本国银行业、证券业，并且与金融界人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以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的身份，支持和批准了原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关于将该行改组为中国银行的要求；他积极支持财政部设立专业银行的计划，主张建立近代银行体系；对于革命党人自己创设的上海中华银行也予以关心和扶植，并在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出任中华银行的总董；他为了打破国际银行团对中国贷款的垄断，曾积极主张吸引外资，推进组织资力雄厚的合资银行，但因故未果。1916年，为给革命事业筹集巨额经费，孙中山发起成立上海交易所，关注交易所事业的发展，指派国民党人从事交易活动为革命筹款。1923年底，为反对列强对中国财政金融的控制和解决广东革命政权的财政困难，孙中山要求北京外交使团拨还粤海关关余，曾遭到上海金融工商界的激烈反对。但在社会舆论的支持下，孙中山继续推进争取关余的努力，与上海金融界之间的关系也得到改善。

[关键词]

孙中山 上海金融界 关系 银行 交易所 关余

关于孙中山与江浙和上海的关系，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是，具体到他的经济主张和实践与上海金融界关系，长期以来缺乏专门的研究。事实上，大体在晚清时期，“革命家”几乎是孙中山唯一的身份；待到辛亥革命和民国成立之后，上海工商业和金融业有了长足的发展，除了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以及四明、信成等早期

银行外,还先后成立了中国银行、著名的南三行,开设交易所等。在此过程中,孙中山积极主张在上海发展本国银行业、证券业,并且与金融界人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以后在南方建立革命政权的时候,为关余的支配问题,孙中山与上海金融界发生过重大的分歧甚至冲突。本人通过仔细梳理孙中山的文集和其他基本文献,试图探索孙中山与上海金融界关系的复杂面向,进行较深入的探究。

一、批准把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上海金融界除了外商银行和作为本土传统金融业的钱庄之外,已经有数家华资银行,主要有:1897年在上海设立总行的中国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905年设立的大清银行(初名户部银行,1908年改名)上海分行、1906年设立的信成商业储蓄银行、1907年设立的交通银行分行和浙江兴业银行分行等。其中的大清银行虽为政府银行,但股本中官商股各占一半。

作为清政府中央银行的大清银行在各地的分支行,因行名中的“大清”字样,辛亥革命期间纷纷受到冲击,“取去现洋庄折等要件,甚至将行员拘留,帐款紊乱”,损失颇重。当时仍在维持业务的上海分行为澄清视听,保护商股利益,遂由原大清银行秘书长项兰生发起,大清银行部分浙江籍商股股东及部分高级负责人,于1911年11月18日在上海汉口路行址开会,宣布成立股东联合会,旋在报刊上刊登成立广告,要求股东于11月18日到行举行股东会。再经过南北方商股的充分酝酿筹划,12月4日股东联合会改名为“商股联合会”。^[1]但是,这些举措尚有待新政府的批准。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于1月24日即呈文孙中山,内称:“今者民国维新,而商民固有之权利自未可稍加损失,应请就原有之大清银行改定名称,重新组织,作为新政府中央银行,匪徒收事半功倍之效,抑实寓保商恤民之意。”呈文提出清理办法其要点为: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

[1]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3页。

行,作为政府的中央银行;停止原大清银行的业务,另设大清银行清理机关于中国银行内;大清银行原有官股500万两,全数予以补抵此次战事地点各行所受损失及一切滥账;大清银行原有房屋生财等项,统归新组织之中国银行接收应用;商股股东等原有之大清银行股份500万两,承认为中国银行股份,照票面价额,换给股票作为旧股,中国银行专招商股,即加招商股500万两,惟开办时可先由新政府酌拨公款若干协助,俟股份招齐即行拨还;另自旧历十二月中财政部批准之日起,作为筹备期间,由财政总长委任正副监督,会同大清银行股东代表筹办一切。^[1]该方案的最关键之处有两点:第一,使新组织的中国银行成为民国的中央银行;第二,保障原大清银行商股的利益不受损失,所持股份全数转为中国银行股份。这两点正是大清银行商股股东必须力争实现的两大目标。

当时,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陈锦涛曾任原大清银行副监督,原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的方案,正是通过陈锦涛转呈孙中山的。孙中山见到这份报告后,立即谕示陈锦涛:“新政府既已成立,凡商民已得旧政府正当之权利,自宜分别准予继续。所请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添招商股五百万两,认为新政府之中央银行,由部筹款,以雄财力,并请派正副监督,先行开办,克期成立。凡新旧营业帐款,请分电各省都督力加保护,并将该行原有房屋、器具、簿据等项先行发还各节,大致尚属妥协,著即准行。”^[2]1月29日,孙中山委任吴鼎昌(达诠)、薛颂瀛(仙舟)为中国银行正副监督,^[3]会同商股股东联合会商订办事细章。可以认为,孙中山基本上接受了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的要求,明确由财政部主管大清银行之清理和筹设中国银行相关事宜。

孙中山迅速批准把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既体现了对原大清银行商股人士的尊重,但也是出于筹措军政费用、解决财政困难的迫切考虑。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伊始,百废待举,军政各项开支巨大,各地北伐部队的饷需急迫,财政部、陆军部均无法应对,而可以指望的收

[1] 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一),档案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3页。

[2] 《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一),第3页。

[3] 王耿雄编著:《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1913》,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144页。

人几乎没有。由于起义与独立各省仅在名义上承认南京临时政府的中央地位,实际并不承担汇解收入之义务,甚至更多的是索取。南京临时政府也曾经努力寻求外援,包括向国际银行团接洽,但都没有结果。对孙中山而言,解决这些难题,必须有政府自己的银行。正如孙中山多次与陈锦涛商议财政事项期间谈到的:“中央政府现无确实可恃之财源,舍发行军钞、募集公债而外,更无济急之法,而欲实行此策,非有金融机关不可。”孙中山与陈锦涛的共同看法是:东南各省已经光复,必须有新政府直接控制下的银行作为汇兑机关,起到活动商业、恢复财源的作用。原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提出的改组大清银行为中国银行的方案,使孙中山看到,大清银行资力雄厚,资本额即有1 000万两,在国内主要地区都有分支机构,在其他资产和专业人员等方面,均较中华银行优越得多。况且大清银行本来就是清政府的国家银行,官股占了股本的一半,即使商股不提出将大清银行改为新政府中央银行的请示,南京临时政府也应该名正言顺地把它接管过来,使之承担起中央银行的职责。这无疑是“盖借已有之基础,应目前之急需,既以增长民国之实力,又可因其资产为通融,实为民国国家与该银行股东两得兼利之道”。^[1]

根据孙中山的明确批示,陈锦涛立即以财政部名义,于1912年1月24日批复大清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1月28日,大清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上海汉口路行址召开股东大会,到会80余人,传达了孙中山的批示及财政部的指示。大会决定,即由商股股东会成员组成中国银行临时理监事会,负责与政府委派之正副监督筹订章程,并有管理全行事务之权;确定朱亦奇、朱虞生常驻会办事,另指定5位理监事驻京担任清理北方事务;凡以前办事失败被大清银行撤退人员,中国银行不得委任办事;理事会人数照英国例为17人,现拟暂订13人,待将来扩充资本时再行续添。2月1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中国银行开办广告》:“本银行奉孙大总统谕组织成立,为民国中央银行。今择于元年二月五日即旧历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上海汉口路三号大清银行旧

[1] 引自陈锦涛关于草创中国银行咨参议院文(1912年3月下旬),《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一),第9页。

址先行交易,择吉开幕。现在民国发行军需公债票,由本行经历发售,如欲购者,请与本行接洽可也。特此广告。”这份广告刊登后,前往中国银行询问股票发售者络绎不绝。

1912年2月5日,中国银行在上海汉口路原大清银行旧址举行了成立会,各界领袖、华侨代表百余人出席。孙中山任命的中国银行监督吴鼎昌、财政总长陈锦涛先后致辞祝贺,股东代表何范之在演说中特别强调:“本行成立以全体股东之一致,呈蒙大总统准行,并陈总长批示,使股东等得保有正当之权利,无任感谢。况政体改良,则因政府而得之一切结果,必臻完好。本银行适于此时成立,发达有期,实有无穷之希望。”^[1]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银行在上海的正式成立。

中国银行获准成立之后,正式对外营业,包括经理发售政府军需公债。2月14日,根据南京临时政府的要求,中国银行在南京设立了分行。以后,中国银行在上海和南京都曾为发行军需公债、收兑军用票,起到了一些作用。

中国银行开业后,财政部“参酌各国之成规,体察我邦之旧贯”,拟订了《中国银行条例》三十条,“于严定政府监督之中,寓郑重股东权利之意,总期利国利民,不失中央银行之责分,有条有绪,以固财政统一之根基”。财政总长陈锦涛将该条例呈送孙中山,孙中山即咨请参议院议决通过。另外,财政部对于中国银行的组织和业务经营非常关注,如令中国银行迅即派员筹设各省分行,还明确指示中国银行慎重处理旧账和准备发钞:“至各行旧放账项,非关存款信用,即属股东血本,更不可有所漠视,现在新股虽未全招,该监督正可从清理旧帐,调查情况入手,而中央银行纸币即可预为布置。”财政部还向中国银行派出监理,“检查该行之票据、现金及一切帐簿,并出席于股东总会及其他一切会议,陈述意见,随时报告本部,以便查核”。^[2]

1912年2月12日,清廷退位,南北和议达成,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已成定局。财政总长陈锦涛曾自上海电询孙中山,在

[1] 《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一),第6页。

[2]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版,第35—39页。

北方统一政府成立之后,南京临时政府有关财政、金融的法令是否继续有效,孙中山当即复电:“清帝退位,民国大定。新总统系受现在临时政府之事。凡民国现行财政事宜,如公债、外债、中国银行之创办,及一切财政之已经施行者当然继续有效,绝无疑问。可由财政部宣布。总统孙文(南京电)”^[1]当时中国银行本身也颇担心其中央银行的地位有变,曾电请袁世凯追认孙中山批准的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的决定,同意中国银行继续中央银行的权利,袁世凯复电表示同意。这样,中国银行的中央银行地位,并没有因为政局的变动而发生动摇。

孙中山对本国银行业的支持,还反映了他在中国建立近代银行体系的主张。南京临时政府从成立到解体的三个月左右时间里,虽然在经济和财政制度改革方面并无重大建树。但孙中山对于设立海外汇业银行、创设兴农银行、农业银行、殖边银行等专业银行,持十分积极的观点。

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仿各国特许银行之制”,曾拟订了《海外汇业银行则例》,于3月12日先呈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财政部在呈文中称:“窃照现值政府统一,各省善后之际,百端待理,需款繁巨,仰给于部固属同一为难,思取于商更虑易滋纷扰。内地之元气已伤,目前之筹款无从。为今之计,舍发公债而外,别无良策。查募债之道,必与欧美有无相通,方能措置裕如,而尤以采用金货汇兑本位以定基础,提倡海外汇业银行以为枢机,图国际通商之便,免汇票变动之害,固交易之信,利外资之用,挹彼注兹,酌盈剂虚,非独济一时之急,抑且宏远之大规。”孙中山在一周内即批示道:“呈悉。海外汇业实国际易贸之枢纽,即国民经济之关键,东、西各国先例昭然。当金融紧迫之秋,得此酌剂盈虚,诚足以扩张商务,补救时艰,所拟海外汇业银行则例三十二条,仰候咨送参议院提议可也。”^[2]

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还拟订了《兴农银行则例》九章共五十三条,《农业银行则例》六章共四十四条,《殖边银行则例》八章共三十二

[1]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第3页。

[2] 《财政部呈稿》(1912年3月1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18页;孙中山的批示(1912年3月18日),同上第422页。

条，^[1]于1912年3月18日呈送孙中山审阅。财政部的呈文指出：“古圣教民，首言足食。列强富国，先重农林……窃进行之法，当在创设金融之机关，为奖励农业之政策而已……今民国方兴，共和确定，兴利除弊，当在斯时。敝部职掌全国金融机关，中央普建各银行，因宜次第规画，而农业、殖边等银行，岂能独付缺如。兹拟筹设农业银行，为贫民代谋生计。创办殖边银行，为疆隅安置流民。互相维系，积极进行。”财政部的方案，是由中央政府募集资本，在首都设立兴农银行，再酌量提拨地方公款，在各地设农业银行。看了财政部的呈文和几个则例后，孙中山即于3月23日批示：“呈悉。中国地称膏腴，尤广幅员，而东南之收获，不见其丰，西北之荒芜，一如其故，此无他，无特别金融机关以为之融通资本故耳。创设农业、殖边等银行，实属方今扼要之图。所拟各银行则例，仰候咨送参议院核议可也。”^[2]孙中山显然已经认识到，农业的丰歉、内地和边陲的开发，受制于金融的发达与否。

在孙中山的首肯之下，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还拟订出了关于设立商业银行、惠工银行、储蓄银行、庶民银行的条例。只是因为当时南北之间力量对比悬殊，南京临时政府迅速解体，未及成立拟议中的各专业银行。

二、支持中华银行与中华实业银行

孙中山在批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方案前后，对于革命党人自己创设的上海中华银行，也予以关心和扶植；待到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还出任过中华银行的总董。

辛亥革命爆发后，上海光复，各地军队集合于上海者，几近数万人之众，但是财政部门罗掘已穷，饷需无着。沪军都督府陈其美遂发起成立中华银行，于1911年11月12日发布告示称：“创立中华银行，以为经济之枢纽。所有公债等票，亦以次第发行……所有本埠一应华商银行，仍应竭力保护，各银行所出钞票，亦应一律通用，勿得阻抑歧视，

[1] 详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426—440页。

[2] 《财政部致孙中山呈稿》（1912年3月1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424至426页；《孙中山批示》（1912年3月2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440页。

致妨市面，是为至要。”另公布《中华银行简章》，规定中华银行股本为银洋500万元，分为100万股，公股商股各半，股款先收半数；经营范围除一般信贷业务外，兼管军政府发行的军用钞票和国家收入的一切附税饷款。当时公股一半洋125万元先行筹足，未及等待商股的半数筹齐，即于1911年11月21日在上海南市正式开业。嗣后沪军政府派代表到南洋各地侨界劝认商股和购买公债票，结果认购股票取得成绩，但对于公债一事，当地侨商均认为应有中央政府债票，方能认购。^[1]这就使得中华银行尔后积极寻求南京临时政府的支持。

还在临时政府筹建时，中华银行方面就要求享有“中央权利”。^[2]另外，中华银行总理林世杰等还以设立南京分行的名义，具文呈请孙中山拨款三十万元。1912年1月21日，总统府曾明确批复同意：“稟悉。现今南京市面恐慌，实因金融滞塞所致，该行有见及此，拟在南京设立分行，并请拨给官股以维市面，核与南京现势尚属可行。仰候令由财政部飭江南造币厂，即拨三十万元发给备用可也。”^[3]但是，成立伊始的中华银行实力不足，在上海金融界工商界的影响甚微，无法与原大清银行相比；孙中山最后决定在原大清银行基础上成立中国银行，享有中央银行权利。这样一来，由造币厂拨款三十万元之案也就不了了之。

沪军政府曾明确要求南京临时政府视中华银行为国家对外汇兑专业银行，给予相应的财力资助。另外，中华银行股东郭辉等呈文孙中山，要求批示政府有关部门遵行原沪军政府所订中华银行章程，拨发公股资本。孙中山曾在批复中充分肯定中华银行的作用：“查该行系在沪上光复时，由沪军陈都督飭令沪财政长等所组织。在当时中央政府尚未成立，金融沮[阻]塞，商旅束手。沪军当东南之要冲，征兵转饷，时机危迫，间不容发，赖该行之功，遂得应付裕如。是陈都督筹画之劳，该行维持之力，均不可掩。”为此，孙中山令知财政部，要求

[1] 沈云荪：《辛亥革命后的上海中华银行》，《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文史资料纪念专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第222—226页。

[2] 《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一），第11页。

[3] 沈云荪：《辛亥革命后的上海中华银行》，《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文史资料纪念专辑》，第227页。

承认中华银行“为商银行之性质，由国家补助股份一半。其办法如日本银行之对于正金银行。如目前无现金，可给以公债票壹百贰拾伍万作抵。庶政策既不因之违碍，商本亦赖以维持矣”。^[1]但是对于孙中山业已同意补助中华银行股款的意见，财政总长陈锦涛却力持异议，他在三月三日的呈文中提出：“今中华银行创设未久，规模未备，设立之时，不过为一隅发行军用钞票之机关……况目前部款，既绝无来源，各省又纷纷请助，安有余力以办外国汇兑之经营。”他特别提醒孙中山：“即谓光复之始，筹办维持，功不可掩，窃恐类于此者，正不独该行为然。设各省金融机关，凡经有功光复者纷纷援例，则补助政策中央必致立穷，特种银行机关且遍全国。况且此种补助之款，系属特别支出，非经议院通过，政府实无权特许。本部固不能破坏宪政，抑恐徒启纷争。”^[2]孙中山最后接受了陈锦涛的意见，于3月21日明确批复：“呈悉。所陈中华银行补助一节，颇有窒碍难行之处，尚属实在情形，应予照准，仰即知照。”^[3]总之，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虽然有心支持中华银行，但基于中华银行作为地方银行的定位，孙中山也无力予以实质性的援助。

待到1912年4月，孙中山请解职临时大总统正式获准；接着沪军都督府撤销。7月，上海中华银行董事会决议改为商办，并请孙中山担任该行总董，由该行董事郭竹樵、杜次珊、江少峰、林世杰等持董事局函面谒孙中山，正式发出邀请。孙中山当即表示同意，并于7月26日复函中华银行董事局，内称：“总董一席，当敬承雅命，勉从其后，请即宣布可也。至如何整顿业务，以求进行之处，容于日内偕一深明银行学者，同至尊处从长商酌，详订善法，以期营业发展。”^[4]孙中山对于允诺出任中华银行总董一事非常认真，几天后的7月30日下午，孙中山就偕同徐固卿、薛仙舟等到当时位于上海南市的中华银行视察，由该行监理李云书接待，会谈了行务情况。接着召开会议，议定中华银行改为完全商办，重订新章，扩大招股，并准备在各埠设立分行。会后拟

[1]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7月版，第138—139页。

[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414—415页。

[3]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72—273页。

[4]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92页。

就了《中华银行宣言书》和《招股简章》，孙中山以总董名义在这两个文件上署名，其他署名者有副总董黄兴，临时董事徐固卿、王采丞、王铁珊、陈英士、王敬济、周金箴、朱葆三、王一亭、顾馨一、李云书、朱子谦、郭竹樵、杜次珊、傅筱庵、王奕友、杨梦初和总理林世杰、协理江上青等，当即印发，并刊登有关各报。

《中华银行宣言书》写道：“我中华银行，奉沪都督命，会合绅商，筹集股款，组织于风涛险恶中，幸不辱命，旬日告成，凡海陆军需，商家汇兑，悉取给焉……今者沪督奉命取消，我中华银行原议官商合办者，今乃未克实行。伏思客岁同人等，殚精竭虑，昼夜图维，际兹民国基础已立，我名誉夙著之开国第一银行，亟应力求推广，继续进行，庶毋负当时海内外同胞踊跃赞助之热忱。同人等有鉴于此，方谋所以扩充，时本银行总董孙中山先生，副总董黄克强先生，董事徐固卿先生等，适皆莅沪，爰于七月之季，特开会议，改为完全商办，重订新章，一意进行，并拟在各埠设立分行，以期联络商情，发展工业。投股诸君，当知本银行与民国共休戚，合群策群力以经营之，而利赖之。他日各埠分行成立，声气灵通，汇兑便捷，则金融机关，操纵自如，不难与西国商帜，共树地球之上，俾期我行与河岳日星而并寿，是则同人等所馨香祷祝者也。”中华银行的招股简章规定，银行名称暂仍用中华银行原名，是否改名待股东大会决议，改组后纯属商股商办，为股份有限公司，以发展实业为宗旨，股本定1 000万两，分为100股，先收一半，非中华民国国民不得认购，无论何事何故，经何手续，股票所有权落于外国个人法人、政府或中外合办公司之手，则该股票即作为废纸，完全无效；凡一般银行所经营的各种业务，本银行皆得经营，惟必须划清界限，厘定妥章，斟酌各地之习惯，采用欧美之新法。^[1]可以说，中华银行改为商办并制定基本规则，得到了孙中山的大力支持和指导。

1912年10月，孙中山又委派王奕友、余西畴、陈杰民、谢坤林为招股员，携带中华银行改组新章程，前往南洋各地为添招新股，并以中华银行总董的身份，致函客居新加坡的原南京临时政府驻南洋各埠筹

[1] 沈云荪：《辛亥革命后的上海中华银行》，《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文史资料纪念专辑》，第229—230页。

款委员长邓泽如,指出:“中华银行为民国开幕之第一银行,与国同休戚,亟应群策群力,共促进行。”孙中山明确要求邓出任中华银行的海外招股员,在“南洋各埠广为劝募,共襄盛举”^[1]。孙中山还致电新加坡商务总会转各埠社会各团体,告知派王奕友等前来筹办招股事,希望南洋侨界鼎力提倡,以救祖国经济。11月1日,王奕友等一行抵达新加坡,向新加坡商务总会面交孙中山的介绍信。新加坡商会即于次日在当地各报刊载劝募中华银行股份的广告,称:“民国初兴,万端待举,财政奇绌,筹办维艰,此项银行为全国最强大之金融机关,完全商办,胜券可操,凡我爱国诸侨胞,务各踊跃认股,共襄要举,幸勿观望不前,是所至盼!”^[2]凭借孙中山的威望和大力支持,中华银行在上海本地和南洋各埠不仅获得急需的股款,还扩大了影响,业务经营走出了困境。

到1912年底,上海中华银行净盈余规元54 200多两,股东得以获得该行股票方式分红。1913年2月,中华银行举行股东大会,到会300余人。孙中山因赴日本没有参加股东会,但致函请假,并嘱“请诸公决议一切,归时报告可也”。鉴于所有股本均由商界担任,股东会最后决定将中华银行改为中华商业储蓄银行。

除了中华银行之外,孙中山还曾与另一家商业银行——信成银行及其负责人沈缦云,有着密切的关系。

沈缦云是同盟会会员,他本人和信成银行曾经替同盟会接受海外华侨的捐款。沈缦云本人还曾受孙中山的委托,亲往南洋各地宣传革命主张、筹组同盟会支部,以及劝募捐款,工作甚有成效。当时海外华侨汇款接济同盟会,收款人多用孙中山或沈缦云的化名,汇往信成银行经收,数额可观。此外,沈缦云还曾以信成银行行长的名义,开出10 000两银子的保单,通过德商瑞记洋行,帮助同盟会秘密购买武器,并寄存在瑞记洋行的仓库内。此外,同盟会在上海所办《民立》等报的馆址,其租金和其他费用都由信成银行负担。由于受到同行的嫉恨

[1] 王耿雄编著:《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1913》,第451页。

[2] 沈云荪:《辛亥革命后的上海中华银行》,《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文史资料纪念专辑》,第231页。

与蛊惑,辛亥前夕信成银行连连遭到退股和提兑,最终不得不倒闭。

辛亥上海光复后,深受孙中山信赖的沈缙云被委任为沪军政府财政总长,参与过中华银行的筹办和早期运作。与此同时,沈缙云与信成银行另一负责人王一亭等正考虑把信成银行改组为中华实业银行,遂商诸孙中山。

是时孙中山不再担任临时政府大总统,潜心于构思实业建设学说,热心兴办实业,尤其希望在上海开办实业银行,从而与金融界有了更多的联系。对于沈缙云的这一提议,孙中山非常赞成,并且欣然答应出任日后新成立的中华实业银行的名誉总董,另约请原同盟会其他骨干分子如宋教仁、胡汉民、于右任、陈其美、张静江,南洋侨商吴世荣,上海绅商李平书等人,共同作为中华实业银行的发起人。中华实业银行创立会于上海广东路36号中国铁路总公司会议室召开,订立中华实业银行章程32条,规定集股额600万元,分120万股,先收四成;推定沈缙云、陆秋杰为筹备主任,另在上海、新加坡、仰光、槟榔屿、爪哇、日本、吉隆、马六甲、大小霹雳、芙蓉、厦门、汕头等地推定筹备员,其中上海的筹备员有宋教仁、伍廷芳、陈其美、汪精卫、于右任、张静江、吴世荣、谢良牧、庄希泉、王宝崙等37人,多为原同盟会骨干。中华实业银行另在上海江西路设事务所。创办中华实业银行招股启事称:“孙中山先生以伟大强毅之志愿,缔造民国,大功告成之日,宣布第二目的曰民生主义,民生主义之进行,在求实业之发达,实业之发达,恃有宏博活泼之金融机关。固欲谋实业,必先谋实业银行,实业银行者,受国家之监督,负发行债票之特权,以供给资本于农工路矿诸大实业界,授受迅捷,于实业上占最重要之地位者也。发起诸同人,秉承中山先生之意,乘时组织。复蒙中山先生以名誉董事之名义,提纲絜领,克期观成,他日实业发达,固足以利国福民,而本银行之营业,日上蒸蒸,亦自可操左券。”^[1]

自1912年4月10日起,中华实业银行开始公开招股,收股存款处除了上海南市、北市两处的信成银行之外,上海的其他银行,如中华银

[1] 沈云荪:《中华实业银行始末》,《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6期。

行、通义银行、兴业银行、浙江银行、四明银行，均代理中华实业银行的收股存款事宜；而外埠各处信成银行均可代收。可见，中华实业银行的筹办是以信成银行为基础，并且争取到其他商业银行的支持。

在孙中山的支持下，中华实业银行的创办呈经北京政府实业部批准立案，《部定实业银行章程》明确规定：“本银行经中央政府实业部之承认，为振兴实业之总机关，其组织为股份有限公司，设于上海，并设分行、代理行于各重要地方。”“实业部总长任命之本银行监理官，随时皆可检查本银行银库存票库簿据及各种文书，本银行监理官，随时可嘱本银行报告营业上各种计算及情形。”“本银行之红利，设每年不足百分之五时，政府自创立初年起，以十年为限，支給经费以补充之，但其数不得过已交股本百分之五。”从这些规定看，中华实业银行当时的性质是商办官督。

孙中山委托沈缙云为劝业特派员，前往南洋诸地劝募华侨回国兴办实业，同时为中华实业银行招股，并手书招股信，内称：“该董事会公举沈君缙云等前赴各贵处招集股份……特恳贵会于沈君到时妥为招待。并为介绍与吾海外诸同志接洽，俾得早观厥成。”^[1]同年5月起，沈缙云一行先后赴新加坡、槟榔屿、仰光、吉隆坡等地招股，华侨华人认股踊跃，到回国之际，共招募到430万元，远超出原定250万元的商股招募数。正如是年10月下旬沈缙云回抵上海时在各界欢迎集会上所说的：“承中山先生劝业特派员之命至南洋各岛，招实业银行股份，各处均受欢迎，招股手续甚见圆满，总数已达430万元。”^[2]并在新加坡设立中华实业银行南洋临时总机关，陆秋杰为驻办事处总董。

孙中山还曾努力促成中华实业银行和中华银行之间的合并。1912年11月，当中华实业银行组织就绪即将正式开幕，孙中山即致电南洋各埠认股中华实业银行的侨商代表，出席中华实业银行的第一次筹备会议，商议并决议与中华银行合并事宜。12月4日，孙中山与陈其美等人出席了由沈缙云、周舜卿等人代表信成银行和实业银行在上海愚园举行的对南洋侨商的欢迎会，并发表演讲指出：“吾国政府与六国银行团磋商借款，受种种之挟制，要求非分之权利……鄙意更拟联

[1]《实业银行之进行》，《民立报》1912年3月20日。

[2]《欢迎实业家大会记》，《民立报》1912年10月30日。

合多数银行，与法国资本家合资创一极大之银行。盖分则魄力小，于全国无甚影响。倘合中外为一家，将国中多数银行联合而成一巨大之银行，发行债票，任外资之输入，则全国金融枢纽操之于己……不致受非法之要挟，而利益亦不致入外人之手矣。”^[1]12月28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华实业银行第一次筹备会，这次会议一是通过了该行章程，二是议决是否与中华银行合并。沈缙云转达了孙中山关于联合国内多数银行并吸收外资、组织资力雄厚银行的主张，建议“有以中西联合银行、中华银行、信成银行三银行合并实业银行之说”。但是，主要是南洋侨商的代表陆秋杰等人强调指出，若中华实业银行的名义与当初招股时有更动，南洋各股东恐难以接受，结果会议否决了与中华银行合并，同时也意味着否定与法国银行家合资办银行的下一步目标。

孙中山因故未克到会，他一方面赞誉会议通过的中华实业银行章程“精密完备，无任钦佩”；另一方面，孙中山对中华实业银行否决与中华银行合并一事，称“合并之议，初本发自南洋，文于此事，毫无成见，诸公既不赞成，则亦听之是已”。^[2]1913年2月，中华银行正式改为中华商业储蓄银行，中华实业银行稍后也于5月15日在上海正式开幕，公推沈缙云为总理，吴世荣为协理。据《中华实业银行开幕广告》称：“本银行为国内华商与南洋华侨合资创办第一成立之银行，专以振兴中华实业，便利南洋各埠华侨经营内地实业为宗旨，兼营汇兑业务。资本六百万元，总行于上海，总分行于南洋之星加坡。”^[3]然而，旋即宋案发生，“二次革命”军兴，随着国民党在赣宁之役的失败，孙中山无法在国内容身，不得不流亡日本；沈缙云则避居大连，不久亡故。中华实业银行行务无人主持，于1913年秋停业，清理结束。

三、发起成立上海交易所

1916年袁世凯统治败亡之后，孙中山得以回国，他积极支持上海金融界创办交易所。

[1] 王耿雄编著：《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1913》，第486页。

[2]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7页。

[3] 沈云荪：《中华实业银行始末》，《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6期。

上海地区最早出现的交易所,是1891年成立的英商经营的上海股份公所,后改组为上海众业公所。此外,便是1918年由日商成立的上海取引所。中国政府方面,则自民国初年开始关注证券交易所的创办。1913年,农商总长刘揆一曾召集全国工商巨子集会北京,讨论设立交易所的必要性,议决可于通商大埠酌量分设,以为倡导。1914年,财政部又发出倡议,建立官商合办交易所。^[1]1914年12月29日,北洋政府颁布《证券交易所法》,此后第一个根据这个法令申请开业的,便是上海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前身)。1916年,孙中山首先发出倡议,而虞洽卿又邀约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闻兰亭、沈润挹等参加,不过,从1916年孙中山与虞洽卿首次提出开办交易所,到1920年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开业,历时四年,可谓历经坎坷。

1916年12月,孙中山欲为革命事业筹集巨额经费,于是接受日本友人的建议,拟成立交易所。为壮大声势和便利在上海商界募集股份,孙中山首先邀请著名商人虞洽卿合作,嘱戴传贤、赵林士、朱执信、洪承祁、盛丕华等先行讨论,并在上海四明银行租一办事处,对证券、棉花、棉纱、金银、布匹、油类、粮食等七种行业的沿革与现状分别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起草了成立上海交易所的申请书,由孙中山领衔,虞洽卿、张静江、戴传贤、赵家蕃、张鉴、赵家艺、盛丕华和洪承祁等八人附议呈请,于1917年1月22日呈交北京政府农商部。该呈文阐述了应当在上海正式设立交易所的理由:

上海为全国物产集散之枢纽,所有大宗物产交易均由各业商人任意买卖,价格无适中之标准,交易无保证之机关,恐慌无从预防,金融不能活动,且经纪人亦漫无限制,于工商业之发展,窒碍实多,虽各业有各业之公会及任意集合之市场,然既无确实之资金,又无完备之组织,政府难于监督,商人无所置信,是以大宗物产之价格,一二外国经纪人常得自由操纵之,病商病国,莫此为甚。至于有价证券之交易,亦无一中心之机关,已发行之公司股票不能流通,新发生之公司不易招

[1] 杨荫溥著:《中国交易所论》,见金融史编委会编:《旧中国交易所股票金融市场资料汇编》(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87页;陈善政:《我国证券市场之发展史》,见陈善政主编:《证券内容专刊》(1946年9月16日),第31页。

股，已发行之公债价格日渐低落，将来国家或地方发行公债更难于办理。因此之故，中国公司多于外国政府注册，以图其股票可以赖外国交易所而流通，中国之投资者亦多弃本国公债于不顾，而乐购外国之公债，且各公司之内容，无一机关调查保证之，买入卖出，漫无所察，一旦破绽发生，股票顿成废纸，往往因一公司之内容缺陷，致市场大起恐慌。凡此种种祸患，皆由无资本充足、信用确实之交易所有以致之，不能徒责商人之无爱心也。

呈文声称：“交易所之组织，则以证券交易、物品交易二者同时经营为最有益于上海市场，尤能助中国一盘事业之发展。”^[1]

这篇呈文虽为朱执信起草，但由于是孙中山领衔上呈，应该视为孙中山对筹建交易所的主要观点与思想。

根据孙中山的委托，戴传贤专门赴北京请农商部长谷钟秀支持批准。同年2月24日，农商部批复：“查所拟营业目的，除物品交易一项，应咨请江苏省长查复到部，再行核办。其证券一项，系为流通证券起见，应准先行备案。惟呈请手续核与《证券交易所法施行细则》第二条规定未符，应即遵照办理。”虞洽卿等人接到指示，一面加紧筹备，一面将“与规定未符”的有关文件一一备齐，准备再次上报。^[2]但不久北京发生“府院之争”，酿成北京政权动荡混乱，旋张勋复辟，上海金融市场陷入混乱，银根紧缩，商业停滞，筹办交易所一案只好暂且搁置。以后，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孙中山毅然南下护法，与北京政府公开决裂，因而受到通缉，并被取消了上海交易所发起人的资格。即便如此，孙中山依然非常关心和支持在上海开设交易所。

1918年初，农商部根据《证券交易所法施行细则》第六条“自暂行立案后满一年并不稟请批准设立者其立案无效”之规定，令虞洽卿迅速筹办，“如逾期未能开办，应即准由他商设立”。同年3月，日商取引所上海开业。于是，1918年4月，虞洽卿联合闻兰亭、邹静斋、沈

[1] 杨天石著：《蒋氏密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2月版，第59—60页。

[2] 剑荣：《虞洽卿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3期。

润挹、张乐君、顾馨一、盛丕华等再度发起筹办上海交易所，所拟意见书特别说明1917年由孙中山倡议创办交易所之经过，重申设立交易所的必要，并以物品交易所之设立为事实上的需要，请准予与证券交易所一并立案，开办兼容证券与物品的交易所。上海总商会亦为之呼吁，催促农商部予以批准。1918年7月14日，虞洽卿联络各巨商召开预备会，确定股本500万元，共10万股，先由各业自行筹认，若有不敷，再行登报招集，同时建立事务所，结果各业认股，异常踊跃。^[1]8月26日，上海交易所第二次预备会在海宁路召开，“所有上海商界重要人物及各业领袖”先后到会，决定修订章程及将所收股本指存中国银行，指定筹办干事盛丕华、冯承祜、邹静斋、周佩箴、赵士林等五人，具体进行筹备工作。^[2]上海交易所发起者共20余人，每人派认股联单一本，到9月中旬已缴有3万余股，所缴股款，每日均存入中国银行。^[3]10月份，认股即告完成。然而，到12月份，上海交易所认股截止已逾两月，却迟迟不能开张，其原因仍然是上海商界与北京政府之间在分业与合业上的分歧所致，上海交易所的发起者们坚持认为，“日人之取引所包含各种营业，我非联合各业各商帮团结为一，则资力皆无能与之对抗，故决议上海交易所全体组织为一公司，以期利害共同，互相辅翼”。但是，农商部却饬令其一分为三交易所办理，各发起人认为将一公司一分为三，开支浩大，且顾虑资力人力皆不足以对抗日人，因此竭力与农商部相争，力图达到统一公司之目的。^[4]

在争执不下之时，农商部只得令上海总商会召集各商帮就交易所是分办还是合办问题再行研究，结果上海各业领袖一致赞成合办，定为议案，并函请上海总商会据情呈报农商部。虞洽卿又赴京亲向主管部门交涉，农商部才核准“查此案既据查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除金业、股票两业外，多数均以合办为宜，自应准予先行开办”。1919年6月28日由上海县知事公署转令上海交易所。同年9月，修订章程，决定将上海交易所改名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过筹备，收足第一期

[1] 《上海交易所组织概情》，《银行周报》第2卷第27号（总第58号），1918年7月16日。

[2] 《上海交易所筹备复业》，《银行周报》第2卷第33号（总第64号），1918年8月27日。

[3] 《上海交易所之收股情形》，《银行周报》第2卷第37号（总第68号），1918年9月24日。

[4] 《上海交易所濡滞之原因》，《银行周报》第2卷第49号（总第80号），1918年12月17日。

股银125万元(总额的25%),于1920年2月1日在上海总商会开创立会,股东总数572户,公推虞洽卿为议长,当场选任理事17人,监察3人。^[1]1920年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开业,地址设在四川路与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转角处,额定资本仍为500万元,先收25%,分10万股。理事会推举虞洽卿为理事长,闻兰亭、赵士林、郭外峰、沈润挹、盛丕华、周佩箴为常务理事。理事会以下设场务科、计算科、会计科、总务科、文书室等机构。交易市场分为七个部:证券部、棉花部、棉纱部、布匹部、金银部、粮油部、皮毛部,各部分别专设市场。每一部有经纪人55名。于是几经周折,上海第一个由华资创办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终于成立了。

如前所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初创与孙中山筹措革命经费有关,虽说最后的成立同孙中山并无直接的关系,但1920年成立时,从孙中山寄来的贺词“倡盛实业,兴吾中华”来看,孙中山还是十分关注交易所事业发展的。此后,国民党人蒋介石、陈果夫、张静江、戴季陶等于1920—1923年间又曾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通过组织茂新号、恒泰号、利源号、新丰号、鼎新号等五家经纪人事务所,从事交易活动。其间,有多少钱用于国民党的革命事业,不得而知,但据杨天石先生的研究,1921年12月11日陈果夫致函蒋介石,告以“孙先生之款已收到”,即系蒋介石通过陈果夫资助孙中山的款项。^[2]

四、在广东海关关余问题上与上海金融界的冲突

1923年底,因粤海关关余问题,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权与上海金融界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是以往双方关系中没有的。

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重建了革命政权——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但政府所面临的财政困难十分严重,要想整顿财政,改变纸币混乱、信用低下的混乱局面,就必须首先整理纸币、建立造币厂,而这需要基金。孙中山除向华侨募捐外,还曾于当年9月向各国驻华外交

[1] 上海市档案馆编:《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7—14页。

[2] 杨天石著:《蒋氏密档与蒋介石真相》,第82页。

团海关委员会要求援照前例,将粤海关关余的13%归粤军政府。^[1]各国舆论虽然以“中国北京自军阀迫走黎元洪,已无政府,中山先生开府广州,号召西南护法团体,全国大势咸趋向于西南护法政府,关余一项,当给予西南”,但拨交关余迟迟没有实施。^[2]1923年10月,曹锟通过贿选登上大总统之位,举国震怒,孙中山拟督师北伐,但军饷的筹措十分困难,因此对海关关余的要求也更为迫切。1923年11月5日和23日,孙中山两度令大本营外交部照会北京外交使团,要求拨还粤海关关余,否则将自行提取。^[3]

广东关余事件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强硬表态,称如北洋政府不能阻止广州关余事件,对海关担保之内债基金将不再负保管之责任,并极力煽动金融工商界反对广州截留关税。

以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为代表的上海金融工商界,因关税与内债关系密切,担心孙中山政府截留广东关余将动摇内债基金,进而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于1923年11月曾致电大元帅府外交部长伍朝枢,请求其顾全大局,相与维持关税。^[4]12月1日,上海总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又致电孙中山,要求为维持债信基金请勿动用关余,内称:“自民国九年整理内国公债案成立,指定关余为基金公布后,内债信用渐见恢复,流通各处,商民称利,方幸社会金融藉之活动,国家元气赖以昭苏。乃本年整理案内各债付息虽未失信,还本均已愆期,票价又跌,人心惶惶,说者谓因关税短收,除洋赔各款外,有无余款或能余若干尚难悬揣,而戈戈之数,外人争之,北方争之,西南亦争之,以致优先确定之内债基金几乎动摇,然内债关系全国人民生计,金融命脉,即国家之安危与共。我公手创共和,功垂青史,爱国恤商当引为己任,况

[1] 1919年经广州军政府的反复要求,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商得北京公使团同意,曾按粤海关关余13.7%的比例分拨给军政府。但次年春军政府分裂,孙中山离粤赴沪,总税务司停止分拨粤海关关余。1920年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军政府提出过发还积欠之关余,但遭公使团拒绝。1922年3月,公使团决定把西南关余全数交付北京政府支配。见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民国部分)》,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00—103页。

[2] 《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9月14日。

[3] 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97、104页。

[4]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上海市钱业同业公会档案,档号S174-1-43;《申报》1927年11月16日。

如整理案内之八厘军需公债尚系我公在南京临时政府任内发行，^[1]想顾全关税不使基金动摇，相与维持尤我公之所乐为，月前安总税务司（系指总税务司安格联）过沪，敝会等曾以保管基金之事为请，渠谓对于整理原案，誓必坚持，客卿不忝厥职，至可感谢，则国人应如何为之后盾，我公应如何为之援助以底于成，诚属不容或缓者也。”^[2]此外，上海银行公会还把孙中山的革命政权说成是“西南军阀”，并以全国银行公会的名义发表宣言：近闻西南军阀有争夺关余之说，试问此项关余为内国公债基金已为全国人皆知，无论何方，无论何人不得攘夺，或以不正当手段挪用一时，否则必与国民共弃之，况债票流通市面，中外持票人不知凡几，如有人攘夺关余即攘夺我国民财产，倘国民财产军阀可以攘夺，国将何以立，敝会为全国金融枢纽，沪市尤为中外商业总汇，唯恐公债基金动摇，必致牵及中外金融及商市命脉，不敢缄默不言。^[3]

上海金融界强烈反对孙中山截留广东关余，有其直接原因。北京政府时期的财政主要靠大量发行公债库券来维持，自1912到1925年，北京政府共发行了27种内债，发行总额达8.76亿元，实发行额达6.12亿元。此外，还有各种记名和不记名的国库证券、盐余借款与各银行短期借款、垫款、透支等等，至1925年底，仅此四项积欠本息共达1.72亿元。^[4]这些内债的担保品除了关余、退还庚款及盐余较为可靠外，其余都是些靠不住的税收。可归中国政府支配的关余及盐余本来就为数不多。当时上海金融界是政府公债库券的主要持有者，公债库券的市场行情与金融业的利益直接相关。1921年北京政府把海关收入作为公债基金担保的来源之一，公债基金由总税务司逐期拨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代为保管，实际上就是由外籍总税务司控制公债基金作为基金确

[1] 1912年1月8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批准发行军需公债，发行额为1亿元，年息8厘，以国家所收钱粮作抵，将来免厘加税实行时，则改以所加税作抵。此项公债自发行后第二年起，每年偿还20%，至发行后第六年还清。但实际发行额为737万元，除已抽还400万元外，尚余337万元。

[2]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上海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档案（以后简称为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号S173-1-42。

[3]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上海市银行公会档案，档号S173-1-42。

[4]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序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11页。

实的保证。1921年整理案出台后,动荡多年的内债市场大体得以稳定下来,确实受到了以金融界为代表的国内诸多持券人的支持,因而孙中山方面截留粤海关余额,自然会受到上海金融界的反对。

孙中山则不顾来自各方面的反对,数次强调支配粤关余的立场,如12月9日发表宣言指出:直系利用北京政府为傀儡,以金钱武力肆行捣乱,侵略粤省;今欲粤省得享和平秩序,以后粤省关税解交直系之举,必须停止;“倘中国他处关税收入不足应付对外债务时,本政府当依其所收关税,随时酌量抵补”。12月12日,针对列强的威胁,孙中山针锋相对地表示,列强若以武力阻止广东政府取得关余,则将以武力对抗。12月19日,孙中山训令粤海关税务司:关余款除应付赔款及利息外,余款解交西南政府,自民国九年3月起,西南关余均应照交;限10日内答复,如不遵命,即另委关员。12月24日,孙中山更是发表长篇宣言,详述粤关余问题之由来及广东政府之立场,除了驳斥列强和北京政府之外,对内债基金问题作了解释:“若人民因本政府收取关余,恐影响内债基金,是亦过虑。盖按北京整理内债案,尚有盐余、烟酒税作抵,北京政府果按该案条例办理,基金决不致动摇也。”^[1]可以看出,孙中山本人并不直接点上海金融界的名,是避免直接的冲突。

对上海金融界的抗议,广东方面及社会各界也都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广东财政部长叶恭绰认为:“公债基金原本定以三种:关余、盐余、交通余利,关款指拨之次第为:还赔洋款、公债基金、政府指拨特款。此中如政府指拨之款,本有伸缩余地,基金有不足者,尽可加拨盐余,今北京政府赖盐余以供政费,将交通余利供军阀之侵占,致基金不敷,是皆明明犯害公债基金,何以置之不问,独于广州政府欲拨用关余,乃群相责难,殊觉不公,盖关盐余款之浪费,交通收入之减少,因而累及公债基金,故完全是北京政府应负责任。”^[2]同时外交部长伍朝枢代表孙中山致电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和总商会,内称:“查民国十年北京政府整理内国公债一案,西南政府始终并未承认。一因其为非法政

[1]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8月版,第1767—1768、1770、1774—1775、1779页。

[2] 《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2月11日。

府之行动；二因整理案内之公债，有为南北对敌时期内所借之债，其用途直接间接有害于南方，其借债情状高利重扣有类赌博故也……夫西南应得关余之一部，各方面久经承认，民八九年亦曾照办。整理公债，乃北庭自借之款，理应自还。乃凭总税务司之力，恃外交团为护符，以西南之关余为还已债之基金，转移盐务、交通等税收，以贿选总统、用兵西南，事之不平孰逾于此？总税务司既以保管基金自任，则不应专取之于关余，而置盐务、交通于不问，况盐款存在外国银行，北庭取用时先得外人之许可。交通收入如京奉铁路亦有存款外国银行，总税务司若履行职务，则整理各债还本付息无须愆期，基金何至动摇？为贵会谋，应请总税司秉整理公债案赋予之权，向保管盐务、交通各款之机关及银行直接交涉提拨，则西南虽提取关余，于公债基金仍无影响。要知西南对于关余断不能贳盗以款，必据理力争，始终不懈，或更不得已而辟南方港口自由贸易。虽牺牲税收，亦于地方商务大有裨益。所虑破坏基金之责在北而不在南，在浪费数万盐、交之款，而不在争区区分之一分之关余。尚望贵会详查真相，熟权利害，毋惑危词，致堕奸人宣传利用之狡计。”^[1]在上海的全国各界联合会等30余团体也联名发表公开函，责问上海金融界以内债基金为词，阻提粤关余，是否受北庭指使助纣为虐，并声明内债基金，未经合法国会议决，国民誓不承认。^[2]

广东政府的解释当然不能使上海金融界满意，1923年12月28日，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和总商会又分别致电总税务司安格联及财政整理会会长颜惠庆，指出：“公债流通重在基金，本年内债仅金融抽签一次，幸有关余为基金，债票稍维信用，市上尚可流通，然其余各债均未抽签，人心仍多观望，查内国公债流通沪市者，为数甚巨，或押或售，持票之人中外皆有，倘使基金动摇，债票即视同废纸，弊害所及，必致牵动中外金融及商市命脉，其受切肤之痛者，不独一部分持票人而已，前因外债牵动内债基金，敝会等曾一再力争，近闻关余又有动摇之说，市面大起恐慌，贵总税务司直接负保管之责，间接有维持之权，

[1] 杜永镇编：《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1923.2—1924.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263页。

[2] 《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2月25日。

是中外商民一致所重望者，敝会等企以此项关余，为内国公债之优先权，无论何方任何需要，不得动用分毫，至欠拨公债基金之盐余及交通烟酒收入，从速照拨，按照整理原案补行抽签，应恳贵总税务司严重保管，始终维持，勿稍退让，勿任破坏，凡吾商民愿为后盾。”并恳请颜惠庆“内债基金除关余外，政府欠拨盐余及交通收入甚巨，以致粤省有词可藉，拟夺关余，敬请贵会长转达财交当局，迅即照案筹拨，以便安总税司查照整理原案补行抽签，兼杜粤省口实”。^[1]可见，在粤关余问题上，上海金融界依然把矛头指向孙中山代表的广东政府。

但是，当时的舆论多以广东政府力争关余“是全国的事，不是广东一省的事；是为中国争主权，不是为广东政府争得一笔进款；是争民族的人格，不是争广东政府的体面”。^[2]12月30日，广东自治会对上海金融业电总税务司及颜惠庆一事进行了严厉反诘，谓：“贵公会等以保留关余足以巩固内债基金，窃以基金未经合法国会之通过，北京非法政府谬然发行，守正不阿之国民，非特不肯购用，且当尊重法纪，有反对之必要也，乃商人贪低折之厚利，遂与非法政府互相为利，以遂其贪，此等罪民律以国法，自当予以严重之惩罚也。今则任其逍遥法外，债票可自由行使，自好之士纵不加以劝止，自不应有助恶之行为，乃贵会等反其道以行之，真非局外人所能道也。抑尤有进者，以国内枉法之丑行，要求外人保管，则诸公将何以自解乎？”^[3]12月16日，在上海的全国各界联合会等30余团体开联席会议，认为粤省提取粤省关余是抵抗北方政府的一种方法，北方非法政府与外人所订任何条约，粤省誓不承认。外人派舰干涉，既违背国际条约，又有干涉国家内政之嫌，为保持国家人格及国际间之地位，不得不据正义公理和全国人民之公意，作大规模之运动；同时严正批评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致孙中山的电文，是“以内债基金为词，阻提粤关余，是否受北庭指使，助桀为虐”，并声明内债基金，未经合法国会议决，国民誓不承认；联席会议各

[1] 《申报》1923年12月30日；上海市档案馆馆藏上海市钱商业同业公会档案，档号S174-1-43。

[2] 《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2月23日。

[3] 《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2月31日。

公团代表,组织粤海关外交后援会,专办此案,以为声援。^[1]在这样的形势下,上海金融界在粤关余问题上的态度,确实难以得到社会舆论的认同。

此外,上海金融界内部的态度也发生了分歧。1924年1月3日,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钱业公会会长秦润卿致函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公权,认为反对广东关税一事,“前此所发通电,已有人讦为帮助北政府,表示反对,如再继续集会,诚恐另生枝节,钱业中亦以对于中山令不再表示之必要”。^[2]尽管粤省提取关余关系到上海金融界的利益,但在明瞭全国时局尤其是关系到中国主权问题上的民意所向,上海金融业也就采取了明智的态度,不复在粤海关关余事件进一步诘难孙中山政府。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进一步强调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在关余问题上继续与列强斗争。这时,美国公使舒尔曼居间调停,4月1日,北京公使团决定将广东海关的关余交给广东军政府,孙中山争取关余的斗争取得胜利。他与上海金融界的关系也没有进一步恶化。

综上所述,孙中山与上海金融界的关系,可以归纳如下几点:

一、孙中山非常重视建立中央政府自己的银行,中国银行是他的第一步实践,虽然时间很短,但为以后在广州创办中央银行,打下了相当的基础。

二、孙中山重视商办银行在振兴中国实业方面所起的作用,在招股、基本制度、章则、扩大影响等方面都发挥过作用,甚至亲自出任有关银行的最高职位。在促进成立交易所问题上,可以认为孙中山是要努力推进中国金融的现代化。

三、孙中山与上海金融界的关系,涉及面并不广,主要是那些非主流的人士;尤其在南下护法之后,孙中山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广东地区的政治与军事事务,没有进一步发展与金融界的关系,尤其与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关系,与南三行、北四行等大的商业银行的负责人

[1]《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2月25日。

[2]上海市档案馆馆藏上海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档案,档号S173-1-42。

没有直接的往来,相互关系较疏远。孙中山在广东的革命事业,基本上没有得到上海金融界的直接支持。这与后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有很大的不同,后者基本上是靠上海金融界的支持得以建立和巩固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最后的奋斗：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主张*

戴鞍钢

[内容提要]

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富强，始终不懈地英勇奋斗。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段，他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并为之实现而多方努力。国民党“一大”前后，为了抗衡把持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孙中山与奉系、皖系军阀之间存在着三角联盟关系，虽是出于反对军阀统治的策略考虑，但也不必讳言，孙中山这时也确实抱有这样的想法，希望自己的救国事业能够得到各派军阀的赞同，从而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在国民革命军建立之前，迫于当时军事斗争的需要，孙中山仍不能不借助滇、桂军的力量。而这些军队动辄以缺乏军饷抗命，使孙中山不堪应付。广州商团的对抗，也加重了对革命政权的压力，甚至使孙中山产生了危机感，因此当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后，孙中山产生了放弃广州，借北伐之机另寻出路的念头。10月下旬又传来直系将领冯玉祥反戈，在北京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政权的消息，孙中山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实现自己救国夙愿的好机会，决定接受冯的邀请北上。当时与孙中山仍有联盟关系的张作霖、段祺瑞亦电邀孙中山北上。孙中山的《北上宣言》明确表达了他这次北上的目标，一是努力扫除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二是通过召开国民会议，依靠民众的力量，迫使奉、皖等反直各军，接受他的救国主张，变军阀政权为民主政权，实现祖国的独立、自由、富强。孙中山指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是互相联系的，并强调这是段祺瑞、张作霖等必须接受的基本条件。北上途中，

* 本文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成果，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07JJD770098。

孙中山多次发表演说、谈话,阐述他的国民会议主张。他特别强调,国民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要铲除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孙中山的主张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得到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各阶层民众的响应,奉系、皖系军阀则极力抵制。为了争取国民会议的召开,孙中山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作了最大限度的让步。段祺瑞等人则一意孤行,以所谓的“善后会议”抗拒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孙中山为此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关键词]

孙中山 国民会议 善后会议 军阀 帝国主义

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富强,始终不懈地英勇奋斗。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段,他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并为之实现而多方努力^[1],但壮志未酬,溘然病逝。本文谨通过梳理这段史实,缅怀孙中山并纪念他奉安八十周年。

一、北伐与北上

1924年9月,是一个“多事之秋”^[2]。在广州城内,商团武装正蠢蠢欲动,图谋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权。在江浙地区,爆发了直系军阀齐燮元与皖系军阀卢永祥之间的战争,习称直卢战争或江浙战争,成为奉系、皖系军阀联手对抗直系军阀的先声。消息传到广州,孙中山立刻在元帅府召开会议,决定遵守先前他为推翻直系军阀吴佩孚、曹錕的统治,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祺瑞所达成的三角联盟协议,出师北伐,“与天下共讨曹吴诸贼”^[3]。会议决定,湘、赣、豫军全部参加北伐,滇、粤军抽调一部随行。9月12日,孙中山率大本营移

[1] 关于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主张及相关史事,学术界的专题研究仍待加强。以往研究成果,可参阅如王杰的《孙中山研究》,曾业英主编的《五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 《孙文致刘震寰密电》(1924年10月1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30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年谱》(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51页。

驻韶关，亲往督师。廖仲恺任大本营财政部长兼军需总监，谭延闿为北伐军总司令。

孙中山与奉系、皖系军阀之间的三角联盟关系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第一次护法运动后期，陆荣廷等桂系军阀架空孙中山，与直系军阀暗中联络，酝酿南北议和；而直系军阀不满段祺瑞的排斥，企图通过与桂系军阀的勾结，加强与皖系抗衡的实力，并进一步打击孙中山。段祺瑞为减轻直桂军阀联手压力，有意与孙中山接触。在这种情况下，受西南军阀排挤愤然离粤的孙中山，于1919年秋电召革命党人宁武到上海，指示：“我们要分化北方军阀，利用直系与皖系的利害冲突，联络段祺瑞，特别是关外实力派张作霖，三方合作声讨曹（锜）、吴（佩孚）。”他具体要求宁武利用东北籍的身份，“回去做张作霖的工作”^[1]。宁武领命后，北上游说张作霖。正欲经营关内的张作霖，表示愿意考虑。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直系联合奉系打败了皖系，段祺瑞被迫下台，皖系势力退居闽、浙、沪一带。之后，围绕着争权夺利，直奉矛盾日渐突出。孙中山洞若观火，他在《致何民畏函》中指出：“今彼派既将段氏打倒，直、奉之争乃又继续开幕。盖直曹奉张，其野心皆无底极，而两方势力又莫能相下。徐世昌今已为彼等所卵翼，更无涵盖之能力。由此观之，奉、直必因权利而冲突、而决裂，而皖系之余烬，又必不能不附我而图报复。”^[2]事态的演变，证实了孙中山的预见。

1921年7月，湖南军阀赵恒惕以援助湖北自治运动的名义，发动所谓援鄂战争。吴佩孚趁机出兵援助湖北督军王占元。结果赵军战败，直系控制了湖北，王占元也被迫下台。张作霖本来也想通过支持王占元，伺机将势力扩展到长江流域，直系此举打破了他的设想。同年底，受奉系支持的梁士诒内阁刚成立，即遭直系的猛烈攻击，意在将奉系势力挤出北京政府，加强直系控制。于是，直奉矛盾激化，并都做了开战的准备。张作霖为了对付直系，一面与皖系勾结，一面决定与孙中山结盟。

[1] 宁武：《孙中山与张作霖联合反直纪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15页。

[2] 孙中山：《致何民畏函》（1920年7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6页。

这时，孙中山已赶走桂系势力，在广州第二次建立起了革命政权，并积极准备北上讨伐把持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为了争取北伐成功，孙中山也希望继续利用北洋军阀的内部矛盾。1922年2月，张作霖、段祺瑞先后派代表南下与孙中山商洽联合讨直，三角联盟初步形成。

同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败退关外。8月，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避居上海。皖系则担心被奉系吞并。三方之间，接触增多。1923年2月，孙中山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余与张、段之三角联盟，现正进行甚顺利，当以之制吴佩孚。吴若不从余之主张，当用联盟之武力讨之。”^[1]

孙中山这一阶段与奉系、皖系军阀的接触，固然主要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应该说，在开始接触之初，对段祺瑞、张作霖其人以及他们要求结盟的动机，孙中山就有明确的认识。1920年3月27日，孙中山曾指出鉴于西南军阀破坏护法运动，“今日之计，势不能不与北方周旋；然联络北方将帅者，不只一人，不曰联皖排直，即曰联直排皖，数年之间，其效可睹。文则以谓乱法卖国，直为罪首，皖为附从。今迫以势不得已，与之周旋，则当择其较有信义而不巧滑者，而后可以计事。且亦年来主张联某排某者之应行临机变计者也。此无他，要以使吾人计划畅行无阻而已。仆之与段芝泉（指段祺瑞，下同——引者）接洽，即本此意”^[2]。前引《致何民畏函》也说明了这一点。

但也不必讳言，孙中山这时也确实抱有这样的想法，希望自己的救国事业能够得到各派军阀的赞同，从而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他曾指示在一封批文中表示：“先生（指孙中山，下同——引者）无分南北，只以主义同者则为同志耳。芝泉近日大有觉悟，先生自乐与共图国事，使真正之共和能早日实现于中国也。”^[3]即使对吴佩孚，孙中山也不把门关死，指示朱和中：“对于吴处当先探悉其心，果有爱国之心，不是为出风头、争地位，乃可与之接洽。”^[4]并说：“两害取其轻，两恶宽其小，吴

[1] 孙中山：《与东方通讯社记者的谈话》（1923年2月22日），《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0、131页。

[2] 孙中山：《复王文华函》（1920年3月27日），《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236—237页。

[3] 孙中山：《批姚畏青函》（1920年5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264页。

[4] 孙中山：《批朱和中函》（1920年8月19日），《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304页。

佩孚与桂贼联结，假民意皮毛，无彻底之办法，为他人作嫁衣，挫去一段祺瑞，而招一张作霖（日本狗）。其无特识、无远见为如何也。请兄向之劝导，顺风转舵，投诚革命党，则其功业必有可望也。”^[1]

在经历两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坚定了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方针的思想，但他并没有放弃通过与各派军阀合作，实现和平统一的想法。就在《孙文越飞宣言》发表的同一天，孙中山发表了《和平统一宣言》，表示：“今日国内势力彼此不相摄属者，姑较计之，可别为四：一曰直系，二曰奉系，三曰皖系，四曰西南护法诸省。此四派之实际利害，果以何冲突，亦自难言。然使四派互相提携，互相了解，开诚布公，使卒归一致，而皆以守法奉公引为天职，则统一之实不难立见。文今为救国危亡计，拟以和平之方法，图统一之效果，期与四派相周旋，以调节其利害。”^[2]

即使到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仍没有彻底放弃这种想法，但他这时对三角联盟的兴趣已大为减弱。1923年6月29日，他曾致电赴沪与反直各派商洽的汪精卫：“自兄行后，我已将中国大局长为考虑，觉得与段合作不过比较上或善耳，仍不能彻底以行吾党之主义。故对段之事只有十分水到渠成，毫无障碍方可允之。若尚要费力，则不如将现在时局放去一切，另图根本之改革，故拟粤中军事大定之后，则亲赴俄、德一行，以定欧亚合作之计划，以为彻底之革命。望兄注意：如段事不洽，则对国会、对黎、曹皆主不问，并请速回为荷。”^[3]

那么，为什么江浙战争爆发后，孙中山又立即作出了北伐响应的决定？除了遵守先前的联盟协议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孙中山对当时华南局势的判断。

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东第三次建立革命政权，以及在随后的讨伐沈鸿英和陈炯明的军事斗争中，主要是依靠了滇、桂军的力量。而这些军队并无革命理想，未脱旧式军队的藩篱。孙中山对此

[1] 孙中山：《批朱和中函》（1920年7月30日），《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290页。

[2] 孙中山：《和平统一宣言》（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50页。

[3] 孙中山：《致口口电》（1923年6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576页。原编者按：收电人不明，似系汪精卫。

有清楚的认识：“现在在广东同我们革命党奋斗的军队，本来不少，我都不敢说他们是革命军。他们这些军队，既是来同我们革命党共事，为什么我还不叫他做革命军呢？我之所以不敢以革命军的名号加之于这些军队之上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内部的分子过于复杂，没有经过革命的训练，没有革命的基础。”他强调：“不明白革命主义的军队，究竟不能除却自私自利的观念，如果和他们本身的利害相反，马上便靠不住；所以我们的革命总是失败。”^[1]

所以孙中山想通过创办黄埔军校等，“另外成立一种理想上的革命军”^[2]。但在这样一支革命军建立之前，迫于当时军事斗争的需要，孙中山仍不能不借助滇、桂军的力量。而这些军队动辄以缺乏军饷抗命，使孙中山不堪应付。广州商团的对抗，也加重了对革命政权的压力，甚至使孙中山产生了危机感，因此当江浙战争爆发后，孙中山产生了放弃广州，借北伐之机另寻出路的念头。9月9日他从韶关致函蒋介石，谈到了这一点：“从根本办法，以练一党军而负革命之责任，此志正与兄同。惟广东一地，现正陷于可致吾人于死之因有三：其一，即英国之压迫。此次罢市风潮，倘再多延一日，必有冲突之事发生，而英舰所注意者，必大本营、‘永丰’、黄埔三处，数十分钟便可粉碎，吾人对彼绝无抵抗之力。此次虽幸免，而此后随时可以再行发生，此不得不避死就生一也。其二，即东江敌人之反攻，现在已跃跃欲动。如再有石牌之事发生，则鹿死难手，殊难逆料。其三，则客军贪横，造出种种罪孽，亦必死之因。有此三死因，则此地不能一刻再居，所以宜速舍去一切，另谋生路。”他认为：“现在之生路，即以北伐为最善。况现在奉军入关，浙可支持，人心悉欲倒曹、吴，武汉附近我有响应之师，乘此决心奋斗，长驱直进，以战场为学校，必有好果也。吾党之士，切勿犹豫，大局幸甚。”^[3]

应该指出，孙中山的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他对当时广东敌我力量

[1] 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全集》第十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2、293页。

[2] 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全集》第十卷，第293页。

[3] 孙中山：《复蒋中正函》（1924年9月9日），《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3页。

的对比过于悲观,实际上,如果坚定地依靠真正拥护革命的民众是可以战胜敌人的。平定商团叛乱和以后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都是例证。而且奉系、皖系与直系军阀之间的战争,无论哪方取胜,都不能给人民带来丝毫的利益。虽然孙中山对张作霖、段祺瑞的政治面目有所认识,他在9月18日发表的《北伐宣言》也明确表示,北伐的目的并不仅限于反直,而是要推翻军阀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但诚如《向导》周刊所指出的,北上参战完全不能影响或动摇军阀制度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政局。^[1]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曾建议孙中山停止北伐,集中精力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推进国共合作的成果,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投入国民革命。但孙中山基于自己对形势的认识,没有改变北伐的决定。

尽管孙中山坚持北伐,但诸如军力、财力实际困难重重,举步维艰。而他面对国内战乱频仍、民生凋敝的严酷现实,早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愿望又如此强烈,因此当10月下旬传来直系将领冯玉祥反戈,在北京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政权,吴佩孚逃至湖北的消息,孙中山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实现自己救国夙愿的好机会。

对冯玉祥,孙中山并不陌生。据冯玉祥后来记述,北京政变之前,他与国民党人就有来往,孙中山还曾托人将自己手书的建国大纲赠予冯玉祥。^[2]北京政变后,冯玉祥进一步表现出进步倾向。他将所部改为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并电请孙中山北上指导。孙中山很快作了积极的响应。10月27日,他复电冯玉祥等,祝贺政变成功,表示:“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3]

10月30日,孙中山由韶关返回广州。次日在大元帅府主持会议,讨论应对北方时局的方针。11月1日,冯玉祥又电请孙中山早日赴京。当时与孙中山仍有联盟关系的张作霖、段祺瑞亦电邀孙中山北上。次日,孙中山决定北上。11月3日,他到黄埔军校辞别,并发表讲话阐述北上目的,认为:“从前革命,都是在各省,效力很小,要在首都革命,

[1] 蔡和森:《北伐呢? 抵抗英国帝国主义及反革命呢?》,《向导》第83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年谱》(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360页。

[3] 孙中山:《致冯玉祥等电》(1924年10月27日),《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252页。

那个效力才大。”并指出北京政变后，政权“不是在革党之手，还是在一般官僚军人之手。拿这次变动的结果看，毫不能算是中央革命，这次变动丝毫没有中央革命的希望；既是没有中央革命的希望，我何以还要到北京去呢？”他解释说，这主要是为了扩大革命的宣传，壮大革命的力量，着眼于将来，为“一个大规模的中央革命”做准备。他强调，此行的结果“究竟是怎样，虽然不能逆料，但为前途发展起见，此时也不能不去。大家又不可以为我到北京之后，马上就能发起一个中央革命。不过借这个机会，可以做宣传的工夫，联络各省同志，成立一个国民党部，从党部之内，成立革命基础。能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预先固然不能断定，但是只要有革命的方法，便可以进行”。^[1]这些都说明，孙中山对政变后的北京政局是有清醒认识的，对这次北上能否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不盲目乐观。

鉴于张作霖、段祺瑞等人反复无常、居心叵测，有一些国民党人担心孙中山北上的安全，劝他取消此行。但孙中山向来以民族利益为重，早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既然觉得北上对革命事业有利，就不管有多大的风险，也决定成行：“根本之图，尤在速谋统一，以从事建设。庶几分崩离析之局得以收拾，长久治安之策得以实施。本大元师权衡轻重，决定即日北上，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2]他坚定地表示：“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3]

同时，孙中山并不因决定北上而停止北伐的军事部署，他指示发一秘密通告给各党部，指出北行之举旨在“以期值此可促党务进行一大步，并非有妥协之意味也。政府之进程须靠兵力而定”^[4]。他在决定北上的同时，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任命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负责大本营事务，驻守韶关，主持北伐军事。11月9日，入赣北伐军连日进占大庾及赣州，并向吉安推进。

[1] 孙中山：《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1924年11月3日），《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264—266页。

[2] 孙中山：《肃清余孽绥靖地方通令》（1924年11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278页。

[3] 孙中山：《与蒋中正的谈话》（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312页。

[4] 孙中山：《批巴达维亚同志电》（1924年11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263页。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不久前在《北伐宣言》中提出的推倒军阀及其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的政治立场,并指出:“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北上宣言》主张对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及特权,对内以全力保障人民之自由,辅助农工商实业团体之发达,谋经济、教育状况之改善,并明确提议召开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1]

11月12日孙中山出席广州各界欢送会,发表演说再次阐述他对北方时局的认识和对这次北上的考虑。他指出,这次北京政变“有许多复杂的分子参加在里头,革命党虽然是原动力,但其中大部分的人都不是革命党”。表示尽管道路坎坷,他仍决定到北京去,“拿革命主义去宣传”,推进革命的发展。并勉励大家“同心协力把广东的基础弄得巩固,做一个革命的好策源地”。要求“南方各同志都要联络起来,团结南方现在的力量,并且要把北伐军前进到武汉,和北方响应”。^[2]次日,孙中山偕宋庆龄乘永丰舰离粤北上。

二、国民会议的主张

孙中山的《北上宣言》明确表达了他这次北上的目标,一是努力扫除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二是通过召开国民会议,依靠民众的力量,迫使奉、皖等反直各军,接受他的救国主张,变军阀政权为民主政权,实现祖国的独立、自由、富强。他强调:“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之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成功。”并指出:“今日者,国民之武力固尚无可言,而武力与国民结合则端倪已见。吾人于此,不得不努力以期此结合之确实而有进步。”^[3]

孙中山认为,要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必须“使国民能自选择其

[1] 孙中山:《北上宣言》(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295、298页。

[2] 孙中山:《在广州各界欢送会的演说》(1924年11月12日),《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308、309页。

[3] 孙中山:《北上宣言》(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296、297页。

需要。盖必如是,然后国民之需要乃得充分表现,一扫从前各派包揽、把持、隔绝群众之罪恶”^[1]。基于这种认识,他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并建议在国民会议召集之前,先召开一次由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及政党代表组成的预备会议,共同商议国家大事。

孙中山这里所说的武力与国民相结合,指的就是通过召开国民会议,迫使奉、皖等反直各军接受他的救国主张。稍后,他阐述说:“当国民革命之初步,有赖于武力与民意相结合,故预备会议,以共同反对曹、吴各军及政党与人民团体平等同列,此即求吻合于武力与民意相结合之言也。”^[2]

孙中山指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是互相联系的,并强调这是段祺瑞、张作霖等必须接受的基本条件。他在广东动身前,就向津、奉各方表明:“主义上决不敷衍。”^[3]北上后,他又直言陈述:“如果北方有胆量,能够赞成南方的主张,废除那些不平等的条约,于中国前途有大利益,南北才可以调和。若是北方没有这个胆量来赞成南方的主张,中国不能够脱离奴隶的地位,就是南北一时调和,于中国前途只有害而无利,南北又何必要调和?何必要统一?”^[4]态度十分鲜明。

在北上途中,孙中山多次发表演说、谈话,阐述他的国民会议主张。他特别强调,国民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要铲除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他指出:“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5]孙中山的主张,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得到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各阶层民众的响应,各地纷纷成立

[1] 孙中山:《北上宣言》(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297页。

[2] 孙中山:《复段祺瑞电》(1925年1月17日),《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561页。

[3] 《孙文关于向津奉表明主义上决不敷衍致胡汉民电》(1924年10月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上册,第260页。

[4] 孙中山:《与门司新闻记者的谈话》(1924年12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434页。

[5] 孙中山:《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1924年11月19日),《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338页。

了国民会议促成会。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孙中山除了自己身体力行,积极宣传,还寄希望于更多民众的支持,指出“要国民会议开得成,根本上还是要全体国民一致去力争”^[1]。并决定派革命党人分赴各地宣传,“俾民众均得了解国民会议之真意”^[2]。中国共产党亦在11月19日发表《第四次对时局宣言》,支持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主张,并在各地积极参加和指导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工作。

在国共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出现了全国性的促成国民会议的呼声,各阶层民众争取民主权利的政治热情高涨,并表现出较强烈的革命情绪。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取消不平等条约,以达到解除终身束缚的锁链之目的;它将继续打倒直系军阀,进而打倒一切军阀,解除其武装。它的方法是不妥协的,民众运动的。”^[3]

孙中山的主张和民众革命情绪的高涨,使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势力十分仇视。孙中山抵沪前夕,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公然扬言要阻止孙中山在上海登岸。在他抵沪后,法租界的巡捕竟阻挠结队欢迎的群众通过法租界。针对这些挑衅,孙中山给予有力的回击。11月19日他在上海的记者招待会上,明确指出:“上海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我是这个领土的主人,他们都是客人。主人行使职权,在这个领土之内,想要怎么样便可以怎么样。”重申:“我这次到北京去,讲到对外问题,一定要主张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4]

孙中山的主张,亦受到奉系、皖系军阀的极力抵制。北京政变后不久,冯玉祥即遭排挤,在张作霖的支持下,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并在孙中山抵京前,于11月24日就任。他一面向列强保证遵守一切中外条约,以对抗孙中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一面提

[1] 孙中山:《在长崎对中国留日学生代表的演说》(1924年11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368页。

[2] 孙中山:《致各省各公署等组织通电》(1924年11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349页。

[3] 罗毅:《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之经过与结果》,《向导》第113期。

[4] 孙中山:《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1924年11月19日),《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336、337页。

出召开所谓的“善后会议”，以对抗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这两个会议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由军阀、官僚进行政治分赃的聚会，后者则是以各人民团体为主角来共商国是。如前者之《善后会议条例》第二条规定，有资格参加其会议者：“一、有大勋劳于国家者。二、此次讨伐贿选、制止内乱之各军最高首领。三、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四、有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由临时执政聘请或派充者，但不得逾三十人。”^[1]

奉系、皖系军阀的上述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孙中山的坚决反对。在他生命的最后旅途中，围绕着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孙中山与奉系、皖系军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如前所述，他在决定北上时，就对将要遭遇的困难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北上途中，冯玉祥被排挤，北京政局逆转，孙中山对未来的阻力，又做了足够的估计。他在上海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我这次往北方去，所主张的办法，一定是和他们的利益相冲突，大家可以料得我很危险。”^[2]这里的他们，虽未点名，但当时的北方已是奉系和皖系军阀控制的地盘，所指是很清楚的。在这同时，孙中山又对说服段祺瑞、张作霖等接受他的主张，抱有一丝希望，认为“这次我到北方去，能够做成和平统一，也未可知”。但他接着又强调：“不过要以后真是和平统一，还是要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必须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的条约。”^[3]表明孙中山虽然对段、张等人尚抱一丝希望，但他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这就决定了他与奉系、皖系军阀之间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

12月4日，孙中山经日本抵达天津，因肝病发作病倒。18日，他抱病会见段祺瑞的代表，直言斥责：“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的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

[1] 《善后会议条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善后会议》，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2] 孙中山：《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1924年11月19日），《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341页。

[3] 孙中山：《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1924年11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379页。

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1]次日，孙中山指示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部派员分赴各省进行宣传，进一步推进促成国民会议运动。

24日，段祺瑞正式公布《善后会议条例》，并宣布次年2月1日召开善后会议。针对段政府的一意孤行，中国国民党于26日发表通电，反对召开善后会议。各地民众也纷纷表示反对，上海学生联合会致电孙中山：“先生对时局宣言，本会深表同情。幸乞贯彻初衷，坚持到底，本会誓为后盾。”^[2]天津市民大会致书孙中山：“先生之事业，帝国主义之强暴及祸国军阀之狡展，处处与先生主张以阻挠，亦即处处与民众利益以残害。军阀所主张之善后会议，愚民欺世，更辱我公。望公能坚持宣言三点，慰苍生之喁望也。吾辈唯有以政权归民主义，为吾革命领袖之后盾。”^[3]

为了民族的利益，孙中山于12月31日抱病入京，与段祺瑞等开展斗争。他对随同入京的汪精卫说：“我四十年革命之目的，是求中国之独立、自由、平等。”^[4]并在《入京宣言》中表示：“十三年前，余负推倒满洲政府，使国民得享自由平等之责任。惟满清虽倒，而国民之自由平等早被其售与各国，故吾人今日仍处帝国主义各国殖民地之地位。因而救国之责，尤不容缓。”^[5]次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发表宣言，指出：“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为今日中国民族求独立解放之唯一途径，乃实行本党政策之第一步，与以党建国之第一步。故必以此提出于国民会议，任何诬蔑、威胁，皆不暇顾，愿同志及国民矢诚拥护。”^[6]

中国共产党人和各界民众，给孙中山以有力的声援。中共“四大”于1925年1月发表的大会宣言指出：“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是段祺瑞要用军阀制度而借着帝国主义的帮助，以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号召“全

[1] 孙中山：《与叶恭绰许世英的谈话》（1924年12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500—501页。

[2] 《上海学生联合会响应孙中山对时局宣言电》（1924年12月29日），《善后会议》，第5页。

[3] 《天津市民大会反对召开善后会议》（1924年12月），《善后会议》，第6—7页。

[4] 《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说明接受孙中山遗嘱经过记录》（1926年1月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上册，第267页。

[5] 孙中山：《入京宣言》（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533页。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年谱》（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369页。

中国的劳动群众,起来制止段氏这种恶劣的计划”。^[1]山东济南各界民众5 000余人举行集会,“群情热烈,一致主张先生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以组织国民会议,决不承认善后会议自规定国民会议之权力”^[2]。旅居日本、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等国的华侨,也纷纷致电声援孙中山。^[3]

为了争取国民会议的召开,孙中山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作了最大限度的让步。1月17日他致电段祺瑞,批评“善后会议所列构成分子,则似偏于实力一方面,而于民意方面未免忽略”,指出:“善后会议于诞生国民代表会议之外,尚兼及于财政、军事之整理,其权限自较预备会议为宽,而构成分子则预备会议所列人民团体无一得与。”同时表示:“文不必坚持预备会议名义,但求善后会议能兼纳人民团体代表,如所云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商、农会等,其代表由各团体之机关派出,人数宜少,以期得迅速召集。如是则文对于善后会议及《善后会议条例》,当表赞同。至于会议事项,虽可涉及军制、财政,而最后决定之权,不能不让之国民会议。良以民国以民为主人,政府官吏及军人不过人民之公仆。”并强调:“曹、吴祸国,挟持势力压制人民,诚所谓冠履倒置。今欲改弦更张,则第一着当令人民回复主人之地位,而使一切公仆各尽所能,以为人民服役,然后民国乃得名副其实也。”^[4]

立场根本对立的段祺瑞等人,自然不会接受孙中山的劝诫。孙中山十分愤慨,当即“吩咐党员,不许加入善后会议”^[5]。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向全党下达了抵制善后会议的通知;次日又批准了广东国民会议促成会反对善后会议的集会游行函请。这份函请指出,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主张“已得全国民众之同情,函电交驰,风起云涌,于此足见国民会议为民众之急切需要也。乃者段执政宣布善后条例,报章所载,无一不是违反人民公意,吾人对此更明白看出段祺

[1] 《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5年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6页。

[2] 《山东省市民大会促开国民会议预备会电》(1925年1月1日),《善后会议》,第8页。

[3] 《北京〈京报〉关于日美华侨一致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的报导》(1925年1月29日),《善后会议》,第11页。

[4] 孙中山:《复段祺瑞电》(1925年1月17日),《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561、562页。

[5] 《汪精卫先生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5期。

瑞欲联合各军阀势力,回复从前割据之局的铁证。似此军阀分赃中国之实现,必引起国内军阀分赃不均而战争,人民痛苦尤烈,外而列强更因此而瓜分或共管中国”,故决定坚决抵制,同时“主张人民自动的举派代表组织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会于北京,实行监督政府,进而以民众力量解决国是”。^[1]

段祺瑞等人则一意孤行,2月1日“善后会议”开场。2月2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宣言,明确反对善后会议的召开。同一天,广东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广州举行“反对善后会议国民大会”。会后,与会民众手持“反对外国军舰在中国水道游弋!”“反对军阀包办善后会议!”“速开国民会议以救危亡!”等标语,举行了游行示威。^[2]针对段祺瑞等人的倒行逆施,根据孙中山关于国民会议的主张,2月10日中国国民党通电指出,国民会议构成之分子,既以人民团体为主要,“善后会议之构成分子,非以人民团体为主要,决不能以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甚望人民团体自动的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盖惟人民团体所制定之组织法,乃能产生真正之国民会议也”。^[3]

激烈的斗争,加重了孙中山的病情。当时有一种用镭疗医治癌症的方法,但疗效甚微,只有约千分之一的希望。自2月份开始,孙中山“分日用镭疗治”。当时的治疗经验,用镭疗医治肝癌,“过了五十点钟还没有效果,那就是完全绝望了”。到2月15、16日,孙中山“用镭疗治已经有了四十四、五点钟了,对于病症除稍为减少痛苦而外,根本上没有一点功效”。^[4]

精通医术的孙中山,深知自己已走到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分别口授《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在《国事遗嘱》中,他特别嘱咐:“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5]在《家事遗嘱》中,孙中山对多年来陪伴他在革命的

[1] 《国民党中央执会关于广东国民会议促成会开会游行反对善后会议函》(1925年1月3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上册,第262页。

[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上册,第262、263页。

[3] 《国民党蒸电之主张》,《申报》1925年2月16日。

[4] 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60页。

[5] 孙中山:《国事遗嘱》(1925年3月11日),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43页。

征途上患难与共、出生入死的妻子宋庆龄予以深情的关怀：“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同时要求子女自立自爱，“以继余志”。^[1]《致苏俄遗书》则表示：“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2]

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富强，始终不懈地奋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惦记的依旧是未竟的包括召开国民会议在内的救国大业。他永远是中国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1] 孙中山：《家事遗嘱》（1925年3月11日），《孙文选集》下册，第644页。

[2] 孙中山：《致苏俄遗书》（1925年3月11日），《孙文选集》下册，第645页。

孙中山与上海帮会的关系及影响

郭绪印

[内容提要]

联络会党是孙中山一贯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他和上海帮会的关系是他联络会党政策、策略的组成部分。他既委派革命同志联络上海帮会,又亲自联络上海帮会;曾委派陈其美、徐朗西等人联络上海帮会,也曾直接和黄金荣联系。其历史影响是多方面的,影响到辛亥革命期间帮会在上海发挥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影响到上海帮会领导人物徐朗西等人终身贯彻“三大政策”。

[关键词]

孙中山 上海帮会 影响

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一开始即与帮会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辛亥革命是受西方民主共和思想影响的“共和知识分子”发动和领导的革命,国内资产阶级未能认识到辛亥革命代表了自己的利益,未能大力支持辛亥革命。革命党人未能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也未能找到发动农民的办法。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国内所依靠的革命力量主要是会党,在海外则依靠海外洪门致公堂。1908年之前,孙中山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基本上都是发动会党,1908年河口起义失败后,虽然重视了发动新军起义,但仍然没有放弃发动会党。此后,孙中山说:“会党性质我固知之,其战斗自不如正式军队;然军队中人辄患持重,故不能不以会党发难。”^[1]他仍然关心发动会党的工作。孙中山联络会党是他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他和上海帮会的关系也是他革命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一部分。

[1]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39页。

孙中山与上海帮会的关系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委派革命同志联络上海帮会；二是亲自联络上海帮会。其历史影响，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并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

一、孙中山委派革命党人联络上海帮会

联合帮会进行革命斗争是孙中山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为了联合海外洪门（又称洪帮、红帮），曾在海外亲自参加了洪门，被封为“洪棍”（元帅）。为了促使美洲洪门致公堂和同盟会密切合作，曾命令同盟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致公堂，实行“堂内合作”，^[1]为以后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党内合作”形式提供了先例。

辛亥革命期间，由于上海在国内的重要地位，当时不仅孙中山重视在上海联络帮会，就是其他革命党领导人物也重视在上海发挥会党的作用。例如陶成章、章太炎、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属于秘密结社的会党性质），在此基础上于1904年11月，在上海成立“光复会”，虽然也在浙江活动，但总部设在上海。

革命党人奉孙中山意旨在国内各地联络会党者不胜枚举，而在上海受孙中山委派或秉承孙中山的意旨联络帮会者，主要是陈其美、徐朗西、朱卓文、韩恢等人。

（一）孙中山委派陈其美联络上海帮会

陈其美（1877—1916），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字英士。早年学习典当和丝业，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留学日本东京警监学校，加入同盟会，1908年回国后，为革命运动穿梭于京津沪浙等地联络革命党人。1909年曾准备与浙江会党首领策动起义，因泄露未遂。后在沪创办《中国公报》、《民生丛报》，协办《民立报》等，宣传革命。鉴于帮会不接受帮外人指挥，陈其美早于1903年即在上海参加了清帮（又称青帮）。有著名帮会人物说陈其美“是清帮中的大字辈”^[2]；又有著

[1] 《孙中山史料专辑》，《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54页。

[2] 樊崧甫遗著：《上海帮会内幕》，《文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6页。

名著作、工具书中称陈其美曾为上海清帮大头目之一。^[1]陈其美是孙中山忠实的追随者和得力助手,是辛亥革命时期苏浙沪一带的主要革命领导人之一。他是在孙中山授意、支持下联络上海清帮的。1910年6月29日,孙中山秘密来到上海,在宋嘉树寓所约见了陈其美。孙中山“知道陈其美是同盟会派入青帮的关键人物,所以约见他来到宋寓,就是要了解他在青帮中的工作的……孙中山多次秘密来到上海,对上海帮会有所联络,因此,陈其美向孙中山汇报中说:‘现在上海的青帮和洪帮一样听命于孙先生,可以为革命所用!’”^[2]从陈其美的这段话中反映出,上海的洪帮早已接受了孙中山的领导,而现在经过陈其美的工作,上海的清帮也接受了孙中山的领导。

当时许多帮会首领人物是跨清洪两帮的,上海“清帮首领兼洪帮(哥老会)首领曾国璋”拥有一支帮会武装,曾国璋死于湖北后,他在上海的这支帮会队伍,由他的属下“通”字辈的刘福彪(一作刘福标)、孙绍武、王小弟等人带领。刘福彪是上海闸北洪帮的当家三爷,当他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便派人找到革命党人张承酉,表示愿率三千多洪门兄弟组织敢死队赴武汉助战,要求革命党派人担任领导。1911年10月25日,张承酉参加洪帮被推为大哥,刘福彪自居二哥,这支洪帮武装接受了革命党的领导。由于这支武装本来的首领曾国璋是跨清洪两帮的人物,所以这支队伍具有清洪两帮的性质,统称其为帮会武装更合适。陈其美得知此事后,于10月26日,在四马路(今福州路)一支香餐馆宴请其首领,通过会谈,拥护陈其美为领袖。根据陈其美的要求,刘福彪等决定不去武汉,改在上海举义以响应武昌起义。会后,清洪帮分子利用自己的各种关系,积极为起义做准备。总之,陈其美把这支帮会武装拉进了革命轨道。

(二) 孙中山委派徐朗西联络上海帮会

孙中山直接联络上海帮会的主要事例,首先是联络跨清洪两帮的

[1] 熊月之等主编:《老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又见陈旭麓等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388页。

[2] 王耿雄著:《孙中山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

徐朗西。孙中山既直接联络这位革命同志兼帮会人物，同时又委派其联络上海的帮会。

徐朗西（1885—1961）字峪云，陕西省三原人。早年留日，为同盟会首批会员。上海跨清洪两帮的著名人物姜豪著文说：徐朗西的学识和志向得到孙中山的赏识，“遂派他回国参加青红帮，发动更多的会党人士投身革命”。^[1]有记载称：徐朗西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为革命需要，遂周旋于帮会之中，与袁寒云、步林屋、曹幼珊、阮慕白、段燮臣等人广为交游”。^[2]徐朗西在上海与这些清帮“大”字辈的上层人物的交往，为以后他在上海帮会中的影响奠定了基础。

“徐朗西回国后，孙中山通过他的日本好友宫崎寅藏（与中国帮会首领稔熟）的关系，很快让徐朗西担任了洪门龙头大哥和清帮理字辈，直至成为洪门峪云山山主和清门大字辈，可谓名震天下。”^[3]这里说明了徐朗西是孙中山委派他回国参加清洪帮的。而他很快进入了清洪帮的上层，是借重于孙中山的日本朋友宫崎寅藏的帮助。但有关徐在清帮的辈分，为何其先是理字辈，后来又是大字辈？这个问题没说清楚。而徐朗西之子徐晓耕说：徐朗西在洪门是峪云山主，在清帮“也是‘大’辈人物，有理字辈授予的证书”。^[4]这种说法比较符合清帮辈分的顺序。辛亥革命后，徐朗西任北伐联军前敌总指挥、孙中山的秘书、造币厂厂长等职。在沪办《生活日报》，“同时从事帮会活动，而以洪门为主，收了不少弟兄，以后民国三年的倒袁运动，民国七年的讨伐段祺瑞，他都担任了重要任务”。^[5]

1917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爆发，当时陕、甘、宁、青、川、滇、黔七省民党结盟，组织联军讨伐段祺瑞，公推唐继尧为总司令。孙中山认为进军策略以先取陕西为上策，因为陕西是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兵力薄弱的环节，且三原有于右任领导的靖国军可以呼应。于是孙中山在上海任命徐朗西为七省靖国军援陕前锋总指挥。徐朗西

[1] 姜豪：《我所知道的会党首领徐朗西》，《上海文史》1993年1、2期合刊，第71页。

[2] 徐晓耕：《先父徐朗西生平事略》，政协上海市委文史委编：《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页。

[3] 姜豪：《我所知道的会党首领徐朗西》，《上海文史》1993年1、2期合刊，第71页。

[4] 徐晓耕：《先父徐朗西生平事略》，《旧上海的帮会》，第126页。

[5] 《旧上海的帮会》，第81—82页。

在上海接受任命时，孙中山亲手书写“天下为公”四个大字的条幅赠给徐朗西，并对徐朗西说：“此次作战，靠你的军事特长，且本人是陕人，此番打回老家，先得人和，定能取得胜利，倘若中途发生变化，可将此字传给后辈，作为参加革命事业的纪念。”徐朗西敬而受之，并以此作为座右铭。^[1]

（三）孙中山亲自联络黄金荣

孙中山直接联络上海帮会的另一事例是对黄金荣的联络。

孙中山和黄金荣的联系是以上海的清帮分子徐福生为中介的。徐福生本是天后宫（河南路桥附近）的一个清帮头目，手下有不少徒弟，因争夺天后宫的庙产，遂有“闹天宫福生”的绰号。此人随黄金荣做鸦片生意，认识了一些广东人，由广东人介绍认识了孙中山。20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来到上海，想利用黄金荣在法租界的势力掩护革命工作。孙中山给徐福生写过一把扇面，徐福生拿了这把纸扇去见黄金荣，说孙先生是位有名望的革命家，到上海也想看看黄先生。黄金荣十分高兴，约定日期要徐福生伴随孙中山到黄家。“黄金荣亲自邀请孙中山到楼上会客室。孙中山说，知道黄先生在上海很有办法，在法租界有很多关系，今后我的同志和朋友到上海，请黄先生多加帮助和保护。黄金荣一口答应。”^[2]

后来孙中山又写信给黄金荣，大意是“指出帝国主义支持军阀制造内战是造成民生凋敝的根源，只有革命才能消除封建军阀之间的混战，解救陷于水深火热之民众，而革命需要有人才之参加及经济上之援助，请黄先生联系志同道合之朋友，在人才和经济方面多加援助”。^[3]黄金荣平时与朋友间的经济来往比较小气，但收到孙中山的来信后，“居然一次拿出一千元交给徐福生转送孙先生，还通知虞洽卿也捐助了一笔钱”。^[4]孙中山接到黄金荣的捐款之后，写了回信致谢。由于徐

[1] 徐晓耕：《先父徐朗西生平事略》，《旧上海的帮会》，第127页。

[2] 程锡文口述、杨展成整理：《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156页。

[3] 《旧上海的帮会》，第156页。

[4] 《旧上海的帮会》，第156页。

福生奔走出力，孙中山又给徐福生写了两把扇面，徐福生特地把其中一把扇面裱好后装上镜框，悬挂在家中的客厅正中。孙中山曾给黄金荣先后写过几封信，黄的亲信中不止一人看到过这些信。^[1]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黄金荣曾叫他在新闻界任职的门生杭石君写了封祝贺信，由杭石君送往南京面奉孙中山。北伐战争胜利后，黄金荣有时对徒弟们说：“我一生之中讲义气，重朋友，连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我也曾出过一些力。只要有困难，我不会不帮忙。”^[2]

1920年前后，蒋介石在上海和陈果夫、戴季陶等从事物品证券交易所的活动。蒋介石在经济上发生了困难，曾投靠黄金荣门下为黄的门生（当时黄金荣尚未正式入清帮，不能开香堂收徒弟，只能收门生）。蒋介石要南下投奔孙中山，黄金荣看在孙中山的情面上，资助了蒋介石旅费。^[3]黄认为这也是间接支援孙中山。

可见孙中山的革命统一战线策略是联络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包括上海的黄金荣这样的人物也在联络范围之内。

（四）韩恢秉承孙中山的意旨联络上海帮会

另有一位革命党军人韩恢，为贯彻孙中山的意旨继陈其美之后在上海联络帮会，此人一生辉煌短暂。

韩恢（1887—1922）字复炎。江苏泗阳人，早年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参加过镇南关起义与黄花岗之役。1911年11月，为接应新军第九镇起义任敢死队长，英勇作战，并参加南京光复之役。“二次革命”时被推为南京都督，继黄兴后任讨袁军总司令，与冯国璋、张勋军激战于南京。护法运动时，随孙中山到广州。1915年袁世凯称帝，韩恢奉孙中山之命到上海任讨袁军第三军军长。先后组织了两次南通起义。韩恢是由士兵一步步因战功成长起来的革命党高级将领，他与社会下层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1920—1921年孙中山任命韩恢为江苏招讨使，机构设于上海。他招募的军队中即有不少

[1]《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上卷，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页。

[2]《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上卷，第299页。

[3]《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上卷，第299页。

帮会分子,拟占领苏北作为根据地,再图北伐。由于部队缺乏教育训练,纪律松弛,建立苏北根据地计划失败,队伍拉回上海,旋在上海联络帮会。他是继陈其美之后联系上海帮会的革命党人。帮会人物樊崧甫说:“陈其美死后,韩恢一度操纵清帮,他是清帮二十二代通字辈,非码头官传衣钵者。”他又说:韩恢在上海联络清帮“从事地下活动”。^[1]这里所说的“地下活动”应理解为革命活动,属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的组成部分。当时上海清帮中已有不少“大”字辈人物,而韩恢是“通”字辈,按常规说,难以领导清帮,但民国以来,上海清帮的规矩已有很大变化,更重要的是韩恢曾担任过革命军的总司令,他又是继陈其美之后的革命党领导人中的帮会人物,孙中山委派他组织革命力量,以这样的身份使清帮集结在他周围是可以理解的。20年代初,韩恢来往于上海和广州两地,在《孙中山集外集》中有1922年7月5日孙中山《命发韩恢经费令》,内容为:“着发给韩恢粤币大纸二千元。此令。”^[2]同年8月5日,又有孙中山《批韩恢请款条》注明:“韩恢请领毫银二千元,小纸币三万元(五角面额之广东省银行纸币)。”批文中仅有“文”一字。^[3]这两笔经费,从时间上推算应是联络帮会的经费。陈炯明叛变之役,韩恢保护孙中山脱险,乘永丰舰离粤来沪,同行者有蒋介石等。韩执行孙中山的反直“三角联盟”主张,号召党内外有志之士,包括组织帮会力量,共同反对统治着江苏的直系军阀,直系军阀视韩恢为眼中钉,必除之后快,直系军阀“齐燮元密令上海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将韩恢诱捕,于1922年10月28日解送南京。同年11月1日韩恢被齐燮元杀害于南京小营,年仅35岁”。^[4]孙中山闻讯后非常痛惜,派人将韩的家属接到广州予以优抚。“1924年4月1日,孙中山追赠韩恢以陆军上将衔”。^[5]

一年后即1923年11月,追随过孙中山的王亚樵指挥其斧头党骨

[1] 政协上海市委文史委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5页。

[2] 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60页。

[3] 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第773页。

[4] 方亮、于涛:《民主志士韩恢》,《江苏地方志》2004年第3期,第43页。

[5] 方亮、于涛:《民主志士韩恢》,《江苏地方志》2004年第3期,第43页。

干人员,在上海大世界对面伏击了徐国梁致其次日死亡。客观上配合孙中山反对直系军阀的斗争,并为韩恢报了仇。^[1]

二、孙中山与上海帮会关系的历史影响

孙中山和上海帮会的关系,所产生的历史影响是复杂的、深远的。陈其美任沪军都督期间保护了上海帮会势力的发展,影响到以后上海帮会的历史。

(一) 上海清帮崛起与陈其美的瓜葛

民国初年,袁世凯认为帮会是革命党的同盟军,对帮会采取剿灭政策,但同时他也收买帮会分子对革命党人进行暗杀活动。另一方面,革命党人在自己统辖地区求“治”,和帮会群体的作“乱”发生严重矛盾,迫使革命党人镇压自己往日的同盟军。唯有陈其美担任都督的上海,帮会在陈其美引导下尚未捣乱而受到了保护,外地帮会人物纷纷移居上海,尤其是清帮。从民国初年起,上海成了全国清帮活动的中心,这对上海社会结构的变化有一定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各地移居上海的清帮“大”、“通”字辈人物以及原属上海籍的清帮著名人物,合计170多人。^[2]这些“大”字辈、“通”字辈人物被称为“种子人物”,在上海广招门徒,扩展势力。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清帮社团纷纷出现,如“恒社”、“荣社”、“仁社”等,总人数不少于几万人。^[3]据当时中共上级机构估计,上海的清洪帮总数约有十万之众。^[4]上海的帮会发展如此突出,当然主要与上海有租界、经济繁荣等因素有关,而民初陈其美任沪军都督期间对帮会不仅没有镇压,反而加以联络和保护,也成为促进上海帮会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以后在上海社会结构中,出现了帮会(包括清洪等帮)代表人物和帮会势力。帮会对上海的经济、政治、社会状况都有一定的影响,是上海社会史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上海帮会势力特别扩张,

[1] 王述樵、郭超:《王亚樵生平活动略记》,《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178页。

[2] 李国屏著:《清门考源》,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1990年8月影印本(根据该书多处记载,并补充了该书中遗漏的40多位著名清帮人物)。

[3] 上海文史馆编:《旧上海的烟赌娼》,百家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

[4] 中共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

虽有多种原因,但与陈其美当年对上海帮会的联络政策有瓜葛。

(二) 陈其美联络上海帮会的积极和消极作用

1. 积极作用

陈其美秉承孙中山的革命意旨,在上海联络帮会取得良好的成绩。但所产生的历史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就积极方面说,在光复上海之役中帮会武装发挥了作用。中部同盟会在上海成立后,陈其美担任庶务部长,积极发动上海起义。10月底,驻沪清军在革命党人分化下基本瓦解。参加上海起义的主要是三支力量,一支是光复会李燮和联络的吴淞、闸北军队,还有两支是陈其美联络的上海商团和清洪帮组成的敢死队。这支三百人的敢死队正是陈其美联络的刘福彪等人带领的帮会武装。在攻打江南制造局时,这支武装英勇作战,付出重大牺牲,对上海光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间,陈其美派蒋介石率一百名敢死队参加光复杭州之役,这支敢死队基本上也是帮会武装。

刘福彪所部帮会武装嗣后改称福字敢死队、福字营,刘任队官、司令,一直听从陈其美的指挥,为革命做出了一定贡献。

陈其美“发动肇和兵舰起义,接受他领导的杨虎原是洪门中人”。^[1]上海跨清洪两帮的首领人物汪禹丞也与陈其美有联系,曾率洪门弟兄参加了辛亥革命。上海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洪门人物,后来大都参加了北伐战争。

2. 消极作用

陈其美秉承孙中山的意旨在上海联络帮会不仅对光复上海的战争有一定的影响,而且还影响到革命后的组织政权。起义各代表于1911年11月6日在上海小东门内海防厅集议,决定成立新政权,在推举谁担任上海都督时,曾有意见分歧,争论不止。这时担任陈其美卫队长帮会人物刘福彪攘臂而起,高举一颗手榴弹,大呼:“都督非选陈英士不可,否则我手榴弹一甩,大家同归于尽!”^[2](另一说,刘将

[1] 《旧上海的帮会》,第81页。

[2] 许奇松口述、李宗武记录:《争夺沪军都督现场目击记》,《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文史资料纪念专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页。

手枪重重拍在桌上)众人在胁迫下推陈其美为沪军都督,无人提出异议,大家拍手通过了。^[1]这件事说明帮会人物以武力胁迫选举,从而破坏了民主选举原则。

在推翻清政府的战争中,帮会武装暂时能够作为革命的动力,但是在建立政权时和政权演变过程中,帮会人物对革命事业的消极作用就不断表现出来。以“武治”取代“法治”,开创了专制的榜样。

清帮人物大都缺乏政治上的坚定信念,政治上容易动摇,容易被敌人收买,袁世凯正是收买了帮会人物暗杀了陈其美的。在陈其美任沪军都督期间,沪军都督府的谍报科中多有清帮人物参加,清帮“大”字辈的应桂馨任参谋部谍报科科长,此人政治上“见风使舵”,道德品质很恶劣,被袁世凯收买,出卖革命并参与袁世凯暗杀革命党的活动,是谋杀宋教仁的主犯之一。这些人的流氓、盗匪本性是难以改变的。历史说明了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是难以改造帮会的。

(三) 上海清帮支持工人武装起义的历史渊源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为反抗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和迎接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共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这期间,上海各帮会对工人起义的政治态度各有不同,而以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为首的势力最大的清帮,虽然正在观望形势,刺探情报。但总的来说,他们对中共领导的三次武装起义是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中共江浙区委专门开会讨论了对帮会的政策,决定派汪寿华作为上海市总工会的代表,和黄金荣进行谈判,要黄等团伙不得扰乱上海工人运动。当时国共两党尚未分裂,黄金荣认为自己和孙中山、国民党一贯友好,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一家人,都应当支持,于是答应了中共提出的要求。

1926年10月26日,中共上海区委在召开的会议上指出:“游民的无产阶级,落伍的军人及青红帮有几万,这些人此次表现很好。”^[2]中

[1]《辛亥上海光复前后》,《辛亥革命回忆录》(4),第7—8页。

[2]《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3页。

共当时认为以黄金荣为代表的帮会是积极支持工人武装起义的。杜月笙从1927年2月28日到3月初,以法租界代表的身份,向中共表示他“愿保护工会”,并要中共到法租界建立工会和设立机关,如中共有人被捕,他“可想法释出”。^[1]3月2日,杜月笙在与中共领导人会晤中安排中共领导干部何松林与法租界官员会见。^[2]中共会议记录中说:3月4日,杜月笙又向中共通报了北洋军阀李宝章企图逮捕罗亦农、陈独秀、何松林等四人的重要情报,关照中共领导人“走路小心,并可通知消息,今天他派人保护我们(中共)开会,又派人介绍我们装电话,他说现在我帮你们的忙,将来你们应帮我的帮[忙]”。^[3]显然杜月笙现在帮助共产党是为了图将来回报。中共会议记录中还有:3月8日,杜又对中共表示“始终保护你们,但以后你们要帮助我,即说北伐军来后,可以弄许多钱”。^[4]这反映出杜认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已是大势所趋,他把当前帮助共产党作为一笔政治投资,不久上海就是国共两党共同的天下,他就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他是以投机商的心态看待和共产党的关系的。所以他反复说:“现在我帮你们的忙,将来你们应帮我的忙。”他对汪寿华也说过这样的话。^[5]至于他说“北伐军来后,可以弄许多钱”,联系到上海清帮“三大亨”一贯的行为,就能明白他是指将来他们做鸦片生意时,希望共产党对他们“网开一面”,杜根本不了解共产党是绝对不允许贩卖毒品毒害人民的。

当时以黄金荣、杜月笙等为首的清帮团伙,对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采取合作态度,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共合作尚未公开分裂,他们认为国共两党是“一家”,他们和孙中山、陈其美领导的革命活动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他们估计不久上海就是国共联合的天下。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夕,利用和黄金荣的旧关系并利用帮会人物杨虎、陈群收买了黄金荣、杜月笙清帮团伙,要他们充当反共

[1]《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0—221页。

[2]《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262页。

[3]《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73页。

[4]《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05—306页。

[5]中共《特委会记录》(1927年3月4日晚),上海市档案馆藏。

的先锋。他们盗用民国初年陈其美在上海成立的“国民共进会”的名称，在前面改了两字，称为“中华共进会”，该团体包括了多种反动帮会，但以清帮为主体。中共领导机构未能及时了解共进会的阴谋和动向，遂在“四一二”政变中遭到重大损失。

（四）徐朗西恪守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期间，孙中山早年联络并委任统帅军队的上海帮会首领人物徐朗西不避艰险，利用他在上海帮会界的关系，“积极设法营救革命志士”。^[1]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对帮会的政策，也受到了以往孙中山和帮会建立统一战线的历史影响。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讲话时，称赞孙中山的统一战线精神，说孙中山“为着推翻清朝而联合各个革命派别和会党”。^[2]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在延安抗大讲演时也论及孙中山当年联络帮会问题，他说：“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气量大，什么红枪会、哥老会、三教九流的人他都要，不论党派成分，各种人都要，所以能作大事。”^[3]上海洪帮首领向海潜在上海沦陷后到达武汉，董必武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时常对向海潜宣传抗日救国思想。董必武认为，孙中山以前闹革命时依靠过帮会，我们虽然不能依靠帮会，但“我们如果能把帮会利用得好，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4]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党员张国威致函徐朗西，希望徐与中共继续合作“共救民族的危亡”。^[5]为此，徐在上海沦陷后，为了和中共联合抗日，除与中共地下组织联系外，并把国民党军统的地下工作人员程克祥、彭盛木、彭寿三人介绍给周佛海。此时正值周佛海急于向重庆方面拉关系之际，使其得以打入汪伪内部。这三人打入汪伪内部后，向国民党军统提供了一些情报，在国民党军统局得到这些情报的同时，

[1] 徐晓耕：《先父徐朗西生平事略》，《旧上海的帮会》，第128页。

[2]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页。

[3] 《陈云文选》（1926—1949），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页。

[4] 邵雍著：《民国帮会》，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

[5] 《旧上海的帮会》，第128页。

徐朗西“大都及时向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汇报”。^[1]

解放战争期间，徐朗西通过胡振家（即胡英）等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密切联系，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为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做了些工作。

上海解放前夕，徐朗西受中共地下党胡振家指示，联络上海码头和三轮车同业公会等组织，准备迎接解放。国民党特务怀疑徐朗西的活动，蒋介石派于右任等劝徐赴台湾，被拒绝，徐经香港转赴北京，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返沪后先后担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1961年病逝，享年76岁。徐朗西是贯彻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上海典型的帮会领袖人物，也是爱国民主人士。他的一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他一生的主要事迹都与早年孙中山委派他到上海联络帮会有关，也与他是一位爱国的、正义的帮会领导人物是分不开的。

（五）黄金荣“自白书”中提及往事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黄金荣已是82岁高龄，他决定不赴台湾和香港，向中共地下党表示：上海解放后，他不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敌，关照其徒子徒孙们不对人民政府捣乱。他曾写了一份他所了解的国民党在上海的财产的报告和400多名上海清洪帮头目的花名册交给中共地下党，表示将功赎罪。他曾告诫门徒不要参与国民党逃跑前的大屠杀、大破坏，对共产党能掩护则掩护，为自己留后路。他令门徒将黄家花园“四教厅”前题有“文行忠信”的蒋介石题字碑推倒，将大厅内的匾额摘下砸碎，表示弃暗投明，改邪归正。解放后，1950年黄金荣为了表示悔过和对人民政府的支持，购买了5万元的公债。但上海群众要求人民政府严惩黄金荣的呼声时起，1950年底肃反运动开始后，上海民众杀黄的呼声又起，黄相当恐惧，忧心忡忡。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代表召见了黄，向其宣布对他宽大的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低头认罪。人民政府也借此对民众有所交代，以缓和民众杀黄的呼声。“悔过书”原件题名《自述

[1] 《旧上海的帮会》，第128页。

悔过书》(存上海市档案馆),于5月20日在《文汇报》、《新闻报》发表时,才改名为《黄金荣自白书》。^[1]在上海市档案馆中保存的黄金荣的“悔过书”有两份,都有黄金荣的亲笔签名。其中一份与公开发表的基本一致;另一份则与公开发表的内容有别,多有文过饰非之处。显然这是前面交的一份,这一份未通过,黄经修改后又交上了后面的一份,即公开见报的这份。前面的那份“悔过书”,从研究孙中山和黄金荣的关系的角度看,却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黄金荣在前一份“悔过书”中自称曾经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者,黄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时候,我保护送他上车,临走的时候,中山先生对我说,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护,所以后来我认得了许多革命分子,像胡汉民与汪精卫,他们就在革命军打制造局的时候认识的。”接下来,黄述说了“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他在大世界施粥救济难民和上海沦陷期间未做汉奸的事实。以上黄金荣所说的和孙中山的关系,既有事实也有差错。他与孙中山有过交往,保护过孙中山以及“八一三”期间救济难民,这是事实,但他说在革命军攻打制造局时他认识了胡汉民、汪精卫,这是不对的。当时胡、汪都不在上海,当时黄有可能认识陈其美等人,这里张冠李戴了。这前一“悔过书”中有关黄与孙中山的交往的一段文字,反映出黄把这件事看成他一生中最值得夸耀的事迹,足可看出孙中山这位伟人在黄金荣这样的人心目中也是十分敬仰的。

孙中山和上海帮会虽然有相当关系,但始终没有如对待美洲洪门致公堂那样亲自领导,致力于组织、宣传工作,说明孙中山晚年其政治工作的重点已不在联络帮会方面,已经转移到掌握军队方面。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1]《文汇报》1951年5月20日。

政治法统、挪用与纪念日的演变

——以孙中山“五五”就职纪念日为中心*

陈蕴茜 杨 涛

[内容提要]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为强化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日常化建构,国民党创设孙中山系列纪念日,“五五”非常大总统就职纪念日就是其中之一。它与国民党对政治法统的承继以及革命叙述的连续性相关。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五五”纪念日的内涵及名称也随之变化,国民党后来将它转化为革命政府成立纪念和还都胜利纪念,而汪伪政权则为寻求统治的合法性,将其挪用、改造为“青年节”。任何一个纪念日都是重要的时间符号,是可以被政府征用或他人挪用的合法性资源,对纪念日的掌控是现代民族国家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具有隐秘传输意识形态的功能。“五五”纪念日的演变揭示出南京国民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手段具有多元性与灵活性特征,以及对时间资源和文化传统的重视和利用。这种利用或挪用,意在创造新传统,塑造人们的集体记忆。“五五”纪念日的演变,反映出民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一个特点,也昭示了孙中山社会影响力的演变过程。

[关键词]

政治法统 挪用 孙中山纪念日 演变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为强化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日常化建构,国民党根据孙中山的出生与逝世以及一生中经历的重大事件,制定了诞辰日、逝世日、蒙难日、起义日、就职日等一系列时间序列符号,这使孙中山成为中国拥有最多时间符号的历史人物。在这些时间符号

* 本论文获得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孙中山形象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资助。

中,就职日因其前后变化较大,特别值得关注。所谓就职日是指1921年5月5日,孙中山领导第二次护法运动,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国民党对这一纪念日的建构是孙中山符号建构工程中的一部分,但是,因为这一纪念日相对具有其独特性,且与国民党对政治法统的承继以及革命叙述的连续性相关,其内在的演变体现出政治变化与国民党权力技术的应变性。笔者认为,对这一纪念日进行更为深入地解读,有利于深化民国政治史研究。

一、政治法统与总统就职纪念日的选取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国民政府“非常大总统”,国民党精心组织隆重的就职典礼。广州城沉浸在一片狂欢之中,“政界喜气洋洋,今天政府各部一律放假,以示庆祝”。^[1]沿街搭建彩棚,并有放爆竹的汽车环市游行,“全城之人,空巷出现,热闹异常,以致藤轿及人力车,竟不可得……沿途所遇之人,无非急急赶往加入游行队者……此项行列,实为对于孙中山之一种天然诚恳之贡献;参加其间者,至少有七万人;各界各级,莫不有代表在内”。^[2]盛大的就职典礼与欢庆场面,突显了孙中山的权威地位,也进一步表明国民党完全视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为正统。

国民党对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一直非常重视,次年即举行“五五”节庆典礼。1922年5月5日,国民党上海本部在莫利爱路,今香山路29号孙中山寓所召开庆祝会,党员到会者400人。秩序如下:

- (一) 摇铃开会
- (二) 宣布开会旨趣
- (三) 行礼,向国旗三鞠躬,向党魁孙大总统肖像三鞠躬
- (四) 演说
- (五) 摄影
- (六) 茶叙
- (七) 散会

[1] 英文情报《各项时事传闻录》,广东省档案馆辑译:《孙中山与陈炯明》,《孙中山研究》第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8页。

[2] 《字林报》赞总统就职盛况》,《新建设的中国》第21页,转引自段云章著:《陈炯明的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页。

张溥泉(即张继)发表演说:“以近年来民国所有的现象,足以证明我党的主张,毫无错误……所以希望第一步将军阀逐出长江流域,希望同志固结党的精神,使此事得早成功……现有一般人鼓吹联省自治,鼓吹第三政府,而这班人都是无所依归的无聊政客。”国民党一开始就明确表白了举行庆典的政治目的,即通过庆祝活动,标示孙中山是革命正统的代表,而鼓吹联省自治的陈炯明之流是无聊政客,国民党的任务就是要铲除一切军阀。同日,中国国民党本部暨党员发表祝电:“广州大总统钧鉴,双十开创,双五复活,皆公负其责任,愿继今益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完全实现。”江西自治同志会、民权建设社发来祝电,中国劳工同盟会则举行纪念仪式:“首对孙总统玉照行三鞠躬礼,次欢呼中华民国万岁!孙大总统万岁!中国劳工同盟会万岁!”^[1]这次庆祝活动,已经初步展现了节日的政治功能。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由国民党主导的追悼会遍及全国各个城镇,规模宏大。在此期间已经有人提议设立忌辰日纪念孙中山,如全国学生联合会通告各地学生会,“定三月十二日为国忌日,每年届期停课一日,以示哀悼之意”。^[2]湖北省议会数位议员也主张将孙中山逝世之日作为纪念日。^[3]但逝世日真正成为纪念日予以实施,要到1926年。因此,最早成为孙中山纪念日的就是非常大总统就职纪念日。5月5日,国民党党报《广州民国日报》就发表社论,指出“五五”是孙中山逝世后第一个纪念日,“我们应该永远勿忘……力遵孙前大总统的遗嘱,以努力国民革命”。^[4]该社论实际上就是国民党将5月5日定为孙中山就职纪念日的正式开始,它不仅对五五纪念日的制度化直接起决定作用,而且对以后官方定位的孙中山系列纪念日制度形成也具有重要影响。

在确立与建构该纪念日时,国民党特别注重自身的革命法统。孙中山就任总统纪念日,国民党选择的是就任非常大总统的1921年5月

[1] 《五五节日之庆祝声》,《申报》1922年5月6日。

[2] 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编:《哀思录》第三册,卷四、海内外各地追悼纪事,第14页,上海,1926年。

[3] 《湖北追悼中山会之筹备》,天津《大公报》1925年3月23日。

[4] 《我们怎样纪念“五五”节》,《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5日社论。

5日,而非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1912年1月1日。因为在国民党看来,临时大总统并不是孙中山最重要的荣誉,也不是国民党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相反,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才是革命史上最最重要的纪念日,“是中国复苏的纪念”。^[1]中央党部举行的纪念会礼坛上所悬横额为:“总理就职的是艰难困苦总统,不是逸豫安乐的总统”,联为“总理为巩固革命基础而就总统职,总理为扫除反动势力而就总统职”^[2],强调这一纪念日在革命法统中的重要地位。胡汉民在讲话中甚至将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纪念日与10月10日中华民国国庆节相等同。^[3]湖北省党部在告民众书中也强调:“五五”纪念日是革命史上“最重要的纪念日”,“国民革命的一部分成功,是完全基于八年前的今日”,“我们纪念‘五五’,是中华民国在袁世凯称帝复辟以后的一个再生纪念日,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过程中一个重大的纪念日,是值得我们热烈纪念的”。^[4]蒋介石到1944年还强调,5月5日是“总理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的革命纪念日,临到这个光荣的节日,我们对于建国的前途和革命的环境,应该有一番深刻的认识,回想民国十年的今日,我们国内的军阀政客,四分五裂,革命的环境异常险恶,国家民族的前途,也异常黯淡,而当时国内外的舆论,除了本党的报纸之外,对于总理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几乎一致反对;然而,总理凭着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对于国家负责的热诚,毅然决然排除一切障碍,就任非常大总统职务,为国民革命重开光明的前途”^[5]。可见,这一纪念日在国民革命历史上的重要性。事实上,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成为北伐统一的基点,也成为当时人的共识。曾参与孙中山护法运动的罗翼群也说:“北伐统一之初基,实肇始于‘五五’。”^[6]

1929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常务会议通过决议,设立

[1] 《我们怎样纪念“五五”节》,《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5日社论。

[2] 《中央举行总理五五就职纪念》,《申报》1929年5月5日。

[3] 胡汉民:《五五双节纪念》,《中央周报》第47期,1929年4月29日。胡汉民:《双节纪念会演讲词》,黄埔中央军事特别党部、黄埔政治学校特别党部编印:《蒋胡最近言论集》,第398页,1927年10月。

[4] 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整理委员会宣传部编印:《五月革命纪念特刊》,1929年5月。

[5] 《蒋主席于“五五”纪念国府受勋典礼训词》,《湖北省政府公报》1944年第502期。

[6] 罗翼群:《五五纪念回忆》,《中央日报》1945年5月5日。

包括“五三”、“五四”、“五五”、“五九”四个纪念日在内的“五月革命纪念周”。^[1]7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次常务会议又通过《革命纪念日纪念式》^[2],标志着完整的革命纪念日体系建立,其中包括“五五”就职日。同时为了显示这一纪念日的重要性,1930年,国民政府又特别规定“每年重五节放假”。^[3]由此,“五五”纪念日成为国民党宣传孙中山的重要时间符号。

在国民党的定位中,就任非常大总统是孙中山一生的荣典,因此,纪念活动强调喜庆的色彩,国民党规定街市均须悬旗,以示庆祝。1927年5月7日,广东各界将纪念“五五”与纪念“五四”、“五七”等同时进行,有数万人参加,情形极为热烈,同时航空处还派出了飞机环绕四周助兴,^[4]会后举办游艺大会,表演文艺节目及革命新剧。^[5]次年,孙中山就职总统纪念日,适逢北伐成功逾半,上海市政府遂组织各界举行纪念庆典,^[6]上海商会通告各业分会“一律推派代表,到会参加”,并“悬旗庆祝”^[7]。上海五月革命纪念委员会特别强调,“先总理就任非常大总统之期,实为我国革命史上之重要纪念。届时务希各团体悬旗庆祝”。^[8]1929年通过的《革命纪念日纪念式》规定:“总理就任非常总统纪念日”,“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均悬党旗国旗志庆”。^[9]以后,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如南京各界均举行庆祝大会,全市休假并悬旗一日。^[10]

而在中国人看来,“五五”是双数,具有中国人传统吉利的意义,又具有纪念孙中山的象征功能,5月5日遂成为1928年厦门鼓浪屿中山图书馆举行开幕礼的特殊日子,^[11]也成为1931年海军民生舰下水

[1] 《五三至五九革命纪念周》,天津《大公报》1929年5月2日。

[2] 《革命纪念日纪念式》(上),《中央周报》第57期,1929年7月8日。

[3] 《国府规定每年重五节放假》,《江苏省政府公报》1930年第480期。

[4] 《粤省举行合并纪念大会》,《申报》1927年5月9日。

[5] 《“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大会详情》,《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5月9日。

[6] 《市政府之公函》,《申报》1928年5月4日。

[7] 《市商协会之通告》,《申报》1928年5月4日。

[8] 《上海各界“五五”纪念代表大会》,《申报》1928年5月5日。

[9] 《革命纪念日纪念式》(上),《中央周报》第57期,1929年7月8日;《革命纪念日纪念式》(下),《中央周报》第58期,1929年7月15日。

[10] 《五五纪念》,《中央日报》1934年5月4日;《首都各界举行五五纪念》,《中央日报》1935年5月5日。

[11] 《鼓浪屿设立中山图书馆》,《中央日报》1928年5月16日。

典礼的光荣日子。^[1]1948年5月5日,全国第七届运动会在上海举行,开幕式上,运动员代表来到总理遗像及国旗前,将火炬安插于预备之木架,熊熊火焰高燃于总理遗像前。^[2]

二、政治需要与“五五”纪念日的不同呈现

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纪念日一直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孙中山系列纪念日同样如此。“五五”纪念日作为其中一个纪念日,因其与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系,自1926年始就成为孙中山逝世后重要的革命纪念日。国民党的党报之一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双五”纪念》:

“双五”纪念者,乃纪念先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民国十年在广州就大总统职之极有意义的一个令节也。

吾人提及“双五”纪念,即一百二十分痛心于革命导师之逝世;且更痛恨于反动势力之增长矣。

自孙先生就职以后,叛先生者,有陈炯明诸逆;自先生去世后,叛先生之主义者,有杨刘诸逆,然此诸逆,均赖先生伟大之精神与夫救国之主义之引导,一一得以荡平。而今所可痛恨者,祇彼捣乱中华民族之军阀如吴张辈而已。吴张诸军阀,其罪恶久已昭著,先生未歿时,即欲与义师以歼除之;惜未成就,今先生歿,而彼辈之势,益形猖獗,其罪恶亦与日俱增:吾人既如先生忠贤之信徒,自当努力与此等恶势力奋斗。在此反动势力甚形嚣张之时,吾人更宜本先生之遗教,努力促成真正之国民会议,以解决彼辈最后之生命也!^[3]

反对军阀是国民党在这一时期的首要任务,因此,“五五”纪念表面上是为纪念孙中山,实则是国民党发表讨伐军阀政治宣言的时间场域。同日,孙中山创办的广东大学学生和教职员等举行800多人参加的“五五”纪念会,周鼎培主席、褚民谊校长宣布开会理由,特别党部代表报告“五五”事略及其意义,主要包括:“(甲) 总理就任大总统之背景;

[1] 杨志本主编:《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7年,第1093页。

[2] 《七届全运隆重揭幕》,《申报》1948年5月6日。

[3] 《时评:“双五”纪念》,《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5月5日。

(乙) 就任之重大意义; (丙) 总理就任后之情形; (丁) 就任后之效果; (戊) 吾人所得之教训; (己) 吾人今后之努力; (庚) 吾人之特殊使命等数段”, 后由广大学生会主席及军事教育部主任等发表演讲, 最后高呼口号而散。^[1]

1927年5月5日,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在公共体育场召开了盛况空前的“五五”纪念大会, 此次会议纪念活动比之前的更为隆重正式, 仪式中增加了向国旗、党旗、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 恭读总理遗嘱, 静默三分钟等仪节。当然, 纪念日的政治功能是不能忽略的, 大会通过了宣言提案并高呼口号。与此同时, 上海特别市宣传委员会也召开了“五五”游艺大会, 节目种类繁多, 包括合唱、双簧、舞蹈、相声、歌舞剧等内容。尽管纪念日呈现出欢乐与喜庆, 但严肃的政治任务同样是纪念会必须承担的基本功能。国民党专门制定了纪念会宣传口号: “请政府讨伐武汉”、“请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彻底肃清叛党分子”、“警告汪精卫孙科”、“请政府通缉叛党分子徐谦、邓演达、顾孟余等”、“电请冯玉祥唐生智同志清党”、“驱逐鲍罗廷”、“拥护南京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拥护蒋总司令”等等。^[2]厦门市党部也组织纪念活动, 规定“全体休业, 报纸停刊”^[3]; 浙江省政府召集蔡元培、马叙伦等知名人士演讲。^[4]此时, 国民党的影响与控制范围日益扩大, “五五”纪念日已经不再是局限于党报评论或国民党“革命策源地”广东省的地方性纪念日, 一些地区也开始举行纪念会。随着北伐的顺利进行, 国民党势力进一步扩展, 中央开始制定“五五”纪念详细的宣传大纲, 包括国民党主义、方针、策略等等。^[5]1928年5月二次北伐时, 北伐军顺利攻入济南, 因此紧接着的“五五”庆祝大会上同时也有克服济南祝捷大会^[6]。

为广泛宣传并规范“五五”纪念日, 1929年4月, 国民党中央出台纪念“五五”总统就职纪念办法与宣传要点, 进一步宣传孙中山“坚决勇毅”、“与帝国主义共产党及一切反对势力奋斗到底”的“大无畏精

[1] 《学务消息: 广大学生举行五五纪念会之热烈》,《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7日。

[2] 《昨日五五纪念详记》,《申报》1927年5月6日。

[3] 《厦门举行五五纪念》,《申报》1927年5月6日。

[4] 《浙省政府举行五五纪念》,《申报》1927年5月8日。

[5] 《中央制定五五纪念宣传大纲》,《申报》1928年5月4日。

[6] 《五五庆祝大会》,《申报》1928年5月4日。

神”。^[1]5月,中央又特别规定纪念办法:“五月五日召集各党政机关及各团体学校代表举行总理第二次就大总统职八周年纪念典礼”^[2]。在纪念活动中,国民党依旧将当时的政治任务贯穿于纪念活动中。1930年,国民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讨伐冯玉祥和阎锡山,胡汉民在中央党部“五五”纪念会上发表讲话就主要针对讨伐冯阎:“我们现在的国民政府,是总理的遗产,不是什么西山派、改组派以及一切军阀官僚所窃取 of 假装的幌子可比……今天纪念总理的热忱,必须表示在拥护总理的遗产——国民政府,以本党过去奋斗的精神,始终负起为全民族谋幸福的职志,向前努力!”^[3]

为配合政治形势的需要,国民党采取多样化的宣传方式。上海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专门在纪念会上赠阅《五五纪念册》,详细叙述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的经过,并号召民众思考:“为什么纪念五五?怎样纪念五五?”以及中国的出路。^[4]次年,上海市党部执委会宣传部又编印《五月革命纪念册》,专门辟有“五五”纪念,收录了胡汉民1927年在“五五”纪念会上的演讲词《怎样才能继承总理之志业》;湖北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宣传部则编印《五月革命纪念特刊》,里面也有“五五”纪念,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为“五五”纪念告民众书》。

告民众书是国民党在宣传孙中山崇拜时常用的一种宣传方式,为便于民众阅读,一般仅三五百字,语言简练,中心突出,先简要叙述孙中山纪念日的历史,然后强调纪念孙中山的意义,最后解读、宣扬国民党的政治主张,这已经成为国民党在纪念孙中山时采取的惯用宣传方式。湖北省的这份告民众书就是详细叙述“五五”纪念日的缘起,让民众认识到“五五”纪念的历史意义,特别强调其当下的意义:即“我们应该注意的有几点:第一,国民革命是尊奉三民主义,来求中国全民族的幸福,不是代表某一个阶级的利益,第二,国民革命的立场,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是一直向前的,并不左或右倾,第三,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是整

[1] 《总理就非常大总统职第八周年纪念宣传要点》,《中央周报》第47期,1929年4月29日。

[2] 《五三至五九革命纪念周》,天津《大公报》1929年5月2日。

[3] 胡汉民:《怎样才配组织政府?——十九年五月五日在中央党部五五纪念会讲演》,《中央周刊》第101期,1930年5月12日。

[4] 《五五纪念册赠阅》,《申报》1928年5月5日。

个的信奉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不是某一派,或某一系所能利用及驱使的。这是因为总理手创的三民主义,是走向自由平等道路上的一盏灿烂的路灯!所以我们纪念‘五五’要在总理所创造的三民主义旗帜之下,继续总理伟大的精神,努力实现三民主义,不绝地奋斗,除去三民主义前途的荆棘——军阀,帝国主义,共产党同腐化分子,这样才配纪念‘五五’,才能实现三民主义,才能完成整个的国民革命的工作,才能使中国走到自由平等的道路上去,被压迫民族,得着解放!”最后,告民众书一般以口号形式结束:

1. 继承总理大无畏的精神!
2. 打倒帝国主义!
3. 肃清党内的腐化恶化分子!
4. 铲除党外一切反动势力!
5.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6. 三民主义万岁!
7. 中国国民党万岁!^[1]

这些形式有效地宣传了国民党应时而易的政策方针,促进了民众对国民党、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节日的政治功能再次得到充分发挥。

国民党对“五五”总统就职纪念相当重视,除依据革命纪念日仪式规定举行庆祝,国民党举行重要会议也定于这个日子,特别是体现执行总理遗教的国民会议就于1931年5月5日召开,这是执行总理遗教的具体体现,因此,通过《案准国民会议提请建树孙中山铜像》:

国民会议接受总理遗教制约定法,议决取消不平等条约及通过关于国计民生各重要提案,在历史上留一大纪念。代表等以该会议系总理所主张召集,拟请国民政府拨款五万元在议场前面建树总理铜像,以资景仰。^[2]

《国闻周报》则特别发表社论《纪念五五》:

[1] 录自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宣传部编印:《五月革命纪念特刊》1929年5月。
[2] 《案准国民会议提请建树孙中山铜像》(1931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648-5848,《国立中央大学有关孙中山诞辰及逝世纪念活动及建树孙中山铜像有关文件》。

本日为国民会议开幕之日，行将于此制定党治之宏观。光大统一之成绩，中央通令全国。于此日共伸庆祝，以崇盛典。凡属国民，当有同感。然而今日更有一大事焉，其值得纪念。殆在任何革命事业之上，即民法规属继承两篇依二月二十三日国府命令，将于本日施行是也。按中国自来革命事业，多属政治的，而此则推翻数千年之宗族思想，改造家庭组织，其性质为社会的，思想的，谓为值得纪念，夫谁能有异辞。^[1]

国民会议召开于5月5日并制定约法，显然是为了表明国民革命对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为此，国民党将“五五”纪念日作为推行训政、宣传约法的载体。对此，各地方党部也十分明了。如北平特别市党务整理委员会发表《五五纪念并庆祝国民会议开幕告全市同志同胞书》：

我国二十年来，变乱相承，迄无宁日，其根本原因，实无一足资国民共信共守之约法与全国上下缺乏尊重法治之心理。际此和平统一告成，正本党扶植民治之时，应如何保障人民，如何完成建设，皆有待于本党之努力，故国民会议者，求中国之统一与建设也；训政约法者，树立训政时期之共同信念，以臻宪政之宏观也；所以维系政治而纳国家于规范，齐一全国国民心志，集中全国国民力量，以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基者。尽欲我国能从事于实际的建设，首须使我国统一，前已言之，而欲我国得真实之统一，则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不然，则既无以谋中国之建设，更无以解决民生问题。是故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谋中国真实之统一，为国民会议消极方面之前提；欲中国能从事实际之建设，求得全国民生问题之解决，为国民会议积极方面之前提；训政约法，即所以谋政府与人民之协作，共负此保障统一和平，与从事实际建设之共信共守的准则，总理之就任非常总统，对内欲以消减嚣张之反动势力，对外欲以取得国际地位，中央于五五纪念日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即本诸总理此种革命精神，以求实现总理之遗志。我全市同志同胞，应深刻认识，努力迈进，共赴大业之完成。^[2]

[1]《纪念五五》，《国闻周报》1931年第18期。

[2]《五五纪念并庆祝国民会议开幕告全市同志同胞书》，北平特别市党务整理委员会印：《新平半月刊》1931年第6期。

不同时期,不同的政治形势,必然有不同的政治任务,“五五”纪念日与孙中山其他纪念日一样,随着时间推移和时势变易而承载不同的政治内涵,只是由于这一纪念日在国民革命的历史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意义,因此,国民党更强调继承孙中山艰苦卓绝、勇毅果敢、适应形势、敢于担当的精神。

仅仅在中央政策宣传层面宣传孙中山纪念日是不够的,必须让全体国民都知道孙中山的伟大贡献,知道总统就职的革命法统意义。为此,国民党将“五五纪念”列入教科书,在发行量极大的《社会课本》中,专门有一课为《五月五日》,文中指出是日为“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大总统的纪念日”。^[1]同时,“五五纪念”已经成为专有名词出现于各类辞典之中。如《新知识辞典》就收录在内:“民国十年(1921)五月五日,孙中山先生为适应当时客观环境的需要,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以后即定为纪念日。”^[2]《国民辞典》、《现代知识辞典》也有“五五纪念”辞条。^[3]正是由于广泛的宣传,商家对“五五”纪念也有所反映,如上海三友图书公司就称“今日为先总理就非常总统纪念,本公司愿以中山纪念日记赠送以志纪念。日记内容有名人近影、总理历史、建国大纲等日用记事之必需”。^[4]虽说这是为招揽生意,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五五”纪念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三、“五五”纪念日名称的转化

孙中山符号的建构始终是与国民党的政治需要与统治技术合为一体的。前期国民党将孙中山系列纪念日确定为全民性的国家纪念日。然而,由于孙中山系列纪念日在革命纪念日中比重较大,国民党遂于1930年通过革命纪念日修订方案,将革命纪念日分为“国定”与“本党”两类,总统就职纪念日遂改为党内纪念日,纪念仪式仅在党内举行,由各地党部召集党员开会,但各机关团体学校仍派代表参加。^[5]

[1] 董文编:《社会课本》第六册第14课,世界书局1934年第26版。

[2] 新辞书编译社编辑:《新知识辞典》,上海童年书店出版,年代不详,第54页。

[3] 王穆夫编:《国民辞典》,第9页;现代知识编译社编:《现代知识大辞典》,现代知识出版社1937年5月,第95—96页。

[4] 《五五纪念赠送中山纪念日记》,《申报》1928年5月5日。

[5] 《中央修正革命纪念日》,《中央日报》1930年7月18日。

党内纪念日不再作为国家纪念日,也就不要求民众普遍参加。^[1]但各地学校团体仍须派代表去党部参加纪念活动,因此,影响依然较大。

“九一八”事变之后,“五五”纪念进一步转向抗日宣传,如1932年洛阳“五五”纪念会上,国民党元老居正在演讲中指出:“这个对日问题,我们要弄个清楚,今后对日关系,如不确定一个妥善方针来,其祸害必有不可胜计者。兄弟以为今后如能坚持长期抵抗,则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抵抗日本,不在一时的兵争,而在长期的抵抗,希望同志们,同下决心,来准备抵抗,实现抵抗。”^[2]演讲表明,这一时期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纪念“五五”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的目的就是宣传抗战,但居正或多或少也在为蒋介石“不抵抗主义”进行辩解。除洛阳以外,上海、北平、南京、汉口、安庆等主要城市也都举行了纪念活动。1934年和1935年的纪念活动规模也很大,南京、北平、济南、青岛、上海、杭州、福州、广州、开封、汉口、南昌、徐州等地都相继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3]后来,“五五”纪念逐步与革命政府成立纪念合并举行。1936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合并举行革命政府成立纪念,南京、安庆、青岛、贵阳、南昌、天津、福州、西安、芜湖、香港等城市同时举行了纪念大会,并且悬旗以示庆祝。^[4]

当蒋介石崇拜在抗战爆发后逐步兴起时,国民党对孙中山崇拜的宣传有所削弱,“五五”总统就职纪念日地位下降,在革命纪念日系列中不再突出,而与革命政府成立纪念日合并举行,总统就职纪念日反而成为附带纪念日。如1936年5月5日,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合并于中山陵举行革命政府成立纪念,上海市党部也召集各界代表举行“革命政府成立纪念”大会,称该日“为革命政府成立纪念,亦即为孙总理就任非常大总统纪念日”。^[5]以后,一些地方纪念中,甚至不再提

[1] 《修正革命纪念日简明表》(1930年7月10日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〇〇次常务会议通过,1934年11月15日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四七次常务会议修正),内政部总务司第二科编印:《内政法规汇编·礼俗类》,第3页。

[2] 《洛阳五五纪念会》,《申报》1932年5月8日。

[3] 《五五纪念,各地党部昨开纪念会》,天津《大公报》1934年5月6日;《五五纪念,全国各地举行纪念》,天津《大公报》1935年5月6日。

[4] 《中央国府合并举行革命政府成立纪念》,《申报》1936年5月6日;《革命政府成立纪念市党部昨召集代表大会》,《申报》1936年5月6日。

[5] 《革命政府成立纪念》,《申报》1936年5月5日。

及总统就职日,如1937年5月5日青海省党部举行“革命政府成立纪念会”,整个纪念会未提及总理就职纪念日,只是在标语与告同胞书中提及孙中山就职一事。^[1]而1937年5月5日,国民政府给外国人士颁授勋章,相关报道只提及革命政府成立纪念会,而不是总统就职日纪念会^[2]。除此之外,这一年还在中山陵举行了革命政府成立纪念^[3]。显然,革命政府纪念是“五五”纪念的核心内容。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5月5日武汉各界在纪念革命政府成立大会上还组织了各戏剧团为伤病演剧并组织了宣传队赴乡郊演讲^[4]。国民党在重庆举行“五五”纪念时,《申报》直接的新闻标题都只提革命政府成立纪念,如《中枢举行革命政府成立纪念》、《革命政府成立纪念渝各界开纪念会》、《革命政府成立纪念中枢举行纪念会于右任报告》、《革命政府成立经过》。^[5]胡先骕在国立中正大学“五五”纪念会上就说:“今天是革命政府成立纪念日,这个日子在本党和中华民国的历史上都占着极光荣极宝贵的一页,其价值和重要不亚于‘双十节’。”^[6]1944年5月5日,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在陪都重庆革命政府成立纪念会上勉励同志们努力抗战,同时举行了国府授勋典礼。^[7]

尽管标题上有所变化,但无论“五五”纪念日是冠以革命政府成立纪念日还是孙中山就职纪念日,它鼓舞人们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的基本功能并没有改变,它是沦陷区人民宣传抗战的时间场域。1939年5月5日,上海市在租界举行革命政府成立纪念会,各团体在“告同胞书”中强调:“第一期抗战,精神与物质并重。第二期抗战,精神重于物质”^[8],鼓励全国军民抗战到底。同时各主要学校大多休假,学生襟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717-4-1029,《国民党青海省党部呈报纪念孙中山及各项纪念周》。

[2] 《革命政府成立纪念》,天津《大公报》1937年5月5日。

[3] 《革命政府成立纪念,中央国府合并庆祝》,天津《大公报》1937年5月6日。

[4] 《武汉各界昨日开会,纪念革命政府成立》,天津《大公报》1938年5月6日。

[5] 《中枢举行革命政府成立纪念》,《申报》1940年5月6日;《革命政府成立纪念渝各界开纪念会》,《申报》1941年5月6日;《革命政府成立纪念中枢举行纪念会于右任报告》,《革命政府成立经过》,《申报》1941年5月7日。

[6] 胡先骕讲、程永遂记:《“五五”与“五四”纪念的意义》,《国立中正大学校刊》1941年第20期。

[7] 《中枢纪念革命政府成立》,天津《大公报》1944年5月6日。

[8] 《革命政府成立纪念 全市悬旗庆祝》,《申报》1939年5月5日。

佩布质国徽，^[1]以昭显爱国热情。次年5月5日，上海市党部及各团体在租界再度举行革命政府成立纪念，追溯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的革命历程，并散发大批爱国传单：“纪念‘五五’，要坚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庆祝双五节，应各就本位，从事救国工作”、“庆祝双五节，要争取民族国家的独立自由”、“我们要从自己的队伍里来检举、肃清奸逆”^[2]。这些传单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勇气以及铲除汪伪的决心。1941年上海的“五五”纪念会，则激励各界民众“效法国父精神，在总裁领导下坚定抗建信念，俾能早日收复失地，获取自由解放”^[3]。抗战时期沦陷区内的“五五”纪念活动，可谓是饱含深情，独具特色。

当然，有时蒋介石还是会在革命政府纪念会上提及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的历史，但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激发人们抗战建国的决心。1944年5月5日，他在纪念国府庆祝授勋典礼上发表讲话：

由这一段革命历史的教训追念总理当时领导革命的辛苦艰难，大家应觉悟到革命不是随便可以成功的，我们要从事革命事业，一定不免有障碍，不免有困难，但只要我们革命党员信心坚定，意志齐一，就一定可以克服种种的困难，达到成功的目的，我们今天革命的环境和总理当时比较起来，真是有天渊之别。今天的环境，可以说是本党革命以来最顺利最光明的环境，也是世界各国革命的环境，我们抗战七年以来，各位同志大家同甘苦，共患难，兢兢业业，各矢忠勤，终于使抗战接近胜利。我中华民族获得友邦和盟邦的尊重，而达到不平等条约取消的目的，我们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凭籍，革命事业所以能够像今天这样的顺利，可以说完全是兴中会以来总理领导同志奋斗牺牲所得的结果，也是各位同志全体军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在这个光荣的纪念日，来举行授勋典礼，缅怀总理缔造的艰难和奋斗的经过，觉得意义格外重大，希望各位同志要各自珍重过去努力所得的成绩，要时刻体念我们今天的成就得来之不易，尤其要体念总理遗留给我们的革

[1] 《本市各级学校热烈庆祝五五纪念》，《申报》1939年5月6日。

[2] 《全市国旗飘扬 庆祝双五纪念》，《申报》1940年5月6日。

[3] 《革命政府成立纪念全市悬国旗庆祝》，《申报》1941年5月5日。

命责任,尚未尽到,大家同心同德格外奋勉,继续努力贯彻始终,光大我们革命的绪业,完成总理未竟的志事,这成我们抗战建国的使命。^[1]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在这种危急关头,借纪念孙中山、号召全国人民抗战无疑成为这一时期纪念活动的重点。

在孙中山就职纪念日被淡化的同时,汪伪南京政权却展开对孙中山符号的争夺,“五五”就职纪念日自然也是不能例外。汪伪国民政府成为日本人的傀儡,但为了寻求统治的合法性,标榜自己的正统性,汪伪政府大肆利用孙中山符号,特别是“五五”纪念日,将其改头换面制定为青年节。^[2]之所以如此,其理由是:“双四为儿童节,双六为教师节,双五为国父就职非常大总统纪念日”,青年们“当认识中华民国艰难缔造之经过,尤当深切认识国父历年领导青年革命,前仆后继,与反动势力搏斗之精神”^[3]。汪精卫是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在汪伪政权建立后,汪精卫为表示其正统性与合法性,完全继承国民党的传统,热烈庆祝孙中山的纪念日。但为了拉拢更多的青年,汪伪在强调纪念孙中山的同时,将孙中山就职纪念日改为“青年节”。这完全是一种挪用,将国民党的政治合法性资源转变为自己的资源,为自己的政权寻求合法性。1943年5月5日,首届“五五”青年节开幕,汪精卫身着元帅服装,亲临致辞。^[4]他在亲自撰写的《五五青年节之意义》中,不仅将孙中山就职纪念日改为青年节,而且有意将阴历五月五日和屈原相关的端午节也作为“五五”青年节的依据。^[5]如此绞尽脑汁穿凿附会,只是徒劳,因为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屈原,他们的高风亮节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卖国政府标榜其合法的象征。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定于1946年5月5日还都南京,就其意义而言,也是更多地强调革命政府的法统。《中央日报》为此特别刊登文章《从革命政府成立到国府还都》,文章回顾了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

[1] 蒋主席于“五五”纪念国府受勋典礼训词,《湖北省政府公报》1944年第502期。

[2] 《国府明令定每年五五为青年节》,《申报》1943年5月1日。

[3] 《五五青年节林宣长最勉青少年》,《申报》1943年4月30日。

[4] 《首都纪念青年节汪主席亲临致训辞》,《申报》1943年5月6日。

[5] 《五五青年节之意义》,《申报》1943年5月5日。

的意义后,谈到国府还都是与革命政府成立一脉相承的革命事业,它“更令人想起二十五年本党所经历的困苦”^[1]。1947年5月1日,《中央日报》发表《五月月令》,《月令》规定,5月5日的纪念日为“革命政府成立纪念、国府还都纪念和庆祝国府还都举行大典”^[2]。显然,国府还都纪念可以彰显国民党在抗战建国大业中的作用。5月5日,国民政府纪念主要内容为革命政府成立与国民党举行胜利还都一周年纪念,而未有孙中山总统就职纪念。^[3]如1948年5月5日,湖北省党部举行纪念活动,称“今日为革命政府成立纪念日,鄂省党部于上午十时集会,举行纪念仪式,武汉三镇商店住户,并一律悬旗志庆”。山西、贵州三省党部也都举行革命政府成立纪念大会,不过都还提及要继续发扬国父革命精神,“完成勘乱建国大业”^[4]。

结 语

美国汉学家柯文曾经指出:“周年纪念是纪念历史事件和人物最常见最有影响的形式……举行周年纪念活动的主要目的往往是教育世人”,而且“周年纪念可在现实和历史之间筑起一条情感桥梁,对纪念的人物或事件加以重新塑造,以适应现在的人们和政府不断变化的看法”^[5]。“五五”纪念日在民国时期的诞生、发展及变化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不唯如此,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汪伪政权,都利用“五五”纪念日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纪念日具有宣传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它常常化约为一种符号为政府所挪用,在不同时期嵌入不同的政治内容,而不同的政党或团体也会依据自身的政治需要利用纪念日作为合法性资源,并且加以改造,以便更好地塑造人们的记忆。由此可见,任何一个纪念日都是重要的时间符号,是可以被政府征用或他人挪用的合法性资源,对纪念日的掌控是现代民族国家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

[1] 《从革命政府成立到国府还都》,《中央日报》1946年5月5日。

[2] 《五月月令》,《中央日报》1947年5月1日。

[3] 《社论:国府还都一周年》,《申报》1947年5月5日;《中央昨日纪念革命政府成立,各地党部均有集会》,《中央日报》1947年5月6日。

[4] 《纪念革命政府成立》,《中央日报》1948年5月6日。

[5] [美] 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189页。

具有隐秘传输意识形态的功能。“五五”纪念日的演变揭示出南京国民政府的社会控制手段具有多元性与灵活性特征,反映了政府对传统的时间资源和文化传统的重视与利用,而这种利用或挪用,则是在创造新传统,对塑造人们的集体记忆起着重要作用。

(陈蕴茜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杨涛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宋庆龄在德国*

邵 雍

[内容提要]

1928年5月至1931年7月,宋庆龄流亡德国的生涯在她一生的革命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德国期间,宋庆龄潜心研究政治与历史,广泛结交当地的中外左翼人士。在国民党左派中,她较早地认识到可能共产党是对的,只有共产党才能实行三民主义,认识到好友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希望不大”。这些思想意识在当时的非中共人士中是凤毛麟角,十分难能宝贵的。她积极与中外共产党员联系,参加他们的社会与政治活动,与他们建立了比较密切的人脉关系,这为今后执行共产国际交办的秘密任务,奠定了人事上的基础。宋庆龄还准确地估计了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低落的走向与法西斯势力可能上台的趋势,充分展示了她的高度政治敏感性与判断力。

[关键词]

宋庆龄 德国 第三党 杨杏佛 共产党

1928年5月至1931年7月,宋庆龄流亡德国的生涯在她一生的革命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她在德国的言论是她革命思想发展长链中的重要一环,对研究宋庆龄在政治上的成熟过程至关重要。但长期以来,由于资料缺乏等原因,这段史实的研究不够充分,宋庆龄在德国的经历鲜为人知,史学界除了刘家泉有专门论著外,几乎未见别的专题论文。笔者主要依据新发表的宋庆龄致杨杏佛的书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撰成此文,供大家参考。

* 本文为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 SJ0703 研究项目。

1928年春的一天,宋庆龄在陈友仁的陪同下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会见了斯大林。宋庆龄对她及中国同仁在苏联受到的盛情接待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她还代表孙中山和中国民众对苏联人民过去给予中国革命的援助表示谢意。宋庆龄表示,由于国共双方的良好合作曾开创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局面,今天要摆脱中国革命的困境,必须要在国际革命力量的援助下,赶走冒牌的国民党领袖,使中国革命回到孙中山规定的革命道路上来。斯大林回答说,希望宋庆龄早日重返中国,继续领导中国的革命运动,并说至于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如何继续支援中国革命的问题,有待具体研究,如有什么决定当会派信使去中国联系,但避而不谈如何解决国民党右派掌权,背弃了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问题。这种敷衍搪塞的话,使宋庆龄等人感到迷惘和失望,^[1]正像宋庆龄晚年亲笔写给爱泼斯坦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当我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介石得逞时,我就不愿在莫斯科多待了。我请母亲给我寄一点钱来,然后就到欧洲去。邓演达已在柏林,所以叶挺、章克和黄琪翔很快跟着去,希望建立一个革命小组。”^[2]

1928年5月1日,宋庆龄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帮助下,乘火车来到德国柏林。刚到后不久,连续给苏联朋友奥维科尔写去两封信,信中显示出在德国的逗留从一开始是有趣的良好心情。^[3]

宋庆龄自5月4日起住在里城堡大街7号沃尔夫家中。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经常陪伴她,并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研究所担任过译员的年富力强的章克照料宋庆龄的日常生活与对外联系。

1929年3月26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派宋子良迎接宋庆龄回国,参加定于5月下旬进行的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宋子良后未成行。4月,宋庆龄与邓演达商议回国事宜,邓派黄琪翔以秘书身份

[1] 《回忆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9—280页。

[2] 《宋庆龄书信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11页。

[3] 《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

随行,以便多了解中国现状。他们于5月6日离柏林,取道苏联莫斯科、西伯利亚回国;5月15日到达中国境内;6月1日在南京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9月21日乘法国邮轮经香港、巴黎于11月中旬回到柏林。11月26日,宋庆龄致函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告以近况并请其函告国内局势。信中说:来柏林已一星期了,但“尚未安顿下来,还住在一家供膳的公寓里。等找到一个可以久居之处,将立即开始研究工作”。^[1]

1930年4月1日,宋庆龄由柏林的里城湖畔9号迁至新居卡尔斯鲁厄街2号,途中遗失蓝色手提箱一个,内有重要文件、贵重首饰和现金。在遍找无果后,宋庆龄向警察局报案,又打电话给中国驻德国公使馆。公使馆负责官员梁龙接到电话向公使蒋作宾请示汇报后,立刻向德国外交部通报了宋庆龄手提箱被盗一案,要求外交部转警察当局尽快采取行动予以侦破。^[2]宋庆龄丢失手提箱后一直心烦意乱,连日感到忧虑和紧张,但柏林的中国留学生对宋庆龄的不幸“却幸灾乐祸,开始造谣,说箱子里有50万钱。一伙人诟责子文送这笔钱给我,另一伙人是‘红党’”。宋庆龄对这些“以恶意伤人为乐,欣赏他人的不幸”的人十分气愤,以至于“对到处中国人都有反感,以至希望到一个看不见任何中国人的国家去”。^[3]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宋庆龄与受中共“左”倾错误影响的中国留学生的相处并不和谐,关系比较紧张。德国警方接到报案后虽尽力侦破,但一直没有结果。直到1931年3月15日,事情才有了转机。这天有两个年轻人神色慌张地拿着一条珍珠项链到当铺典当,要价与昂贵的珍珠项链相差悬殊,引起了当铺老板的怀疑和报案。警方将当铺老板提供的珍珠项链与宋庆龄登记的材料核对后,断定这就是宋庆龄手提箱中的一件首饰。原来典当项链的年轻人之一正是宋庆龄4月1日乘坐的出租车的司机。当时宋庆龄将手提箱遗忘在出租车内,出租车司机发现后便窃为己有。由于案犯做贼心虚,一直把手提箱藏匿在家中,所以

[1]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65页。

[2] 刘家泉著:《宋庆龄流亡海外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140页。

[3]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66页。

其中物品并未流失。3月16日,宋庆龄为表示谢意,从手提箱中选了一件精致的银器赠送德国警察局官员。^[1]

1931年4月底,宋庆龄接到家中电报说母亲病了,她极想回去看望,又怕这是国民党为即将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要骗她回国的陷阱。5月1日她致函好友杨杏佛:“我接到要我回家的电报,因为我的母亲病了。我对她长期患病当然是非常担心的,而且极想去看她。但是鉴于所谓的全国大会即将召开,在此关键时刻,即使以不看母亲为代价,我也必须避免回去……我将依靠你的判断,因为你与我家成员关系密切,你可以轻易地(秘密)核实病情并告诉我。”^[2]同时指出,蒋介石、宋美龄和宋子文相信杨杏佛“很能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因此有必要取得杨杏佛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杨本人“置身当前政治之外的决定是十分正确的”。^[3]

7月31日,宋庆龄离开柏林回国奔母丧,结束了她在德国的流亡生活。

二

宋庆龄在德国期间爱憎分明,旗帜鲜明。1928年5月间,她拒绝会见孙科等来柏林的国民党政要以及南京政府驻柏林的外交官员。1930年4月14日,宋庆龄在给杨杏佛信中明确表示来信“勿寄使馆”,因为外交官梁龙经常外出,“而我不想去那里取信”。^[4]宋庆龄还在1928年6月底拒绝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司徒雷登的会见要求。

与宋庆龄往来最密切的是邓演达。早在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就与邓演达、陈友仁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一个临时性的领导机关,其任务是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指导复兴中国革命的工作。后来因不能见容于斯大林,他们先后离开了苏联来到德国。

[1] 刘家泉著:《宋庆龄流亡海外岁月》,第151—154页。

[2] 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编:《啼痕——杨杏佛遗迹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页。

[3] 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编:《啼痕——杨杏佛遗迹录》,第223页。

[4]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67页。

1928年5到6月,宋庆龄与邓演达一道研究中国的土地问题与农民问题,为第三党政治纲领的相关部分做准备。他们就继续中国革命的事讨论多次,并一致认为此后的革命工作,仍应注重农民问题,解决土地问题。1928年8月21日,宋庆龄在致杨杏佛函中,明确要求他有信请寄柏林邓演达住处再转来。各种图书馆是宋庆龄旅居德国期间进行研究工作的好去处。她常在图书馆潜心读书,研究学问及孙中山遗著,常常整日“沉湎于书籍之中”^[1]。

8月,她与邓演达一道会见了20年代初担任过孙中山、宋庆龄护卫工作的叶挺与这年进柏林大学学习的黄琪翔,讨论中国革命的前景。宋庆龄十分关心叶挺的动向。她在1931年5月1日致杨杏佛的信中,说前中共党员“叶挺和他全家(还包括一个保姆!)也在这里”,“在此越冬”^[2]。

1929年12月上旬,邓演达专程从伦敦坐飞机前来柏林与宋庆龄会面,商谈他回国进行革命斗争事宜,并作最后告别,邓演达说:“这次或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我们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尖锐的且又残酷的。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斗争,譬如顽强的封建势力、机会主义,以及反动行为。因而在军政两方面全树了不少的仇敌。但他们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3]。

1930年,邓演达在回国途中顺道游历考察了西欧、东欧、中亚、南亚等地,每到一地便写信给宋庆龄告以沿途所见所闻,详细叙述沿途的风土人情,考察结果。宋庆龄饶有兴趣地阅读邓演达的来信,说看邓演达的信,“像看小说一样,希望这个小说永远不完的看着下去”^[4]。

邓演达在回国后于8月9日主持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通过的《我们的政治主张》^[5]指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及南京国民政府是革命的敌人,平民革命的目的就是推翻它们的反动统治。对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承认其是工人阶级的革命

[1]《申报》1931年8月14日;《胡兰畦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8页。

[2]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编:《啼痕——杨杏佛遗迹录》,第223页。

[3]《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47页。

[4]方述:《邓演达先生及其朋友》,《前进论坛》2000年第10期。

[5]《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二辑。

政党,另一方面又对中共及其路线方针政策作了错误的批评,认为共产主义是“不对症的药方”,“共产党纯粹是国际的,而我们是带民族性的。共产党以中国革命为手段,而我们的目的就是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农村根据地的斗争及政权建设也作了错误的批评。批评和攻击虽然表现了对当时中共“左”倾领导实行的排斥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拒绝与他们联合反蒋的不满,实质上是由于与认识上的和所谓“平民阶级”立场的局限性所致。邓演达错误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工具,是中国民族解放的障碍,也是人民解放的障碍”^[1]。这些言论和主张,一时受到不少同情革命而又徘徊不前的中间阶层的响应。但宋庆龄却有自己的独立判断。1930年8月30日,她在致杨杏佛函中说:“至于第三党,称之为它将来的名字,能不能成事颇多取决于南京和北京之间争吵的时间长度。只有在此阶段,邓(按:指邓演达)等才能够保持活跃。因为它对南京和北京以及共产党都要斗争。”^[2]

宋庆龄在德国期间曾于1928年11月会见了公开身份为柏林第二大学政治经济专业留学生的共产党员廖承志。廖承志当时奉派到德国工作,任汉堡国际海员俱乐部书记等职。1930年6月他又陪母亲何香凝来看望宋庆龄。不久廖承志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何香凝直到9月才离开柏林。在这期间,宋庆龄与他们经常见面,讨论中国革命的形势及斗争的方式,还陪同何香凝参观德国博物馆,游览柏林名胜。通过何香凝的介绍,宋庆龄与由廖承志介绍加入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的留学生胡兰畦相识。胡兰畦从1930年起协助宋庆龄展开工作,1931年曾经陪同宋庆龄回国奔丧,后又赴德。对于廖承志的真实身份宋庆龄是清楚的。她在1931年2月17日给杨杏佛的信中说,“廖夫人的儿子现在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她的女儿已回中国和一个党员青年结婚”,并认为:“青年一代肯定会下决心成为革命者!”^[3]早在1928年8月21日,她在给好友杨杏佛的内部通信中说:“既然你已最终认清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革命组织,那你与它越快断绝关系越好。可能共

[1] 转引自《回忆邓演达》,第57页。

[2] 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编:《啼痕——杨杏佛遗迹录》,第218—219页。

[3]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68—69页。

产党员是对的——只有他们的党能实行孙博士的主义。”^[1]宋庆龄的这一判断是她自己经过独立思考后作出的,可能与她在柏林期间阅读到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的政论文章有关。

宋庆龄在德国期间,在看书研究的同时,也抓住机会在德国境内外进行游览与调查。她1929年11月26日在柏林致函杨杏佛,告知:“我一直在试图说服人们在欧洲设立一家中国新闻机构的必要性。英国、法国和日本的报纸经常散布对我们不利的新闻,而我们却没有办法去纠正!如果我的建议能被接受,我希望你和杨夫人一起到欧洲来帮助我做这件事。我心中已有几位可信赖的外国人来帮助我们。”并说这一工作可以使杨杏佛“经常接触时事,同时也让我们有时间在欧洲作一些调查和旅行”。^[2]这里宋庆龄十分明确地将调查和旅行并列,要外出调查就要旅行,旅行一方面饱览山川美景,同时也不忘人文调查。

宋庆龄到德国后的首次出境旅行是由她弟弟宋子安陪同的。宋子安是1926年秋进哈佛大学的。本来宋庆龄“计划与他同去”,后来宋庆龄“决定最好还是等一等”,因为当时“在国内有许多事要做”。^[3]1928年6月下旬,宋子安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他在回国途中特意绕道欧洲探望离别多时的二姐。6月25日到7月11日左右,在宋子安逗留柏林的日子里,他俩每天散步,还一道参观了柏林大学及其图书馆,游览了名胜古迹与皇宫。7月12日起,姐弟俩前往国外旅行,先到巴黎的美国医院作X光治疗,再去瑞士湖间镇的阿尔卑斯山区,还去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8月21日从布拉格回到柏林。随后,为了学习与保健,从里城堡大街7号沃尔夫家中搬到维兰特大街18号科恩莱希博士夫人家里。

1928年12月,宋庆龄第二次出境旅行,离开德国柏林去苏联莫斯科,欢度圣诞。由于此前柏林的牙医在治疗宋庆龄牙病时将一根针断在她的颞内,到莫斯科后发作痛苦难当,就地进行治疗。何时返回柏林时间不详,只知道次年4月底已经在柏林了。1930年2月23日收到

[1]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58页。

[2]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64页。

[3]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54页。

宋庆龄祝贺新年明信片的奥维科尔从莫斯科来函询问近况，希望宋庆龄能再回到莫斯科，并说“肯定你所有的朋友对于不久在这里再次见到你一定会高兴的”。^[1]不过在此之后直到全国解放，宋庆龄没有专程去过莫斯科。

三

孙中山生前在提出以俄为师的同时也提过以德为师。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者，孙中山对德国的印象并不坏。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亲密伴侣与战友，不能不受此感染与影响。1928年宋庆龄初到德国时“心情是好的”^[2]，对德国方方面面的评价是正面与肯定的。同年8月21日，宋庆龄致函杨杏佛，劝杨设法将全家带到德国来，“首先因为可从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学到许多适合于中国建设的东西，其次这里是生活费最低的国家”，“如果每人每月有二百马克开销，可以过得很不错”。“德国人民对外国人非常民主和友好……柏林是我有生以来感到最自在的地方，远较在上海还自在，虽然我在那里还算有幢房子。这里家务极简单，且不是非做不可，因膳食可在附近购买，价廉物美。花五十马克（二十五元鹰洋）你可租一间相当不错的带家具的房间，房东负责清洁和整理不另收费。这真是一个搞任何研究工作的理想环境，有各种设备和图书馆。”^[3]

1930年8月30日宋庆龄致函杨杏佛，在这次信中，宋庆龄笔下的德国的形象就不是很光鲜了。宋庆龄写道：“到处是经济衰退，特别是德国，四百万人失业使问题变得严重。甚至在柏林我也看见许多商店关闭。公共汽车公司上月仅因加价20—25芬尼而亏损了350万马克，许多人开始以步行代替乘车。现在这家公司无法兼顾两头，为了紧缩开支只好解雇几千工人。乞丐到处叩门，盗贼和自杀者甚多。德国肯定希望再来一次战争——不过这一次她要变为赢家以补偿其巨大损失！由于中国货币通货膨胀，许多中国学生在此挨饿，有些女生特

[1] 《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25—26页。

[2] 转引自《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20页。

[3]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58页。

别困难。我设法为她们争取奖学金。”^[1]就职业道德而论，至少是医治她牙病的医生和她乘坐的出租汽车司机的所作所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是有损德国形象的。

1931年2月17日，宋庆龄在给杨杏佛的信中再谈德国形势，对此充满忧虑：“德国现在是很糟的冬季。失业大军不断增加，令人不安。乞丐挨家挨户地讨饭和要旧衣服，一天至少响六七次门铃。盗窃和杀人不可胜数……知识分子成为弃儿。满街都是失业的演员，小提琴手为了几个芬尼在寒冷的街头演奏。另一方面，‘纳粹’即纳粹党人（法西斯党徒）已很强大了。德国在最近的将来已不可避免一场革命，而法西斯党徒将占上风……德国政府在增加税收方面是多么会动脑筋，所有单身汉一律课以重税。”^[2]

两个多月后，宋庆龄于1931年5月1日致函杨杏佛，介绍了在经济衰退背景下德国正在恶化的政治局势：“今天是五月一日，但今年德国工人却难以搞多少游行，因为‘纳粹’或称‘民族社会主义者’（此即真正的法西斯）正在找他们的麻烦。此间内部政治斗争非常激烈和残酷。”^[3]

这种态度的转变，总体上是由于德国阶级与社会矛盾有个逐渐显现的过程，宋庆龄对它的认识当然也有一个过程。同时也与宋庆龄在德国和“左倾”人士的频繁接触与来往有直接的关系。

1928年8月前后，宋庆龄与德国共产党领袖克拉拉·蔡特金等人来往甚密，与德国作家、艺术家等著名人士广泛保持着联系。

1930年，宋庆龄在柏林任“国际保卫革命者委员会”中央机构的成员。该组织旨在募集资金为被监禁的革命人士提供法律保护和物质援助，西方知识界中有许多人参加或赞助。她还参加该组织在柏林举行的集会，会见了不少德国著名作家、艺术家、教育家等。

由于宋庆龄在德国与“左倾”人士有频繁活动以及共产国际背后的支持，使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有了一定的地位。共产国

[1] 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编：《啼痕——杨杏佛遗迹录》，第218—219页。

[2]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68—69页。

[3] 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编：《啼痕——杨杏佛遗迹录》，第223页。

际有什么事情也会找到宋庆龄。我们仅仅看与德国直接相关的信息就可以体会到这一点。

1929年8月,国际反帝大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宋庆龄再次被选为名誉主席。

1931年6月,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泛太平洋产业联盟上海办事处秘书牛兰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同年8月19日,宋庆龄接德国劳动妇女领袖克拉拉·蔡特金来电,要求救援牛兰夫妇。来电谓:“因为你是伟大的孙逸仙理想的真实的承继者,我希望你会热心努力的援救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的秘书局的工作人员。”当天她又接到德国罗弗莱赫尔教授和卓越的艺术家人士十余人来电,要她援助牛兰夫妇获得自由。来电谓:“迫切的恳求女士对于被逮捕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之恶劣情况有所减除,及求得他的自由。”^[1]

8月20日,宋庆龄接到德国著名版画家珂勒惠支教授等十余名妇女界人士来电,要求援助牛兰夫妇获释。来电谓:“最急切的恳祈你去援救被逮捕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及其夫人的释放。”^[2]接到这些电报后,宋庆龄为营救牛兰夫妇,多方奔走,不遗余力,但国民党当局坚决不予释放。直至1937年12月,日本侵占南京时,牛兰夫妇才乘乱越狱,返回苏联。不管怎样,宋庆龄在营救牛兰夫妇的问题上是尽心尽责,出过大力气的。

宋庆龄在德国期间,虽然遭到德国官方的秘密监控,但比起国内来政治环境要宽松多了。由于基本的生活有人照料,使她有可能潜心研究政治与历史,有时间结交当地的左翼人士。政治上思想上的进步是宋庆龄在德国期间最令人称道的一个方面。在国民党左派中,她较早地认识到“可能共产党员是对的——只有他们的党能实行孙博士的主义”,认识到“对南京和北京以及共产党都要斗争”的第三党“希望不大”。这些思想意识在当时的非中共人士中是凤毛麟角,十分难能宝贵的。宋庆龄积极与中外共产党员联系,参加他们的社会与政治活动,与他们建立了比较密切的人脉关系,这为今后执行共产国际交办

[1]《文艺新闻》1931年9月7日。

[2]《文艺新闻》1931年9月7日。

的秘密任务,奠定了人事上的基础。宋庆龄还准确地估计了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低落的走向与法西斯势力可能上台的趋势,这些预见充分展示了她的高度政治敏感性与判断力。总之,宋庆龄在德国的日子很有一些收获,没有白白度过。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孙中山宋庆龄研究中心副主任)

大革命失败后的宋庆龄与邓演达

朱玖琳

[内容提要]

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与宋庆龄先后出走海外，在莫斯科和柏林共同寻求新的救国道路。初期，宋庆龄曾和邓演达等一起，共同努力建立一个“革命”的国民党组织。但是，在共产国际的作用下，宋庆龄和邓演达的思想都在逐渐发生变化，而变化的方向却是两极的。邓演达认为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主张在中国走第三条道路，以“平民革命”救中国；宋庆龄则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她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当第三党正式成立时，宋庆龄明确表示对它不抱希望。

[关键词]

宋庆龄 邓演达 平民革命 第三党 共产国际

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与宋庆龄先后出走海外，在莫斯科和柏林，他们过从甚密，共同研究和探讨中国革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寻求新的救国道路。出走海外初期，宋庆龄曾和邓演达等一起，共同努力建立一个革命的国民党组织。但是，在共产国际的作用下，宋庆龄和邓演达的思想都在逐渐发生变化，而变化的方向却是两极的，两人在中国革命道路未来走向的问题上产生了根本性的分歧。当邓演达将第三党正式组织起来时，宋庆龄却明确表示对这个走第三条道路的政党不抱希望。

一、在莫斯科宣布筹建革命的国民党组织

1927年7月14日，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在武汉宣布“分共”，宋庆龄痛而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

“暂时引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1]不久，她秘密离开武汉回到上海，准备出走海外。起初，因为怕“在中国的人会对此说三道四”^[2]，她对是否直接去苏联表示了犹豫。在陈友仁的劝说下，8月22日凌晨，宋庆龄还是秘密地与陈友仁等分批登上了开往苏联的货船。

宋庆龄是为抗议国民党右翼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而出走的，但此时的她并没有认为国民党就此失去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她当时之所以反对分共，只是因为“容共是总理一种政策”，“现在要变更总理的政策，她不能赞成”。^[3]当时的她对共产党的极左行为多有不满，在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处目睹了共产国际号召没收土地、逮捕军官、成立新的工农军队和通过激进成员夺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权的“五月指示”时，她“大为惊慌和不悦”^[4]。在她的心目中，国民党才是中国革命的主导力量。她在《赴莫斯科前的声明》中明确说明：“在与国内军阀及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只有在国民党领导下正确地配合运用由三大政策所产生的革命力量，国民党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我要亲自到莫斯科去说明这一点。”^[5]所以到莫斯科后，宋庆龄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说时，总不忘说明，她代表的是国民党左派，是革命的国民党。

在莫斯科等待宋庆龄和陈友仁的不仅有苏联人，还有先他们一步来到莫斯科的另一位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与宋庆龄不同的是，邓演达曾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判断，认为“国民党只是一个清道夫”，“国民革命完成之后，必来一个共产革命”，“国民革命完成之时，就是国民党寿终正寝之日”，国民党“仿佛是一个清道夫”，“扫除道路让共产党去走”。^[6]不过，他并没有认为国民党是时便已失去中国革命的主导地位。“四一二”之后，邓演达因为积极主张讨蒋，而

[1]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

[2] [美] 彼德·兰德著：《走进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379页。

[3] 陈公博著：《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

[4] [美] 丹尼尔·雅各布斯著：《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55页。

[5]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2页。

[6] 陈公博著：《苦笑录》，第35页。

受到“庇护蒋介石”^[1]的冯玉祥排挤，被迫去国赴欧，并在宁汉合流后辞去总政治部主任职。他在《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和《辞职宣言》中，表达了与宋庆龄类似的政治观点，坚决反对蒋介石、汪精卫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在莫斯科，宋、邓、陈三位国民党左派领袖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他们曾由鲍罗廷陪同，一同到高加索参观，深入农村了解情况。10月22日，邓演达写信告诉妻子郑立真：“我来后不久，孙夫人即与陈友仁同到俄来。现在我正与他们在高加索（苏俄南部）地方商议一切，不日或要到德国去。”^[2]

宋庆龄高加索归来，就有人冒失地根据谣传向她祝贺她与陈友仁即将结婚，她当即晕厥过去。以后，同样的谣言又发生在了宋庆龄和邓演达的身上。

谣言和诽谤并不能动摇宋庆龄忠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的决心，三位领袖也没有因为谣言而分裂。1927年11月1日，三人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以后的“第三党”）的名义，在莫斯科发表了由邓演达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宣言》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主张平民革命，称：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工、农、手工业者、小商人及青年学生”，尤以“最受压迫剥削之农工群众”为主要动力；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地主、土豪绅士及与他们相勾结之高利贷资本家”；革命的结果是“其政权主要的掌握在工农为中心的平民群众手上，其经济建设，必超越资本主义之毒害向社会主义前进”。^[3]

这种“平民革命”的理论，不同于共产党纯粹的“工农联盟”，但它反对国民党压迫工农运动，发展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思想，把工农视作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动力。

然而，这种有别于共产党的理论，引发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极大不满。

[1] 冯永宁：《邓演达年谱新编》，转引自“邓演达思想研究专题学习网”。

[2] 冯永宁：《邓演达年谱新编》，转引自“邓演达思想研究专题学习网”。

[3] 梅日新、邓演超主编：《邓演达文集新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3—208页。

鉴于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这三位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地位，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曾给予了三人高度的重视。联共（布）不仅为宋庆龄和陈友仁来苏提供了一万卢布的旅费，^[1]还特地拨出招待费，安排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和主席团委员叶努基泽负责他们“在苏联逗留期间的全部接待工作”^[2]。

当时，苏联正处于党内矛盾异常尖锐化时期。斯大林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遭到了托洛斯基的世界革命理论的强烈反对。斯大林一方面为了苏联的一国利益，敷衍邓演达回国领导推翻蒋政权的斗争的要求；另一方面为了逃避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又在公开场合主张极左政策。托洛斯基则贬低孙中山，认为孙逸仙主义是小资产阶级主义，国民党左派实际上是中国土地革命的刽子手。

对于斯大林和托洛斯基两派的立场，三位领袖当时都不予接受。他们都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忠实捍卫者，他们希望通过苏联的援助，推翻蒋、汪政权，建立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平民政权。同时，对于共产党的极左政策他们都不赞成。邓演达到苏联后不久曾在以托派为主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发表讲话，严厉谴责蒋介石和武汉集团，同时也提到“五月指示”的错误，指责共产党的极左政策。邓演达的批评是客观公正的，但是，“听众中的一些共产党学生显然被激怒了，于是，用开闭电灯和脚踩地板来进行报复”。^[3]宋庆龄后来也应邀来这所学校发表讲话，她表示要为捍卫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奋斗到底，结果有些激烈分子批评孙中山的主张不够彻底，她当场予以驳斥，并嘲讽他们患了“左”倾幼稚病。^[4]

因为苏联和共产国际不愿意帮助国民党左派的活动，三位领袖认识到留在苏联已没有意义，于是先后离开莫斯科。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7卷，第71页。

[3] [美] 盛岳著：《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页。

[4] 屈武：《操比金石 节砺冰雪——回忆宋庆龄同志》，《人民日报》1981年6月4日。

二、在柏林为筹建新党进行理论研究

邓演达率先于1927年12月抵达德国柏林。宋庆龄和陈友仁则略迟一些，他俩是在斯大林明确要求他们回到中国去与蒋介石合作后，才于1928年春离开了莫斯科。^[1]宋庆龄原准备去美国，为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3月22日召开会议，认为：“让宋庆龄去美国一至两个月作关于中国和苏联的报告和演讲是合适的。如果宋庆龄愿意让柳克斯^[2]同志陪同去美国的话，不反对他去。建议宋庆龄希望会见的那些同志不要拒绝会见她。”^[3]但在与陈友仁商量后，宋庆龄改定赴德，陈友仁则移居巴黎，以使所谓他们两个“结婚”的谣言不攻自破。^[4]

1928年初，宋庆龄在逗留莫斯科期间，曾写信告诉邓演达，她要回国去探视母病。当时，邓演达正在柏林住院养病，得知宋庆龄打算回国，他急切地于2月22日回信劝宋万勿回国，留在国外进行革命工作。他告诉宋，他准备去日本工作，建议宋请母亲到日本去相见。他还询问宋对于建立第三党组织的意见有何新的看法，希望她能够秘密参与建党工作。该信全文如下：

庆龄姊姊同志：

接到你17/2的信时我打算晚几天再写信给你，方才又接到你的21/2的信，叫我不能不即刻写信给你了！唉，亲爱的同志！我深深的为你挂心，因为你这样的在你的亲爱的母亲底怀抱里。你的生命，你的爱，自然现在你的母亲的方面占了几分之几；然而我却同时为你担心：设若你真正的就回去了，你怎样去尽你的责任，就是你对于社会的生命，对于社会的爱？不错，中国的社会本来是矛盾的，并且是绝对的矛盾；尤其是我们负担革命责任的人们，在家庭和社会的生活里，无处

[1] 章克的回忆，转引自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1页。

[2] 原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1927年6月同鲍罗廷一起向共产国际报告了罗易擅自向汪精卫泄露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的事件。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7卷，第384—385页。

[4] 陈丕士著：《中国召唤我——我参加中国革命的历程》，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66页；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240页。

不表现着十二分的矛盾。我们的责任叫我们勇敢的向前，我们的旧有的关系——环境，无时无地不拉我们向后。这种情况，孙先生也深深的感着，尤其是在他的后半期的政治生活里。不过孙先生勇气和决心坚强的很，把一切落后的牵挂都先后的打破了罢了。

庆龄姊姊！我是赞成你回去一趟看你的亲爱的母亲的，如果她真是有病；但是我不赞成你回上海去。我盼望你能够设法请你的母亲无论如何到日本去，你到日本去候她。这样子可以得着许多益处，免去许多害处。第一，日本的地方养病好些，方便妥当些；第二，可以免去国内反动关系的欺骗牵扯；第三，可以进行我们的革命工作。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因为一件事做成两件好事。我最近接到国内无量数的信件和请求——都是叫我转致意给你的。彭泽民最近有一封很恳切的信来，我明后天就转给你看。总合起他们的意见，第三党的组织是必要的而且容易成功的。我已经有过一封信给你，稍稍问你现在的意见，因为你从前的意见我已经知道的了。我以为继续总理从前在日本的主张，就以中华革命党为新党的名号，不过一切纲领政策口号及组织自然要十二分具体的指出，才能免去过去国民党的招牌人人可以顶戴，国民党的说法人人可以都可以接受的混淆暧昧底性格。因为这个十二分重要的使命，我必然要和你详细商量；但是我现在必不能到莫斯科去，因为我如果现在就去，那党的组织必不能成功，你可以知道这种关系的。我——以及国内多数同志的意见，我们应该到日本去做这种工作。所以我十二分的盼望你趁这个机会先去日本。我现在决心3月10号出院工作，等待几个月后即到日本去做工。你应该可以了解我的意思了，但是我盼望你十二分的留意秘密。

因为谈话的方便及一切方略的决定，我们有亲口谈一次话的必要，望你能设法到德国来一次，一来在回国前可以借名游览西欧景色；二来可以多得多些消息。我十二分的盼望你能秘密进行这个工作罢！你的母亲即使有病迟三五天见面不十分要紧的。望你一面有以安慰亲爱的母亲；一面更有以安慰国内无数渴望我们——尤其是你——的青年及工农同志也。各事要和你面谈的太多，恨不能插翼飞去和你立刻见面!!!

叶挺有信给我要来德国,我前信已经告诉你,他的意见如何,盼你告知我!我的病到3月10号就算完结,我不再被病了!我十二分的盼望你放心,安慰;拿着你的决心和勇气去安慰你亲爱的母亲!^[1]

1928年5月1日,宋庆龄抵达柏林,租住于邓演达为她安排的里城堡大街7号沃尔夫家。^[2]柏林给宋庆龄带来了从未有过的自在感觉。这里不仅环境清爽,气候怡人,极适合治疗宋庆龄的皮肤病;而且生活费极低,人们对外国人也非常民主和友好。不过,最为重要的是,宋庆龄认为,她可以从德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学到许多适合于中国建设的东西。^[3]德国的《魏玛宪法》赋予了民众各种权利,其所设“经济生活”一章特别规定了“经济生活应与公平原则及维持人类生存的目的相适应”。这一切无疑都对宋庆龄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宋庆龄与邓演达同时居住在柏林后,与邓的接触十分密切,几乎每天都要与邓见面,商谈革命工作,一谈就是几个小时。^[4]邓演达时居柏林Bayerische Strasse 29IV,他在1929年5月给季方的信中说:“宋先生已到此同居,一切事商量甚多,日间当络续寄回。”^[5]由于他们的接触如此频繁,以至于分不清东方人长相的德国警方在监视宋庆龄时,误把与宋庆龄同住的宋子安与邓演达混为一谈。发现自己的错误后,严谨的德国警察马上做了纠正,向上汇报:“在上述报告中所提到的那位年轻的中国人系孙宋庆龄22岁的弟弟。”^[6]

邓演达深受宋庆龄的器重,被宋庆龄称为“超群出众、得天独厚的革命家”^[7]。在柏林,他为宋庆龄分析世界大势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解释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他们一致认为三民主义的实现与民族解放,各阶级的公民权与自由权,及为提高全国生活水准的斗争是不可

[1] 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2—393页。

[2] 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上册,第400页。

[3] 《宋庆龄书信集》上,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

[4] 章克的回忆,转引自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251页。

[5] 梅日新、邓演超主编:《邓演达文集新编》,第449页。

[6] 柏林警察局长1928年7月2日、8月1日向普鲁士州内政部长的报告,原件存德国波茨坦国家档案馆,转引自刘家泉著:《宋庆龄流亡海外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8、82页。

[7]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46页。

分割的。^[1]在秘书章克的帮助下,他们还到柏林一些大的图书馆搜集了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各国土地问题的资料。邓演达主张,要真正重振中国革命,必须制订出一个以土地和农民问题为中心的纲领。这一观点十分契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深得宋庆龄赞同。邓演达曾写信给同志郭冠杰说:“关于继续中国革命的事,已和孙夫人、陈友仁先生讨论多时,有了具体的结论。此后我们的革命工作,仍应注重农民问题,解决土地问题,以建立我们的革命力量。”^[2]

在柏林,宋庆龄还拜邓演达为师,请他教授国文。邓演达特地到中国留学生那里去搜寻“五四”时期和20年代初期《新青年》、《向导》等时尚杂志上所发表的一些较好的文章作为范文和教材。特别重点推荐了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人的文章,因为这些革命者同时又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而且他们的文章都是深入浅出、易懂易学的。^[3]

虽然没有史料显示宋庆龄和邓演达当时就如何组织第三党具体谈了哪些内容,但不管谈了什么,他们当时是没有分歧的。从章克的回忆及宋庆龄日后对这段经历的叙述上看,邓演达当时在革命理论方面充任的几乎是宋庆龄老师的角色。宋庆龄评价他说:“因为他对于历史、经济、哲学等学科全有渊博的知解及明锐的识断,使那些接近他的人,都能获极大的教益,并更深切了解中国革命前途所可遭遇的种种问题。他分析世界大势和其相互间的关系,是那般地清楚而一无疑点,解释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又实实在在是处处引人叹服。”^[4]

三、分歧的产生

分歧的产生似乎是突然的。因为史料欠缺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持宋庆龄与邓演达早有分歧的学者以宋庆龄1931年8月24日的表态,及在邓演达去世后的言论,来证明宋庆龄的“高瞻远瞩”;持宋庆龄在邓演达生前与他没有分歧的学者则忽略宋庆龄1931年8月24日的表态,并也以宋庆龄在邓演达去世后的言论,来证明宋庆龄反对

[1]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46页。

[2] 丘挺、郭晓春著:《邓演达生平与思想》,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9页。

[3]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251页。

[4]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47页。

走第三条道路是在邓演达去世之后。

但事实并非如此！

1931年8月24日，宋庆龄回国抵沪（8月13日）未一月，邓演达被捕（8月17日）刚满一周，上海《字林西报》刊登了宋庆龄与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宋庆龄公开表示她不是第三党党员，她的政治见解仍然与1927年7月14日声明所陈述的相同。^[1]

与邓的分歧虽然不是谈话的重点，但这一谈话的确表明，宋在邓生前就已经在三大政策的问题上与邓产生了分歧。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坚持中国革命不应受苏联领导，应该在保持独立的情况下接受苏联的支持，与共产党合作。但是，苏联并没有检讨自己在中国大革命失败中的责任，受其影响的中国共产党也在左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28年2月25日，就在宋、邓、陈刚刚宣布准备成立第三党，连政治纲领都还没有考虑成熟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通过了由斯大林等提出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中武断地将第三党之类的新党宣布为“孟塞维克的反工农的党，蒋介石或其他工农刽子手的走狗。”^[2]于是中国共产党也一改以往对孙中山和宋庆龄的起码尊重，7月28日，中共党员陈宽在共产国际六大第十五次会议上，指责《工人画报》封面“印有‘第三党’头面人物之一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肖像。在照片背面题有引自孙中山《建国方略》的语录，而孙中山的学说是反对阶级斗争的，现在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并称：“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已是苏维埃革命，中国革命早已不是遵循孙中山精神，而是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不断得到发展的。恪守孙中山精神的继承者们，无论是蒋介石之流的右派、还是宋庆龄、邓演达这样的左派，这些人恰恰相反，他们应该是中国劳动群众无往不胜的革命过程中的失败者。”^[3]

在这种情况下，邓演达最终放弃了三大政策，并走上反对苏联、反

[1]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82页。

[2] 黄修荣主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1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

[3] 黄修荣主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11卷，第286页。

对共产国际，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道路。但是，宋庆龄却始终坚持不变。

最新发现的史料再次证明，宋庆龄的确在邓演达生前就已经与他发生了分歧。1930年8月30日，第三党在国内正式成立时，宋庆龄从柏林回信给杨杏佛明确表示，她对第三党不抱希望。她说：“至于第三党，称之以它将来的名字，能不能成事颇多取决于南京和北京之间争吵的时间长度。只有在此阶段，邓等才能够保持活跃。我看这一团体希望不大，因为它对南京和北京以及共产党都要斗争。”^[1]

宋庆龄坚持三大政策的原因除了她誓死忠实于孙中山外，当时在斯大林操控下的共产国际对她的直接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虽然通过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但他们并不想就此放弃宋庆龄这样一面对中国革命颇有影响的旗帜。1928年3月，就在宋庆龄决定离开莫斯科前不久，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部专门就宋庆龄的问题召开会议，就如何争取宋庆龄的理解和支持作出了决定，并为宋庆龄的未来政治活动确定方针。会议决定：“让宋庆龄同我们的一些负责同志进行一次谈话，以便弄清她对共产国际最近一些决议，特别是她对第九次全会决议（关于第三党的条款）的态度。”此外，“还有必要对她做更有力的系统的工作，并让她了解我们的建设和政策”。关于宋庆龄未来的政治活动，会议制定以下方针：吸收宋庆龄参加社会活动，使其主动参加中国反帝同盟的工作，“并保证可以利用这个广泛的组织作为共产党人进行工作的某种合法掩护”；“利用宋庆龄来瓦解国民党军阀上层分子和团结所有真正的左派在与共产党保持联系情况下进行工作”；“利用宋庆龄在恢复与苏联的外交关系问题上对南京、武汉和冯的中央施加压力”；“利用宋庆龄来正确地报道苏联的情况，揭露无论来自国民党首脑（在土耳其的孙科、胡汉民、西西伍）方面，还是来自帝国主义报刊方面对苏联的造谣和诽谤。”决定最后还说：“有必要召邓演达来苏联^[2]，使他采取与共产党更紧密合作的方针，以便利用他和宋庆龄一起来达到上

[1] 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编：《啼痕——杨杏佛遗迹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9页。

[2] 邓演达已于1928年2月22日致宋庆龄的信中明确表示，他为了第三党的事业不会到莫斯科来。显然，他不想受苏联党的操控。

述目的。”^[1]

共产国际要对宋庆龄“做更有力的系统的工作”，但是一时之间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宋庆龄不久就去了柏林，并在柏林整天与邓演达待在一起，进行思想交流，接受他的平民革命理论的灌输。等到共产国际密切接触宋庆龄的机会到来时，已是是年年底。

1928年12月18日，宋庆龄以到海德堡大学学习为名，来到柏林警察局申请去海德堡，但她离开柏林之后，随即秘密前往莫斯科。宋庆龄此时突然秘密赴苏，是因为原定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即将于3月12日举行，她准备经西伯利亚回国参加大典，但事先又不想让任何外人知道，所以便假称去海德堡读书。对此十分了解的邓演达于12月16日写信告诉同志季方：“庆不日可回国（十分秘密，不可告人）。”^[2]但是，奉安大典因为工程的关系延后进行，于是宋庆龄为治疗牙病而滞留莫斯科。^[3]邓演达在1929年2月17日给季方的信中也说：“夫人则因葬事改期更须迟日返来。但一切事可照常办理不必等待也。”^[4]

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究竟对远离邓演达影响的宋庆龄做了哪些“更有力的系统的工作”？国内现已公开的史料缺少这一段的记录。就宋庆龄当时给美国著名社会活动家和进步人士杰西·劳埃德（Jessie Lloyd）的信看，苏联方面为她安排了很多活动，使她倍感愉快，以至于她在给劳埃德的信中高兴地说：“这里的生活充满情趣。”^[5]

再回柏林以后，宋庆龄果然如共产国际当初为她的未来政治活动所制订的计划那样参加了“国际保卫革命者委员会”，并为此而与德国共产党关系密切。^[6]当时，她在柏林遗失了一只重要的手提箱。她心烦意乱地告诉杨杏佛：“箱内装有我所有的重要文件、密码、家族纪念品和友人存放我处的资金。”^[7]显然，宋庆龄此时正在德国从事秘密活

[1] 黄修荣主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389—390页。

[2] 梅日新、邓演超主编：《邓演达文集新编》，第455页。

[3] 《宋庆龄书信集》上，第62页。

[4] 冯永宁：《邓演达年谱新编》，转引自“邓演达思想研究专题学习网”。

[5] 宋庆龄1929年1月21日致劳埃德函，《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60页。

[6]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278页。

[7] 宋庆龄1930年4月17日致杨杏佛函，《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66页。

动,而“所有的重要文件”则记载了她与某些人的联系及这些人的真实身份。为此,德国共产党青年运动领袖艾尔文·荷普(Erwin Hopper,又译欧文·霍佩)动用了自己的私人保镖为宋庆龄查找手提箱。^[1]手提箱直到次年3月16日才由柏林警察局破案后方完璧归赵。^[2]荷普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宋庆龄的裁缝,其母在宋家当女佣。^[3]正是因为他与宋庆龄来往过密,因而成为德国警方在调查宋庆龄手提箱案时的重点怀疑对象。德国警方的调查结果发现了荷普的真实身份,也为后人提供了一些宋庆龄与德共接触的蛛丝马迹。也许是荷普成功地赶在警察之前得到了这些材料,德国警方并没有发现这些他们一直在寻找的“情报”。宋庆龄在德活动的保密之深,使我们至今也无从知晓她当初如何与德共合作,具体从事了哪些秘密活动。

就如从柏林到莫斯科一样,宋庆龄从莫斯科返回柏林也是秘密的,所以她回柏林的时间成了一个悬案。因为这牵涉到邓演达与她直接交流时间的长短,所以有必要对此进行梳理。

宋庆龄本人在1928年12月18日给德国警察的报告中说,她考虑于3月份返回柏林。^[4]但事实上她并非如她设想的那样于3月返回柏林。

邓演达在1929年4月21日致季方函中称:“黄兄(按:指黄琪翔)27日可离此返国,请十二分秘密,因他的行动不能令他人知,更不能令人知道他和我们往来也。”^[5]黄琪翔是由邓演达安排,以秘书身份陪同宋庆龄回国参加奉安大典的人。5月5日,邓演达再次写信告诉季方:“奇(黄琪翔)兄决于明晚和庆姊动身回来,先到北平,但望你千万不能告知他人(除聘兄以外),免姊事生事也。”^[6]按照黄琪翔夫人郭秀仪参与编写的《黄琪翔传》的说法,黄琪翔曾接到宋庆龄由莫斯科发

[1] 德国普鲁士州第三地方法院最高检察官通过普鲁士州司法部给德国内政部长的报告及德国内政部给德国外交部关于上述报告的抄件,原件存德国波恩国家档案馆,转引自刘家泉著:《宋庆龄流亡海外岁月》,第157页。

[2] 德国波恩国家档案馆中国档案第三卷第三号,转引自刘家泉著:《宋庆龄流亡海外岁月》,第154页。

[3] 德国普鲁士州第三地方法院最高检察官通过普鲁士州司法部给德国内政部长的报告,转引自刘家泉著:《宋庆龄流亡海外岁月》,第146、148页。

[4] 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上册,第415页。

[5] 梅日新、邓演超主编:《邓演达文集新编》,第469页。

[6] 梅日新、邓演超主编:《邓演达文集新编》,第470页。

给他的一份电报,说她要来柏林,有事商量,要黄到车站接她。^[1]书中对发电报的时间描述得非常模糊,用了“1929年5月间”这样的措辞,说明作者虽然对具体时间不太清楚,但至少肯定是在1929年5月前后。结合邓演达1929年4月21日的信,宋之返回柏林恐怕最早也要近4月底了。

从1929年4月底到1929年5月6日宋庆龄从柏林启程经苏联西伯利亚回国,宋庆龄与邓演达重逢不久就又分别了,双方似乎没有时间作更为深入的思想交流。

在国内期间,宋庆龄向黄琪翔表示不愿会见任何人,其中也包括第三党在国内的同志。为此,1929年6月23日,邓演达特致函季方解释:“接奇兄(黄琪翔)的来信,知道最近他及她(宋庆龄)的经过,你还未曾和他见过面?她的立场目前是很困难的,我想你目前不必和她见面,因为一方面她不愿意谈话,他方面她也不愿意和外人见面。”^[2]

奉安大典结束后,宋庆龄再次出国,于1929年9月21日启程,经法国巴黎重返柏林。就在宋庆龄启程前不久,邓演达离开了柏林。邓演达坚持未来的中国必须先发展资本主义,为此他要到欧洲各国去进行实地考察。当宋庆龄于10月底抵达巴黎的时候,邓演达先于10月11日离开巴黎去了他心目中的“资本主义领袖的祖国”——英国。邓演达原打算再赴巴黎,与宋庆龄面谈。他在1929年10月24日给季方的信中说:“庆姊等重来,谅日间可以在巴黎相见,我们只希望她能原则上的积极,并不强求她怎样具体地去出力工作。她是中国革命的象征,我们应当尊重她。”^[3]

但是,可能是在书信往来中已经发现了宋庆龄思想上的变化,为避免当面沟通可能遇到的尴尬,邓演达采取了迂回的方式,他在英国通过书信来往与宋庆龄讨论他10月份抵英后起草的《我们对现在中国时局的宣言》。他在《宣言》中明确指出:“我们目前的口号不是反蒋讨蒋,而是整个的推翻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统治,不但是要反对南京而且要反对一切其它挂名反对南京的军阀政客。我们的目的是要

[1] 王大鲁、刘青云等著:《黄琪翔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

[2] 梅日新、邓演超主编:《邓演达文集新编》,第476页。

[3] 梅日新、邓演超主编:《邓演达文集新编》,第490页。

建设一个民族的平民的统治，去实行孙总理的未完的工作。”宋庆龄非常赞同他所表示的对南京政府及国民党改组派的态度，并告诉他，也在巴黎的汪精卫屡次派人找她，要和她接头，被她坚决地拒绝了。^[1]值得注意的是，宋庆龄的表态仅限于此。邓演达《宣言》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评价，《宣言》起始便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领导中国革命的政党先后走入反革命或破产。”紧接其后谓：“共产党要在中国建立苏维埃，叫中国做成苏联的属邦，蔑视中国独立的要求，已经由客观的事实证明了他的空想，失坠了他领导中国革命——民族的革命——的资格和使命。”^[2]宋庆龄对如此尖锐的批评的态度是什么？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从邓演达给季方的信中根本就看不出来。也许宋庆龄没有正面对邓演达说明？亦或邓演达不愿让对宋庆龄领导第三党寄予厚望的同志们失望？无论如何，邓演达当时的确在努力获得宋庆龄对这个《宣言》的同意。他在1929年12月致季方等函中说：“（《宣言》的）公开时期及方法，待我和宋商量后再定”^[3]并在致季方等的另一封信中说：“我现在先把草稿录来，先抄转各同志，然后待下次的信——如果宋已同意——再公开地发表。你们看这篇宣言，也可以知道我们对时局的态度和陈公博辈的态度。”^[4]

然而，《宣言》却迟迟没有公开发表，应该只有一个解释——宋庆龄不同意《宣言》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批判，她不赞成走到三大政策的对立面去。

1929年12月，因为国内南北各派军阀势力矛盾日益激化，邓演达认为这是回国组织革命的绝好时机。为了争取宋庆龄的支持，邓演达从伦敦飞回柏林，与宋庆龄商谈回国进行革命斗争的“实际办法”。^[5]

然而，他们久别重逢的时候，也是永别的时候。邓演达报着为革命必死的决心，向宋庆龄辞别，他对宋庆龄说：“我们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尖锐的且又残酷的。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斗争，譬如

[1] 见邓演达1929年12月致季方、岳化、震华函，梅日新、邓演超主编：《邓演达文集新编》，第522页。

[2] 梅日新、邓演超主编：《邓演达文集新编》，第209页。

[3] 见邓演达1929年致季方等函，梅日新、邓演超主编：《邓演达文集新编》，第522页。

[4] 见邓演达1929年致季方等函，梅日新、邓演超主编：《邓演达文集新编》，第523页。

[5] 见邓演达1929年致季方等函，梅日新、邓演超主编：《邓演达文集新编》，第522页。

顽强的封建势力、机会主义，以及反动行为。因而在军政两方面全树了不少的仇敌。但他们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这次或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1]

如邓演达所料，蒋介石不会放过他。宋庆龄在邓演达柏林辞别后，就再也没见到过他。^[2]邓演达被捕后，宋庆龄竭尽所能参与营救，虽因此而收到许多卑鄙的信件，但宋庆龄坚定地向杨杏佛表示，这些信并不能阻止她的营救行动。^[3]邓演达的被害使宋庆龄异常悲愤。至1928年8月，她还在略带犹豫地表示：“可能共产党员是对的——只有他们的党能实行孙博士的主义。”^[4]邓演达遇害后，她不再顾忌被戴上红帽子，公开发表宣言，明确表示，中国只有在代表工农阶级利益的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5]

虽然反对走第三条道路，但是对于第三党本身及其所从事的活动，宋庆龄从未在公开场合予以攻击，因为这也曾经是她的目标，她对为之共同奋斗的故友充满了尊敬和怀念。

1980年，宋庆龄应季方之请，为《邓演达文集》亲笔题词，称颂邓演达“坚苦卓绝，忠勇奋发，忠实革命”。^[6]

（作者为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室副研究员）

[1]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47页。

[2]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47页。

[3] 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编：《啼痕——杨杏佛遗迹录》，第227页。

[4] 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编：《啼痕——杨杏佛遗迹录》，第208页。

[5]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86页。

[6] 季方：《宋庆龄同志是中华民族的一代楷模》，《光明日报》1981年6月1日。

宋庆龄研究回顾与展望

盛永华

[内容提要]

宋庆龄研究已走过30年,成果丰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最初10年,大致缕清宋庆龄一生——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前“做了什么”的基本脉络。第二阶段也是10年左右的时间,较集中开展对宋庆龄一生中重要实践的个案研究,这是宋庆龄研究深化的体现。研究者们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如宋庆龄是孙中山的亲密助手和战友;是孙中山思想事业的继承、捍卫和发展的忠诚战士——达成共识。21世纪开始了研究的新阶段。宋庆龄研究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展开。随着近现代史研究禁区的逐步解禁,国内外有关档案逐步解密,为宋庆龄研究的深化拓展提供了必要条件。新中国建立后宋庆龄的地位与作用,应是此阶段的研究重点之一。宋庆龄研究方兴未艾。但在研究中要避免学风浮躁,急于求成,低水平重复等弊端。

[关键词]

宋庆龄研究 回顾 三个阶段 展望 新课题

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女儿——“国之瑰宝”宋庆龄的研究,是在她逝世后才展开的。至今已走过了差不多30年的时间。回望这30年,感到十分欣慰——从起步到现在,宋庆龄研究者们筚路蓝缕,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事业从空白到有了长足的发展,硕果累累。但距缕清宋庆龄曲折、坎坷、丰富多彩而瑰丽的一生;还原她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通过宋庆龄研究以丰富、拓展中国近现代史

研究；把宋庆龄研究从“纪念史学”提高到学术层面等方面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还有待于热爱宋庆龄的人们和史学工作者继续共同努力。

到2010年，宋庆龄逝世已经29周年。大致说来，宋庆龄研究在这近30年期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这是宋庆龄研究的起步阶段与始创阶段。

宋庆龄逝世前后，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对她一生的业绩和高贵品德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崇高的荣誉。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逝世，当年的10月是辛亥革命70周年。当时，中共中央为了缅怀和让人们更多地了解这位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独特贡献的伟大的女性，决定由廖承志副委员长主持，在宋庆龄故居举办宋庆龄生平展览，故居同时对国内外人士开放，供大家瞻仰。第一个介绍宋庆龄生平事迹的展览在1982年5月29日宋庆龄逝世一周年时，于北京宋庆龄故居由邓颖超大姐和廖公主持开幕，首次以文物、文献和历史照片向国内外较为系统地介绍宋庆龄的生平、她的伟大业绩和思想。同时出版了《纪念宋庆龄同志》——国内外第一本以历史文物和文献资料介绍宋庆龄一生的图传。廖公亲自审查了图传的书稿并题写了书名。进行这两项工作时，文物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对宋庆龄的历史进行了最初的梳理和介绍。

宋庆龄研究即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宋庆龄一生为人谦逊低调，她自己没有留下回忆录。有关自己的点滴情况，仅见于她写于1922年6月的《广州脱险》（约2800字左右）和《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约2000字左右）。前者曾以相同的内容稍异的文字，以《自传》为题目收入1938年在香港华光出版社的《宋庆龄自传》一书；后者载于《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还有一些资料分别散见于她给友人的信件，或她的友人的著作、回忆录中。由于宋庆龄的革命道路曲折特殊，许多经历不为人所知，或当时不能为人所知，此前也没有人研究宋庆龄，没有人较为系统地了解她。廖

公当即指示从研究孙中山的学者中组织力量进行宋庆龄研究。事实上,对宋庆龄历史的梳理和研究,就是在廖公的直接指导下、组织下开展的。

当时研究宋庆龄可根据的资料寥寥:

一是邓小平同志在宋庆龄的追悼会上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所致的悼词。悼词把宋庆龄一生作了最简要的概括。重要的是,在悼词中总结并肯定了宋庆龄是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这不仅是对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中历史地位的认定,而且指出了她思想发展的历程:从爱国主义出发,毕生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与时俱进,成为共产主义的英勇战士。或许有人认为这会成为宋庆龄研究的“框框”,使探寻宋庆龄的思想发展历程有了“主观”的前提引导。此种看法其实是不够客观的——关键是这个归纳是否符合实际。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并面临被世界列强瓜分局面的旧中国,宋庆龄作为一个爱国的青年学生,她必然会从爱国而走上救国的道路,从爱国主义发展为革命民主主义——宋庆龄家庭与孙中山的关系,使这种转变变得更为必然和顺畅;也正因为从爱国和立志救国出发,必然会在革命的转折关头奋力进击,顺乎世界的潮流,不断地自我超越,从革命民主主义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宋庆龄的思想和实践,反映了她代表的那一代爱国者们的探索、追求和思想发展规律,并且成为近代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的缩影。

其次就是宋庆龄自己编辑或审定的她的两册文集——《为新中国奋斗》和《宋庆龄选集》。《为新中国奋斗》于195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1927年至1952年7月撰写的文章63篇,根据不同的革命阶段分为五部分内容:“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为争取民权自由的斗争”、“为争取国内团结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为坚持团结与战胜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解放和人民政府”。据此,可以理解为宋庆龄将自己从孙中山逝世后至新中国成立之初这段历史大体分为五个阶段。另一册是196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庆龄选集》。该《选集》是在《为新中国奋斗》的基础上增订的,共收入了宋庆龄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撰写的文章145篇,按照

写作的时间顺序编排,其中少数文章由于种种原因,经宋庆龄同意,由编辑出版者作了个别修改。

在跨越两个世纪的人生长河中,宋庆龄有近70年的革命生涯。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她所处的特殊地位和险恶环境,使她常常不得不以笔为武器,发表声明、宣言和文章,以宣传革命和引导潮流。宋庆龄这两本著作,是研究她的思想和实践的最真实、最重要、最基础的历史文献。正如她在《为新中国奋斗》的《序言》中所说:“从很多方面来说,中国革命是有它的独特性的。因此,关于它的事迹写得越多,从它的经验中所能获得的好处也越多。陈毅将军和另外几位朋友都劝我说,如果我能把我从一九二七年以来所发表的演说、文章和声明编印出来,我可以在这方面有所贡献。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著作反映了历年以来的革命潮流,反映了人民力量的消长,反映了人民的力量最后冲破一切,取得胜利。”(《为新中国奋斗》第1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收入集子的这些文章、演说等也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极为重要的文献,可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进程。

再次,宋庆龄逝世后,很多曾与宋庆龄共过事的前辈、被她营救过的革命者、在宋庆龄的关怀下成长的一批同志……他们怀着对宋庆龄非常深厚的感情,陆续发表了许多回忆文字,这些回忆录成为我们研究宋庆龄的重要资料。

应该说,宋庆龄研究初始,是由中共中央推动,由廖承志副委员长亲自组织、指导进行的。参加资料收集、考订、整理并进行研究的,除少数文物、史学工作者外,更多的是对宋庆龄充满感情的曾在她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及各界人士。

至90年代初,经过10年左右的努力,宋庆龄研究从几乎空白着手而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北京宋庆龄故居举办的宋庆龄生平展览及《宋庆龄图传》问世,第一次形象地向广大读者介绍了宋庆龄光辉的一生,为后来人们撰写长篇传记提供了翔实的、可以作为根据的资料。之后陆续出版了一批介绍宋庆龄生平的著作,如蒋洪斌的《宋庆龄》、《宋庆龄的足迹》;吕明灼、刘家泉、陈漱渝、尚明轩、唐宝林等分别所著的《宋庆龄传》等。由尚明轩、刘家泉、陈民、赵楚云编著,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宋庆龄年谱》也于1986年出版。这一段时间所出版的宋庆龄传记,尽管由于受史料限制,考订不尽精当,因而有些结论不够准确,但是总的来说,宋庆龄一生做了什么,特别是她在新中国建立前做了什么,大的脉络是搞清楚了。他们为宋庆龄研究打下了最初的基础,是宋庆龄研究的先行者。

对宋庆龄一生进行阶段性研究也同时开展,收获颇丰:如1986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季鸿生、郑灿辉、吴景平著的《宋庆龄与抗日救亡运动》、1986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杨耀健著的《宋氏姐妹在重庆》、199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的《宋庆龄在上海》图册,以及稍后分别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刘家泉著的《宋庆龄流亡海外岁月》、《宋庆龄在香港》等。

集此阶段成果之大成者,是1992年1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受宋庆龄委托,由宋庆龄多年的同事和挚友爱泼斯坦先生所著、翻译家沈苏儒所译《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该书以史料丰富翔实——许多历史事件作者曾亲历或参与,立论客观科学,文字精炼朴实而著称,成为研究宋庆龄的必读书。

用1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搞清楚宋庆龄这位伟大的女性一生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贡献,成绩斐然。

另一方面的重要收获是资料收集、整理的逐步深入和系统化。为便于研究,各有关方面对宋庆龄的文章、演说、函电等分类出版。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宋庆龄关于中国福利会的论述专集《永远和党在一起》;1984年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宋庆龄论少年儿童教育》;1988年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了《宋庆龄题词选》,收录宋庆龄题辞墨迹103幅;199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宋庆龄论儿童教育和儿童工作》……最有分量的是1992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修订出版的《宋庆龄选集》(上下卷)。新版两卷本的《选集》汇集了宋庆龄在1912年至1981年间的文章、讲演、文电、书信等358篇。较之于1966年版相比,修订版收文篇幅增加了213篇;收文的时限提前至1912年,止于1981年,几乎收入了她一生的主要论著。旧版中因政治原因

修改过的地方尽量恢复了原貌,是迄今收录宋庆龄著作最完备的一部选集。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的同志们为《选集》的修订出版付出了巨大的热情和辛勤的劳动。

从1981年开始,国外有关宋庆龄及“宋氏家族”的一些作品也被介绍到国内,其中有美国作家罗比·尤恩森的《宋氏三姐妹》、埃米莉·哈恩的《宋氏家族》、斯特林·西格雷夫的《宋氏王朝》等。英国的张戎、乔恩·哈利戴所著的《孙逸仙夫人》也由中国和平出版社翻译出版介绍到国内。这些作品所提供的资料,对宋庆龄研究均有不同的参考价值。

此阶段的研究成果表现为出版了一批论著和资料选辑,其中研究性专著,包括年谱、传记、资料集(如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的由吴景平教授翻译的《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纪念集等共40余种;文章、回忆录以及相关资料有740多篇。1992年12月,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了由北京图书馆高级馆员苏爱荣编的《宋庆龄研究文献目录》。《目录》共收入了1911年至1991年,国内(包括台、港地区)用中文正式发表或出版的宋庆龄著作篇目和对其生平事业、思想研究的专著、报刊论文以及史学论文集的有关篇目,并酌收了部分研究机构内部出版物中有关篇目,共2300条。这部《目录》对宋庆龄研究发展状况及其成果作了总结与回顾,为研究者以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帮助。

随着研究的开展,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上海、广州、北京、重庆等城市——在孙中山、宋庆龄活动的主要地区,有关宋庆龄的纪念馆、纪念地陆续建立起来,研究的队伍也逐渐地组织起来了。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设立了宋庆龄研究中心以推动资料收集与研究、宣传工作;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及其属下的宋庆龄陵园管理处,从成立的时候开始,也建立有宋庆龄研究室。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单位的历任领导对研究工作都十分重视,从开创至今,一直给予关怀和支持。上海宋庆龄故居、上海孙中山故居、中国福利会……所有这些跟宋庆龄有密切关系的单位之研究者,都把开展宋庆龄研究作为自己的基础工作之一,体现了他们对宋庆龄的深厚感情。在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支持下,全国第一个宋庆龄研究会——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在1991

年成立。该会组织资料收集整理,开展关于宋庆龄的研讨,整合研究队伍并加强与各高校和各研究机构的联系,大大加强了研究的学术力量。

1993年1月,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举办了“纪念宋庆龄诞辰100周年·宋庆龄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以及韩国、日本等国的学者近百人出席了会议并提交了论文,会后论文结集由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以宋庆龄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在国内外尚属首次。这次研讨会既是为缅怀宋庆龄的伟大业绩、崇高品格;同时也是对十年以来宋庆龄研究进行总结,以推动今后研究更好地开展。因此此次研讨会具有承前启后的里程碑的意义。

在宋庆龄逝世后的前十年,对她的研究已引起广泛的关注,但严格说来,还算不上对历史人物的学术研究。然而,这是为以后研究打基础的十年,是很关键的十年。

二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宋庆龄诞辰110周年,大约也是十年左右的时间,可算是宋庆龄研究的第二阶段。如果说在第一阶段基本解决了宋庆龄一生主要“做了什么”,那第二阶段则主要是解决她“为什么这样做”的问题。

第二阶段研究是在第一阶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首先还是继续扎实地做基础工作,也就是资料的收集、发掘、整理,并且结集出版,提供研究者使用。在这第二个阶段中,这方面的成果也是很丰硕的。宋庆龄自己的著述如《宋庆龄书信集》(上、下册)、《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相继编辑出版。《宋庆龄书信集》收入宋庆龄自1913年致1981年近70年间致同学、同事、友人等的书信900余封、近100万字。内容更多地涉及她各时期的工作(通过信件布置工作或和同事讨论问题,是宋庆龄的常用工作方法)和对国内外重大问题的看法和表态。2004年《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的出版有着特殊的价值——过去结集出版宋庆龄书信的时候,可能从政治的角度考虑多一些,而《续编》收入的全部是私人信件,这些私人信件很多是宋庆龄由于各种原

因,要求收信者“阅后销毁”,而她的友人舍不得将信销毁,在经历了许多劫难后得以保存下来的——有些人因保存了一些信件,在“文革”中遭到灭顶之灾。这些私人信件中有很多私密的东西,包括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而保密,也有因个人原因而保密的。信件除披露了很多重要历史事件外,还可让我们更加多角度地了解宋庆龄。如她处理问题的立场、原则、技巧和方法,以及她的文化修养、她的兴趣爱好、她对亲属的挂念和交往、她的人际关系等等各方面,使得我们对宋庆龄的了解更具体。宋庆龄确是一个很特殊的、有独特地位的伟大女性,但她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这对我们多方面了解和研究宋庆龄是很有帮助的。

其间,还有相关的重要历史资料如《中国福利会志》、《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丛书》等陆续出版,还有大量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各方面的资料相继问世,为宋庆龄研究的深入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基础条件。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编译的《宋庆龄来往书信集》不仅收集了宋庆龄致友人的信,还有别人给宋庆龄的来信,由此,一些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比较清楚。这种编辑方法是很值得称道的。

在宋庆龄研究的第二阶段,对宋庆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在继续深化研究“宋庆龄一生主要做了什么”的基础上,探究“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也就是探究宋庆龄思想发展的历程。第二,是探究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即她对中国革命事业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贡献。把就事论事提升到历史研究的理论层面。

在此阶段,广泛开展了对宋庆龄的专题研究。如:与孙中山并肩战斗的十年、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宋庆龄;宋庆龄与国共两党、与共产国际、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少年儿童教育、与救济事业、与世界和平事业……这些个案研究,不仅丰富和深化了对宋庆龄毕生实践的研究,而且探索了她与时俱进的思想发展历程:从爱国主义出发,最后走向共产主义。大量的阶段性个案研究,使研究更细致,结论更符合历史实际,因而也更科学,反映了宋庆龄研究的深化与拓展。但限于资料和研究力量的

不足,使得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要在目前还原历史原貌还相当困难。

此阶段,对宋庆龄研究的一个重大进展,是研究者们对于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贡献达成共识——在与孙中山共同生活的十年,她是孙中山忠诚的学生、助手、战友和伴侣;在孙中山逝世后,她是孙中山思想与事业坚定的继承者、捍卫者,她不断地发掘、拓展孙中山思想事业的内涵,使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与时俱进,永远活在祖国发展的伟大事业中。这是宋庆龄对中华民族的一大贡献。

199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孙中山与宋庆龄》图传,则完全用历史文物照片、文献资料,无可疑义地阐释了孙中山与宋庆龄互为影响的关系。

早在举办宋庆龄生平展览的时候,廖公就多次指出:“宋庆龄是一位有着特殊的地位,对中国革命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伟大女性。”他也曾多次指示,希望以北京宋庆龄故居为依托,成立孙中山、宋庆龄研究中心。廖公这样的一个建议,事实上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研究孙中山和研究宋庆龄是不可分割的。

在评定宋庆龄对中国革命重大的、不可代替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时,必须充分确认她与孙中山的关系的意义。1991年5月26日,在宋庆龄逝世10周年前夕,《人民日报》以一整版刊载盛永华撰写的《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理解与影响》;1993年1月,为纪念宋庆龄诞辰100周年,盛永华在《海南日报》发表题为《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其间,盛永华还发表一系列论述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及“三大政策”的继承与发展的论文,集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是她以孙中山的战友与伴侣的身份,支持、继承、捍卫和发展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宋庆龄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是她新的革命阶段发掘和赋予孙中山思想以更深厚的内涵,使孙中山思想具有不熄的生命力。她始终高擎孙中山的旗帜,将国内不同的阶层及不同意识形态的爱国进步人士和社团,凝聚于孙中山的旗帜之下,成为一支中国革命与建设大军中不可缺少的力量,并率领他们投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至社会主

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她的人格的魅力,成为一种强大的感召力量,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

“在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续高举他的旗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他的思想和事业,跨越了半个多世纪,贯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时期。她的努力使得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同奔腾不息的历史潮流融汇起来,赋予孙中山的旗帜以新的生命力;同时也给现实斗争注入了更多的凝聚力。孙中山迄今仍未离开历史的舞台,仍在鼓舞人们前进,宋庆龄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宋庆龄无愧为炽烈的爱国者的楷模,她对祖国和人民的义务感使她不断攀登,以矫健的步伐义无反顾地跨越了两个时期——三个阶段,始终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起着先驱者的作用……作为孙中山忠实的、亲密的助手、学生、战友和伴侣,她的奋进成为联接贯通不同革命时期的津梁和纽带。宋庆龄在长期的艰苦岁月中奋力撑持、高举孙中山的旗帜,捍卫了孙中山的事业。她对孙中山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赋予了孙中山的精神遗产以新的内涵,使孙中山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仍然起着作用……这种联接和贯通,能够使过去革命斗争的传统、经验和教训为当前革命所吸收,并使更高层次的革命斗争能够比较顺畅地获得广泛的认同。在宋庆龄的巨大影响和感召下,许多仁人志士从孙中山的旗帜下出发,走进了新的革命行列,跨入了新的革命时期。”这些论文于1993年结集成《宋庆龄论》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宋庆龄对于孙中山的影响不仅仅是在她与孙中山并肩战斗的10年,她是用她的一生去捍卫孙中山的思想和革命原则。新中国成立之初,宋庆龄曾经在多个场合多次讲到:新中国成立了,使得孙中山的理想结出了美丽的花朵和丰硕果实。这个果实“比想象当中还要美丽”。但是,到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的时候,在筹备纪念活动之时,宋庆龄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建议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孙中山资料整理和研究机构。她认为这是一份历史的遗产,对研究新中国的历史,研究我们民族发展的历史是有帮助。她希望有一个常设的机构,整理和系统地出版孙中山的著作,同时“应该搞一些电影等影视节目,

以教育后人”。为什么写这样的一封信？在短短的5至6年时间里，宋庆龄可能发现了什么问题。宋庆龄必须强调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孙中山仍然存在，他的思想仍然有生命力。上世纪50年代，宋庆龄相继写了很多篇文章，介绍孙中山与列宁的联系，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联系，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直到1966年“文革”已经开始，她仍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在演说中她总结了孙中山留给我们的很多精神遗产——孙中山对革命的不懈的热忱，他对人民的亲近的感情，他不断地前进的与时俱进的精神。对于孙中山思想和革命原则的守护，宋庆龄是第一人。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又活了56年时间。在这56年里，她是孙中山思想事业忠诚的守护者。在“文革”中，孙中山被诬为“牛鬼蛇神”，“四人帮”同时向宋庆龄射出暗箭，对她与孙中山的婚姻说三道四。宋庆龄一生当中从没有像在“文革”时期那样，坚决捍卫自己与孙中山的婚姻的合法性。她在给友人的许多信件中，着重谈自己50年前与孙中山结合的情况，痛斥那些散布谣言的人是“有罪”的，表达了对孙中山的深情。这不仅仅是维护一桩婚姻，这是在维护孙中山的旗帜。

宋庆龄对孙中山思想事业的继承、捍卫和发展，成为宋庆龄研究者非常关注和着力研究的重要课题。大家确认，研究孙中山，尤其是他的最后十年，不可不研究宋庆龄；研究宋庆龄，更是不可不研究孙中山。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研究孙中山的专家学者加入了宋庆龄研究的行列，大大推动和深化了宋庆龄研究。

在整个90年代以至宋庆龄诞辰110周年的十多年时间，宋庆龄研究得到长足的发展。宋庆龄的研究者们，特别是上海的有关部门——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单位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为了抢救“活的”历史资料，他们动员力量访问了不少当时还健在的宋庆龄的同事、友人和亲属，——这些“口述历史”资料的收集，对宋庆龄研究的深化大有帮助。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等等单位在扎扎实实做好博物馆本身职能要求的工作的同时，对研究工作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不同的时期，他们陆陆续续召开了不同专题的研讨会，提出了

不少研究的新课题,并且把论文结集出版。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过。

此阶段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丰硕。据不完全统计,已出版有关专题论著、学术研讨论文集、图传、纪念集等逾70种,发表在各种报刊杂志的学术论文达六七百篇。

三

21世纪的到来,迎来了宋庆龄研究的新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禁区逐个解禁,国内外大量的档案资料逐步解密,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时空。而宋庆龄作为中国近现代先进人物的一员,她与近现代中国重大的、足以改变历史发展航向的事件关系又是如此之深切,对她的研究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宋庆龄研究已不仅仅是解决她“做了什么”和“为什么做”的问题,而是把她的所做所想放到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大潮中去,考察她如何站在先驱者的行列中,引导潮流,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并从中寻找出一些规律。由此,宋庆龄研究从“纪念史学”走向了学术研究的领域。

新世纪开始,宋庆龄研究呈现了很好的势头。蒋介石日记、蒋经国日记和宋子文档案等相继公布,为宋庆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新资料;近年来,国内包括港、台地区多次举办了关于宋美龄、宋子文及“宋氏家族”的学术研讨,为宋庆龄研究提供了新视野、新角度,推动着宋庆龄研究的拓展。2008年海南出版社出版的由海南省宋庆龄研究会、海南省宋耀如研究会编,周泉根著的《一九九二年以来宋庆龄研究文献长编》,集中反映了近年宋庆龄研究的喜人成果。更为可喜的是,经过30年的努力,各研究机构和学者们认识到必须携手合作,才能有力地推动宋庆龄研究向前发展。2009年4月,在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政府支持下,由目前国内仅有的两个宋庆龄研究会——上海和海南宋庆龄研究会,与目前国内唯一的宋耀如研究会联合举办了“宋耀如及其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

然而,宋庆龄研究的开展毕竟只有大约30年,所取得的成果与

宋庆龄对国家民族的贡献相比,还是很不相称的,许多问题的研究有待深入。如宋庆龄和国共两党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过程中,国共双方都离不开宋庆龄。当蒋介石需要同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时候,他通过宋子文找宋庆龄,让她把希望谈判的意愿传达给共产党;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时也要通过宋庆龄传达给国内外。中共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是通过宋庆龄联络1000多位国民党左派和爱国民主人士,联名以“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的名义来发表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宋子文他们通过宋庆龄向共产党请求不要杀蒋介石;而共产党方面,也及时把自己的意见通告宋庆龄。宋庆龄的斡旋对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很大作用。当时国共两党的沟通,都是以宋庆龄为桥梁,她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她的作用是多么的独特。但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呢?不甚了然。又如史料表明,宋庆龄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为共产国际工作,但她和共产国际是怎样的关系呢?也不甚明瞭。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作为国家领导人之一,她起了什么作用?对于中共的重大决策,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右”、“三面红旗”、对外政策以至“文革”,她有什么看法、想法和建言?她向人大、政协提过什么提案?什么提案被接纳了,什么意见没有被接受等等。可以说,对宋庆龄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地位与作用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这些问题的研究,与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研究,互为补充和促进。许多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等待资料的进一步解密。又,现在还有许多宋庆龄的函电分别收藏于各个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和个人手中未能公诸于世。即使是搜集材料这方面,空间也是非常广宽的,更遑论在大量收集、发掘、整理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历史研究。总之,宋庆龄研究现在是方兴未艾,任重而道远,前景美好,大有可为。

但在宋庆龄研究中,也存在学风浮躁,急于求成,资料封锁,东抄西拼和低水平重复的弊端,这是应该引起注意和纠正的。

在宋庆龄研究方面,上海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有着全国其他省市所不可比拟的优势。上海是宋庆龄出生、成长的故乡,是她和孙中山并肩战斗的根据地之一,是她为新中国奋斗的主要战场,也是她作

为新中国的重要领导者之一工作的地方。因此,上海留下了很多有关宋庆龄的遗迹、丰富的历史文物和文献资料,留下了由她开创的许多事业。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年上海已经打造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对宋庆龄充满感情的文物工作者和历史科学工作者相结合的队伍。他们在宋庆龄研究这片园地里默默地耕耘,扎扎实实地推动着宋庆龄研究向深入发展。应该说,关于宋庆龄研究的总体水平,上海是站在全国的前列的,他们所出的成果足以说明这一点。

我们有理由期待宋庆龄研究不久将有更丰硕的科研成果。

(作者为原中国文物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我家与宋庆龄的关系

[法] 高醇芳

当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的领导提议我动笔写一写宋庆龄与我们家的关系,并尽可能写成回忆录出版时,我很感动。的确,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我从小就特别珍惜宋庆龄和我父母的友情,经常听到父母谈起他们之间的交往,一直感到非常光荣。但我们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起我们家 and 宋庆龄的关系。一来是低调,二来也算是“保密”吧。

—

我母亲是英国北方约克郡人。我父亲高士愚在1934年去英国留学,就读于利兹大学纺织系和染料化学系。1936年秋,父亲在他海外求学时所参加的第一个舞会上,便碰到了我的母亲——金发碧眼、娇小玲珑的玛菊瑞。父亲对母亲一见钟情,在那天的舞会上一直与她跳舞,散会后还殷勤地开车送她回家。以后,父亲当然又对母亲紧追不放。

当时在英国没有多少中国人,利兹大学只有两个中国留学生。我外婆是一个很开通、很善良的人,说高士愚一个人远在异国一定很寂寞,便鼓励我母亲跟我父亲做朋友,一起出去跳舞、游玩。我父亲是很英俊的,风度翩翩,一番诚意终于赢得了我母亲的芳心。

父亲四年内学完了六年的课程,在获得毕业文凭后,于1938年9月3日,在利兹圣约翰教堂迎娶了母亲。当日,《约克郡晚报》以“一个中国学生的浪漫史”为标题特地作了报道。那时,对英国人来讲,去中国就像去月球,是一件遥远神秘的事,但母亲毫不迟疑地跟随父亲奔赴战火弥漫的中国。

这是一段漫长而充满艰辛和危险的旅程。我父母先坐船到法国马赛，继而乘上“盎特莱蓬”（Andre le Bon）法国邮船——邓小平赴法国勤工俭学也是乘坐这条船，在海上颠簸近一个月后，抵达越南海防。在海防，他们转乘火车到河内，在河内住宿一夜，再到边境城镇老街住一夜，然后乘火车去昆明。赴昆明的火车只有一节车厢，样子就像是用绳子捆绑起来的铁皮箱，开动起来时摇摇晃晃的，发出叽叽嘎嘎的声响，仿佛随时都会散架。蹒跚而行的火车外面，一边是陡壁，一边是深渊，两个火车头一拉一推，噗哧噗哧艰难地行走了一整天。在我父母抵达昆明的第二天，这条铁路就被日本飞机炸毁了。

我父母在昆明等了几天后，便乘坐邮件飞机来到了父亲的家乡重庆。在重庆，他们举行了中式婚礼，英国新娘规规矩矩地向公婆行了中国的磕头礼。父亲给母亲照重庆语音译了她的姓Scott，给她取了个寓意美丽善良的中文名字——高施嘉德。

我父亲一家在重庆也算名门望族。祖父高秀山，字志敏，原籍北京通县，有蒙古族血统，是重庆商会主席。他在林森路48号开设“美趣时”染料香水商行，在沙坪坝修建了“高家花园”，建造了纺织厂。祖母童云仙，来自重庆瓷器口童家桥，生有十七个子女。

重庆自1938年2月起遭受日军残酷大轰炸。日机疯狂投掷燃烧弹和炸弹，人口稠密的重庆市陷入烈焰浓烟之中，到处血肉横飞，惨不忍睹。祖父出资创建了重庆救火会，在日寇炸弹烧城时灭火拯救居民。他也为家族店员修筑了防空洞，与市民公共防空隧道相通。一次，日军轰炸，把市民防空隧道的东水门洞口炸塌了，人们在烟雾弥漫之中无法出洞，非常恐慌。我父亲立即打开了通往高家防空洞的栅门，维持秩序，让受难市民一个一个从我家的洞口疏散出去。救人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约有两千多人得救。第二天许多人都来磕头感谢救命之恩，而我父亲则说这完全是应该的，不必谢。

在轰炸中，高家住宅曾三次被炸弹击中。其中一次炸弹掉在高家防空洞洞口附近，把母亲的左耳给震聋了。

战争中有许多孤儿。宋美龄组织援救收养孤儿的活动，我母亲一到重庆后就积极参加。

1942年秋天，祖父去世。临终前，我母亲一直握着他的手，直到他呼吸停止。祖父的葬礼也许是当时重庆最大的葬礼。出殡那天，送葬队伍浩浩荡荡的，有两千多人，开路的就是救火会的二十四大马。我母亲也跟所有的中国家属一样披麻戴孝，手中还拿着一根哭丧棒。由于她是逝者的大儿媳妇，高家众多的女眷就由她这位蓝眼、高鼻、金发的英国大嫂带领牵灵。这一“奇观”给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她非常钦佩这位英国媳妇，很快就把我母亲介绍给了宋庆龄。

二

我母亲第一次去宋府参加保卫中国同盟理事会会议时，在座的还有重庆市长贺耀祖夫人倪裴君等几位理事。宋庆龄热情地欢迎了我母亲。从此我母亲和父亲就成了保盟的中坚分子。

宋庆龄把自己的家都奉献出来了。她家的底层就是保盟的办公室，经常举办理事会议。保盟致力筹集资金，购买、制作衣鞋物品供给前方的士兵以及后方的孤儿贫户。募捐工作采取多种方式：找银行企业捐款、举办慈善捐款舞会、音乐舞蹈表演会、收集捐献物资等。

我母亲奔走于银行企业之中，筹集了许多捐款。她还广泛发动在渝的外籍夫人，特别是国际妇女俱乐部（INTERNATIONAL WOMEN'S CLUB）的成员为保盟出力。我姐姐的干妈张训恭夫人，以及后来也成为我干妈的翟克恭夫人（日本人），也积极参加了募捐活动。

我父母的家在祖父创办的“美趣时”商行二楼，宋庆龄也常去那里商议交谈。宋庆龄每次来我父母家，外面都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我父亲也关照他的小弟妹们要乖乖地站好，不要乱走动。

因为父母家位于市中心，比较宽敞，大家来去也比较方便，所以当保盟收到布料等物品后，均由我母亲发送给大家做军鞋棉衣等，再集中在我家，由我母亲负责运送到宋庆龄家。我母亲也亲手织毛衣，做衣服，还让家里保姆帮着一起做。有一次宋庆龄收到了美国人捐赠的许多毡帽，心灵手巧的中国妇女就把它改做成非常暖和的毡鞋送给军队士兵。

保盟也组织音乐文艺表演会筹款。英国留学的钢琴家李翠贞、舞

蹈家戴爱莲、歌唱家Lola Chang（张训恭夫人）都曾献上自己的艺术，参加义演。1945年5月18日，宋庆龄在新建成的胜利大厦举办大型筹款舞会，重庆很多中外显要人士都参加了。我母亲依然是主要负责人。那天，我父母还表演了拿手的探戈舞等。商震将军和他夫人非常喜欢他们优美的舞姿，拜我父母为师。

宋庆龄没有子女，但非常喜欢儿童，也非常看重友情。她跟我母亲说，你的子女都是我的干女儿、干儿子。1945年2月17日，我二姐在重庆出生，取名醇莉，有“胜利”之意。我父母在无锡同乡会馆设满月洗礼酒宴，邀请了二百多人。宋庆龄亲自出席祝贺，在来宾册上签了名。那天，贺耀祖市长和夫人光临了，干爹杭立武赠送了小金手镯，基督教牧师也来了。我母亲一向热情照顾来访重庆的英国皇家空军青年士兵，为他们做蛋糕庆祝生日，带他们到处游览，他们非常喜欢这位同胞大嫂。庆祝生日那天，他们出动了自已的乐队，带上提琴和各种铜管乐器，甚至还把他们军营里的钢琴都扛来了，热闹了一番。

宣布抗战胜利那天，我父母正好在看完蒂娜·德彬主演的好莱坞电影后回家的路上，眼见全城沸腾，欢庆胜利。回到“美趣时”的家时，大家都在大堂里等着他俩，桌子上摆着整整一碗茅台酒。我母亲想起她的诺言：抗战胜利那天，一定要喝一碗茅台来庆祝。她高兴地径直走向桌子，举起碗欢呼：胜利！干杯！一口气喝完，然后马上就醉倒在地，昏睡过去。这是她一生中唯一喝醉的一次，是为中国人抗战胜利而干杯。

三

1946年4月，我父母带着五岁的醇英和一岁多一点的醇莉，由英国军事办事处出面帮忙买到机票，经印度加尔各答飞往英国。父亲购买了整整一个毛纺厂的机器，海运到上海。8月，他们坐船两周，抵达加拿大蒙特利尔，再坐火车去美国纽约。在加拿大，父亲遇见了来自纽约的舒自清。舒很大方地把自己的住房和汽车钥匙交给父亲，让我家人住在他家。在纽约，我父亲购买了毛纺机器需要的小马达、BUICK汽车以及一些家具，运到上海。

巧得很，由美国三藩市开往上海的轮船仍然是“盎特莱蓬”号法国邮船。此船战时改成军用船只，战后又恢复民用。在船上，醇英和醇莉都得到了生日蛋糕，她俩都是2月17日出生的，只是差了五年。

到上海后，我父母一家住进了江苏路237弄17号的英国式花园洋房。父亲在杨树浦建造了民治毛纺厂，安装了英国的机器和美国的马达。他是中国毛纺工业的先驱者。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回到上海，保盟亦改称中国福利基金会。我父母从国外抵沪定居后，宋庆龄还亲自光临江苏路我家问候，表示欢迎。于是，我母亲立即又投入基金会的活动。

1947年11月10日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成立，以及1948年11月20日基金会举办儿童福利舞会时，我母亲均任联合主席。基金会也组织大型义卖会、义演会来筹款。有些美国朋友捐赠了许多西式童装进行义卖，我母亲说我小时候的衣服都是在义卖会上购买的。基金会设有儿童福利站，为贫苦儿童提供豆浆等营养食品，教书识字，在医疗药品、儿童福利、文化艺术教育等众多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宋庆龄甚至还把她母亲的房子奉献出来，开办了托儿所。

后来我的英国外婆也到了上海。1948年春天宋庆龄特地请了我们一家三代人到她靖江路家（今桃江路45号——编者）做客。宋庆龄和我外婆、母亲、两个姐姐一起在花园里散步，还让三岁的醇莉坐在石像上玩，我父亲照了几张相片。这是宋庆龄居住靖江路别墅时仅存的相片，也是宋庆龄与我们一家三代人唯一的照片。宋庆龄一直把照片珍藏在她的相册里。

1949年春，宋庆龄组织“三毛乐园会”筹集捐款。我母亲带着宋庆龄的信函奔走于银行企业之间。大多数银行公司都很配合，承诺每月固定捐献一定数量的银元。尤其是美国、英国和其他欧洲银行，都敬仰宋庆龄，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纺织工业界的募捐也没什么问题，因为我父亲是毛纺企业家，在业界有很多朋友，大家都热心捐款。但有一些中国银行不予理会。会员都发有一个张乐平设计的别致的纪念徽章。我母亲筹集到许多捐款，宋庆龄在庆祝会上特地赠送给她一个竹刻笔盒，以示感谢。

1949年5月,上海政局动荡。我父亲携全家坐飞机去了香港。我们在鲁宾孙路安家。父亲的事业做得很好,妈妈也很喜欢香港。1950年,宋庆龄给我父母去信,说中国政局稳定了,热情洋溢地邀请他们回上海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父母欣然接受了,带领全家又回到了上海。

四

我母亲很注重孩子的文化教育。我们都学了钢琴、芭蕾舞。当时有些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舞蹈艺术家教授芭蕾舞,我大姐醇英学得非常好。醇英有音乐舞蹈天才,又有灵气,加上专心刻苦,后来成为上海芭蕾舞台上第一主角。1955年2月,她才14岁,表演《天鹅湖》中的白天鹅独舞,荣获了上海市中等以上学校文艺会演一等奖。她是会演中唯一的芭蕾舞演员。后来她的表演作为优秀节目,代表上海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群众文艺观摩演出。那年5月,她在中南海怀仁堂表演了这段世界名作白天鹅独舞,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赞赏和热情祝贺。她是中国舞台上第一只“白天鹅”。

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成立,来上海招生。醇英非常高兴地去投考,但学校体检查出她肺部有钙化点,没有录取,她很伤心。第二年夏天,她带了X光片和医生出具的没有任何健康问题的证明来到北京,再次去舞蹈学校报考,但学校还是没有接受她。我母亲感觉很不公平。她从未向宋庆龄请求过任何帮助,这次为了女儿的事业,她特地给宋庆龄写了封信,请她帮助。宋庆龄跟舞蹈学校的校长戴爱莲联系后,学校同意醇英作为自费试读生,插班到三年级学习。1957年,这位舞校唯一的自费“试读生”,成为在中国上演的第一个世界经典法国芭蕾舞剧《无益的谨慎》的女主角。1958年,北京舞蹈学校首届学生毕业演出世界名作《天鹅湖》,醇英担任女主角,同时演“白天鹅”和“黑天鹅”。她漂亮的舞姿还登上了明信片。醇英也是中国第一个跳顶级难度的《唐·吉珂德》双人舞的芭蕾舞演员,和舞伴吴捷棣一起,1961年参加了全国独舞双人舞汇演。作为压台戏,她成熟优美的动作和轻巧灵敏的旋转赢得了观众的热烈喝彩。在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下,醇英又辉煌地在台上飞速地用脚尖转了一大圈。这一次,她的精

湛演出震撼了瑞典皇家芭蕾舞团，使他们甘拜下风，不敢再对中国舞蹈演员傲气。醇英为年轻的中国芭蕾舞事业大大增光。如果没有宋庆龄的亲切关怀，中国就会少了一位杰出的芭蕾舞艺术家。为了此事，我母亲心里一直非常感激宋庆龄。

宋庆龄非常珍重友情。她每年都要给我父母寄圣诞卡祝贺新年，也给我母亲写了很多信。每次信封上都注明“confidential”（密件），可惜在“文革”中都给烧毁了，只剩下一张1958年她用两张宋画印刷品制成的贺年片。她也送给我母亲一些非常雅致的荣宝斋木刻水印信笺。

五

我家跟宋庆龄的珍贵照片都被红卫兵抄走烧毁了，现在留下的几张，也是多亏了我大姐。1966年破“四旧”时，她把照相簿大胆地藏到她丈夫王庚尧的父母家。庚尧父亲是工人，母亲瘫痪在床，住在北京后海附近德胜门内大街蒋养房羊房胡同16号的清贫小屋，不会遭到抄家，比较保险。

“文革”大大地伤害了我母亲，她实在不明白“文革”是怎么回事。她一直那么热爱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战时就同中国人民同甘共苦，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她充满爱心，什么坏事都没做过，却遭到红卫兵的侮辱唾沫，每天都在恐惧中挣扎。她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力气，把橱柜推到二楼卧室门后面，防止红卫兵砸门冲进来。我母亲实在受不了侮辱，多次跑到派出所，请求拘留她，以躲过红卫兵的迫害。但警察不肯拘留她，让她回去。父亲工厂的造反派还算手下留情，没有把我们扫地出门，留下了二楼整个一层给我们居住。不久抢房席卷上海，连红卫兵贴的封条都被抢房人撕掉。我们一楼客厅、餐厅被隔成四小间，住进了四家新婚的夫妇；进门房间住进一对夫妻；汽车间被改造成二层楼小房，由房地产造反派的头头一家占领。父亲在工厂扫地，经常挨斗挨打，没有工资，只有每月十二元的生活费。幸亏有父母在香港的好友和旧属每月汇款来。我则被分配到星火织布厂做挡车工。

许多朋友都被迫害致死，有跳楼的、上吊的、开煤气的……到处乌

云密布,毫无希望。我们跟宋庆龄的联系也中断了。但我们一直很想念她。1970年,我和母亲到了北京。我母亲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和贺年卡。我母亲知道宋庆龄喜欢喝茶,叫我亲手给宋庆龄做了一个很别致的英国人常用的暖茶壶套,以寄思念之心。暖壶套上面是一个漂亮的梳着辫子的娃娃头,穿着大红色绸子上衣,下面我缝上了一个粉红色织锦缎长裙,里面有棉花夹层保暖用。我顶着寒风将它送到后海北沿46号宋庆龄的家中。宋庆龄的寓所外没有门牌号,也没有警卫。我刚一按门铃,门就开了。我跟警卫员解释,那是送给宋庆龄主席的东西。警卫员没说什么,收下了。

过几天,我小时候一个朋友张万申从巴黎回到上海,我就马上赶回上海跟他见面。那天是12月25日,正好是圣诞节,晚上,万申来我家,父亲也在。有一位神秘的不速之客,戴着大口罩,悄悄地上楼找我们。他是宋庆龄的秘书杜述周,给我们带来了一盒大蛋糕,说是宋庆龄送给我们过节享用。那是一个精致的蛋白柠檬蛋糕。自1966年“文革”开始后我们就再没见过这样的蛋糕。我们非常感动。在这最艰难的日子,宋庆龄还不怕危险,特地请人给我家送蛋糕过圣诞节!在打倒一切、消灭宗教的“文革”的黑夜中,她还想到母亲是基督教徒,圣诞节是如何重要,惦记着老朋友,以蛋糕表示深厚情意。当时不用说圣诞节不能提,连吃蛋糕也是“丑恶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会遭受严厉批判的。

70年代开始,公安局能让东南亚归侨出国探亲了。我们也壮胆提出出国探亲申请。“文革”中有“海外关系”是很危险的,父亲被扣上了许多“帽子”:里通外国、间谍、卖国贼……没有谁敢提出出国的要求,这会招致很大的罪名。费了许多周折,我们终于收到了我小姨妈从英国寄来的信,说是想见我母亲。我们才得以此为理由申请出国探亲。

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我母亲在1953年加入中国籍,是第一批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外国人,由周恩来总理签字。我虽然很小,但我还记得陪我母亲到上海市政府某个部门去领回了国籍证。由于是中国籍,所以要通过公安局申请中国护照。

每次我们偷偷地跑到长宁区公安局询问催促，母亲都紧张得脸通红，血压高极了。我搀她慢慢回来后，她就病倒在床上好几天。我们走投无路，就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请她帮忙，以使我们能获准离境。

宋庆龄虽然当时自己也处境困难，但她马上给机要秘书写了一封信，阐述了从抗战以来我父母的情况，以及与她的紧密联系和友情。她甚至觉得是她把我父母请回中国，结果如此遭殃，还不能回英国探亲，她很难过，觉得很抱歉。所以一定要帮助我母亲。母亲原本也是英国人，应该能与子女一起回国探亲。宋庆龄给上海公安局写了信函。但当我们提到这封宝贵的信函时，公安人员却冷漠地说：“北京是北京，上海是上海。”

六

一拖两年过去了，丝毫没有进展。1973年，我们得到宋庆龄的邀请，去她上海淮海中路府上用茶点。那是3月18日，风和日丽。我和母亲穿戴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在江苏路自家弄堂斜对面坐上44路公共汽车，到华山路淮海路下车，过马路到达淮海中路1843号。我们一到，门就打开了，警卫员请我们进去。我们非常激动，静悄悄地慢步走向房子正门。

一进门，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高高挂在大堂正中墙上的我亲手制作送给宋庆龄的挂历。这是我用硬纸板糊上金色绸底，下面左边贴了一个放炮仗的年画式的男娃，右边一个笑嘻嘻捂着耳朵看放炮仗的女娃，中间一个大红爆竹，丝丝烟火往上，烟雾团中爆出“新年快乐”这些字。这个“手工艺品”下面挂着一个日历。我顿时很感动，也很高兴。没想到宋庆龄那么喜欢我做的挂历，还把它放在家里那么重要的位置。

工作人员把我们引向会客厅。宋庆龄笑容满面地在门口迎接我们，亲切地拥抱我和妈妈。我们都非常激动。她是那么的美丽慈祥。我给宋庆龄赠送了一条我亲手做的真丝双绉白围巾，上面用彩色丝绸贴绣了一个跳芭蕾舞的小姑娘，是我二姐在《白毛女》芭蕾舞剧中出

演的形象：左腿挺立在脚尖上，右腿前曲举着，两手一上一下，头上两个小鬃髻，斜着头笑嘻嘻的，很活泼可爱。她非常高兴地表示谢意。她跟我们说英语，关心地问到我父亲、姐弟。她请工作人员为我们准备了精致的西式糕点，英国式的奶茶。问到我们申请出国的进展时，我如实告诉她：“公安局说，北京是北京，上海是上海。”她很平静地“噢”了一声，没说什么。

她也问起戴爱莲的近况。我说，我去北京郊区五七干校看我大姐时，碰到了她。她给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在那儿养猪。宋庆龄若有所思地“噢”了一声，久久未语。对于当时的情况，老朋友的不幸遭遇，她心里是非常沉痛的。过了不久，戴爱莲就被“解放”了。我在宋庆龄主办的《中国建设》杂志上看到有关戴爱莲的介绍文章。她是最早被“解放”的“牛鬼蛇神”，我想这或许跟宋庆龄的直接关怀有关。

宋庆龄给我准备了一盒礼物，用嫩绿皱纸精心地包装好，系上粉红丝带。回家打开看，是一盒美国的杏仁巧克力夹心糖果，粉红色的圆铁盒上面写着：ALMOND ORCA, AMERICA'S FINEST CONFECTION, 是Brown Halley 品牌的。这是非常珍贵的礼物。那时中国与海外完全隔绝，根本没有“美帝国主义”的食品。这盒糖果的盒盖有点给压扁了，一定是经过许多周折，有人送给宋庆龄，她自己舍不得吃，又送给我们享用的。我一直都把盒子保留着，从上海带到香港，再到巴黎，最后回到上海，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代为保管。

快谈移晷，我们依依不舍地与宋庆龄告别。她送我们到门口，久久拥抱。我微笑中含着泪水……

这是我母亲最后一次见到宋庆龄。我真后悔当时没带照相机。当然那时候大家做事都非常小心谨慎，生怕越轨。在那种非常时期去见国家领导，不敢有太多“花样”。

回家后，我母亲跟我说：宋庆龄是非常讲义气的人，朋友的忙她一定会帮的。她说出的话是一定会做到的。她虽然没露声色，但她一定会让上海公安局给我们办理好出国护照。

果然不错，过了几个月，公安局就通知我们去领取护照。这回他们可客气多了，还说欢迎你们回上海。

我们马上给宋庆龄去信致谢。当宋庆龄得知我们即将离开中国，特地送给我们一本《中国建设》，是1973年11月那一期。封底印有一只精致的双面苏绣波斯白猫，一只蓝眼睛，一只黄眼睛，非常可爱。她在内页用英文写道：

真为你高兴，亲爱的玛菊瑞！我们的苏绣是多么奇妙！带上这只波斯猫来给你们旅途增添快活。

致以深爱

宋庆龄

1973年11月1日

1973年12月5日，母亲带着我和弟弟悄悄地离开了上海。走的那天，我们非常伤心，尤其是看着饱经苦难的慈祥的爸爸、亲爱的大姐，还有其他亲友，不知今后何时再能重逢，心酸得直掉泪。

坐了三十六个小时的火车后，我们到达广州过夜。第二天一早，母亲和弟弟用“生日快乐”的歌声伴我起床。我们坐火车到罗湖。边境森严壁垒，深圳河两边严严实实布满了高高的铁丝网，到处是荷枪实弹的边防军战士。我们战战兢兢地经过了海关的严密搜索，带着红帽子的搬运工推行李过无人区的深圳桥，没几步路就到了香港。我母亲的心给“文革”伤透了，此后就再也没有踏上这片国土。

七

1975年6月，我只身到达巴黎。宋庆龄一直给我们写亲笔信，寄送贺年片和《中国建设》杂志，连信封都是她自己亲笔写的。我知道她需要美国的露本斯坦黑色染发水，可当时在香港只有瑞芙珑一个品牌。她皮肤过敏，只能使用露本斯坦制品。我在巴黎看到此牌的染发水，非常高兴，马上给她买了。但是，怎么送给她？这可是个大问题。那时化妆品根本不能通过邮寄进口到中国。正好我碰到一对年轻夫妇要到北京使馆去工作，我就托他们把染发水带到北京。可是我姐姐醇英胆子很小，根本不敢见任何外国人，更不用说是外交人员了，查起来没完。我不想给她增添麻烦，就请朋友跟宋庆龄的友人中村夫人联系，因为她是有名的“国际友人”，可以跟外国人接触。

然后再请她跟我姐姐联系，转交给她。我姐姐到中村那儿取到了染发水以后，就马上给宋庆龄去了信。宋庆龄很高兴，而且完全信任我们高家的人，想请姐姐帮她染发。我姐姐心想，国母的头可不敢碰，太宝贵，这责任太大，而且她也不知怎么用染发水，从来没有用过。因此就照实告诉宋庆龄她不会，最好还是请专业的人帮忙。后来就比较容易了，可以寄送。我也一直给宋庆龄提供染发水。一次，妈妈在香港的报纸上看到有一篇报道，说是一些香港知名女士有幸见到了宋庆龄，看到她高龄但还是一头乌发，非常钦佩。妈妈很高兴地笑着跟我说：“她们不知道是我女儿的功劳呢！”我也很自豪。

我在巴黎国际大学城碰到一位艺术爱好者和他的著名越南画家朋友。他们非常喜欢我的国画，就自告奋勇地帮我联系展厅。在法国外交部和教育部的赞助，以及法国国家亚洲艺术集美博物馆专家和索邦大学学法语的德国同学及其丈夫等热心朋友的帮助下，1977年4月，我在巴黎第一次举办了我的国画展览。宋庆龄闻讯后非常高兴，来信写道：

我非常亲爱的迪娜：

最热烈地祝贺你成功的画展。我多么想能在那儿亲自看看你的艺术作品！

尤兰达二十岁，在这里上芭蕾舞学校。简尼特十八岁，进了外语学院学英语……你会觉得她们很有趣。也许有一天你会回来，教她们绘画。她们会很喜欢你的！

……

致以深爱的问候。

你的

宋庆龄阿姨

我把印有我一幅水墨山水画的请柬寄给了宋庆龄。她非常高兴，给我来信写道：

最亲爱的迪娜：

……你的画作极富于艺术性。我要把你的有“中国传统国画”的画卡配上镜框，因为这真是非常美丽迷人的。

宋庆龄后来还给我寄送了一张印有国画花卉的美国出版的小贺卡,建议我也把我的国画印制成贺卡发行:

最亲爱的迪娜:

这也是你应该做的!人们买来作为贺卡,而且可以看到你的中国山水等绘画。

爱自

宋庆龄阿姨

宋庆龄还非常关心我大姐,在来信中写道:“希望马丽亚能和她家人去看望她父母。她应该不久就会获准出国。”

1977年8月,大姐一家出国申请批准了。宋庆龄邀请她和丈夫王庚尧、八岁的儿子尧尧到她府上做客,设午宴为他们饯行。王庚尧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主要演员,舞剧《鱼美人》的第一男主角,陈爱莲的舞伴,曾荣获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章。宋庆龄很开心,放起舞曲音乐,请庚尧跟她的秘书张珏跳个交际舞。大家在一起乐融融的,她完全把他们当作亲人一样,谈笑风生。那一顿难忘的饯行午餐非常丰盛可口,摆满了一大桌。最难忘的是那道“琵琶大虾”,这在当时是很难吃到佳肴。宋庆龄拿出许多礼物送给姐姐带走留作纪念。其中有一个高贵精致美丽的晚宴小手提包,是许多小块镜子用金丝线镶绣在丝绒上。她也让姐姐给妈妈和我各带了一个这样的印度晚宴手提包,还送给我们五条漂亮的真丝围巾。一条是蓝色织花的长围巾,一条是印有上海南京路水彩画的漂亮的乔其纱方围巾,一条印度黑色镶织金色小花硬沙长围巾,一条白色的同样的围巾,还有一条浅蓝色方巾。他们临走时,宋庆龄还亲自拿了几个好大好大的苹果给小王劲带着。

我很想为宋庆龄效劳,问她需要什么东西,她却只想到她的朋友。来信说:

由于有一些外国客人来看我,他们都喜欢“法国配制的芥末”和这儿供应的热狗(香肠)。所以如果方便的话,请寄给我两三罐上面说的芥末,世界上最好的芥末。

最近有一位老太太,韦尔西·费西尔,98岁,从纽约飞来看我。

当我问她想吃什么，她的回答是“皮蛋”和“热狗”！但她告诉我，后者“必须佐以法国配制的芥末”。她现在已经走了，但还会有其他美国客人来看我。所以，你是否能速寄一些给我……

我就坐车到市中心的一家食品店，挑选了四罐不同品种的芥末酱，马上给她寄了去。

1978年3月13日，我收到她非常客气的来信：

我最亲爱的迪娜：

百万分感谢你那么迅速就办好了我请你办的事。我刚打开了你航空寄来的两罐美味法国芥末，觉得真是鲜美好吃。当我收到你慷慨给我的另外两罐平邮时，我会告诉你我最喜欢哪一种。

她还很风趣地写道：“我们刚开完人大会议。极端疲劳，而且那强烈的弧光灯照得我脸都肿了，现在我的脸就像一个庞肿的熟透了的红番茄！”

宋庆龄一直念念不忘支持鼓励我画国画。她告诉我：

如果有值得寄给你的画，我会给你的。在上海家里，我有一本画得非常漂亮的古代花卉画册，有一天你会收到的，只要能可靠的人带来给你。我很爱看这些画，知道你也一定会很欣赏这本画册，因为你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看到她夸奖我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我非常感动。有什么能比这更珍贵的呢？

1978年4月7日，她又给我写信聊天：

最亲爱的迪娜：

我很高兴告诉你，刚收到那另外两罐芥末，我们今晚就品尝。那么多的美国朋友到达这儿。昨天“迪克西军使团”到了。二次大战时，他们常驻延安。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其中大部分人是“美国南方人”，即从南方各州来的美国人。他们最喜欢吃烤肉，把猪放在深地坑里烧烤，特别好吃。不知道我们这些“生手”是否能做出这种烤肉来请他们。

上个月我们的人大召开，有四千名代表出席。我参加了所有的会议，甚至还参加了两次在晚间举行的讨论会。所以我觉得筋疲力尽

了。走廊很长，走起来很累，所以年长的代表们都坐轮椅！不过，我坚持住了，而让一位年轻姑娘简尼特（我的“受保护人”）用她的有力的手臂搀扶着我。她很机灵，只要一见到有摄影记者对准我们照相，她就迅速的抽回她的手臂，这样看起来好象我自己在走，没有人搀扶！

你在电视里看到我们了吗？在美国和英国的朋友写信告诉我他们看了整个过程。

今年是我帮助建立的中国福利会成立四十周年，因此我可能六月份得到上海去参加庆祝活动。我会让你知道我什么时候离开。

谨此望你身体健康，不要工作太辛苦。

心爱的，感激感谢 来自

宋阿姨

宋庆龄给我来信或者寄杂志的信封都是她亲笔写的，而且还特别有心地挑选了一些好看的她喜欢的纪念邮票贴上。如：徐悲鸿的骏马、齐白石的虾和菜蔬、长城及其他中国名胜古迹和风景、动画片孙悟空选图、民间艺术如风筝等。1979年9月4日，她给我寄来了两张邮票，一张是“人物夔凤帛画”，一张是“人物驭龙帛画”，都是长沙楚墓出土画。她生怕邮票会压坏，很仔细地把邮票装在纸袋里夹在印有可爱的小天使的贺卡中。她写道：

最亲爱的迪娜：

附上一套新邮票，我想你会觉得很有意思。

她也很关心我的终身大事，信中问我：“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成为‘夫人’了？”

还告诉我：

这些日子我们非常非常忙，游客来自四面八方，由于现在我们与美国之间关系正常化了。

深爱你的，

孙阿姨

我于1978年5月在巴黎举办第二次画展，8月到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山中的温泉小镇举办画展，1979年6月和10月在巴黎又举办了国画

展览。想到宋庆龄那么想来看我的画展，我都特地带上了她送给我的黑丝绒金线镶绣小玻璃镜的美丽的晚宴手提包参加开幕式，让她老人家开开心心，让我感到她就在我的身边，非常温暖。

1979年9月14日，宋庆龄病刚好些，就给我写了一封非常亲切感人的信祝贺我：

我非常亲爱的迪娜：

我因患气管炎卧床一个多月，所以没能早些写信告诉你，我为你在巴黎的成功有多么的高兴！我心里一直是想着你的，亲爱的，可爱的迪娜！

那封信是挂号寄来的，里面有一张二十五美元的支票，用回形针别在信纸上。她写道：

你帮了我那么多的忙，尽管你在经济上还不能自足，而我又因现在的处境对你不能有任何帮助。为此我深感遗憾。我非常想送给你一本美丽的古代画册。当我找到一位可靠的人去你那儿，我要把画册赠送给你。现在画册跟我的心爱的珍贵物品一起，锁存在上海。前几天，一位老朋友寄给我一张支票，买书用的。我现在转给你使用，想到你送给我各种物品。我还在享用着你慷慨惠赠的那么多的法国芥末。我也平邮给你最近一期的中国文学，我想你会喜欢阅读和赏看里面的一些图画。

我非常感动。我能寄送给她芥末酱和染发水，是很开心的，是我的心意。这些很小的礼物，她还那么念念不忘，一定要表示她的衷心的感谢，还为我的破费感到过意不去。她力不从心，感到非常遗憾。那时国内人没有外汇外币，连国家副主席也不例外。宋庆龄收到这张从美国加州寄来的支票，就转送给我。支票正面兑现人名字是“Madame Soong Ching Ling”，反面她用蓝色钢笔写上：“Soong Ching Ling to Deanna Gao”。

我捧着这张支票，都愣了。国母的爱心似海，太伟大了。我当然一辈子不会去银行兑现这张支票。这是无价之宝，我一直都珍藏着。想到有些人当了领导，只想人家向他“进贡”，觉得理所当然，而宋庆龄那么高的地位，我们又那么亲近，她都没觉得帮她办事是理所当然

的,总是不停地向我致谢。

宋庆龄也非常爱护她身边的两个年轻姑娘隋永清(Yolande尤兰达)、隋永洁(Jeanette简尼特),经常在信中提到她们。此信中她写道:

你和你亲爱的母亲来看我时,我的两个年轻姑娘,姐妹俩,正好不在家。她们在我这儿14年了。尤兰达现在22岁了,在我们的电影厂工作。她的妹妹简尼特18岁,得到奖学金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预科学习。她非常想家,因为小姑娘觉得很难适应那儿的习俗和环境,再加上她不喜欢西方食品很受罪。我想起码要有六个月的时间她才能习惯她的新生活。她们都是可爱的女孩子。希望她们回来后都能为人民服务。尤兰达虽然还在北京,但有人让她跟好莱坞签合同。可我希望她留在这儿当我们人民的演员,无论如何。

致以我最热情的问候和许多爱。千万注意你的身体,迪娜!

深爱你的,

宋庆龄阿姨

我为宋庆龄画了一幅国画赠送给她。她好高兴,非常喜欢,1979年12月15日给我写信:

我最亲爱的迪娜:

十分欣赏你珍贵的作品,由衷感谢你。作品是如此精美,显示出你作为画家的少见的才华。

前几天,我给你寄了一本挂历。希望你能欣赏到我们国家的风景。

她还想着要送给我一些法国买不到的中国食品过圣诞节用:

一位老太太朋友将去巴黎,所以我要请她给你带些中国罐头过圣诞节用。她叫劳拉·马苟丽丝·江布冷夫人,1942年抗日战争期间她是战争救助工作者。虽然年纪很大,她仍然在纽约、巴黎和以色列之间来回旅行。她白发苍苍,相当健康。

可惜我没有得到这位美国老太太的任何消息。

宋庆龄的染发水用完了,就非常客气地问我:

亲爱的迪娜:请你是否能空邮寄给我一些海伦娜·露本丝坦黑色染发剂,叫作“快速染发”香波?这是唯一的一种不会引起我头皮搔痒的染发剂!我急需一些。非常感谢!

她非常喜欢中国民间艺术,尤其是剪纸,给我寄过许多次,各种各样的。有上海剪纸、扬州剪纸、南通剪纸、熊猫剪纸,等等。她信中说:

这儿我给你寄些民间剪纸,外国人都狂热喜欢。你可以自己留用或者送给朋友一些。

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圣诞快乐,新年好!

最好的爱 来自

宋庆龄阿姨

宋庆龄也非常喜欢中国烹调。她想到在国外不容易吃到美味的中国菜,就给我寄来了一套上海国际饭店编辑的京菜谱,印有鲜美菜肴的彩色照片,让我可以如法炮制,或者起码可以“望图止饥”。看,有北京烤鸭(这可是学不会的)、德州扒鸡(每次坐火车到北京路上一定要抢着买的)、干烤鱼翅、生焖对虾、醋椒桂鱼、松子黄鱼、糟溜鱼片、糟溜三白,等等。

当然绘画方面,她更是到处留意,给我寄来了许多图片。当时没有任何中文版的国画、古画,也刚开始对外出版。她找到一些,如:英文版的《中国文学》出的“中国传统绘画”,有齐白石、徐悲鸿、吴作人、刘海粟、李可染、李苦禅、黄永玉、萧淑芳、唐云、程十发、林风眠等画家的画作。1979年的日文版《人民中国》杂志出的“中国名画”,封面是南宋陈居中的工笔绢画《四羊图》,十二个月分别为:明朝边景昭的“竹鹤图”、张路的“望月图”、仇英的“桃源仙境图”、徐渭的“牡丹蕉石图”、蓝瑛的“雲林秋霁”、清朝朱耷的山水画、原济的“竹菊秀石图”、李禅的花卉、李方膺的“籀石图”、袁江的“骊山避暑图”、吴昌硕的“梅花图”、现代徐悲鸿的“雄鸡图”,还有清朝虚谷的“松鹤图”。她也寄给我1979年第10期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封面上是李可染的“春牛图”;中有“中国女画家作品选”,分别是何香凝、王叔晖、萧淑芳、胡絮青、郁风、陈佩秋、俞致贞、冯忠莲、周思聪、吴青霞、周练霞、常沙娜、权正环、蒋采苹、吴玉梅、张迪平的国画。这之前,她给我寄了三张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出的1978年袖珍年历片,都画着漂亮可爱的不同民族女娃娃,一张画着小白猫的小年历片。

八

1980年2月,我第一次回国。宋庆龄非常高兴,2月8日给我写信:
最亲爱的迪娜:

我昨天想跟你通话但是电话没打通,所以就给我上海家里打电话,让他们去告诉你,请你一到北京就马上给我打个电话,以便我们约个时间见面。我的私人电话是444205。我的房子没有门牌号码,很难找。所以我会派我的汽车去接你来。请告诉我的秘书艾琳·张,让我知道你什么时候来最方便。别忘了把你的地址告诉她!

致以给你的许多爱,

宋阿姨

她还在同一天给李燕娥及周和康的信中特地关照:

如有电话,请通知江苏路的高第娜女士,请她到了北京后,打个电话给秘书张珏同志,以便派车接她来寓。谢谢!她刚从法国来,不熟悉我这里的方地方。

我七年没回上海,于是就在上海待了整整三个星期。我非常想早些见到我亲爱的宋伯母,她也等得很心焦。2月28日,她来信说:

我亲爱的迪娜:

好像你还在上海!我们把你的要求已经给有关部门去函让你看古画,但尚无答复。目前这宫殿仍然不对外开放,因为有窃贼事件,我们从别的部门得知。(保密)。

我热切地盼望见你,所以请回复你什么时候到北京!

顺致许多爱。

你的慈爱的,

宋庆龄

可惜我已经离开了上海,没有收到这封信。而在2005年我回上海时,原先住在我们三楼的十一婶婶王珏的妹妹王赫把这封保存了四分之一一个世纪的信给了我。我这才看到了宋庆龄在二十五年前给我写的信。

我在3月1日晚上坐软卧离开上海,3月2日到达北京,住在东城

区新中街我父亲的堂弟高士良家。我一到就马上给宋庆龄打了电话。她请我第二天就去府上去见她，共进午餐。

3月3日，阳光煦丽。宋府派了宋庆龄的吉姆车来我叔叔家接我。十一点准时到了她家，汽车一直开到寓所门口。宋庆龄已在一楼会客厅等着，我们久别重逢，高兴得不得了，热情拥抱。

客厅很宽敞，墙上正中端重的孙中山椭圆形肖像赋予客厅一种特别的肃穆气氛。像下高桌上布满了各式各样的贺年卡，琳琅满目，中间放着一小盆粉红色花卉。一套藤沙发椅前面有一张玻璃面的藤矮桌。房间各处还摆着一些盆花，很好看。

宋庆龄穿了一身中式衣裤，上身是深蓝色的，带黑色盘纽，黑绸长裤，一双很普通的黑色方口塑料底布鞋。她非常美丽慈祥高雅。她请我坐在她旁边，用上海话非常亲切地和我交谈，询问家人近况。我拿出一本我大姐和姐夫在香港办的中西舞蹈学校演出的节目单送给她，她仔仔细细地逐页翻阅，直夸奖，非常开心。她非常亲密地挽着我的手一起照了相。

她给我介绍了从小在她身边长大的隋永清。她非常疼爱永清。永清略抹淡彩口红，短卷发，美丽大方，很精神。她当了电影演员，很简单。

我也给了宋庆龄一张我在巴黎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拍的一幅国画的照片，请她转交给廖梦醒。那是在博物馆研究中国古画藏品时，发现有一幅画旁边有她父亲廖仲恺的题字，觉得很珍贵，就拍下了照片，准备有机会送给她留念。

她问我在北京希望参观哪些地方。我说，我最希望能看到的是故宫收藏的古画。我的恩师鲍亚暉说，学画要“眼馋手勤”，要多看古画，多看好画来熏陶自己。我1976年曾在大英博物馆中国绘画馆整整泡了一个月，馆长还把库藏的珍品拿出来，陪着我看。根据规定，只有馆长才能碰这些画。我从早到晚天天看，有时还临摹。在巴黎我也把集美博物馆的古画，包括敦煌的画，都看遍了，也临摹了一些。我当时正在研究文征明的画，吴门画派，很想能多看到些原画。她说她一定帮我的忙。她是最喜欢我画国画了。

饭菜准备好了，工作人员请我们入座。餐厅就在旁边。一张不大的长方桌上铺着一块白色的钩花台布，上面盖着玻璃板。宋庆龄请我多吃菜，还亲自用筷子把干烧大对虾放进我饭碗。

饭后，我们继续欢聊。宋庆龄很喜欢我的连衣裙。她说她有点发福，请我替她设计一件上装，使她显得瘦些。我很高兴，一口答应。我想送她一双法国皮鞋。为了让我知道她的脚的大小，她把她脚上穿的鞋脱了下来，让我穿着试试。我把脚穿进她的鞋，比较松，有些大。所以我知道要替她买大我一码的，36码的差不多。

我离开之前，宋庆龄和我跟全体工作人员照相，可惜照虚了。

老太太应该去午休了，便依依不舍地跟我拥抱道别，说希望能过两天再见到我。她还很周到地请永清带我去花园走走，请她第二天陪我到友谊商店买东西，并安排自己的汽车司机跟永清一起来接我。

我在北京的那几天，宋庆龄几乎天天给我写信，给我送礼物或画片，请秘书送到我叔叔家。我见她后第二天，3月4日，她请秘书给我送来一支派克金笔，盒装的，还带有两个墨水添加管，信中说：

最亲爱的迪娜：

请接受这支笔作为你访问北京的纪念。我知道它会对你在你的工作中很有用。

这几天我得主持一些会议（当主席），所以恐怕我不能抽出很多时间同亲爱的你在一起。但如果我找到时间，我就一定会设法接你来这儿。

昨天我把你的信和照片送去给辛西娅·廖，我希望能很快把她的感谢信转交给你，如果她可以坐起来写字的话。

带上我对你和你亲爱的全家人最热忱的爱。

宋庆龄阿姨

她还特地附加了一句：“你去参观故宫了吗？”

那时故宫博物馆不对外开放，更不用说书画馆了。我很幸运，有宋庆龄的帮助，能进故宫博物馆，还有书画专家指点。我先到办公室，拜见著名书画鉴定泰斗徐邦达先生。办公室很简陋，但徐老很热情，很客气。他带我去看画，我饱享了眼福。因为我对文征明的作品感兴

趣,他就拿出了两幅画“考”我辨真伪。我自己画国画,对笔触墨色还是比较敏感的,居然一下子说对了。徐先生非常高兴,想不到法国来的“外国小姑娘”还有些专业眼光。他又拿出了两幅署名“石涛”的画,一真一伪让我辨别。嘿,我又说对了。他高兴极了,还请我过几天到他家做客,继续研究文征明书画艺术。他住在小石桥胡同11号,四合院,住处不大,堆满了书籍书画、笔墨纸砚文房四宝。

宋庆龄深深热爱中国自己的艺术,自己的文化。她非常喜欢国画,支持我画国画,想尽办法使我能有古画临摹。3月5日那天,秘书给我送来了一个宋庆龄3月4日写的大信封,里面有她从日文版《中国杂志》中取下的一页,内页印有一幅南宋李嵩的工笔花篮花卉,还有一张信纸,信中写道:

最亲爱的迪娜:

请保留内页的图画。我想你可以像这张画一样画一张。

致以爱

宋庆龄阿姨

3月7日,她为我母亲和大姐准备了一些北京稀有的糖果食品,给我来信说:

最亲爱的迪娜:

终于寄来了廖梦醒感谢你好心的信件。这些天我工作忙得不得了,有许多我不能缺席的会议,而你9号就必须回去,恐怕我不会再有见你和与你聚谈的巨大欢乐了!请向你的家庭转达我最热情的问候,向你母亲和马丽亚带去许多爱。我为马丽亚同她有才华的丈夫创办舞蹈学校的卓越成绩倍感骄傲。

希望我为你写给博物馆领导的信能有预期效果,你最终看到了你所希望看的吗?我会留意好看的图画供你作画用。

请你能否把这些美国枣带给你亲爱的母亲,把巧克力带给亲爱的马丽亚,以表我的心意和爱。

你的法国朋友和学生蓬赛夫人明天下午将出席妇女联欢会。希望你能抽空来一下,哪怕是几分钟也好,因为这以后总是留有美好的回忆。

致以对你的许多爱。亲爱的迪娜

你的慈爱的
宋庆龄

秘书张珏也给我来条说：

高醇芳小姐：

你如有工夫，想参加明日下午三时的“三八”节茶话会，请在明上午十一时前到灯市口全国妇联国际联络部找杜学明同志，要请柬，凭柬入大会会场。

请持本条前往妇联。

致

敬礼

张珏

一九八零年三月七日

她还在信封上注明：“注意 请柬如拿到，不可转让。仅限你本人用。”

能够再见到宋庆龄，我非常高兴。她那么深情慈爱地邀请我，我很感动，心里感觉好温暖。我当然不会把请柬转给别人的。

那天下午雨下个不停。我住的居民区里根本没有出租车，我又不能骑自行车到人大大会堂。我在门口公用电话处打电话找出租车，但老是占线，怎么也打不通。好不容易拨通了，等车子来接我送到人大大会堂，已经迟到了半个多小时。我匆匆进入会场，开门见山地问警卫员宋庆龄主席在哪儿。他当然有点吃惊，我说我是宋主席请来的客人，他就把我带到宋庆龄坐的那张圆桌子。宋庆龄看到我来了，非常高兴，亲亲我。我跟她说，很对不起，我迟到了，因为找不到出租车。她热情地把我介绍给各位来宾，有各国大使夫人等，还给我剥桔子，给我拿蛋糕，要请我入座。我看见旁边警卫员好像脸有难色，可能是预先不知道我来，没有安排。我就谢谢她说：“Aunty，不用麻烦，我先到那边去，一会儿再来看你。”她很舍不得，非常关心地问我：

“有人送你回家吗？”

我说没有。她就说：

“好，我送你回去。”

秘书就跟我约定，等文艺表演一结束就来宋庆龄这儿，一起走，送我回去。

宴会厅摆满了圆桌，有五千妇女参加大会。秘书陪我去找座位。我看中了237号桌，因为我们在上海住在江苏路237弄。稍微品尝了一些点心后，我就背了我的照相机去照相。那天有儿童们的精彩表演，可爱极了。宋庆龄非常喜欢。她身边有那么多多的贵宾，我不愿打扰她，就远远地给她照了相。我也拍了一些儿童演出的照片。

表演刚一结束，秘书就来接我。他走得好快，我紧紧跟着。宋庆龄见我，好高兴，亲切地挽着我的手臂，满面笑容，一起走出去。她的护理搀扶着她的右臂。新华社记者都围上来照相。看我长得完全是外国人的样子，觉得很奇怪突然：这位跟宋庆龄那么亲热的外国女孩子是谁？他们问我是那个代表团的，以便报道。因为那时，能来中国的外国人，一般都是参加代表团的。我很客气地说，我没有什么代表团。

来宾从北门出去，我们和宋庆龄坐电梯走，要从另外一个门出去。我跟秘书说，我的黑小羊羔皮大衣存放在北门进口处。他说他们负责去取。

途中，秘书跟宋庆龄说，要接见一个加拿大代表团。宋庆龄用上海话说她“吃力来”，想早点回去休息。秘书说，已经答应他们，安排好了，不太好推脱。宋庆龄就不说什么，一直挽着我的手，一起进入一个会客厅。

在等加拿大代表团到来时，宋庆龄请我坐在她旁边的沙发椅上，跟我亲切交谈。她把她胸前戴的一朵粉红色的绢花摘了下来，递给我，说：

“今天过节，人家送给我这朵玫瑰花。迪娜，你像花一样，我送给你留作纪念。”

这朵美丽的玫瑰花，凝聚了她多少爱心。

接见完代表团以后，我挽宋庆龄走出人大大会堂。她上了第一辆红旗轿车，前面有国旗，我上了第二辆红旗轿车。前面有警卫队摩托车

人字形排列开道，很威严。车里很宽敞，脚下铺着厚厚的北京刻花地毯。有三排座，我进车时后面已经坐了两个人。他们听到我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北京话，很惊异。我们愉快地交谈。

红旗轿车缓缓开进后海宋庆龄官邸。我们都下了车。宋庆龄和我亲切拥抱道别，依依不舍。她已经很累了，需要好好休息。我想到这就要跟亲爱的宋伯母分手了，眼睛不禁湿润了。

我换乘了她的吉姆车，车子一直送我到东城区新兴里高士良叔叔家。

后来，我在巴黎收到她的挂号信，信封背面是硬纸板，里面是两张照片，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信笺”包着。宋庆龄为我精心地挑选了这两张照片留作纪念，一张是她左手挽着我，右手挽着专门扶持她的护理人员，胸前戴着一朵绢花，满脸笑容；另一张是在会客厅里，我俩坐在沙发椅上，后面站着三位秘书和护理人员，她和我开心地亲切交谈，绢花在我的手上。我非常感动。她真是非常细心，想得非常周到。这两张照片不但是美好时光的珍贵的纪念，也是史实记载：这朵美丽的粉红色玫瑰绢花是她赠送给我的，有照片为证。

回到巴黎以后，我继续给宋庆龄提供染发水。我很自豪，国母那么信任我，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一头乌发，完全是由我保证的。我非常保密，没有人知道。我曾请了我在巴黎认识的英国朋友，后来负责故宫讲解器制作的名叫丹尼尔的小伙子，还有在巴黎开中餐馆和旅行社的老朋友托尼陶先生，把染发水带到北京。醇英姐姐已经离开北京，我就请朋友跟我堂叔高士良、婶婶武素芹，和堂妹高蓓莉联系，交给他们，然后由他们负责转交给宋庆龄。每次都是杜秘书去士良叔叔家去取。他们家住在五楼，秘书爬楼爬得好辛苦，气喘吁吁，但他总是笑呵呵地说：这是锻炼身体。

九

那年6月2日我结婚。想到宋庆龄对我慈爱的祝愿，我在市政府和饭店的婚礼上，都带了她送给我的漂亮的小手提包，让她老人家高兴高兴，也借此感觉她在我身边。在家拍结婚纪念照时，我也特地用

上了她给我的手提包。

12月，我收到了宋庆龄的贺年卡，12月7日寄出的。这次她就遵照西方人的习惯，在信封上和卡上写的都是我新婚丈夫的名字：PATRICK DE BUC先生和夫人。面上印有艺术照片，蓝底，几枝白梅盛开。内页印有金色隶书体“恭贺新禧”，右下角“宋庆龄”。中间她用绿色粗钢笔写着：

致帕特立克·德·布克先生暨夫人：

祝愿你们1981年一切最美好！

过了两周，我又收到了她的贺年片，同样的贺年片。我心想，老太太已经给我寄过一张贺年卡了，是否忘了。她那么喜欢我，生怕我没收到她的贺卡，就再寄了一张。

那年12月，我母亲也收到了两张贺年片。我们当时都没发现为什么她给我们寄出两张贺年片。过了几年以后，有记者来我家，我把我珍藏的这两张贺卡拿出来，一念给他听，我就明白了。宋庆龄在第二张卡上写着：

祝愿帕特立克·德·布克先生和夫人

1981年及以后年年一切最美好！

慈爱的

宋庆龄

宋庆龄是在1981年5月29日去世的。她在给我们寄出第一张贺年片后，感觉自己生命可能已经接近尽头，过不了1981年，恐怕再也不能给我们寄贺年片了，就提前向我们贺年，让我们1981年以后每年都有她的祝愿。我念到那儿，呜咽了，流泪了。她的爱心似海，为朋友小辈想得那么周到，太伟大了。

1981年5月，我到了北京。法国外交官马腾先生非常好，招待我住在他家里。他跟我说，宋庆龄病重。我马上跟秘书联系好，第二天一早就去探望宋庆龄。我想献给她一些鲜花，但当时北京根本没有花店。我到处找，好不容易买到了一束鲜花，赶到她家中。

秘书领我上了二楼。我轻轻地走进了卧室。宋庆龄躺在大床上，床前有许多医疗器具，周围有不少医务人员。看见她那么虚弱，我很

心酸。我让工作人员把鲜花献给她，并在耳边告诉她，高醇芳从法国来看望她，代表高家，送鲜花给她。她虽然说话已经非常困难，还说谢谢，谢谢我来看望她，谢谢我的鲜花。我静静地站着注视着她，心酸得泪水盈眶，好久好久，只愿在她身旁久久地待着。每一秒钟都是珍贵的。我问医务人员她是否能早日康复，他们没言语。医生要护理她了。我不得不离开。我强忍泪水，向她告别。这是永诀啊……

我一出卧房，就止不住哭泣了。秘书安慰我，还请我在寓所用午餐。我实在太伤心，不想吃饭，就谢谢了他们的好意，走下楼梯。正好有一位先生走上楼梯。原来是廖承志来看望她。他瘦多了，我一下子没认出来。

外面阴雨连绵，天亦伤心，陪我流泪。

5月22日，我离开北京之前，到宋庆龄寓所告别。宋庆龄已经昏迷，正在安睡，不便打扰。我心中默默跟她道别，沉重离去。

5月29日，我从广州到达香港。宋庆龄在晚上八点十八分逝世。6月2日，在香港跑马地的新华社香港分社设了奠堂，隆重悼念宋庆龄名誉主席。灵堂正中悬挂着宋庆龄遗像，上面黑纱横幅，前面一排常青树，四周摆满了花圈。四千五百多名人士前来沉痛哀悼宋主席，排队缓步进堂，一一在遗像前鞠躬默哀。香港总督麦里爵士，美国、法国、日本等所有国家的总领事，犹太富商卡道理爵士都前来吊唁，鞠躬致哀。

我和母亲，还有一位曾在上海洋行工作过，也曾经见过宋庆龄的外国朋友Vera女士，在下午四点到达奠堂。门口工作人员问我们的身份，我就回答说：宋庆龄主席的好朋友。我非常怀念宋庆龄，身上也带了照片，这样人家也能相信。

我们怀着非常悲痛的心情，向宋庆龄遗像深深地三鞠躬。我难过得哭泣。我母亲和朋友也伤心得直流泪。当我们将要离开时，记者都围过来了。整整一天，他们还没有遇到过认识宋主席的人。记者提了很多问题，比如，怎么认识宋主席的，等等。我们简述了宋庆龄抗战时期在重庆的保卫中国同盟，抗战胜利后到上海改称为宋庆龄福利基金会的一些活动贡献，她的慈爱之心，跟我们的深厚友谊，对我们的亲切关怀，等等。《南华早报》的记者问我：“您跟宋庆龄主席有过亲密接

触，您对宋庆龄主席的评价如何？”我脱口而出：“她人好极了，是一位优秀的伟大的贵夫人。”（She was wonderful, a wonderful greay lady.）

第二天，《南华早报》报道吊唁宋庆龄主席文章的大标题就是“悼念‘伟大的优秀的贵夫人’”，引用了我的话。我有所安慰，能以此肺腑之声纪念宋庆龄，献给她在天之灵。以后一般都把lady翻译成“女性”，我觉得不太确切，lady一词有更深含义，不同于woman简单女性一词。

许多年以后，我家老朋友王若驹偶然跟上海裱画大师严银龙提到我们和宋庆龄的密切关系。严师傅为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就跟领导说起了我们，引起了注意。2004年，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陆柳莺馆长来到巴黎。我把我珍藏的宋庆龄的照片、信件、贺卡、杂志、礼物等文物给她看了。她非常珍惜，如获至宝。陆馆长提议在上海举办一个展览。我想到宋庆龄生前一直非常想看我的国画展览，也喜欢我教国画，就提议也把我和我法国学生的国画带到上海去，在她故居开个展览献给她，让她高兴高兴，实现她的遗愿。陆馆长非常支持。在秦量主任大力支持下，展览马上就立项了，并得到了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陈兆丰局长的关注和支持。纪念馆派了麦灵芝和小蒋来巴黎帮助我整理资料，一一照相登记。

2005年5月，我捧着这些珍贵的信件文物，由我的两个儿子和两个朋友帮忙，把所有的画作带上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上海，筹备展览。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带我儿子一起去陵园敬拜宋庆龄。

我敬献了大花篮，带孩子在墓前三鞠躬，轻轻地说：“最亲爱的伯母，我来看你了，迪娜来看你了。我好想你。我永远想念你。”她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我泪水夺眶而出。

2005年10月27日，展览在上海宋庆龄故居隆重开幕。恭献给宋庆龄伯母在天之灵。

最亲爱的宋庆龄伯母，您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档案选编

Selected Archival Materials

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藏宋庆龄致黎照寰夫妇函

【编者按】黎照寰，字曜生，1888年出生于广东南海，曾在孙中山身边工作，1930年至1944年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将交大致信西斋提供给宋庆龄作“国民伤兵医院”之用。“文革”中遭受迫害，于1968年9月16日去世。

2001年，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从黎照寰亲友手中征集到宋庆龄致黎照寰及其夫人蔡慕莲函。2009年5月，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室与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达成编译出版工作协议，由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负责提供这批信函，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室负责编译，并在《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专刊创刊号上公开发表。具体负责信函翻译者为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人员王志鲜和朱玖琳。全部文稿由宋庆龄亲友、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访问学者宋曹珺璇女士及其丈夫宋仲虎先生校译。由朱玖琳负责考释。

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宋庆龄致黎照寰夫妇函75封，大多为手写体，其中21封有具体日期，4封缺页。此录74封。未录一封无日期，系正患严重眼疾的宋庆龄为尽快回复黎照寰所托而在病中草就，由于字迹过于模糊无法识别故未录。所录识别不清者以×××注明，考证所得日期均以括号标明。编排以年代为序，自第46封信始因无具体日期故以原档案号为序。

1. (1952年) 8月30日

亲爱的黎博士:

在我即将北上的最后时刻,我要向你和多萝西^[1]道别。附上一些蜂皇浆片,是朋友给我的,我发现对增强人的能量和体力很有好处,相信一定对你也有帮助的。

同时,对我的离开请为我保密。我×××并感觉很疲劳,所以请原谅我就写这些。

顺致对你俩的亲切问候,请珍重。

你们的
宋庆龄
8月30日

2. 1956年2月28日

亲爱的黎博士:

多谢你的来信,这三封来信是昨天送达我的。因为访问三国之行使我身心俱疲,所以政协会议一闭幕,我就开始卧床了,而且医生嘱咐我要躺在床上。他们希望我能够恢复体力,完全休息,所以不允许我会见任何客人和朋友而影响休息,不允许发信。结果,我甚至在新年也因神经痛而卧床。这栋房子里没有了任何节庆活动,因为为我工作了六年的厨师因中风瘫痪也入院了,他不能再工作了。我曾有机会去上海过新年,但由于我身体状况不好而无法成行,尽管有许多急需我回去办理的事务。我只好派我的警卫去急办这些事务。

不知为什么李妈^[2]那么晚才把200元钱寄给你,我11月份离开北京之前就将钱寄给李妈了。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听说你为了换钱把所有的东西都变卖了,你的古董只换来微不足道的钱。这是我为老朋友

[1] 即黎照寰的妻子蔡慕莲。

[2] 即李燕娥(1912—1981),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928年到宋庆龄身边当保姆,陪伴宋庆龄度过了整整53个春秋。

能做的最起码的事了，也恰好我自己并不需要这些钱。

关于你或那位苏联朋友的问题，我现在还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回复。但是，有一点可以告诉你，毫无疑问孙博士是因肝癌去世的，这是已经通过解剖充分证明的。协和医院曾作过分析报告，这个报告令所有的同志信服，包括孙科。所以那种臆测是不可能的。德国医生克里当时也在场。而段祺瑞和他的下属都是些无赖，他们竭力要加重他的病痛，他们没能毒死他。你可能回忆起他发病时是在日本，（我们）正在经天津回家的路上。

我听说林国才^[1]去香港竭力劝说他母亲不要去檀香山，但是我由于生病而没法跟他谈谈。我不知道孙科博士或他的孩子们有回来的打算。廖夫人^[2]告诉我，我的一个弟弟在香港，她打算写信让他回来。我还知道莫里斯·科恩^[3]现在在这里，实际上他等着见我，已等了三个半月了。但是，我还不能见任何人，尽管我是愿意和他谈谈，并愿意从他那里听到所有的消息。

在国外的50天里，我每天要参加8到9个盛大集会，因此，你可以想见，我是多么的疲劳。一俟我的状况好点后，我马上又要有另一趟出访。你将可以在电影上看到我的这次旅行，因为与我们随行的有两位摄影师。我有6本多关于此次出访的相册，回来时我会带着，但是天晓得要到什么时候了，因为我又要出国，而且（即将召开的）人大以及其他事项要求我待在这里。

请代我问候多萝西。向你们俩致以良好祝愿，祝你们一切顺利。

向你们俩致以良好祝愿。

宋庆龄

1956年2月28日

[1] 林国才，广东人，已故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其父林介眉早年加入同盟会，跟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其家族与孙中山家族过往密切，他称宋庆龄为婆婆。

[2] 即廖仲恺夫人何香凝。

[3] 莫里斯·科恩（1889—1970），英籍犹太人，中文名马坤，曾任孙中山侍卫长兼副官。1955年10月应邀来华出席中国大使馆的招待会。

3. (1956年)7月17日

亲爱的黎博士：

多谢转来露丝^[1]送的巧克力以及朱尼尔精致的照片和照片上她的3个已经长大的女儿。朱尼尔已经有了三个女儿，这真是让我吃惊。在我的印象中，好像还是看到在波莫那^[2]时，朱尼尔预备好要上学的样子。我认为人不会觉得自己在变老，虽然有（身体）疼痛的警告。

请告诉我菲比是谁？她是你的干女儿吗，还是露丝的表妹，还是什么人？她要在这里待多长时间？我希望我的×××好一些后，哪一天见见她。

今年夏天很难捱，明年夏天还活着的话，我要到其他地方去，因为上海对我来说太潮湿，太热。

露丝有高血压吗？如果没的话，我想给她寄些很好的人参，是金日成同志送给我的。由于上述病痛，根据医生的意见，我晓得你和我都是不能用这个东西的。

天气转凉点时再给我写信，我好安排见见菲比等人。

向你和多萝西致以亲切的问候。

宋庆龄

7月17日

4. 1956年10月31日

亲爱的黎博士：

如你所知道的，我是用英语思考的，因此，写作时我不会去考虑中文翻译会是什么样的。在我的纪念文章^[3]中我曾经提到，孙博士对华侨和其他人士提出的口号（为宣传革命）“勿敬朝廷”，然后我又提到，他喜欢“事实胜于虚荣”。我不知道如何翻译成准确的汉语原文，因为

[1] 即陈乙明之妻陈黄露丝。陈乙明（1895—1976），祖籍广东河源，香港注册会计师。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工业合作社会计师。后曾帮助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2] 美国加州城市。

[3] 即宋庆龄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于1956年11月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一文。

我不记得他的原话了。你能不能现在就帮我考虑一下这两个句子的最简短又最准确的翻译,请立刻告诉我,因为我要把它发电报到北京。如果你不能马上就送来给我,请电话告诉我,我可立即另外派人。

还有一事,我在报上看到,你对一个记者说,孙博士以前每天工作八小时。也许在孙博士生病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他通常是从早上八点开始工作直到夜里十一点,而且他也从来没有时间安排午睡。他总是专心于工作、写作、会见国民党员,或者埋首于阅读和绘制地图。一年到头最多有一次可以花一个小时和人下一次棋。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

谢谢。

你诚挚的

宋庆龄

1956年10月31日

5. (1956年)11月20日

亲爱的黎博士:

关于两个委员会的人选,譬如谁更适合这项工作,我没有什么可以说的。至于王昆仑,那里的最高领导认为,他一向是“孙科的人”,也许他正是因此而被选中的。没有任何人同我商量过任何事情,实际上在我离开北京时,我并不知道他们已经决定要纪念孙博士的90周年。

叶恭绰是孙博士的好朋友,孙博士非常喜欢并尊敬他。我认为可以请他撰写孙中山画传。孙博士和我都非常欣赏他优美的书法。很遗憾他身体不好,不能更多地参与到目前的工作中来。

许多北京的朋友在我这里,我即使胃不舒服也要再过去为他们安排一下晚餐。

致以良好的祝愿。

你永远的

宋庆龄

11月20日

6. 1956年11月23日

亲爱的黎博士：

我的时间全被占用了，因为众多杂志向我约稿，尽管我还远未从疲劳中恢复过来。我刚刚完成为《新观察》写的文章^[1]，这篇文章正在翻译。

谢谢你给我看你的广播稿，在此我还给你。关于研究所，我已经给周总理寄了一份备忘录^[2]，建议建立革命史研究所，包括研究孙博士的著作和活动。我们需要有组织的和有系统的研究，而不是毫无计划的。这样一个机构可以担任编著全部中国革命史的工作，同时可以一些简短的专册、调查资料、专题论文等。这种工作不仅可以保存我们的革命遗训，在国际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孙博士的无私和刚毅造就了一个历史上罕见的动人的事迹。我再一次建议，要请一位最好的编剧编制一部关于他的电影，以使孙逸仙的故事得以再现。一些与他共事的人还有健在的，他们可以为搜集有关孙博士一生中各种阶段的个性和气质的资料提供巨大的帮助。

在得到北京的同意之前，请不要向人提起此事。

我不同意保留孙博士从未居住过的地方，有些人正在这么做。环龙路63号我们只住了几个月，所以没有必要把它接管过来，请告诉柯庆施^[3]，但环龙路44号是我们的办公处，所以接管过来是有用的。

但是我不明白你所提的关于香山路7号的引起误解和错误的报道。对此，我没听到过什么，如果你能写清楚你要说的内容的话，我将不胜感激。

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你忠诚的

宋庆龄

1956年11月23日

[1] 1956年12月，宋庆龄在《新观察》第23期发表《漫谈新闻与历史》一文。

[2] 1956年11月27日，宋庆龄致函周恩来，所谈关于孙中山的内容与致黎照寰函大致相同。

[3] 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

7. 1956年11月

亲爱的黎博士:

我一辈子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疲倦,那么多的长途电话、电报打来,要求我做这做那,或为报社和杂志社写这写那……我现在被神经紧张和失眠所折磨,照这样下去,我肯定要折寿的。从国外回来后,我就没有休息过。我的脑子始终是醒着的。结果,我患上了头疼,白天晚上终日不断,由于紧张的生活,我的牙龈都肿了。

我恳求你,告诉那些询问关于我与孙博士共同生活情况的人,我不能接受他们的要求,因为每当我试图去回忆我和孙博士在一起的日子,我的伤口就被撕开。为这个原因,我不打算参与任何类似的纪念会议。每当人家纪念这样的日子,我却是在经历痛苦。等我疲倦稍缓解点,我会试着找找我在广州脱险后不久所写的旧文^[1],并给你寄上。

你的这首诗一定会受到上海的报纸或杂志的欢迎的。《中国建设》^[2]杂志来信告诉我,他们收到这类周年纪念的短文,已在为此忙不过来了。尽管这样,假如你愿意试试看将它寄给他们,以下为他们的地址:

北京东四区东黄城根甲40号

中国建设社

我还担心,11月12日有4000人去参观我们的旧居,会对那所房子造成损坏的。这样做是不明智的,应该只允许每个代表团的少数领导进入。烦请将此意见带去,引起他们的注意。

你诚挚的

宋庆龄

8. 1957年2月10日

亲爱的黎博士:

我咳嗽咳得非常厉害,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医生担心如果我现

[1] 1922年6月,宋庆龄广州脱险回到上海后,撰文《粤变纪实》(又名《广州蒙难记》、《广州脱险》),发表于6月28日和29日的上海《民国日报》。

[2] 对外宣传刊物,现名《今日中国》,由宋庆龄于1951年创办。

在去北方的话可能会患肺炎，所以我必须推迟行程直到严重的支气管炎好转。其间，我正忙于准备14日的文章，所以请原谅我无法进行任何其他阅读。这里有些人也许可以向你提供有用的建议，其中之一是金仲华^[1]。

致以良好的祝愿。

你忠诚的

宋庆龄

1957年2月10日

9. 1957年4月22日

亲爱的朋友们：

非常感谢送来美丽的百合花花篮。我昨天早上才起的床，因为刘少奇同志要来看望我^[2]，而且因为将有客人自国外来，我要做些准备。卧床整整三个礼拜后，我现在还是站不稳当。现在神经痛不那么厉害了，休息和放松应该可以助我解除病痛。

我还要感谢你送来露丝所赠的包和围巾，露丝的视力一定是退化得很快，我发现那个包上尽是霉斑，包里还有两根牙签和糖果残渣，而且包里重要的小镜子也掉了。不过，请不要对她提起这些。我只是想她能来让如张福星^[3]医生这样能干的眼科医生给看看，以他的能力给露丝看眼睛是没有问题的。

顺致良好的祝愿。

你们永远的

宋庆龄

1957年4月22日

[1] 时为上海市副市长，兼任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2] 据王光美回忆，是日，刘少奇在欢送伏罗希洛夫去杭州后，偕同夫人王光美特地来看望宋庆龄。在交谈中，宋庆龄提出希望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刘少奇、周恩来亲自到上海，向宋庆龄转达党中央讨论的意见——“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

[3] 张福星（1902—1975），福建厦门人，时任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其家人当年曾在孙中山遇险时不避风险将孙藏在家里的地窖内，为此宋庆龄非常感激张家，与张及张的子女一直保持着往来。

10. 1957年5月18日

亲爱的黎博士：

此前，广州中山大学一位名陈锡祺者，撰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革命活动》。

他的记载中有一些与事实不符，其中说孙博士和我是在1914年结婚的。陈将此材料来源归因于你处。因为给出正确的时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所以我要告诉你，孙博士和我是在1915年10月25日结的婚。这一事实在东京市政厅有记录。此外，还有朱卓文^[1]和他的女儿朱慕菲女士作为我的见证人，孙博士的见证人有和田瑞（东京著名的大律师）博士和夫人、头山满先生和夫人和梅屋^[2]先生和夫人。10月下旬，朱先生和他的女儿陪我从上海去日本，两天后我结的婚。

孙科和他的家人知道，他的父亲和母亲是在那一年的4月离的婚，后来他的父亲通知他再婚之事。孙科可能还存有他父亲给他的信。

你非常诚挚的

宋庆龄

1957年5月18日

11. (1958年)6月25日

亲爱的黎博士：

听说你病了，我非常遗憾。也许有这些杂志陪伴，你不得已卧床的时光可以好过些。

我自己正集中精力从事与中福会20周年纪念相关的事务，听审报告，审议准备推出面向公众的文学作品。

82岁高龄的廖夫人^[3]非常活跃，令我自愧不如。她参观了工厂、与归国人士谈了话、观看了展览会。我腿上的关节炎令我痛苦不堪，

[1] 朱卓文（1875—1935），原名超，字卓文，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是孙中山的同乡和最早追随者之一，首批加入中华革命党，1935年被陈济棠捕杀。

[2] 即梅屋庄吉。

[3] 即廖仲恺夫人何香凝。

以至于我每走一步路都要付出努力才行。

上周有一天，廖夫人早上6点去了杭州，当天下午4点还去西湖荡舟！真是了不起，多么有活力的人啊！

相信你已收到中福会的纪念文集，祝你很快康复。

你非常诚挚的

宋庆龄

6月25日

12. 1958年9月4日

亲爱的黎博士：

想了好几天要给你写信，但是我的关节痛现在扩散到了我的手指，以至无法早些给你写这封信。我非常希望你现在感觉好点了。我觉得，你决定不动手术是明智的，因为有些中医疗法对治疗某些病还是蛮有疗效的。对这种毛病，也建议你多喝些果汁。

今年夏天对我来说也是最难捱的（一个夏天）。我没去任何度假地度假，本想这里的高温也许对我的关节炎有好处，但这看来是个错觉。我额头上的汗水就像瀑布一样往下淌，整天都是这样。可能是因为去年冬天我在莫斯科时，作了几次前额神经性皮炎斑疹的光照治疗。斑疹倒是减少了许多，但是难看的情况依旧。看来治疗还需时日。

正当我的同事和朋友在大跃进运动中作出许多成绩的时候，我却只能在家静坐养病。我连上下楼梯都不方便，因此就没有去视察那些工厂，而这件事是我本该在北上前就做的。顺便告诉你，北京的许多道路都在进行拓宽，许多房子要拆掉，包括我在那里的家今年冬天也要拆了。因此，我想我要住到城里的另一个地方了。北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改进，不久，它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美丽的首都之一。

一个朋友从苏州给我带了一些茉莉花等，我想你可以用来泡茶。但那些豌豆是给多萝西的，病人吃了不消化。最后，但

愿看到你身体健康起来，到秋天时，你的整个状况有极大的改善。

顺致良好的祝愿，愿你和多萝西保持健康。

你们永远的

宋庆龄

1958年9月4日

13. 1958年12月11日

亲爱的黎博士：

这是另外一期《中国建设》，希望你和多萝西能够喜欢。

祝愿你们身体健康。

你们永远的

宋庆龄

1958年12月11日

14. 1959年2月5日

亲爱的黎博士、多萝西：

多谢转来陈露丝的贺卡。新年假期里我给你家打了两次电话都没打通，听说你还没回家，我真的感觉很遗憾。

我自己也正在治疗心脏病，还是在1953年在华东医院发现这个毛病的，但我一直没当回事，直到最近回去后当我感觉不适时才去检查。两周前我左手腕受了伤，按摩师每天同石筱山医生一起来给我治疗，同时还为我治疗关节炎。但愿我们都能在即将到来的春天战胜我们的病痛。其他一切事情进展良好，令人乐观！

给你们送上我们最近一期的杂志^[1]。

[1] 即《中国建设》。

向你们俩致以良好的祝愿。

你们永远的

宋庆龄

1959年2月5日

15. 1959年11月7日

亲爱的多萝西：

你寄到我北京地址的信刚刚送达。获悉黎博士还在医院里，我非常遗憾。如果你给在香港的陈露丝写信，她也许会寄给他先前对他有效的那些药。由于我给在香港的老朋友去信都没有回音，我不再期望从香港得到什么东西了。即使是陈露丝，也好像极力要避免和这里的老朋友通信。但是，有人需要药品的话，她也许不至于不帮这个忙。

莉莉的祖母去世前写信给我和廖夫人，也要求取得让莉莉和她的家人去看望她的许可。我们试过了，但是都没有回音。以前，曾经有朋友两次托我帮助他们去香港几个月，可是都过去两年了，也没有一个人回来。因此，我没法怨主管部门不信任。

我不知道《中苏友好月刊》上有我的像，如果你那里有的话，请借给我一天。

在医院照顾黎博士的张惠芬医生和陈护士经常来看我。假如允许我出去访客的话，我会去看望黎博士的。我的关节炎加重了，所以我要重新开始每天的治疗。

给你送些蜜饯，要快点吃掉，因为天气潮湿，什么食品都放不住。

向你们俩顺致良好的祝愿。

你诚挚的

宋庆龄

1959年11月7日

16. 1960年12月3日

亲爱的多萝西:

感谢来信告诉我你喜欢那些螃蟹。我真希望黎博士能和我们分享。但是实话告诉你,我自己是不能吃螃蟹的,因为它会引起皮肤过敏。

关于黎博士希望访问苏联,我真的很抱歉,我无力帮助实现此事。只有党可以决定此事。廖承志是负责决定此事的人。因此,黎博士应该向他提出要求。

顺致对你和黎博士的良好祝愿。

你们诚挚的

宋庆龄

1960年12月3日

17. 1962年2月3日

亲爱的黎博士和多萝西:

多谢你们送给我装饰精美的漂亮的黄油和一罐我以前从未尝过的阿华田面包干。我回赠一些马湘先生送给我的柑橘,还有一些苹果、著名的云南普洱茶和一些黎博士非常喜欢的玫瑰猪油年糕。

我得了重感冒,咳得厉害,医生还不允许我出卧室,否则我会在假日期间来拜访你们。

在此我祝愿你们春节快乐,也祝愿我们再见时身体好一点。

爱你们的

宋庆龄

1962年2月3日

18. 1962年2月20日

亲爱的黎博士:

信中所附斯坦因曼的信让我有些吃惊。他的夫人是不是Tseng

Kai-hwei第二个妻子的女儿？我把它寄给你看，也许你会感兴趣。我还没有回信答复，因为看来这和我离得太远（指和我的关系）。请看完后还给我。

我听说人大可能推迟到下月15日左右才能召开。我希望你有足够的精力参加。如果医生认为这次旅行对你来说不是太艰苦的话，气候和环境的变化也许对你有好处。我回来后一直没有外出，因为我的关节很疼，甚至连手指关节都疼。医生说由于我容易发疹子，使用腮腺素可能对我并不好。他们想给我试试使用注射剂，但是先要看看人家注射后的情况。但是我还是很感激露丝考虑得很周到。

向你和多萝西顺致良好的祝愿

宋庆龄

1962年2月20日

又及：张福星医生（他夫人三个月前去世了）正在上海修养，住在沧州旅馆。

19. 1962年3月3日

亲爱的黎博士：

听说医生不允许你出院去参加这次的人大会议，我真是感到很遗憾，我认为这次会议将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会议。而且，环境的改变会使人精神振奋。虽然回来已经快两个月了，但是我只外出过一次，就是去看牙医。除此之外，我就是一直待在家里，大多数时间待在楼上，因为一下楼梯我就浑身关节疼。周围的人里，只有廖夫人不受上岁数的影响。她带着全家去了南京，她自己现在在杭州休养。以她85岁的（高）龄还可以到处旅行，这真是难得，而且她还乐于到处走走。我是多么希望能有她一半的活力啊，尽管我比她年轻许多！她女儿还在华东医院接受治疗，跟我差不多，不能到处走。

莉莉的丈夫艾伦·邓给我写信称，他打算去香港看望莉莉，莉莉得了心脏病。他自己身体看上去也很弱，现在不工作。我不知道他是

不是需要钱？因为他没有工作。他还告诉我，平^[1]是家中唯一一个待在香港的人，有一个儿子现在已经大到进大学的年龄了。我真不敢相信，好像只有几年的功夫，那时他还是个在我们这里跑来跑去的小男孩……时间过得真快！

你提到我的“职务”，你认为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可能担任什么职务。我没有能力再担任任何职务了，现在只能在房间里走走而已。

如你和多萝西需要北方的什么东西，请告诉我。向你们俩顺致亲切的问候。

永远的

宋庆龄

1962年3月3日

20. (1962年)6月30日

亲爱的黎博士：

廖仲恺夫人在一些妇联同志和她女儿的帮助下完成了她的回忆录。^[2]这对你有好处，既然这一主题这么涉及个人，你可以从她那里得到帮助，她记得关于陈^[3]谋反叛乱的每件事情。就我来说，我一直到16日早上才逃离观音山到弯弯曲曲的天桥底下的总统府，在总统府坚持了好几个小时，一直到下午4点。那天晚上，我和马湘、黄惠龙是在吴淞^[4]要塞司令马伯霖家度过的。直到我们听到邻居正在询问我们的情况并且听说叛徒陈的走狗正在搜查我后，我才勉强离开了那儿，去岭南大学钟荣光家。我和钟荣光的夫人很熟，她和我曾在慰劳会共事过。

第二天，伍廷芳的儿子伍朝枢博士乘摩托艇来看望我，并给我带来了关于孙博士的一些消息。我们在马湘、黄惠龙和那文（不是马

[1] 即孙科长子孙治平。

[2] 指由何香凝口述、全国妇联工作人员笔录的《何香凝谈话录》（1962年8月30日—9月15日），未刊。

[3] 指陈炯明。

[4] 误，应为长洲。

坤)的陪伴下前往永丰军舰。(我和孙博士)对将要做的事情私下面谈了一个小时后,我再次回到岭南。第二天孙科和戴恩赛陪伴我到了香港。在香港,我们在一个说客家话的古怪的老妇人的古怪的房子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我穿着我的女仆的衣服,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马湘没有陪我去上海,而是我要求马和黄回到永丰军舰上去。一到上海我便发表了关于陈叛乱的谈话。

如果我找到这个谈话(记录),我会把它借给你的。

致以良好的祝愿。

你的

宋庆龄

6月30日

马湘还健在而黄惠龙早就故世了。前者可以证实我所写的内容。

连声海^[1]不是星海

21. (1962年)7月28日

亲爱的黎博士:

在最近召开的分区大会上,你当选为那个重要的委员会委员,请接受我的祝贺。因为健康原因,我只参加了第一次会议而无法出席所有的分区会议。从北方回来的旅程确实很困难,我们在蚌埠附近遇到了气流,暴风雨令我们在南京迫降,那里正下着暴雨,所以我们无法去紫金山。而且,那里的天气特别热。我们与上海通了电话,所以午饭后我们得以乘上专列,当天回到了家。然而,潮湿闷热的天气使我从头到脚浑身上下都发出了疹子,搞得我都快崩溃了。医生们现在正在给我治疗,但愿随着冷空气的到来,难看的疹子会很快消退。然而,尽管医嘱要我绝对静养,我还是有必须要完成的工作。回来之前,他们要求我准备一篇孙博士周年纪念的回忆文章,是关于孙博士如何开始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2]这确实是一篇切合时事的文章,因为历史意义的原因,必须要写。

[1] 连声海(1885—1947),广东顺德人,曾任孙中山秘书。

[2] 即宋庆龄1962年11月12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回想此事,时间正好倒回到40年前。孙博士在那里会见某个苏联朋友,时间是在1922年4月底,就在陈炯明叛变之前。孙博士从北伐前线撤回来时,陈炯明发动反对孙博士的反革命行动。那是40年前的事,自那时起,世界确实实现了很大的跨越。现在,苏联和中国是同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两个伟大国家。同时,帝国主义者现在正在企望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分裂,妄图看到我们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崩离析。

如果你能够给我提供一些可以结合我文章主题的事例或材料,譬如为什么孙博士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等,这些材料对我归纳我所写的文章会有巨大的帮助。单单一个人的回忆是不够可信的,而且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请你将你所知道的尽速告诉我。

但愿你的身体状况正在好转,希望在我北上之前能和你见面。

向你们俩致以良好的问候和祝愿。

宋庆龄

7月28日

22. 1962年7月19日

亲爱的多萝西:

多谢你送来便条和美丽的鲜花。我上周曾打算给你送去这樱桃酱和一盒北京糖果,可是我的关节痛和非常严重的热疹使我没法做任何事情。整天浑身上下不停地流汗。但愿你们俩不要像我这么遭罪。

希望等天气转凉了能和你们见面,顺致亲切的问候。

你们一如既往的

宋庆龄

1962年7月19日

又及: 请告诉黎博士,我很高兴他喜欢我们的《中国建设》杂志。

23. (1962年)8月6日

亲爱的黎博士:

感谢来信,很高兴你喜欢《中国建设》杂志。我们正不断努力让杂志按时出版,但总是碰到困难,如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不时要出国参加各种会议。

我身体不太好,关节炎总是困扰着我。只有按摩师为我按摩神经时,我才可以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暂时忘掉疼痛。在6月和7月,我的病要发作两次。假如这个月的13号再发作的话,我就可能变得迷信了!每一次发作,要持续一周。医生们不得不整天待在这里监护我,但是他们也找不出我的病因。

天气使人特别难受,又热又潮湿,尽管电扇高速运转,我还是不停地流汗。

但愿你们的健康状况不断进步,这样,回来时我就能见见你们。

不知露丝给我送来什么礼物,如能请多萝西送去1843号^[1]交给李妈,我将不胜感激。她会为我保管到我回来。她是我的诚实的人,已跟我30多年了。

向你和多萝西致以亲切的问候。

你永远的

宋庆龄

8月6日于北京

24. (1962年)8月15日

亲爱的黎博士:

非常感谢删减(文章),并感谢多萝西将你回忆起的那一段打印下来。本该早些时候给你写信的,但是由于胃不舒服而卧床休息了好几天,实际上仍旧受热疹和关节炎的困扰。

我工作很努力,每天早上3点起床,因为这时工作比较安静。自

[1] 即上海市淮海中路1843号宋庆龄寓所。

去年以来，这个区域变化很大，早晨，隔壁传来的吹奏或练习小号的声音、小孩子哭叫的声音，还有敲打金属的声音，弄得我筋疲力尽，实际上是神经上被这些声音弄得疲劳不堪。我认为应该有第五大自由——免于噪音的自由！

顺致良好得祝愿，愿你们喜欢这两个罐头，是我从外国朋友那刚收到的。

你们永远的
宋庆龄
8月15日

25. (1962年) 10月5日

亲爱的黎博士：

本想给你写上几笔，问一下你的康复的情况，但是我还在卧床，只允许我一次坐起来一小时，所以推到今早才给你写信。

几周前完成了关于孙博士同共产党合作的文章^[1]，并发给周总理审查，因为是他要求我写关于这个主题的回忆录的。他来电告诉我，他打算在11月12日孙博士诞辰日出版这部回忆录，他还说必须减去文中的一些部分，因为文章太长。那另一篇文章写好后，将会在那天和我的文章一起出现。因此，我会注意看在周年纪念日出现的这篇文章。^[2]

苏加诺夫人坚持要来看我，我们在北京的人只好打电话给我，要求我“在床头和她见面两分钟。”这显得非常别扭，因此我决定起床和她茶叙，希望她的陪同也参与谈话。她来坐了二十分钟，完后我再次卧床了。^[3]

有人要来给我做心电图，只好搁笔。

[1] 即宋庆龄1962年11月12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2] 《人民日报》当日仅发表了《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3] 1962年9月27日下午，宋庆龄在上海寓所接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夫人哈蒂妮·苏加诺，王光美陪同接见。印度尼西亚大使苏卡尼·卡托迪维约也在座。

向你和多萝西致以亲切的问候。

宋庆龄
10月5日

26. (1962年) 12月28日

亲爱的黎博士：

这是我从杂志上剪下的一份剪报，请你看看。我希望有什么药能够帮到你。或许林国材^[1]可以搞到新药给你试试。

关于我的情况，我的病痛要伴随我一生了。我现在觉得走路非常困难。也许我应该在热带生活。但是，我又不喜欢天热。生活中存在太多的矛盾。

杰西告诉我，你跟她说陈露丝因为手臂的毛病正在吃苦头，要用某种钢钉固定。露丝到底怎么了，你是听她说的吗？

顺致良好的祝愿。

宋庆龄
12月28日

27. 1963年1月1日

亲爱的黎博士及多萝茜：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这个水果蛋糕以及我在除夕给孩子们的那包糖。

祝你们大家快乐。

宋庆龄
1963年1月1日

[1] 误，应为林国才。

28. (1963年)3月16日

亲爱的黎博士:

我亲自写信感谢你和多萝西在孙博士纪念日送来这么可爱的一篮鲜花。

我希望你们喜欢我送的这罐饼干和我们的《中国建设》杂志。

这里的气候非常潮湿,患关节炎的人生活非常不便。不久我会考虑回到北方,在那儿我必须再换一次房子。我怕搬家,因为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向你们俩致以我最诚挚的祝福。

宋庆龄

3月16日

29. 1963年3月18日

亲爱的黎博士:

昨晚我一刻也不得安睡,因为我听到了有关我晋升的传言。我身体很不好,一年不如一年,尽管我睡得很少,我还是要挣扎着起床。希望你能告诉我有关传言说了什么,也就是他们将提议给予我什么样的晋升。在我看来,我身居第一副主席职位,已经是太高了。我曾考虑如何来提出退休的要求,我确实是病得无法去出席所有的会议等等。请给我一个答复,我会销毁来信并保守这个秘密。

很遗憾多萝西的皮肤病还没有康复,我想这是不是由于缺乏某种维生素。假如有什么我可以为她做的,请告诉我。

匆匆写下此信,顺致亲切的问候。

你永远的

宋庆龄

1963年3月18日

30. (1963年)4月20日

亲爱的黎博士:

我回来已经有两周了,由于从前海搬家过来,要打开包裹,重新安排一大堆东西,所以感觉很疲劳。但愿你和多萝西都身体健康。

我收到了露丝给我的发油,我会写信给她表示感谢。

这个新住宅^[1]确实非常宽敞和讲究,房子周围有小溪环绕,人造的土堆看上去像座小山。我住在这样一个宽敞的大宅邸里,而其他对国家和人民作了那么多工作的人,却住在很不起眼的房子里,我感觉很不舒坦。我得到了一种解释,但是并不是你听到的那样。我的身体很不好,不能承担更多的责任,更不要说我还缺乏知识。

现在每天有一个医生和护士帮我治疗我的关节痛。我读许多书,正在努力赶着完成交给我做的一大堆事务。

艾伦·邓要我帮助他去香港,但是你是晓得的,这是不可能的。

请将附上的便条转给艾伦。他的中文名叫什么?邓伟,还是什么的,我忘了他的地址。以前我记性很好的,现在开始退化了,因此我看东西的时候,必须要做笔记,很麻烦。

我的地址是:北京后海,北河沿28号。假如你来参加人大会议的话,一定要来看看这里的美丽风景,欣赏一下我们小溪里养的鱼。

向你们俩致以最热烈的祝愿。

宋庆龄

4月20日于北京

我的手指头好累,所以请原谅我写得潦草。

31. 1963年9月11日

请保密

亲爱的黎博士:

本月8日的来信收悉。非常高兴得知在开会期你的健康状况允

[1] 1950年宋庆龄在京寓方巾巷,1959年10月移居北海西河沿8号,1963年4月移居后海北沿(今北京宋庆龄故居)。该处原为清醇亲王府西花园的一部分。

许你北上(参加会议),也许你能够重新回到家里了。这实在是个好消息。我衷心希望你来看我时,我还在这里,私下里告诉你,我已收到今年冬天出访的邀请函。如果政府决定要我出访一段时间,我可能错过你的来访。如果我还在这里,我自然希望能够带你和多萝西看看我的新住所。这是一座老王府,是摄政王为他自己建造的,可是革命剥夺了他的永久居住权。院子非常漂亮,有一条小溪流经这里。考虑到我患关节炎,政府为这个房子加建了二层,这样就不再潮湿了。但有一个缺点,房子朝西,夏天很热。而且楼上比楼下要高出三度。还有就是地方太大了,厨房离得非常远,冬天尤其不方便,菜在他们送到餐厅之前就凉了。虽然如此,这里还是比我原先的住所要安静些。原来的住所就在湖边,有大批的人夏天来这里游泳,冬天则来滑冰。

1966年,我们将纪念孙博士百年诞辰。我已经将你的名字列为筹备委员会成员之一。有些熟悉孙博士1911年之前活动情况的人现居住在海外。我们必须请他们把他们了解的事情写下来,因为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而且他们应该不会拒绝合作。关于1931年我从国外回来后收集的全部有关孙博士的材料,说起来就令我非常痛心,我把那个箱子留在我的老房子里了(我以为日本佬不至于损害孙博士的东西),留在那里的还有我自己的东西。^[1]但是,正像你可能记得的,我所有的东西都遭到日本佬的洗劫,我永远也找不回来了。我想,你看到了关于我的老房子还有九龙的小寓所遭洗劫的报道……^[2]回忆这些事情是痛苦的。我还没有时间作任何准备去回忆我婚后的那些岁月或我从过去学到些什么。

为了跟上目前的形势,我投入了我所有的时间,因此,没有机会去回忆任何事情。年纪大了,记性就差了,尤其是对那些在我结婚之前我没有参与的事情。好在有些人还健在,他们可以提供他们在那个坎坷年代所知道或所经历过的事情。我们的回忆录主要依靠这些人,还有历史研究所的人。

[1] 1937年12月23日,宋庆龄在上海沦陷以后,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的掩护下,秘密离沪赴港。1942年9月日本宪兵沪南分遣队连续三次搜查宋庆龄位于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的寓所,孙中山文稿及其他物件全部被劫掠。

[2] 1941年12月10日,宋庆龄在香港沦陷前冒着日军的炮火,与宋蔼龄等乘坐最后一班飞机离港赴渝。其位于九龙嘉林边道的寓所原为宋子文私宅,亦遭日军洗劫。

我正在准备我的讲稿,因此时间都花在眼前的任务上了。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坐着研究各种资料,因此我血液循环不太好。我相信,国才^[1]一定没有机会看出,走路对我来说是件难事。因为我脚踝没有力气,有时候我要借助拐杖走路。为了减轻我的疼痛,医生们每天来为我做针灸治疗和按摩。然后,我靠打针来增强体力。我曾累得连楼梯也上不了。但是,这些治疗开始起作用了,我开始感觉不那么累了。

你有没有与孙科通信的方法,好请他写点关于他所知道的他父亲的活动情况?这样是最有好处的,因为他自己本身就积极参与了当时国民党的活动,他了解许许多多事实。

但愿我把事情都对你讲明白了,问你和多萝西好。

你们永远的

宋庆龄

1963年9月11日

32. (1963年)10月10日

亲爱的黎博士:

但愿你已经收到我的信,我在信中谈到,我已经回复了黄梦熊以及他通过你转来的信。

听说你已经出院,正在家中享受家的氛围,这真是一个好消息。人大召开的时候,希望能在这里同你和多萝西见面。我出访锡兰的时间^[2],将由主席讨论确定。因为国庆节期间的活动增多,我的老毛病又犯了,非常难受,加上痛苦不堪的关节炎,从来也没停止过的。为了穿暖点,我已经套上了线衫和棉袄。希望早日见到你和多萝西,顺致亲切的问候。

永远的

宋庆龄

10月10日

[1] 即林国才。

[2] 1964年2月宋庆龄赴锡兰访问。

33. 1964年1月15日

亲爱的黎博士：

多谢你12日的来信。去年11月真倒霉，我跌跤后右手腕严重骨折，只好上了石膏。到如今，我仍需每天做两个小时的推拿按摩，从肩膀一直做到手指尖。对我来说，最不幸的是不能使用右手。手不在适当的位置，看上去怪怪的，因为外科整形医生说，他必须在里面用不锈钢钉使骨头固定在一起，所以我吃太多的苦头了，“疼痛难忍”。等到（我的）健康状况以及手的情况好些（不是你想的肘部）后，我必须如约出国。

请将我的情况转告露丝，并告诉她我不能对她所送的礼物写信致谢的原因。请在1843号的我的管家李燕娥同志到你那里去接他们过来，这样她会立刻带他们来见我，因为我很想见他们。

向你和多萝西致以亲切的问候。因为握笔困难，请原谅我字写得潦草。

你们永远的

宋庆龄

1964年1月15日

34. (1964年)3月26日

亲爱的黎博士：

去年我在家时，艾伦·邓给我来过一封信，要我帮助他和他的孩子去香港，和他的太太和儿子史蒂文斯相聚。我记得我将此信寄给了你，请你说服他，让他理解我的职责是劝说人们回来，而不是离开中国。我不知道后来他有没有见过你。现在他又给我来信重提此事。我没法让他理解我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尽管我是“副主席”。因此，我想再次请你帮我向他解释我不可能满足他的要求。

我正遭受严重的神经痛、坐骨神经和关节痛的折磨，此外还有重感冒，使得我无法去看牙医，以尽快拔掉我的智齿。我的手腕骨的接合和缝合都不好，因此我的尺骨凸出得就像一个核桃。我问了好几个医生，都对北京西医的糟糕工作非常后悔，给我做出的唯一结论就是动手术来纠正。但是，我不想再遭受更多的痛苦和麻烦，就让我这可

怜的不对称的手和手腕那个样子吧。对于我的不幸和去年11月以来我所遭受的所有痛苦,我觉得非常沮丧。

向你和多萝西致以亲切的问候。

宋庆龄

35. (1964年)4月4日

亲爱的黎博士:

非常高兴得知你杭州之行非常愉快。你体力好的话,还可以去广州。从1940年到现在,我还没有回去过。杰西刚从桂林回来,她给我写信说她的这趟旅行很愉快,就是感觉到很累,但还是想过来向我报告她此行的情况。我患重感冒还没好,因此没法去看牙医,拔除智牙。

感谢你告诉艾伦他应尽的义务。莉莉应该回来使家人团聚。

给你和多萝西一些复活节彩蛋,是李姑^[1]昨天染好的。

隋同志^[2]去年探家时中风,现在处于半瘫痪状态,住在医院里,这确实令人很伤感。这个消息令我非常不开心,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足够的勇气去看望他。我生怕我的情绪可能会影响他,引起他的苦恼,反而对他更加不好。我把他的2个孩子^[3]送去了幼儿园,那里对孩子的影响比他家里好。这两个孩子非常聪明。我回来的时候,到幼儿园去看过她们,发现她们对日常作息和环境都比较适应。

顺致良好的祝愿。

永远的

宋庆龄

4月4日

耿丽淑^[4]小姐告诉我,你去拜访了她两次。

[1] 即李燕娥。

[2] 即宋庆龄警卫秘书隋学芳。

[3] 即隋学芳长女隋永清和次女隋永洁。

[4] 耿丽淑(Talitha Gerlach, 1896-1995),美国人,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人员。1949年在美国发起组织中国福利呼吁会,任主席。1952年秘密来华,任中国福利会顾问。宋庆龄逝世后,任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上海宋庆龄基金会顾问。

36. 1964年10月2日

亲爱的黎博士：

多谢你9月28日来信。我真希望你能参加今年冬天举行的人代会。由于日程表上还有许多其他的会议要开，恐怕这次会议要推迟到12月份了。所以你必须随身多带些保暖的衣服。

我不知道尤金·陈的夫人^[1]把他的自传保存在哪儿。你知道她在解放前不久，与×××一起到美国去了，他们在纽约结了婚。但在美国几年后，他们移居新加坡，最终离婚。我知道，她甚至不会实现他的（尤金的）要把骨灰从飞机上撒下来的愿望。对于这件事情以及她从未为出版他的自传而做过任何事，特里^[2]和杰克^[3]（尤金的儿子）非常生气。同时，特里正在写一本关于他父亲往事的书。尤金·陈没有将他在当秘书时存档的孙博士和列宁以及其他一些要人之间的通信的原件或复印件移交给我，所以我无法帮你为了孙博士的百周年纪念而搜集这些信出版。

我们举行了热烈而隆重的国庆庆典，有大约3 000名来自许多国家的客人。9月30日晚，举行了一个有5 000多人参加的招待会。20个不同国家的代表团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那真是非常累人的。主席身体健康，精神矍铄，他昨天连续站立了两个小时检阅盛大的游行队伍。

我的手腕仍在进行热腊治疗，行动不便，深感痛苦。那位给我治疗骨裂的医生很粗暴。他一点也不懂得像陈中尉以及其他一些当今我国的年轻的医生那样进行技术革新。

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接待外国来宾，阅读文件，和指示秘书如何回复一大堆的人民来信，以至于我现在不得不说再见了。请原谅我字迹潦草。

[1] 即陈友仁夫人张荔英。

[2] 即陈友仁长子陈丕士。

[3] 即陈友仁次子陈依范。

向你和多萝西致以热烈的问候。

你们永远的

宋庆龄

又及：林达光^[1]和他的家人到加拿大去了。他急于去见珀尔^[2]。

37. (1964年)12月13日

亲爱的黎博士：

你28日的来信收悉。我要立即回信告诉你，你要求收回那份失实的声明是非常正确的。我是1915年(10月25日)结的婚，婚后，我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由朱执信起草孙博士1916年开办证券交易所的计划的事情。由于我们都在孙博士身边工作，这样一个计划我不会一点也不知道的，[以下缺页—译者]

38. (1965年)3月6日

亲爱的黎博士：

现在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历史博物馆在你的朋友去参观时并没有展出我的结婚证书了。从今以后谁想去看原件，向我们申请一张卡片(就像博物馆和廖梦醒建议的那样)后就可以看了。^[3]

我写信给梦醒要她找出博物馆不能展出它的原因，而这是她专程去找了博物馆馆长后的回复。

还有这份手稿你也许想看。辛西亚说她发现了许多错误。这是从《南华早报》(一份英国人在香港经营的报纸)翻译过来的。

请在星期二早上原样还给我，因为我必须通过某位即将赴京的可靠

[1] 林达光，孙中山孙女婿林达文之弟，50至60年代在北京国际广播电台任英语播音员。后移居加拿大，任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2] 即孙中山孙女孙穗英。

[3] 1962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从私人手中征集到一件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日本结婚的誓约书，经宋庆龄证明确系真件。1965年2月26日，宋庆龄嘱秘书致函中国历史博物馆询问为何不陈列誓约书的原因。3月5日，中国历史博物馆函复：“关于我馆收藏的宋副主席和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结婚的誓约书，将拟於明年组织举办孙中山先生诞生百周年展览时陈列，在未陈列期间，予作为珍品保藏，如有欲看者可经过联系，前来阅览。”

的人归还它。

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你忠诚的

宋庆龄

3月6日

又及：请归还梦醒的信，因为我必须回复她。

39. (1965年)3月10日

亲爱的黎博士：

请读这两份附件，明天一早还我。那些恶意中伤我的人，在明年看到这份原始证明时，其好奇心就会得到满足了。我们的婚姻也在东京市政厅由我们的律师和田瑞进行了登记。孙博士在1915年4月（当时我仍在上海）与他的（孙科的）母亲经双方协议离婚后曾写信告诉他儿子。孙科可能还保留着那封信。至于为什么不公开或通知其他人，他也许有自己的理由。

匆匆草就，谢谢你和多萝西8日送的花。因我太忙了，未能及时回信，希见谅。

你们永远的

宋庆龄

3月10日

40. (1965年3月)

亲爱的黎博士：

我向你保证结婚证书上是有日期的，是辛西娅在匆忙之中忘记复印下来。你明年将会看到，没有人可以在那里找出错误来。对于某些老顽固提出的怀疑和问题，我想声明，现有的任何法律都没有规定人们结婚要得到那些恶毒的诽谤者的同意。拉丁谚语曰：世间自有公正的头脑，所以让这些狗去叫吧。

证书上的所有一切都是规范的,年代为1915年,日期为10月25日。如果他们认为那份证书是“假造的”(!)那么他们可以去东京市政厅查看婚姻登记。

请把这本杂志给多萝西。

致以良好祝愿。

SCL

41. (1965年)5月19日

亲爱的黎博士:

谢谢你让我看你随信附来的材料和你反驳那些对孙博士的毫无根据的指责。那些人真是非常荒唐!孙博士怎么可能穿着中国长衫之类的(服装)到国外去!他又不是李鸿章!你看,就是现在的领导人,也还是随孙博士的式样,穿着中山装,因为它实用。在我那个时候,孙博士在家从来不吃西餐。他是吃素食的,只吃蔬菜或者鱼,甚至蛋也不吃的。我们每个月的开销从来不会超过300元,这其中包括衣食开销。因为孙博士从来不存一分钱,所以这笔钱都是由林焕庭每月交给我的。所有有关金钱方面的事务都是由廖仲恺、林焕庭还有刘纪文经手的,刘纪文还在世,可以证明上面讲的这些情况。

有一次,孙博士要去广州,我看到他的鞋子太旧了,我就买了两双鞋子让他带上。他不赞同我的做法,说:“我只有一双腿,干嘛要买两双鞋子呢?!”

关于孙博士穿着西服,很自然的,他们不可能指望孙博士在外国穿着中国的长衫。这些指责是多么的荒唐和不可思议!

最近,我国政府给孙中山的女儿阿琬(格雷丝·戴)送去了一大笔钱(美元),作为她的生活费,这意味着她将可以过很舒服的生活了。她现在和她的已婚的女儿(不知道她丈夫叫什么名字)住在一起,只给了我她家邮局的地址。听说就是阿平^[1]和林国材^[2]也不知道她实际上住在哪

[1] 即孙治平。

[2] 误,应为林国才。

里,为什么要这么秘密。她寄了些孙博士的旧衣服、照片和一些留声机唱片,其中有一张是孙博士的演讲唱片,回赠给政府,作为纪念品。

向你和多萝西致以亲切的问候。

永远的

宋庆龄

5月19日

又及:

伍廷芳比起唐少川更加进步和可靠。在上海时,唐少川准备投靠日本人,我不记得是谁杀了他。唐少川是个挥霍无度的人,他积聚了大笔的财富,生活得就像一个国王,如最近在意大利去世的法鲁克国王^[1],他的死是因为贪婪地吃下了一整只羊!

请原谅我写得潦草,因为我必须要为《北京周报》完成关于我们的儿童教育的文章。^[2]

42. (1965年)7月9日

亲爱的黎博士:

很高兴你身体健康了许多,可以考虑在这么难熬的夏天离开。我也想能够去趟牯岭,但是我还在进行治疗,没法离开。他们从天津派来一位推拿伤口的专家,为我看病。这人家传的这种特别的疗法,有十八代了。所以他有些经验,不同于普通的推拿大夫。

但愿有一天能听到露丝的消息,很高兴她有个好的去处。你是否知道孙科现在还在不在香港?

听说台湾人民正在为百周年大作筹备。

向你和多萝西顺致良好的祝愿。

宋庆龄

7月9日

[1] 1965年3月17日,45岁的埃及末代国王法鲁克在意大利于就餐时因暴饮暴食去世。

[2] 1965年5月,宋庆龄在《北京周报》第22期发表《培养坚强的革命后代》一文。

43. (1965年) 11月10日

亲爱的黎博士:

想必你已经知道刘主席为明年孙博士百年诞辰纪念而召开的筹备会议。廖承志担任这个委员会的秘书长,你是委员之一。是的,这期间孙哲生夫妇和阿平夫妇会到达台北,出席在那里举行的活动。

这里现在的温度是零下二度,因此从今天起我们开始开暖气了。但愿上海的天气没有这么冷。这样大一个房子的用煤真是浪费,这里一天所消耗的煤,用于我们上海的房子取暖的话,可以用一个多月,对此我很不开心。

印度尼西亚的形势一天比一天明朗,这使我想起了1927年的汉口。那个国家存在太多的腐败现象,阶级斗争已变得不可避免。我就是担心那里的华侨,他们正经历着困难的时期。但是,我要欣慰地说,我们的大使^[1]是个非常能干和勇敢的人。1957年,我访问缅甸的时候,他在那里任大使,我和他以及他的家人很熟悉。

向你和多萝西致以亲切的问候。

永远的

宋庆龄

11月10日

44. (1966年) 2月15日

亲爱的多萝西:

多谢来信。上海11日积了很深的雪,这真是令人吃惊!而这里变得如此干燥,以至于我的皮肤不停地痒。每次洗完澡,我必须用甘油涂满全身。

我很想家,但是这里有许多工作要去做,所以我不能回去。实际上,我正在准备一篇关于孙博士的文章^[2],因为即使在百年之后人们还是要阅读这篇文章的,所以(撰写它)需要作许多阅读和思考。从这

[1] 即姚仲明。1966年4月7日被召回,以在政治上对印尼反华活动造成压力。

[2] 即《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

个角度看,我一定要写。

很高兴黎博士能够参加百年纪念筹备会议。革命博物馆给我来电,要我把十年前展出以后返还到上海的所有有关孙博士的材料给他们。但是,我觉得左右为难,因为上海的委员会也有权展出这些东西。因此,我要他们自己写信给上海的主管部门。我一直住在北京,这也使我无法把我从自己的档案柜里找出来的私人物品分些过来。由于关节炎和背痛的毛病,我很难来回跑,否则我会去一趟的。

我希望菲比能来这里工作。她会打字吗?

你自己和黎博士要千万保重。由于约翰逊^[1]愚蠢而邪恶的企图,我恐怕1966年将是非常艰难的一年,但是上海不会有问题。我想他们会保存上海,以达到他们的目的。无论如何,我们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随时保持警惕。

顺致对你们俩的良好祝愿。

永远的

宋庆龄

2月15日于北京

请原谅我用这支圆珠笔,写出来非常淡,但已经是我在这里能找到的最好的了。

45. 1966年4月10日

亲爱的黎博士:

你6日的来信我已收到。你对陈望道批评孙博士的回应是绝对正确的。我们所有读过教会大学的人或迟或早都是被施过洗礼的。当他在英国被满州监禁,经他学医时的教授詹姆斯·康德黎博士多方营救获释后,为安全起见,他住在詹姆斯爵士和康德黎夫人的家里,他们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在身心疲劳和重重压力下,他深受他们的影响。当他写《伦敦蒙难记》时,他听了周围人的话,写下了“上帝拯救了

[1] 即美国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1966年2月,他批准对越南北方施行大规模轰炸。

他”。因此人们以此作为他是基督教徒的证据。我从他自己的口中得知，他那时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但他从不信上帝或其他神祇。他称在中国的传教士是“伪君子或是受了误导”，攻击唐绍仪是希望把革命活动的某些资金交给他们“安全保管”！国会移至广州时，唐、伍廷芳是总裁。在我告诉他讨厌传教士的原因后，我们经常谈到传教士的伪善。我在孩提时，经常随虔信基督教的母亲在星期天去教堂。当我们到教堂时，牧师和他的助手总是把坐在前排座位上的衣衫褴褛的妇人赶走，腾出位置给我们坐。虽然我只是个孩子，但我为此愤愤不平。

顺带说一句，陈望道的夫人^[1]作了几十年的上海女青年会领袖，一直到她几年前去世。

至于孙博士在中山大学（他去世后改此名）演讲的事，他从不用讲稿，每次都是即席演讲。邹鲁和黄昌谷两人从来就不是进步人士，他们不仅谈不上革命，相反是机会主义者和堕落分子。我现在还记得那些大元帅府的人都挺看不惯黄昌谷，因为在任何场合，甚至是在拍集体照时，他都要抢占一个显著的位置。我相信如果去问马湘，他也会记得。

至于使用钢笔一事，田桓搞错了。孙博士在与外国朋友通信时，以及在我们婚前和婚后给我写信时，他一直习惯使用这支钢笔。他有好几支别人送给他的钢笔，但都丢失了或是找不到了。很有可能这支小巧的红色钢笔是由跟随我们的杨仙逸送的。杨仙逸用他以前从檀香山带回来的美国部件，制造了第一架飞机。因为孙传芳当时试图收买我们的司机等人杀害我们或把我们送入他们的圈套中，所以为保卫孙博士，杨仙逸教我驾驶汽车，为此我永远感激他（我因此而成为从法租界获得驾照的第一个中国妇女）。杨也来自香山或称中山县，所以我们像亲戚一样。甚至孙博士一直穿的那件外套也是杨从檀香山探亲回来时带给他的另一件礼物。我记得这支小巧的红色钢笔是从孙博士的书桌上被偷走的，很奇怪它是怎么被找到的？我自己也有几支

[1] 即曾任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总干事蔡葵。

钢笔在那儿。其中一些上面刻有我的名字或名字的大写字母。有一支抗战时期在昆明的一个销赃市场被一个朋友发现了。但这支笔太旧了，所以我把它丢在重庆不再用了。

至于彩蛋，我们现在在每年清明节染彩蛋是因为孩子们喜欢把彩蛋藏起来，再去找出来，与宗教或复活节无关，就像我在圣诞节不带任何宗教意味地放松一下一样。

我希望你能看懂我的粗体字，使用粗钢笔能使我的眼睛轻松一些。我有很多信要回，用这支笔，可以缓解用眼的紧张。

你看到的我的照片把我美化了。实际上，我的眼睛因为失眠和工作时间太长而肿得厉害。离开药物我几乎无法入眠。如果我不看书或不工作的话，我可能会睡得好一点。关键是要会控制好自己的思想，但是生活中怎么可以没有书本！这又是一个矛盾！

向你们俩致以真挚的问候。

你们永远的

SCL

4月10日

我知道总是有人会诽谤我，甚至当着你的面。如果他们再这样做的话，你可以掴他们耳光！

46. 无日期

亲爱的黎博士：

非常抱歉，正如我下午的留言所说，我不能收下这些礼物。因此，我没法给他们表示感谢。我的工作一天天地多起来，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多，我没有时间做这些应酬，所以从今以后，请不要再为他们或其他人转送礼物。

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心存感激的

宋庆龄

47. 12月5日

请保密

亲爱的黎博士：

感谢你的来信。由于一直没有机会同你和多萝西聊一聊，我只能希望你们在这里多待上几天。但愿春节前我回家时能有这个机会。送上一些糖果，带着路上吃。

预祝你们访问我们的老根据地——羊城愉快。

爱你们的

宋庆龄

12月5日

48. 7月2日

亲爱的黎博士：

第一个受列宁派遣去见孙博士的人^[1]，目前还生活在列宁格勒，因为几个月前我得到了他的音讯。马林就是那个到桂林去见孙博士的人。他和孙博士会谈的结果后来是派遣越飞（阿道夫）到上海去见孙博士。

我记得孙博士从桂林给在广州的廖仲恺写信，让他接待马林，同时要求廖销毁他们的信件。但是，廖没有这样做，而是放在了自己的保险箱里，结果在陈炯明叛乱时，叶举打开了廖放在财政部的保险箱，使这封信曝光，指责孙博士勾结布尔什维克，要将共产主义引入中国。所有国内国外的报纸公开登载了他们的信，将其说成“一个大丑闻”，背叛了中国，等等，等等。帝国主义者自然对此大加利用。

原谅我草草写下这些，因为我有太多的事要做。

诚挚的

宋庆龄

7月2日

如果你去公共图书馆，看看那个时期的报纸，你会看到这封信的。[页边注—译者]

[1] 即维经斯基，中文名伍廷康。

49. 9月18日

亲爱的黎博士、多萝西：

送上些我北京花园里结的新鲜枣子，希望你们喜欢。要乘早吃掉，在这里很容易坏掉的。

顺致问候

宋庆龄

9月18日

50. 8月28日

亲爱的黎博士：

多谢你的来信和给我看阿强^[1]的信，此信现在奉还。

有个朋友送我一些巧克力，听杰西·×××说你们喜欢吃这种糖，给你和多萝西寄去。顺致良好的祝愿。

你们永远的

宋庆龄

8月28日

51. 2月8日

亲爱的黎博士：

送上一些玫瑰年糕，你从前很喜欢吃的。但愿你和多萝西喜欢。很遗憾，由于感冒我不得不卧床休息，春节期间没能见任何人。顺致良好的祝愿。

宋庆龄

2月8日

[1] 即孙治强。

52. 8月19日

亲爱的多萝西:

多谢你的便条。很高兴你拿给菲比一件她喜欢的东西。

我给你寄了两双鞋子,肯定你能穿的,另外那双给菲比,因为我患关节炎,不再能穿高跟鞋了。

能不能请戚景文为我带两双鞋给陈露丝,因为我这里没有人去香港,而且我也不知道露丝的地址。这是请你给我帮的一个大忙,我从心里感激你。

致以爱意。

爱你的

宋庆龄

8月19日

53. 1月24日

亲爱的黎博士:

有一张好一点的合影照,×××登在报纸上。昨天,因为它不是很正式,更加自然点。唯一的问题是,由于睡眠少和看书时间长(一天看10小时的书!),我的眼皮有点肿。

我不记得用过这张照片。多亏了露丝寄给了他们,因为我现在浑身关节疼痛。

希望你和多萝西喜欢这些糖果,并致以亲切的问候。

你们永远的

宋庆龄

1月24日

54. 无日期

亲爱的黎博士:

多谢给我看了关于邵力子的文章。很显然,从一开始孙博士的目标

就是社会主义。例如,他的文章出现在比利时社会主义的报纸《人民》上。

你的
宋庆龄

55. 11月8日

亲爱的黎博士:

今早报纸上登载的你的回忆录非常好,而且很有必要,因为几乎没有回忆录里有关于孙博士在国外的生活、在留学生中,以及他对留学生们所说的话的内容。

在读到随信附上的材料时,对有人竟头脑简单地推测,孙博士的反帝等活动是会见李大钊和瞿秋白以后的结果,我觉得很好笑。细读后请(将材料)原样还我,但是在12日的发言中,请你记得要强调,事实上,孙博士在见到共产党人之前,早年(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日本对华“二十一条”、英国威胁炮轰广州等等)就已经开始从事这样的活动了。请将此信销毁。我不是要贬低他们的贡献,而仅仅是因为我们要尊重真理和事实,我们一定要真实地记录这些事情,即使这些事实是某些人不希望看到的。

我本想请你和多萝西那天来吃午饭的,但是你那天要去演讲,也许还要和其他人去看故居,那我就改天再安排吧。日子一旦确定,我会即刻通知你们。请不要给我送花或其他什么,我会感觉不安的。这次来不要带任何东西,除了带着友谊的记忆。

宋庆龄匆草
11月8日

56. 4月20日

亲爱的黎博士:

多谢你的便条及让我看到附件,这非常重要,我希望李济深先生能够同意你所说的,并且有勇气做这件事情。

我的眼睛很不好,所以要等我感觉好一点再继续。我的感冒影响

了我的听力。

顺致对你和多萝西的良好祝愿。

宋庆龄

4月20日上午9点

57. 3月13日

亲爱的黎博士：

希望你能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我就可以告诉你何时我能抽空回答你的问题。

请不要送金鱼缸给我，我已经有一个大鱼缸了。

顺致良好的祝愿。

宋庆龄

3月13日

58. 2月17日

亲爱的多萝西：

非常非常感谢你送的鲍鱼，特别是那烹调食谱。

我要给你寄一盒糖果，其余的请你替我转交莉莉和艾伦·邓。

你永远的

宋庆龄

2月17日

59. 无日期

[以上缺页一译者]我真是该说自己无聊。现在她无法控制自己。党组织没有给她分配工作，因此她整天到处走，说起话来就像个小女孩，有一天在大庭广众前做很愚蠢的动作。这事真是太悲哀了！

现在正在用新的疗法治疗我的关节炎，不是通常的按摩。这种方法是一个老太从和尚那里学来的，已经治好了好几个人了，但是因为

我的毛病时间比较长了，治疗需要时间。但是我相信她的疗法。

致以最热烈的祝福和爱意。

你永远的

宋庆龄

60. 无日期

亲爱的黎博士：

我因突发的重要事务而×××××回来了。但愿你身体好起来，节日里才会被允许出来。

刚刚发现露丝寄来为我治疗关节炎的腮腺激素针剂。我会咨询医生我是不是可以〔以下缺页—译者〕

61. 2月12日

亲爱的多萝西：

这是一盘杏仁鸡，希望你和黎博士能够喜欢。

顺致良好祝愿。

诚挚的

宋庆龄

2月12日

62. 3月31日

〔以上缺页—译者〕中苏合作的确切日期，但可以肯定是1923年1月26日，在越飞到上海访问孙博士之后。关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建立，是在蒋介石访问苏联后，黄埔军官学校建立之前不久，由苏联发起的。我认为，在蒋、汪1927年背叛革命的时候，中山大学被解散了。

顺以良好的祝愿。

你永远的

宋庆龄

3月31日

63. 3月7日

亲爱的黎博士：

这几好吗？

我从2月17日起就一直卧病在家，医生们正在尽力为我治病。当一个人需要和人们会面，有工作需要去完成时，却病倒了，这真是非常痛苦的事。但是，必须要用有哲理的态度，因为还有什么选择呢？

菲比·陈是不是那个我曾在陈露丝家见到过的女孩？

尽管这个冬天很厉害，所幸你和多萝西都很健康，顺致问候。

你们永远的

宋庆龄

3月7日

64. 无日期

亲爱的黎博士和多萝西：

非常感谢你们给我这里和故居送来美丽的鲜花。由于有许多任务等待我去完成，所以延迟了给你们写信。还有就是我的伤残的右手，给我带来很多不便，到现在还疼痛和肿胀，正如你们知道的，我的骨折接合得不好，因此我手腕外侧的尺骨凸出得就像个核桃，使得写字很不方便。你们来看我时就会看到它。我希望我能马上见到你们，但是我必须要去看我的高血压，并听取专家的意见，专家要来给我的手做检查，设法如何减轻我的疼痛，还要看牙医。此刻写信只是为了告诉你们我想念你们，希望这些必须要做的事都处理完了就能和你们见见面。

你们有没有什么途径带些礼物给陈露丝？她的亲戚还在这里吗？我觉得，我一定要送给露丝一件礼物，让她知道她没有被忘掉。

向你们俩致以良好的祝愿。

永远的

宋庆龄

65. 3月18日

亲爱的黎博士：

这是露丝送我的苏格兰围巾，但我是从来也没有用过的，因为我有一条国产羊毛围巾几乎和这条一样。我想给多萝西，她也许会在外出旅行时用得上。

这条金色的印度织锦披巾，请你尽力帮我送给陈露丝，顺便代我向她问候。我提出需要的东西，她总是能够满足我，我要向她表示我的谢意。

希望她会喜欢，她戴上这条金色的织锦披巾（其实是围巾）时，能够想起我。

听说广州非常非常潮湿，所以你不要在那里待太长时间。不如待在从化，那里有不错的温泉。

衷心希望你们旅行愉快。

向你和多萝西致爱。

宋庆龄匆草

3月18日

66. 8月9日

亲爱的黎博士：

请不要拒绝帮我这个忙，请让多萝西买些布料送给菲比，因为菲比不肯收钱。我没有其他办法来补偿她买的那些月饼，这是我非常想要的那种月饼，我想拿来送送喜欢这种香港特产的小月饼的人。这是帮我一个大忙，假使多萝西不帮我的话，我只好找其他人帮我买布料送给菲比了。

万分感谢。

你永远的

宋庆龄

8月9日

67. 6月3日

亲爱的黎博士：

送上一点粽子和枇杷给你和多萝西。

永远的

宋庆龄

6月3日

68. 8月9日

亲爱的黎博士：

1. 给你一份新一期的《中国建设》杂志。我送去一些素火腿，是在锦江为你和多萝西订的，昨天晚上你们好像很喜欢。但是你们把它放过冰箱以后，请吃前先要蒸一下，这样会软些且容易消化。

2. 随信附上20元钱，请让菲比为我买些椰子馅和莲蓉馅的月饼。用这种盒子装，带给香港中国旅行社经理亨利·蔡^[1]先生，然后给博罗金。我还留了一封信和两样礼物给亨利·蔡夫妇。他知道在那里再将这些东西委托谁带给博罗金。菲比和他谈话的时候，请不要用我自己的名字，称“夫人”就可以了。这样，坏人就不能耍计了。

多谢陈^[2]和菲比。

宋庆龄

8月9日

69. 11月3日

亲爱的黎博士：

是谁在谣传我们1914年在横滨？孙博士自从袁世凯试图收买他的下属来刺杀他而逃离那里以后，就不曾离开过东京，我从来没有和

[1] 即蔡福就，广东中山人，曾任香港中国旅行社副董事长。与宋庆龄有几十年的交往，曾捐赠药品和文具给儿童。

[2] 即陈露丝。

孙博士一起到过那里。我们是1915年10月25日在东京结的婚,由和田瑞、头山满、梅屋夫妇、朱卓文、朱慕菲等作为见证人,而且我们的婚姻在东京有登记。当时,有那么多的敌人试图制造谣言和风言风语,但是,NCDNews当天有关于此事的报道。不幸的是,在陈炯明袭击我们的时候,它连同其他文件一起被烧毁了。被烧毁的还有,他和孙科的母亲在1915年4月的离婚书(他们自1913年就分开了),还有我们的结婚证书,上有几个朋友的签名,以及其他一些重要文件。

我们从日本回来后住《中法新汇报》^[1]报馆楼上一个房间^[2]里,是那个编辑^[3]自己的屋子。在袁还活着时,孙博士先秘密返回,在袁死后,我们就租了环龙路63号,有个办事处在环龙路44号^[4],在我们房子的正对面。因此,这所房子是在1919年或1920年或1921年,由加拿大温哥华的华侨组织成员买下的,当时陈树人是当地国民党主席。

几周来,我为了完成几篇文章,加之晚上失眠,感觉非常疲倦,没有力气再写了。请原谅我糟糕的打字。昨晚,他们派梦醒^[5]来看我,谈关于广播演讲等事情。可是我还没有想好,尽管我应该考虑好,但是,我实在是筋疲力尽。关于我和孙博士的关系,那是我至死也不会忘却的,我们日复一日地一起工作,亲密无间。回忆这些事,就意味着要重新经历这些事,它深深地影响了我。请费心将这个便条销毁,我讲得很乱。很惭愧,对我所经历的,在心中留下最深切感受的事情,我却写得如此的无力。但是,眼下我实在是疲劳得无法写好它。因此,请将这个条子销毁,同时记得不要为他举行宗教追思活动。

宋庆龄匆草

11月3日

[1] 《中法新汇报》是日刊,1897年7月创刊,1927年7月停刊,主办者及主编者是法国人蒂罗和雷墨尔。

[2] 即当时上海法租界的洋泾浜55号。

[3] 即《中法新汇报》主编韦玉泉。为了纪念孙中山,韦夫人冯道生一直保存着孙中山睡过的那张床。宋庆龄对韦夫人始终心存感激,1964年7月29日,汇款100元赠她,作为医药等费用。

[4] 即今上海市卢湾区南昌路180号,原中华革命党本部事务所和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所在地。

[5] 即廖仲恺之女廖梦醒。

70. 1月9日

亲爱的黎博士：

希望你和多萝西能够喜欢这张我在除夕晚会上与久违人士的合影。其中有艾伦的女儿们。

顺致最美好的祝愿。

你们永远的

宋庆龄

1月9日

71. 4月16日

亲爱的黎博士：

我非常抱歉，我的要求被忘掉了，因此我只有2份法文版的了。如果你的侄子不能阅读法文的话，请写信给北京的办公室，让他们为我寄2份英文版的给你。

宋庆龄匆草

4月16日

72. 无日期

亲爱的黎博士：

最近还好吗？我希望你能早日出院，回家度假。

宋庆龄

73. 无日期

亲爱的黎博士：

送你们一个平湖西瓜，希望你和多萝西能够喜欢。我将送给菲比一个兰州瓜，让她带回去，还有金日成同志送给我的一盒最珍贵的人参。希望陈露丝能够喜欢这份礼物。能够和你们大家相见真是件高

兴事。我希望,明年我们能够在北京我的家里再一次大团圆。

向你们大家致以亲切的问候。

宋庆龄

又及:菲比是个甜美的姑娘。我非常喜欢她,真希望她能来住住。

74. 2月9日

亲爱的黎博士:

在我走之前,我想还是将你好心寄给我的脆饼干寄还给你,因为你们比我更需要这些东西。顺便寄去一些甜饼给你作茶点。

我曾给艾伦寄去100美元,让他给他的孩子们买点东西,因为我不逛街,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但是,他拒绝收下这笔钱。不管怎样,假如多萝西或者你能向他说明我的好意,他会为了他的孩子们收下这笔钱,买点需要的东西的。顺便给他们寄去两个包裹的饼干,眼下饼干很难弄到。

需要什么我能为你和多萝西弄到的东西,请告诉我,我会尽力去办的。

顺致对你俩的良好祝愿。

爱你们的

宋庆龄

2月9日

附录

1. Aug. 30, (1952)

Aug.30th

Dear Dr. Ly:

On the end of my departure for the North, I wish to say goodbye to you & Dorothy. Enclosed please find some royal jelly tablets which came from a friend & which I found so beneficial in giving me energy & strength that I am certain will be of great help to you too.

Please keep my departure confidential meantime. I am xxx & feeling very tired, so pardon these few lines.

With affectionate greetings to you both.

Aloha, meantime

Yours,
SCL

2. Feb. 28, 1956

Dear Dr. Ly:

Many thanks for your three letters which were handed over to me yesterday. Immediately after the closing of the PPCC I was laid up in bed, and the doctors ordered me to remain in bed, as I was so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exhausted by my trip to the three countries. No guest or friend was permitted to disturb my rest and no letter was permitted to be sent up, as they wanted me to restore my energy and have a complete rest. With the result even on New Year's day I was laid up in bed, with nerve pains. There was no celebration of any kind in this house, for the cook who had worked with me for six years was also being hospitalized, as he had a stroke of paralysis, so he will not be able to work again. I had a chance to spend the New Year holidays in Shanghai but my physical condition was so low that I could not make the journey, although lots of urgent business matters were awaiting my return to be solved. I had to send my guard there to expedite matters.

I do not know why Lima handed over the 200 so late to you for I sent it to her just before I left Peking in November. I did so, because I heard that you were selling all your things in order to get some money, and that your curios brought trifling sums. It was the least I could do for an old friend, and it happened that I did not need the money for myself.

Regarding the questions you or the Soviet friend asked, I have no time or energy to answer now. But one thing I can tell you that there was no question that

Dr. Sun died from cancer of the liver, which a post mortem fully proved. The PUMC made an analysis which fully satisfied all comrades including Sun Fo. So that supposition is out of the question. Dr. Krieg, the German doctor was also present. While Tuan Chi-jui and his subordinates were all rotters and did much to intensify his illness and sufferings, they were not able to poison him. You may recall that his illness started when he was in Japan on his way home-via Tientsin.

I heard that Lin Kuo-tsai had gone to Hongkong to try and urge his mother not to go to Honolulu, but owing to my sickness I could not speak to him. I do not know the intentions of Dr. Sun Fo or his children about returning. Mme. Liao told me that one of my brothers is in HK and she wanted to write and get him back. I also know that Morris Cohen is here in fact he has been waiting to see me for 3 months and half, but I am still unable to see anyone yet, although I would like to speak to him and hear from him all the news.

In the 50 days I was abroad I had to attend from 8-9 functions a day so you can imagine how exhausted I am. I shall have to make another trip abroad as soon as I am in better condition. You will be able to see from the movie all about my trip, as we had two cameramen along. I have over 6 albums covering the visits. I shall bring them back when I return, only heaven knows when though, as I shall have to go abroad again and then the Congress and other matters will require my presence here.

Please give Dorothy my greetings. My best to you both and hope that everything goes well with you.

With best to you both.

SCL

28 II 1956

3. July 17, (1956)

July 17th

Dear Dr. Ly:

Many thanks for forwarding Rose's candy & Junior's fine pictures of her 3 grown girls. It is quite a shock that Junior has 3 girl already. In my mind's image I still see Junior getting ready to enter school in Pomona. I suppose subjectively one never grows old despite painful warnings to the contrary .

But please tell me who is Phoebe? Is she your god daughter or Rose's cousin or what? And how long will she remain here? I hope to meet her oneday when my xxx heat gets better.

It has been a trying summer, and if I am still alive next summer, I hope to be somewhere else for Shanghai is too damp & too hot for me.

Has Rose got high blood pressure? If not, I should like to send her some very

fine ginseng, presented to me by 金日成同志. I know that you can't take it, nor can I, owing to above trouble, consulted my doctors.

Do please drop me a line when the heat subsides, so I can arrange to meet Phoebe, etc.
With affectionate greetings to you & Dorothy.

SCL

4. Oct. 31, 1956

Dear Dr. Ly:

As you know I think in English therefore when I write, I never bothered to consider what the translation would be in Chinese. Now in my article for the anniversary, I mentioned that Dr. Sun raised the slogan among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others (as revolutionary agitation) "No reverence for the throne", then I mentioned that he preferred "the solid truth to vain glory". I do not know how to translate that into the original Chinese, as I have forgotten the exact words he used. So will you now think of the shortest and most exact translations for these two phrases for me and let me have this at once please, for I must wire that to Peking. Phone me if you cannot send it to me at once and I shall despatch [sic] someone right away.

Another matter. We saw in the papers that you related to one of newspaperment [sic] that Dr. Sun used to work 8 hours a day. That was perhaps so when he was sick but he always worked from 8AM to 11PM, and he never had time for an afternoon nap either. He was immersed always in work, writing, receiving KMT members, or reading and drawing maps. Only once a year for an hour utmost that he would play chess with anyone. He had no special hobby.

Thanking you.

Yours sincerely,

SCL

Oct. 31, 1956

5. Nov. 20, (1956)

Dear Dr. Ly,

I have nothing to say in regard to members of the 2 committees, as to who is more fitting for the work. As for 王昆仑 the top leaders there consider him as a "孙科 man" always, so possibly that's why he was selected. I was never consulted on anything & in fact when I left Peking, I had no idea they've decided to commemorate Dr. Sun's 90th anniversary.

叶恭绰 was a good friend of Dr. Sun's who liked & respected him highly. I think he should be asked to write the 孙中山画传. Both Dr. Sun & I admired his good Chinese

writing very much. I am sorry that his bad health prevented him from participating more in the present work.

Many Peking friends are here so despite my stomach trouble, I should leave to set up some dinner for them again.

With best regards.

Yours ever

SCL

Nov. 20th

6. Nov. 23, 1956

Dear Dr. Ly:

I have been extremely occupied, although far from recovered from my fatigue, as so many magazines are demanding articles. I have just finished one for the New Observer and it is being translated.

Thanks for showing me your broadcast which I herewith return. Re the Research Institute, I have already sent a memorandum to Premier Chou sugges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evolutionary Research Institute, including the research of Dr. Sun's work and activities. What we need is an organized and systematic study, not a haphazard one. Such an institute would then be able to publish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addition to shorter materials, surveys and monographs. This will be of international value not only for preserving our revolutionary heritage.

Dr. Sun's selflessness and resoluteness all make a dramatic story the like of which has been seldom seen in history. Once again it is my proposal and view that the best scriptwriters be engaged to in writing a film story about him so as to bring alive the story of Sun Yatsen. Still many people alive who worked with him and can be of great assistance in the gathering of material on the personality and character of Dr. Sun at various stages in his career.

Before this has received Peking's approval, please do not mention this to people.

I do not approval of making out places where Dr. Sun had never lived, which certain people are doing. 63 Rte Vallon, we lived only a few months, so no use to take it over, please tell Ko Chingse, but 44 Rte Vallon was our office, so useful to take it over.

But I don't understand to what you referred as causing misunderstanding and incorrect news about 7 Hsiang Shan Lu. I have not heard anything in this regard and would appreciate if you would write clearly about what you said.

With best regards.

Yours sincerely,

SCL

Nov. 23, 1956

7. (Nov., 1956)

Dear Dr. Ly:

Never in my life have I been so harassed, so many long distance phones and telegrams demanding that I do this and that or write for this and that paper and magazine... I am suffering from frayed nerves and sleeplessness, and [sic] my life will surely be shortened at this rate. I have had no rest since I returned from abroad. My mind is awake all the time. Consequently, I am besieged with constant headaches, day and night and my gums are all swollen due to the tenseness of life.

I beg you to tell those people who ask for my life with Dr. Sun, that I cannot accede, for whenever I try to recall my life with him, it opens fresh wounds. I am not going to attend any of the memorial meetings for this reason. While others celebrate the occasion, I suffer instead. When I am less harassed I shall try to search my old account I wrote shortly after my escape from Canton and send to you.

This poem of yours will surely be welcomed by any paper or magazine in Shanghai. The China Reconstructs magazine has written me that they received such short notice for the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that they are simply caught with full hands. However, here is the address if you wish to try and send it to them.

北京东四区东黄城根甲 40 号

中国建设社

I am also afraid that the 4,000 people going to visit our old home will cause damage to the house on Nov. 12th. It is unwise to do so, only few leaders of each delegation should be admitted. Kindly bring this before the notice of the people.

Yours sincerely,

SCL

8. Feb. 10, 1957

Dear Dr. Ly:

I've been having a bad cough for over a week & the doctor fears if I leave for the north now I might have pneumonia, so I've to postpone my departure until the severe chest cold is better. Meantime, I am busy preparing an article for the 14th, so please pardon me for not being able to do any other reading. There are several persons here who might give you valuable suggestions, one of whom is 金仲华.

With best wishes.

Yours,

SCL

Feb. 10th 1957

9. Apr. 22, 1957

Dear Friends:

Thanks so much for the lovely basket of lilies. I got up only yesterday morning as Comrade Liu Shao-chi was coming to call one [sic] me, moreover I have to prepare myself for the approaching arrival of guests from abroad. I am still wobbly on my feet after 3 complete weeks of being laid up in bed. The nerve pains are not so acute now and rest and freedom from worries should help me to get rid of the trouble.

I must thank you also for forwarding the bag and scarf from Rose, whose eyesight must be deteriorating fast for I found the bag full of mildew, two toothpicks and residues of candy inside, while the mirror so important in a handbag was missing. However, please don't mention this to her. I only hope that she would come and have her eyes attended to by so competent an oculist as Dr. FSTsang, whose competency to deal with her trouble is without question.

With best wishes.

Yours always,

SCL

April 22, 1957

10. May 18, 1957

Dear Dr. Ly:

Sometime ago a man by name of 陈锡祺 from the Chungshan University of Canton wrote a pamphlet entitled (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革命活动) .

There were some discrepancies in his recording, among which was the allegation that Dr. Sun and I were married in 1914. And Chen ascribed this information as coming from you. Since this is of historical importance for the right dates to be given, I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Dr. Sun and I were married on October 25, 1915. This fact was recorded in the Tokyo Municipality. Furthermore Mr. Chu Jockman and his daughter Chu Muphia (朱卓文, 朱慕菲女士) were my witnesses, while Dr. and Mrs. J. Wada (well known barrister in Tokyo), Mr. and Mrs. Toyama and Mr. and Mrs. Mumeya were witnesses for Dr. Sun. Mr. Chu and his daughter accompanied me from Shanghai to Japan in the latter part of October and two days later I was married.

Sun Fo and his family were aware of the fact that his Father and Mother were divorced in April of that year, and later was notified by his Father of his remarriage. Perhaps the latter still possesses that letter his Father wrote him.

Yours very sincerely,

宋庆龄

May 18, 1957

11. June 25, (1958)

Dear Dr. Ly,

I am very sorry to hear that you are ill. Perhaps the accompanying magazine will make the enforced hours in bed pleasanter.

I myself have been preoccupied with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CWI 20th anniversary, the hearing of reports and the censoring work of literature that we are putting out for public consumption.

Mme. Liao despite her 82 years is very active and puts me to shame. She visited factories, talked to overseas members and attended exhibitions. My poor arthritic legs are so painful that every step I take requires effort.

Mme. Liao left at 6 am one day last week for Hang Chow and by 4 pm the same day she went boating on West lake! Marvelous, active person!

Trusting that you have received the CWI commemorative literature and with best wishes for your rapid recovery.

Yours very sincerely,

S.C.L.

June 25th

12. Sept. 4, 1958

Dear Dr. Ly:

It has been on my mind to write you for some days but the painful joints now extended to my fingers prevented the realization earlier. I do hope that you are feeling better now. I think you are wise not to resort to an operation for there are Chinese remedies which have been so effective in curing certain ailments. Plenty of fruit juices are also recommended for such cases.

This has been a most trying summer for me also. I did not go away to any resort in the hope that the heat here may be beneficial for my rheumatic troubles. But this has been an illusion. Perspiration kept pouring down from forehead like waterfall all day long, due perhaps to the fact that last winter when I was in Moscow, I took some Bouquit light treatments for the neurodermatitis spots on my forehead. These spots are reduced considerably, however the unsightly condition remains. It may take time to cure them.

While my colleagues and friends are accomplishing much in the Big Leap forward campaigns, I have to sit quietly home and nurse my pains. Walking up and down the stairs even gives me trouble, thus I have refrained from inspections in some factories which I should carry out before returning north. By the way, so many streets are being widened in Peking and many houses have to be torn down, including my home there this winter. So I shall be living in another part of the city

I think. Peking is undergoing vast improvements that it will certainly be one of the biggest and most beautiful capitals in the world soon.

A friend brought me some jasmine blossoms etc from Soochow which I think you would like with your tea. But the peas please let Dorothy enjoy for they are hard for patients to digest. I close with the hope that this may find you in better health and with the approach of autumn your general condition will improve greatly.

With best regards to you and Dorothy, who I hope manages to keep well.

As always yours,
SCL
Sept. 4, 1958

13. Dec. 11, 1958

Dear Dr. Ly:

Here's another CR issue which I hope you and Dorothy will enjoy.

Best wishes for your health.

As ever,
SCL
Dec 11, 1958

14. Feb. 5, 1959

Dear Dr. Ly and Dorothy:

Many thanks for forwarding the greeting card from Rose Tan. I am indeed sorry to hear that you are not back home yet for I telephoned twice to your house unsuccessfully during the New Year holidays.

I, myself, am also under medical treatment for a heart ailment which was discovered in 1953 by the Hua-tung Hospital but of which I had remained ignorant until recently when I went back for a check up when I felt sick. My left wrist was injured 2 weeks ago and the bone masseuse is coming daily with 石筱山医生 to treat it, at the sametime, I am also getting some treatment for my rheumatoid arthritis. I hope that we shall triumph over our illnesses with Spring in the offing! Everything otherwise is progressing so well that we should be optimistic.

Here's our latest magazine.

With best wishes to you both.

As ever yours,
SCL
Feb.5, 1959

15. Nov. 7, 1959

Dear Dorothy:

Your letter sent to my Peking address has just been forwarded. I am extremely sorry to hear that Dr. Ly is still in hospital. Perhaps if you write to Rose Tan at HK, she will be able to send him the medicines that did him good before. I have given up hope of ever getting anything from HK, as my letters to old friends there remained unanswered. Even Rose Tan seems anxious to avoid communications with her old friends here. But perhaps in the case of one needing medicines, she would not withhold help.

Lily's grandmother before passing away, wrote me and Madame Liao also to obtain permission for Lily and family to go down and see her. We tried but no answer came in either case. I was asked twice before by friends to help them go to HK for a few months but neither of these people turned up even after two years, so I cannot blame the authorities for being sceptical.

I do not know about that portrait of me in the Sino-Soviet Friendship Monthly. If you have a copy, please lend it to me for a day.

Dr. Chang wei-feng and the nurse Chen who attended Dr. Ly in the hospital come often to see me. When I am permitted to go out visiting, I shall pay Dr. Ly a visit. My arthritis became worse so I am resuming my daily treatments.

Sending you a few sweetmeats which you must use up soon as the damp weather doesn't preserve food of any kind.

Meantime with best wishes to you both.

Sincerely yours,

SCL

Nov. 7, 1959

16. Dec. 3, 1960

Dear Dorothy:

Thanks for your letter telling me how you have enjoyed the crabs. Only I wished that Dr Ly could have shared with us. To tell you the truth though, I myself am not permitted to taste it as it causes skin irritation.

Regarding Dr. Ly's desire to visit the USSR, I am really sorry that it is not within my power to help materialize it. Only the party can decide this. Liao Sheng-chi is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deciding this matter. So he is the person to whom Dr. Ly should make the application.

With best wished to you and Dr. Ly.

Yours sincerely,

宋庆龄

Dec. 3, 1960

17. Feb. 3, 1962

Feb. 3, 1962

Dear Dr. Ly & Dorothy,

Many thanks for your beautiful pat of fine decorations & the tin of Ovaltine rusks which I've never tasted before. I am sending herewith part of the oranges that 马湘先生 sent me, some apples, the famous Yunnan Puer tea & some 玫瑰猪油年糕 which Dr. Ly likes very much.

I have a heavy cold & cough so I am not allowed to get out of my bedroom yet, or I'd like to visit you during the holidays.

Here's wishes you a very joyous 春节 & that we may meet in better healthy.

Affectionately,

SCL

18. Feb. 20, 1962

Feb. 20, 1962

Dear Dr. Ly:

The enclosed letter from Steinmann was somewhat of a surprise for me. Is his wife the daughter of Tseng Kai-hwei's second wife? I am sending it as it might be of interest to you. I have not answered it yet, as it looks rather far-stretched (as to relationship to me) . Please return it when you are through.

I heard that the Congress will be postponed, perhaps around 15th of next month it may be convened. I hope that you will gain enough strength to attend it. The change of climate and surroundings may do you good, if the doctors do not think the trip would be too strenuous for you. I have not been out at all since arrival as my joints, even in the fingers, give me pain. I was told by the doctors that Parotin may not be good for me, as I easily get urticaria. However, they are trying the injections on others first for observation before trying it on me. But I am very grateful and appreciative of Rose's thoughtfulness.

With best wishes to you and Dorothy.

Ever yours,

SCL

P.S.

张福星医生 (whose wife passed away 3 months ago) is in Shanghai for a rest, staying at 沧州旅馆。

19. Mar. 3, 1962

March 3, 1962

Dear Dr. Ly:

I am indeed sorry to learn that your doctor would not let you leave the hospital to attend the Congress this time, which I think will be an unusually interesting one. Furthermore, a change of surroundings would be mentally refreshing. Although I have been back for almost 2 months, I have been out only once, to see the dentist, otherwise I have been staying strictly at home, mostly upstairs, since going down the stairs pains me in every joint. The only person around who does not seem affected by growing age is Mme. Liao. She came down with her entire family to Nanking and she herself is now resting in Hangchow. To travel around at her age - 85 - is quite a feat, moreover, she enjoys it. How I wish I could be half as active, although much younger than she! Her daughter is still getting treatments at the Huatung Hospital and is, more or less like me, unable to move around much.

Allen Teng, Lily's husband, wrote me that he is planning to go to HK to see Lily, who has heart trouble. He himself seems to be very sickly and is not working. I wonder whether he needs money, since he is without work? He also mentioned to me that Ping is the only one in the family, staying at HK, and has now a son big enough to enter the University. I can hardly believe it, for it seems only few years ago that he was a young boy running about in our place... How the year fly!

You mentioned to me of my "mission" . What have you in mind? I do not know of any mission I am supposed to undertake. I am too incapacitated to be any mission, being barely able to go about even in the house.

If there is anything you or Dorothy wish from the north, please let me know. Meantime I send you both my affectionate regards.

As always,

SCL

20. June 30, (1962)

June 30th

Dear Dr. Ly:

Madam 廖仲恺 has written her memoirs with the help of some 妇联同志 as well as her daughter. It would be good for you to get her help on this theme since it was so personal, she will remember everything concerning Chen's treachery & rebellion.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 I did not escape from the 观音山 until the morning of the 16th for the 总统府 which was below the zigzag天桥, where for several hours & remained until 4 pm. That night 马湘, 黄惠龙 & I spent at the home of 马伯霖 who was garrison head of Woo Sung. Not until we heard that neighbors were making enquiries about

us & that traitor Chen's 走狗 were searching for me, that I reluctantly headed for 岭南大学 for the home of 钟荣光 whose wife I know quite well when she was working with me at the 慰劳会.

The next day, Dr. 伍朝枢, son of 伍廷芳, came to see me in a motor launch & gave me some news of Dr. Sun. We left for the 永丰军舰 accompanied by 马湘, 黄惠龙 & Norman, but not Cohen. After an hour's private interview of what was to be done, I left for 岭南 again. The next day Sun Fo & Tai En-sai 戴恩赛 accompanied me to Hongkong where we spent the night in a queer house of a curious old woman who spoke 客家话. Next day I went to board the steamer for Shanghai, dressed in my maid's clothes. 马湘 did not accompany me to 上海. I asked 马 & 黄 to go back on the 永丰军舰 instead. Upon arrival in 上海 I gave out an interview about the treachery of Chen.

If I can find this account I shall lend it to you.

Best wishes

Yours

SCL

马湘 is still living but 黄惠龙 died long ago. The former can vouch for what I wrote.

连声海 not 星海

21. July 28, (1962)

July 28th

Dear Dr. Ly:

Please accept my congratulations upon your election on that important committee at the recent regional conference. I was unable to attend all but the first session, owing to bad health. Indeed, it was a most trying trip from the north. We met air pockets near Pengpu and the storm forced us down at Nanking where it was raining heavily so we could not visit the Purple Mts. Also, it was terrifically hot. Telephone connections were made with Shanghai so after lunch we were able to board a special train which brought us home the same day. However, the clammy, sticky and damp warm weather caused rashes to break out all over my body from head to foot, rendering me incapacitated. Doctors are now treating me and I hope the rashes unsightly as they are will soon disappear after cooler weather approaches. However, there is certain work that I must fulfill, despite doctors' orders to keep absolutely quiet and rest. Before I came down I was asked to prepare a memoir, to mark the birth anniversary of Dr. Sun, about how he came to cooperate with the CP. It is really a most timely article and must be written for historical reasons.

As I recall it, it went back exactly 40 years ago. There Dr. Sun met certain Soviet friends, it was nearing the end of April 1922, just before the coup d'etat of

Chen Chiung-ming who instigated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move against Dr. Sun who was recalled from the front-the expedition against the northern warlords. It was forty years ago. The world has indeed made great strides since the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are the two grea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socialist camp at present. Also, now the imperialists are praying for a split between the socialist countries, hoping for our collapse and estrangement within the world socialist camp.

If you could give me some facts or materials to incorporate in my article on this subject, as to why Dr. Sun cooperated with the CP, they would be of immense help in the summing up of my article. One person's memory alone is not reliable enough, and this is a historical piece. So please let me know soonest what you know.

Hoping that your health is improving and that we shall meet before my departure for the north again.

With best regards and wishes to you both.

SCL

22. July 19, 1962

July 19, 1962

Dear Dorothy,

Many thanks for your note and the lovely flowers. I meant to send you this cherry jam and box of Peking sweets last week, but arthritic pains and the terrible heat rashes I am suffering from kept me from doing anything. Perspiration keeps pouring down from head to feet all day long. I hope you both are not suffering so much as I am.

With affectionate wishes and hoping to see you when the weather cools down.

As always, yours,

SCL

PS/ Please tell Dr. Ly that I am glad he enjoys our CR magazine.

23. Aug. 6, (1962)

Peking
August 6th

Dear Dr. Ly,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I am glad that you like the China Reconstructs magazine. We have been trying to be punctual but often meet with difficulties, as some of the workers on our staff have to go abroad now and then to attend the various meetings.

I have not been in good health, my arthritis pains me always. Only when the masseuse works on my nerves, I forget the pains an hour or so. Then I have had 2 of June and July. So if it comes again on this 13th I might become superstitious! Each

time the attack lasted a week. The doctors have had to stay here throughout the day to watch over me, but they could not discover the cause of my illness.

The weather has been most unbearable, hot and damp and I keep on perspiring, despite the electric fan going at free speed.

I hope that your health will keep on improving so by the time I return, I shall be able to see you.

I do not know what gifts Rose has sent me, but shall be grateful if you'd ask Dorothy to forward to Limah at 1843. She will keep them for me until my return. She is my honest and has been with me for over 30 years.

With my affectionate regards to you and Dorothy

Yours ever,
SCL

24. Aug. 15, (1962)

Aug. 15th

Dear Dr. Ly:

Many thanks for cutting down & for Dorothy for typing what you could recall of that period. I'd have written earlier but was laid up with stomach ailment for many days, in fact are still suffering from heat rashes & pains from arthritis.

I am working hard, getting up at 3am as it is quieter to work then. This region has changed a lot since last year, the blowing & practicing of trumpets in the morning & the cries of children & the hammering of metal wares in my neighborhood run me ragged, rather my nerves become ragged by these sounds. I say that there should be a fifth Freedom, Freedom from noise!

Best wishes & hope you'll enjoy these 2 tins I've just received from foreign friends.

Ever yours,
SCL

25. Oct. 5, (1962)

Dear Dr. Ly:

I have been wishing to draft you a line inquiring you about the progress of your health, but being still bed-ridden and only allowed to sit up for an hour at a time, I have postponed it until this morning.

The article on Dr. Sun's cooperation with the C Party was finished some weeks ago, and sent to 周总理 for 审查, as he was the one who asked me to write up the

memoirs on this subject. He has phoned me that he intends to publish it on Nov. 12, the birthday of Dr. Sun, and that he will have to cut out some parts as the article is too long. That another article will be written to appear along with mine on that day. So I am watching to see it appear on that anniversary.

Madame Sukarno insisted upon seeing me so persistently that our people in Peking had to phone me, requesting me to “receive her at my bedside for 2 minutes.” This was rather awkward, so I decided to get up and give her some tea and refreshments, hoping that others accompanying her would do the talking as well, she stayed for 20 minutes, after which I went to bed again.

They are coming to make a graph of my heart today, so I must stop now.

With affectionate greetings to you and Dorothy.

SCL
Oct. 5th

26. Dec. 28, (1962)

Dec. 28th

Dear Dr. Ly:

Here is a clipping that I cut out from some magazine for you to read. I wish there were some medicine available that would aid you. Perhaps 林国材 can obtain some new drugs for you to try?

As for me, my pains will remain as long as I live. I am finding walking very difficult. Perhaps I should live in the tropics. But then I dislike hot weather. There are too many contradictions in life.

Jessie told me that you related to her that Rose Tan is suffering from some trouble in her arm and that it has been tied to some some [sic] steel gadget. What is the matter with Rose, and do you hear from her?

With best wishes.

SCL

27. Jan. 1, 1963

Dear Dr. Ly & Dorothy,

Hope you will enjoy the fruitcake & the parcel of sweets which I gave to children on New Year's Eve.

Wish you all the best.

SCL
Jan. 1, 1963

28. Mar. 16, (1963)

March 16th

Dear Dr. Ly:

I am writing personally to thank you & Dorothy for the lovely basket of flowers you sent on Dr. Sun's memorial anniversary.

I hope you will enjoy the tin of biscuit & our CR magazine.

The climate is very damp. Thus victims of arthritis find life difficult. Soon I shall be thinking of returning north, where I shall have to change house again which I dread, as moving is never a pleasant job.

With my best wishes to you both.

SCL

3月16日

29. Mar. 18, 1963

March 18, 1963

Dear Dr. Ly:

Last night I could not sleep a wink because I heard there was a rumour about my promotion. My health is very bad, each year I feel frailer, and there is such a struggle to get up from the bed, although I sleep very little. I hope you would be kind enough to tell me what is the rumour, that is, what kind of promotion they proposed to give me. It seems to me I am already too highly promoted, being the first vice chairman. I was thinking how I should go about asking for retirement for I am really too sick to attend all the meetings, etc. Please answer me and I shall of course destroy your letter and keep the matter confidential.

I am so sorry that poor Dorothy is not yet recovered from her skin trouble [sic]. I think it is due to lack of certain vitamins. If there is anything I could do for her, please let me know.

In great haste out with affectionate greetings.

Yours ever,

SCL

30. Apr. 20, (1963)

Peking, April 20th

Dear Dr. Ly:

I have been back for 2 weeks already and feel quite exhausted with the operation of moving from 前海 and unpacking & rearranging my accumulated possessions. I hope that you & Dorothy though are keeping well.

I have received the hair pomade from Rose & will write to thank her.

Indeed this new residence is very spacious and elegant, with a small stream surrounding the house, an artificial mound that is supposed to look like a hill. I was feeling uneasy about occupying this spacious mansion, when others who have done so much for the country & people are living in very modest quarters. I've got an explanation for it but not the one you heard about. My health is too poor, not to speak of my lack of knowledge, to be burdened with more responsibilities.

Am getting daily treatments, with a doctor & nurse to help, for my painful joints. I do much reading & am trying to catch up with the backlog of duties assigned me.

Allen Teng wants me to help him go to HK, but you know this is impossible.

Please forward enclosed note to Allen. What is his Chinese name? 邓伟 or what also I've forgotten his address. My memory which used to be excellent is beginning to deteriorate, so whenever I read, I have to take notes which is a nuisance.

My address is: 北京后海, 北河沿 28 号. If you come to attend the Congress you must come to see this beautiful landscape and enjoy the fishes we are breeding in the stream.

Warmest wishes to you both.

SCL

My fingers are so tired so please pardon scrawl.

31. Sept. 11, 1963

Confidential
Sept. 11, 1963

Dear Dr. Ly:

Your letter of the 8th inst has arrived. I am most happy to learn that your health will permit you to come up north during the sessions and that you may be able to return home again. This is indeed good news. I sincerely hope that I shall be here during your visit, for confidentially speaking, I have received an invitation to go abroad this winter. If the Government decides to let me go out for a while, I might miss your visit. If I am here, I will certainly hope to show you and Dorothy my new abode. It was an old palace which the Prince Regent had built for himself, but the revolution prevented him from ever occupying it. The grounds are beautiful, with a small stream running across the place. Owing to my arthritis, the government has built a second floor to the house, so it is not so damp. However, it has one fault, it faces the west, so it is very hot in the summer. And upstairs it is 3 degrees hotter than downstairs. Then the place is so big that the kitchen is very far away, which

is very inconvenient during the winter when the dishes get cold before they reach the dining room. However, it is less noisy than my former place, which is right next to the sea where in the summer the crowds come to swim, and in the winter to skate.

In 1966 we will commemorate the centenary of Dr Sun's birth. I have put down your name as one of those who will form the committee to prepare it. Some persons who know well of Dr. Sun's activities before 1911 are living abroad. We will have to ask them to write up what they know, since this is for historical reason and they should not refuse to cooperate. As for all the materials I had gathered about Dr. Sun since I returned from abroad in 1931, I am painfully sorry to state that this box was left behind in my old home (thinking that the Japs would not tamper with things of Dr. Sun's) along with my own possessions. But as you may remember that all my things were ransacked by the Japs and lost to me forever. I thought you had read about the ransacking of my old home, as well as my pied-à-terre in Kowloon... It is painful to recall these facts. I have not had time to prepare anything to recall those years of my marriage or what I had learnt of the past.

It takes all my time to keep up with present conditions thus there is no chance to recall anything. As one grows older one's memory suffers, especially of events which I did not participate in, before my marriage. However, there are persons still alive who can contribute of what they know or what they had experienced during that eventful period. Mainly on these persons, and from the 历史研究所 that we have to depend upon for memoirs.

I am in the midst of preparing my address so am [sic] most occupied with the present requirements. I sit most of the time working over the different materials, so my circulation is bad. Kuo Tsai, I am sure, had no chance to observe that walking is difficult for me. Sometimes I have to use a stick to walk about for my ankles are weak. The doctors come every day to give me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treatments to enable me to suffer less pains. Then I get injections to strengthen me. I used to feel so tired that I could hardly walk up the stairs. But these treatments are taking effect, and I am beginning to feel less tired.

Have you any way to correspond with SF and ask him to write up of what he knew about his Father's activities? It would be most helpful for he knew many, many facts, being himself actively engaged in KMT activities of that period.

Hoping that I have made everything clear to you, and with my best wishes for you and Dorothy.

As always yours,
SCL

32. Oct. 10, (1963)

Oct. 10th

Dear Dr. Ly:

I hope that you have received my letter saying that I have replied to 黄梦熊 and the letter he sent via you.

It is a splendid piece of news that you are not in hospital now and are enjoying home and surroundings. I hope to see you and Dorothy here when the congress convenes. My departure for Ceylon will be discussed and settled by the Chairman. Owing to increased activities during the 国庆节. My old trouble has returned, which is very annoying besides the other affliction 关节炎, which never leaves me. I am already bundled up with yarn and 棉袄 around me. I hope to see you and Dorothy soon. Meantime send you my affectionate wishes.

As ever,
SCL

33. Jan. 15, 1964

Jan. 15, 1964

Dear Dr. Ly:

Many thanks for your letter of the 12th. I was most unfortunate last November. I fell down and fractured my wrist (right) bones seriously, that I had to be in plaster cast. Even now I have to be treated & massaged from shoulder down to tips of fingers for 2 hours daily. To me it is the greatest misfortune, not being able to use my right hand. The hand was not in proper position & looks grotesque, because the orthopedic surgeon said he had to use nails (stainless) inside to clamp the bones together & that I'd suffer too much - "intolerable pains." When health & condition of hand (not elbow as you thought) is better I must go abroad as promised.

Please tell Rose about my condition & why I can't yet write to thank her for the gifts. Please ask my housekeeper 李燕娥同志 at 1843 to get them from you so she may forward to me at once, for I need them very much.

Meantime, my affectionate greetings to you & Dorothy.

Pardon this scrawl as it is difficult to hold the pen.

As ever yours,
SCL

34. Mar. 26, (1964)

March 26th

Dear Dr. Ly,

Last year when I was home Allen Teng sent me a letter asking me to help him and

his children go to Hong Kong to be with his wife and son Stevens. I remember I sent it to you and requested you to make him understand that my duty is to persuade people to come back and not to leave China. I don't know whether he had seen you since. Now again, he has written me on the same subject. It is not possible for me to make him understand what I can and cannot do, altho I am “付主席” . So I am again requesting your aid to explain that his request is not possible for me to solve.

I am suffering from severe nerve pains, sciatica and pains in the joints, besides a heavy cold which prevents me from going to see dentist and have a wisdom tooth extracted soonest. The bones in my wrist were badly set and knitted, thus my ulna bone juts out like a walnut. I have consulted several doctors and all regretted very much for the poor work of the Peking 西医 & concluded the only thing for me to do is to have an operation to correct the bad job. But I don't want to undergo more pain & trouble so shall leave my poor lop-sided hand & wrist as it is. I feel very unhappy about my ill luck & all the sufferings I had undergone since last November.

With affectionate wishes to you & Dorothy.

As ever yours,
SCL

35. Apr. 4, (1964)

Dear Dr. Ly:

I am very glad to know that you have had a very nice trip to Hang Chow. When you are stronger then you can visit Canton. I have not been back since 1940. Jessie is just back from 桂林. She writes me she had a fine trip but feels very tired but still wants to come & report to me about her trip. I have a heavy cold still so I can not visit the dentist to have a wisdom tooth extracted.

Thank you for telling Allen about his duty. Lily should return & keep the family together.

Here are a few Easter Eggs for you & Dorothy, which 李姑 dyed yesterday.

Yes, it is very sad that 隋同志 had a stroke when he visited his family last year & now he is half-paralyzed in the hospital. The news made me very unhappy & up to now I have not gathered enough courage to visit him. I am afraid my emotion might cause him unhappiness & make him worse. I have sent 2 of his children to the 幼儿园 where the influence is better than his home. The children are extremely clever. I visited them at the kindergarten upon my return & found them quite accustomed to their new routine & surroundings.

With best wishes.

As ever
SCL
April 4th

Miss Gerlach told me you had called on her twice.

36. Oct. 2, 1964

Dear Dr. Ly:

Many Thanks for your letter of the 28th Sept. I do hope you will be able to attend the congress this winter. I am afraid it will be postponed until December since there are so many other meetings on the agenda. So you must bring some warm clothes along.

I have no idea where Mrs. Eugene Chen kept his autobiography. You know she went to America just before liberation with Ho Yingchi & they were married in N.Y. City. But they moved to Singapore after some years stay in US but they finally were divorced. I understand she has not even fulfilled his wishes (Eugene's) that his ashes be taken up on airplane and scattered below. Terry & Jack Eugene's sons are quite angry about this, as well as the fact that she has done nothing about publishing his autobiography. Meanwhile, Terry is writing a book about his father's past. Eugene Chen did not turn over to me the manuscripts & copies of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Dr. Sun, Lenin & other important persons, which he, as secretary, kept on file. Thus I cannot help you in collecting them for publication for Dr. Sun's centennial commemoration.

We have had a hectic but most grand Oct. 1st anniversary as about 3,000 guests arrived from many countries. The evening of the 30th Sept. there was a banquet for over 5,000 persons. There were 20 separate foreign delegations with whom we had to have pictures taken together! It was most fatiguing indeed. The Chairman was in good health & spirits, so he could stand up for 2 hours yesterday on the reviewing stand, as demonstrators passed in colorful display yesterday.

My wrist is still under hot wax treatment as it gives me much pain & trouble. The doctor who set the fractured bones was 粗暴 He knows nothing about 技术革新 as 陈中尉 & many other young doctors are possessed with nowadays in our country.

I have much to do, receive foreign guests, read documents & instruct the secretary how to answer the pile of 人民来信 so I must say goodbye now. Pardon the hurried scrawl please.

With my warm regards to you & Dorothy.

Yours ever

SCL

Oct. 2, 1964

PS. 林达光 & his family have left for Canada. He expects to see Pearl soon.

37. Dec. 13, (1964)

Dec. 13th

Dear Dr. Ly:

Yours of the 28th has arrived. I hasten to reply that you are quite correct in

demanding this withdrawal of that unfounded statement. I was married in 1915 (Oct. 25th) & ever since then I never even heard of 朱执信 writtig about Dr. Sun's plan to start a stock exchange in 1916. As we all worked closely around Dr. Sun. such a plan would not fail to reach my ears, for [以下缺页—译者]

38. Mar. 6, (1965)

March 6th

Dear Dr. Ly:

You can understand now why the 历史博物馆 did not exhibit my marriage certificate to the public, when your friend went to see it. Henceforth anyone wishing to see the original can apply to us for a card (as suggested by the museum & 廖梦醒) and can see it.

I wrote to 梦醒 to find out why the Museum failed to exhibit it & here is her reply after she made a trip there herself to see the director of the Museum.

Also the manuscript which you might like to read. Cynthia said she found many mistakes there. They were translated from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n English owned paper in HK)

Please return same to me by Tuesday morning as I must return it via some trusted person leaving for Peking there.

With best regards.

Yours sincerely,

SCL

Please also return 梦醒's letter as I must answer her.

39. Mar. 10, (1965)

March 10th

Dear Dr. Ly:

Please read these 2 enclosures & return to me by tomorrow morning. People who maliciously slandered me can satisfy their curiosity next year when they see the original certificate. Our marriage was also registered in the Tokyo Municipal Council by our lawyer 和田瑞. Dr. Sun wrote his son when he & his (Fo's) mother were divorced by mutual agreement in April 1915 (when I was still in Shanghai) Fo may still posses that letter. As for not showing it & informing others about it, he may have his own reasons for it.

In haste but with thanks to you & Dorothy for the flowers on the 8th. I couldn't write sooner as I have been so busy.

Yours ever

SCL

40. (Mar., 1965)

Dear Dr. Ly:

I assure you that on the marriage certificate there was the date of the month but Cynthia in her haste, forgot to copy it down. As you will see next year that no one could possibly find errors there. As for certain old partisans raising doubts & questions, I wish to state that there is no law in existence that anyone getting married should have the consent of these wicked slanderers. As the Latin proverb goes “Mens conscia recti”, a mind conscious of rectitude, so let these dogs bark.

Everything was in order on the certificate, the year 1915, the date of the month Oct. 25th. Moreover, if they think that certificate was “假造的” (!) then they can go to the Tokyo 市政府 to take a look at the marriage registry.

Please give this magazine to Dorothy.

Best Wishes.

SCL

41. May 19, (1965)

May 19th

Dear Dr. Ly: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see the enclosed and also the rebuttal you've made against the groundless charges against Dr. Sun. Those people are really ridiculous! How could Dr. Sun go abroad wearing Chinese long gowns, etc! He wasn't Li Hong Zhang! You see even the present leader follow his fashion of wearing 中山装, because it is practical. In my days, Dr. Sun never ate foreign food at home. He was a vegetarian and ate only vegetables and fish, not even eggs. We never spent more than 300 yuan per month which included food and clothing. This money was handed to me by 林焕庭 each month, as Dr. Sun never kept a single cent. All transactions (monetary) was handled by 廖仲恺 and 林焕庭 as well as 刘纪文 who is still living to confirm the above.

Once when Dr. Sun was proceeding to Canton I found his shoes too old, so I bought 2 pairs for him to take away. He disapproved my action by saying: “I have only 1 pair of legs, why buy 2 pairs?!”

As for his wearing foreign clothings, naturally they couldn't expect him to wear the Chinese long gown abroad. How absurd and fantastic such charges!

Recently our government sent 阿琬 (Grace Tai), Dr. Sun's daughter, a very large sum of money for her upkeep (in U.S. currency) which means she will be comfortable for life. She is living with her married daughter (don't know her husband's name) and gave me only her post office address. I was told that even Ah Ping and 林国材 don't know where she really lives and why be secretly. She sent some of Dr. Sun's

old clothings, pictures and some phonograph records, 1 of Dr. Sun's speeches to the government in return as a token.

With affectionate greetings to you and Dorothy.

As ever,
SCL

p.s./

伍廷芳 was for more progressive and reliable than 唐少川. I don't remember who killed him when he was about to join the Japanese in Shanghai. 唐 was a spendthrift. He amassed a great fortune and lived like a king-King Faroukh who died recently in Italy for gourmandizing a whole sheep!

Pardon this scrawl as I must finish my article for the Peking Review on the education of our children.

SCL

42. July 9, (1965)

July 9th

Dear Dr. Ly:

I am glad you are so much better in health that you are considering going away during these unbearably hot days. I wish I could go to Kuling also, but I am still under treatment and can not leave. They have sent down a 推拿伤口的专家 from Tientsin (天津) to look [sic] me. This man's family has for 18 generations been carrying on this particular treatment. So he has some experience, unlike the ordinary 推拿大夫。

I hope to hear from Rose oneday. Glad she has a nice place now. Do you know whether SF is still in HK?

Heard that the Taiwan people are making big preparations for the centenary.
Best wishes to you & Dorothy.

Yours
SCL

43. Nov. 10, (1965)

Nov. 10th

Dear Dr. Ly:

You must have read about the preparatory meeting opened by 刘主席 to commemorate Dr. Sun's centenary next year. 廖承志 is the 秘书长 of this Committee of which you are one of the members. Yes, meantime 孙哲生 & wife & Ah Ping & wife have arrived at

Taipeh to attend the celebrations there.

It is 2 degrees below zero here now so today we started to turn on the steam heat. I hope Shanghai is not so cold. It is really a waste of coal in this big house & I feel unhappy about it for one day's coal consumed here can heat our Shanghai house for over one month!

The situation in Indonesia is becoming clearer each day. It reminds me of 1927 in Hankow. There is so much corruption in that country & the class struggle has become inevitable. I am afraid the 华侨 there are having an unpleasant time. But our ambassador, I am glad to say, is a very capable man & a courageous one. He was ambassador in Burma when I visited that country in 1957 and know him & his family well.

With affectionate greetings to you & Dorothy.

As ever,
SCL

44. Feb. 15, (1966)

Peking
Feb. 15th

Dear Dorothy:

Many thanks for your letter. It is indeed surprising that there was deep snow in Shanghai on the 11th! Here it has been so dry that my skin itches all the time. Every time after bath I have to apply 甘油 all over me.

I missed home very much, but there is much work to be done here so I cannot return. In fact, I am preparing an article on Dr. Sun which requires much reading & reflection, since this article will be read even hundred years later. From this angle I have to write.

I am glad that Dr. Ly was able to attend the preparatory meeting of the centenary. The Museum of Revolution has been calling me to let them have all the materials about Dr. Sun which were on exhibition 10 years ago & later returned to Shanghai. But I find myself in a quandary for that Shanghai committee also has the right to exhibit them. So I asked them to write to the Shanghai authorities themselves. My stay in Peking also prevents me from sharing some more personal items which I looked up in my own filling cabinet. It is difficult for me to make trips back & forth, owing to my arthritis & pains in the back. Otherwise would do so.

I wish Phoebe could come here to work. Can she type?

Do take the best care of yourself & Dr. Ly. 1966 will be a very trying year I fear, with Johnson's stupid & wicked intentions. But Shanghai will be ok. I think as they want to preserve it for their own ends. However, we are prepared for all contingencies & always on the alert.

With much love & best wishes to you both.

As always,

SCL

Please pardon this ball pen. It is very dim & the best I can obtain here.

45. Apr. 10, 1966

April 10th

Dear Dr. Ly:

Yours of the 6th has reached me. You were absolutely correct in your reply to 陈望道's criticisms against Dr. Sun. All of us who attended Christian institutions were made to be baptized sooner or later. When he was imprisoned by the Manchu xxx and released after strenuous attempts of his old medical professor Dr. James Cantlie, he lived for safety's sake in the home of Sir James & Lady Cantlie, who were devout Christians and had a great influence over him, when he was under great strain and stress. When he wrote "Kidnapped in London", he listened to those arrouned him and wrote that "god [sic] had rescued his life". Thus people use this as a proof that he was a Christian. I know from his own mouth that he was under great xxx stress at that time, but he never believed in god [sic] or gods. He called the missionaries in China as being "hypocrites or misguided" and attacked Tong Shao-yi for wanting to hand over certain funds to them for "safe-keeping" for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When Tang. and Wu Tingfang were 总裁 when the parliament was moved to Canton to function, We often talked about the hypocrite of the missionaries, when I related to him why I myself disliked them. As a child I was taken to church on Sundays by my mother who was a devout Christian. When we arrived at church the pastor and his assistants used to drive away the poorly clad women in the front pew to give up their places to us! It caused resentment in me, even as a child, that poor people were so treated.

By the way, 陈望道's wife was for decades the leader of the shanghai 女青年会 until she passed away a few years ago.

As for Dr. Sun's lectures at the 中山大学 (so-named after his death) he never had notes, but spoke extempore & impromptu every time. Both 邹鲁 & 黄昌谷 were never progressives, not even to speak of being 革命 in any sense of the word. Both were opportunists & corrupt. I remember now those in the 大元帅府 despised 黄昌谷 for at every chance, even taking group photographs, he used to fight to stand in front and in the most prominent place. I am sure 马湘 would remember this if asked.

As to using fountains, 田枢 was quite mistaken, for Dr. Sun always used this fountain pen when he corresponded with his foreign friend and when he wrote to me before and after our marriage. He had several fountain pens given to him, but they were lost or disappeared. Very likely the small red fountain pen was given to him by

杨仙逸 who was attached to us as a builder of the first airplane with the American he brought over from Honolulu.杨仙逸 also taught me to drive the automobile, as a precaution to guard Dr. Sun, as 孙传芳 was trying to bribe our drivers etc to kill or drive us to their traps, for which I was always grateful to him. (Thus I was the first Chinese woman to obtain a driver's license from the French Concession) 杨 was also from 香山 or 中山县 so we were like relatives. Even the suit that Dr. Sun always wore was another gift brought to him by 杨 when he returned from a trip to Honolulu, to bring back his family. I recall that little red fountain pen stolen from Dr. Sun's desk. Wonder how it was found? I myself had several pens there. Some of which were also engraved with my name or initials on them. One such was found by a friend at a thieves' market in 昆明 during the 抗战时代. But it was so decrepit that I left it in 重庆— no longer useful.

Now as to the colored eggs, we dye them every 清明 for the sake of children who love to hide & find them — nothing connected with religion, or Easter, just as we relax at Xmas without religious significance.

I hope you can read my heavy writing — as the thick pen is easy on my eyes. I have much to write, I was presented with this pen to ease my often strained eyes.

The pictures of me you saw flattered me. In reality my eyes are either puffed up or awaken from insomnia & much work. I sleep very little despite drugs. If I don't read or do any work, then I can sleep better. But the main thing is to conquer one's mind: but how can one live without reading! Contradictions again!

Affectionate greetings to you both.

As ever,
SCL

I know certain persons are always spreading slanders against me, even before yours presence. You should slap their faces if they do so again!

46. No dated

Dear Dr. Ly,

I am very sorry that I can not accept these gifts as I told you in my afternoon message. Therefore I can not write to thank them. Please don't forward their or other people's gifts henceforth as I am too busy to attend to much courtesies, with my work accumulating each day & obligations multiplying.

Thanks for the trouble.

Yours gratefully,
SCL

47. Dec. 5

Dear Dr. Ly,

Thank you for your message. I only wish you could stay here longer though, as I haven't had a chance to chat with you & Dorothy. I am hoping to get this chance when I return home before 春节. Meantime, sending some sweets for the journey.

Hoping you'll enjoy visiting our old 根据地, 羊城。

Affectionately yours,

SCL

48. July 2

July 2nd

Dear Dr. Ly:

The 1st man sent by Lenin to see Dr. Sun is still living in Leningrad for some months ago I heard from him. Marlin is the man who went to see Dr. Sun at Kweilin. The result of the talk between him & Dr. Sun later resulted in sending Joffe (Adolph) to see Dr. Sun at Shanghai.

I remember that Dr. Sun wrote to 廖仲恺 at Canton from Kweilin, asking him to receive Marlin, at same time asking Liao to destroy their letter. But 廖 did not do so & kept it in his safe, with the result that when 陈炯明 rebelled, 叶举 broke into his safe in the 财政部 & exposed this letter, accusing Dr. Sun of conniving with the Bolsheviks to introduce communism into China. Their letter was published in all papers here & abroad, making it "a great scandal", of betraying China etc, etc. The 帝国主义 made much of it naturally.

Pardon hasty note as I have too much to do.

Sincerely,

SCL

If you will go to the public library & read the newspapers of that period, you'll see this letter. [页边注一译者]

49. Sep. 18

Sept. 18th

Dear Dr. Ly & Dorothy:

Here are some fresh dates from my Peking garden which I hope you'll enjoy. They must be eaten quickly for they get spoilt easily here.

Regards from

SCL

50. Aug. 28

Aug. 28th

Dear Dr. Ly:

Thanks so much for your letter & for letting me see Ah Kiang's message, which I now return.

A friend sent me some chocolates & learning from Jessie xxx that you are fond of such sweets, I am sending to you & Dorothy with my best greetings,

As ever yours
SCL

51. Feb. 8

Dear Dr. Ly:

Here are some 玫瑰年糕 which you used to like so much. Hope you & Dorothy will enjoy it.

Very sorry my 感冒 forces me to remain in bed, so have not been able to see anyone during the 春节.

Best wishes.

SCL
Feb. 8th

52. Aug. 19

Dear Dorothy:

Thank you for your note. I am glad you got Phoebe something that she likes.

I am sending you 2 pairs of shoes which I am sure you can wear, and another pair for Phoebe as I have arthritis I no longer can wear high heels.

Will you please ask 戚景文 to bring 2 pairs of shoes to Rose Tan for me, as I have no one going to Hong Kong & don't know Rose Tan's address. This is a great favor for which I thank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With love to you.

Yours affectionately,
SCL
Aug. 19th

53. Jan. 24

Dear Dr. Ly:

Here is a better photo of the group that the xxx appeared in the papers. Yesterday, as it's less formal & more natural. Only bad thing about it is my swollen eyelids caused by sleeplessness & much reading (10 hours a day!).

I do not remember use [sic] it. It was most kind of Rose to send them, for I am suffering very much from the pains in all my joints.

Hoping you & Dorothy will enjoy these sweets & with affectionate greetings,

Yours ever

SCL

Jan. 24th

54. No dated

Dear Dr. Ly:

Many thanks for showing me your article of 邵力子. It is quite clear that Dr. Sun was aiming at 社会主义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For example his letter appearing in that Belgium Socialist paper "LePeuple" .

Yours

SCL

55. Nov. 8

Dear Dr. Ly:

Your reminiscences in this morning's paper is very good, and very necessary, because few of the reminiscences contained items of Dr. Sun's life abroad, among students, and what he said to them.

In reading this enclosed item, I am amused that some people are so simple-minded as to infer that Dr. Sun's anti-imperialist work, etc. developed as an outcome of seeing Li Ta-chao and Chiu Chu-pak. Please return same to me after perusal, but in your speech on the 12th please bear in mind to stress the fact that such work Dr. Sun started early in life (the Opium War, the Tai ping Rebellion, the Japanese 21 Demands, the British Threat to Bombard Canton, etc) , before he met any CP. Kindly destroy this note. I am not belittling their contributions, only as we value truth and facts, we must record them truthfully even if the facts are not what some people wished to see.

I intended to ask you and Dorothy to come for luncheon that day, but as you are going to lecture and perhaps see the old home with others, I shall arrange for another date. As soon as I can arrange it, shall let you know. Please do not send flowers or anything for I shall be overwhelmed with them. Just come without

anything for once, but with memories of your friendship.

In haste.

SCL
Nov. 8th

56. Apr. 20

April 20th
9pm

Dear Dr. Ly,

Thank you for your note & for letting me see the enclosed, which is important and I hope 李济深先生 will agree with what you said and has the courage to take this up.

My eyes are very bad so I shall continue when I feel better. Caught a cold which has affected my hearing.

Best greetings to you and Dorothy meantime.

SCL

57. Mar. 13

Dear Dr. Ly,

I hope you'll send me your phone number, I shall let you know when I have a moment to spare for your questions.

Please don't send me the 金鱼缸 because I have a big one already.

Best regards.

Yours,
SCL
March 13th

58. Feb. 17

Feb. 17th

Dear Dorothy,

Many, many thanks for the 鲍鱼 and especially the recipe for cooking.

I am sending a box of sweets for you and the other please pass onto Lily and Allen Teng for me.

Yours ever
SCL

59. No dated

[以上缺页—译者] I'm boring to say the least. Now that she cannot control herself. The party does not assign any work to her, so she goes visiting all the time, & speaks like a little girl & makes foolish gestures before an audience one day! What a sad thing it is!

I am getting a new treatment for my arthritis now, not the conventional massage. An old lady learned this method from a monk and has cured several persons already, however it will take time as my trouble has been of long standing. But I believe in her method.

With my warmest wishes & love.

Yours ever,
SCL

60. No dated

Dear Dr. Ly,

I have been xxx xxx back on important matters unexpectedly. Hope you are getting better & that you will be allowed to come out during the holidays

Just found out that the Parotin injections sent by Rose are for my arthritis. Will ask the doctor whether I may [以下缺页—译者]

61. Feb. 12

Dear Dorothy,

Here is a dish of almond chicken wich I hope you and Dr. Ly will enjoy.

With all my best wishes.

Sincerely,
SCL
Feb. 12th.

62. Mar. 31

[以上缺页—译者] the exact date of Sino-Soviet cooperation, but it was certainly after Adolf Joffe's visit to Dr. Sun in Shanghai on Jan. 26, 1923. A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中山大学 in Moscow, it was initiated by the Soviet Union after 蒋介石's visit there shortly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黄埔军官学校. I believe it was dissolved when both 蒋 & 汪 betrayed the revolution in 1927.

With best wishes.

Yours ever,
SCL
March 31st

63. Mar. 7

March 7th

Dear Dr. Ly,

How are you these days?

I have been laid up ever since Feb. 17th and the doctors are doing everything to cure my ailments. It is very painful indeed to be laid up when there are persons one wants to see and jobs to finish. However, one has to become philosophic, for what is the alternative.

Is Phobe Chen the girl I used to meet at Rose Tan's home?

With regards to you and Dorothy whom I hear is quite healthy, despite this rigorous winter, fortunately.

As ever yours

SCL

64. No dated

Dear Dr. Ly and Dorothy:

Your beautiful flowers sent here and 故居 were much appreciated. Owing to so many duties awaiting me to fulfill I had to postpone writing you. Moreover, my crippled right hand gives me much trouble, swelling and painfulness even now, as you know, my fractured bones were not set well, so that my ulna bone, outside the wrist juts out like a walnut, rendering writing inconvenient. You will see it when you come to see me. I wish I could see you right away but I have to see to my hypertension & attend to the 专家 who will come to inspect my hand & see what can be done to relieve my painful condition as well as pay visits to the dentist. But just want you to know I think of you & hope to see you when these necessary matters are attended to.

Have you any way to forward a gift to Rose Tan? Is her relative still here. I feel I must send Rose a gift to let her know she is not forgotten.

With affectionate wishes to you both.

As ever,

SCL

65. Mar. 18

March 18th

Dear Dr. Ly,

Here is the Scot wool scarf which Rose sent me but which I have never used as I have a Chinese woolen scarf almost likes it. I want Dorothy to have it, as she will find it useful in her travels.

This gold brocade shawl from India, please try your utmost to send to Rose Tan for me with my love and greetings. I thank her for always responding to my requests for things I need.

I hope that she will like it, and remember me when she wears the gold brocade shawl, rather scarf.

Please don't stay too long in 广州 for I hear it is terribly damp. Rather stay in 从化 where there is a fine hot spring.

Do hope that you both will enjoy your trip.

With my love to you and Dorothy.

In haste.

SCL

66. Aug. 9

Dear Dr. Ly:

Please do not refuse me this favour. Please ask Dorothy to buy some materials to present to Phoebe, since she refused to take the money. I have no other way to reimburse her for those tins of 月饼 which I want very much to give to certain people who like this particular kind of small moon-cake, that are a speciality from Hong Kong. This will be a great favour to me. If Dorothy does not help me then I must ask some one else to go and buy the material for Phoebe then.

With million thanks.

Yours ever,

SCL

Aug. 9th

67. June 3

Dear Dr. Ly,

Just a few 粽子 and Pipa for you and dorothy.

As ever

SCL

June 3rd

68. Aug. 9

Aug. 9th

Dear Dr. Ly:

1. Here is a new CR magazine for you. I am sending some 素火腿 which I ordered from 锦江 for you and Dorothy last night as you seemed to like it. But after you leave

it in the ice box, please steam it before eating. So it will be soft and easy to digest.

2. Enclosing 20 yuan which please ask Phoebe to buy some 椰子馅 & 莲蓉月饼 for me.

They come in this kind of box and bring them to Mr. Henry Tsai the manager of the China Travel Service there in HK. For Borwording. I leave also a letter & 2 gifts to Henry Tsai & wife. He will know whom to entrust them for Borwording there. When Phoebe talk to him, please don't use my own name but, "madame" instead. So bad persons can't play monkey tricks.

Many thanks to Tan and Phoebe.

SCL

69. Nov. 3

Dear Dr. Ly:

Who circulated the lying record that we were in Yokohama in 1914? I was never there with Dr. Sun, who never left Tokyo after he escaped there after Yuan Shih-kai's attempts to kill him by buying up his subordinates. We were married in [sic] October 25, 1915 in Tokyo, with 和田瑞、头山满、梅屋夫妇、朱卓文、朱慕菲等 as witness, and our marriage was recorded in the Tokyo. So many enemies tried to create rumours and gossips at that time but in the NCDNews of that day there was an account. Unfortunately it was burnt among other papers, divorce papers between him and SF's mother in April 1915 (with whom he had been separated since 1913) [sic] our marriage certificate with signatures from several friends) along with many other important documents during the Chen Chiungming attack.

We lived in a room — the editor's own room, above the Lecho chine, when we returned from Japan. He returned first secretly as Yuan was still living. So after Yuan died we rented a house on 63 route Vallon, and had an office on 44 route Vallon, right opposite our house. It was therefore either in 1919 or 20, or 21 that this house was bought by the Overseas members of Vancouver Canada, where Chen Shu-jen (陈树人) was chairman of the local KMT then.

I am very weary from the weeks of working on several articles, and nights of sleeplessness that I have no energy to write. Please pardon the bad typing. And last night they sent Mongsing to see me about broadcasting, etc. But I havenot [sic] made up my mind yet, although I should but my body is too exhausted — also mentally. For my relationship with Dr. Sun was such that even death could not make me forget our day to day work and closeness. To recall them means to relive them and this reacts on me deeply. Please kindly destroy this note. They are badly put and expressed. I should be ashamed to write so poorly about the deepest feelings I experienced but I am too weary to do it better right now. So pleased destroy this, and also remember

not to hold a religious memorial service for him.

In haste.

SCL
Nov. 3rd

70. Jan. 9

Dear Dr. Ly,

I hope you & Dorothy will enjoy this snapshot of my New Year's Eve party for people whom I've not seen for a long time, including Allen's daughters.

With best wishes.

Yours ever
SCL
Jan. 9th

71. Apr. 16

Dear Dr. Ly:

I regret very much that my request was forgotten, so I have only 2 copies of the French issue. If your nephews cannot read French, please write the Peking office to send me 2 copies of the English issue for you.

In haste.

SCL
April 16th

72. No dated

Dear Dr. Ly:

How are you these days? I hope you will be able to get out of hospital soon & enjoy the holiday at home.

With greetings from

SCL

73. No dated

Dear Dr. Ly:

Here is a 平湖西瓜 which I hope you & Dorothy will enjoy. I am sending Phoebe a 兰州瓜 for her to take back, also a box of the most precious 人參 which 金日成同志 presented to me. I hope Rose Tan will like this gift. It was such a pleasure to see you

all. I hope we shall have a big reunion in Peking next year at my place there.

With affectionate greetings to you all.

Yours,

SCL

P.S. Phoebe is such a nice sweet girl. I like her very much & only wish she could come to stay.

74. Feb. 9

Dear Dr. Ly:

Before I leave I want to return the rusks you so kindly sent me, as you need them more than I do. Along are some sweet biscuits for your tea.

I sent Allen a 100 dollars for him to get some things for his children, since I do not go shopping and don't know what they need. But he simply refused to accept the money. However, if Dorothy or you would explain to him my good intentions, he will have to accept them for his children and buy some things they need. Along I am sending them two packets of biscuits which are difficult to procure now.

If you need anything that I can get for you or Dorothy, please let me know and I shall do my best to get them.

With best wishes to you both.

Affectionately,

SCL

Feb. 9th